译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阶级分析方法

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精炼而“切中要害”地介绍了当代最主要的六种阶级分析视角，既包括延续传统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阶级分析思路，也包括布迪厄基于资本、索伦森基于租金以及后阶级分析等理论框架。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美〕埃里克·欧林·赖特/主编　马磊、吴菲等/译
Eric Olin Wright

復旦大學出版社

CAMBRIDGE

尽管很少有哪个主题像阶级这样在社会学中如此重要，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一个富于争议的概念。社会学家们不但在阶级的定义上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对其在社会理论中的主要功能以及对当代社会所进行的社会学分析中是否应该继续倚重这个概念都有不同见解。一些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阶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而另一些人则坚持阶级依旧是体现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权力的重要形态。一些人将阶级仅仅视为经济现象，但另一些人却采纳了更加泛化的定义，认为阶级不仅包括经济状况，也包含了文化维度。本书将探索阶级的六个主要传统的理论基础，每一章都由该领域的专家写就。在本书的结尾，通过抛出：“如果‘阶级’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的疑惑，我们将展现有关这些阶级分析方法的概念性图谱。

合著者：理查德·布林恩 (Richard Breen)，戴维·格伦斯基 (David Grusky)，简·帕库尔斯基 (Jan Pakulski)，奥格·索伦森 (Aage B. Sørensen)，艾略特·魏宁格 (Elliott B. Weininger)

埃里克·欧林·赖特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维拉斯杰出教授（*Vila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他新近的著作包括：《民主推进：授权式参与治理中的制度创新》（*Deepening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2003*），《阶级说了算：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19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声明：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销售。

上架建议◎社会学、政治学

ISBN 978-7-309-08014-8

9 787309 080148 >

定价：28.00元

阶级分析方法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美〕埃里克·欧林·赖特/主编　　马磊、吴菲等/译
Eric Olin Wright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阶级分析方法/〔美〕埃里克·欧林·赖特(Wright, E. O.)主编;马磊、吴菲等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
(复旦译丛)
书名原文: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ISBN 978-7-309-08014-8

Ⅰ.阶… Ⅱ.①埃…②马…③吴… Ⅲ.阶级分析 Ⅳ.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3188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rik Olin Wright,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ISBN 0-521-84304-9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udan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09-525

阶级分析方法
〔美〕埃里克·欧林·赖特 主编 马 磊 吴 菲 等译
责任编辑/马晓俊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5 字数195千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8014-8/D·497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纪念

奥格·索伦森

1941—2001

理查德·布林恩 (Richard Breen),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社会学系官方院士

戴维·格伦斯基 (David Grusky),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简·帕库尔斯基 (Jan Pakulski),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社会学教授与艺术学院院长

奥格·索伦森 (Aage B. Sørensen),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前任教授

艾略特·魏宁格 (Elliott B. Weininger),纽约州立大学布洛克波特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Brockport)社会学副教授

埃里克·欧林·赖特 (Eric Olin Wright),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维拉斯杰出教授(Vila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序　言

埃里克·欧林·赖特 (Erik Olin Wright)

2001 年 3 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第 4 频道的《今日》栏目播放了一个报告，与英国人口普查中新近使用的 7 种类别的阶层框架有关。这个节目邀请听众们访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看看自己属于哪一个阶层。在短短几天内，该网站的点击量就超过了 50 000，创下同类栏目的历史纪录。(可见)至少对于那些收听 BBC 早间新闻的英国人来说，阶级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这个栏目还访问了一些听众。一名警务督查在得知自己和医生、律师以及公司首席执行官一同被归为第一阶层时，回答道:“这难道意味着我在干园艺活的时候，得穿着白色网球套装？……无论在经济地位上还是社会地位上，我都觉得和他们不在同一个阶层。”在随后的一期“直播聊天”栏目中，很多人打电话向埃塞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的大卫·罗斯(David Rose)教授表达了对这个编码框架的抱怨，后者是此次人口普查所使用的新阶层类别的主要设计者。一个卡车司机不愿意被划分到第七阶层，认为自

己的工作很有技术含量,需要使用新的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罗斯解释道:"这个分类主要是为了捕捉到雇佣合同以及工作条件的本质差异,而非工作所含技术水平的不同,通常卡车司机的雇佣状况很不稳定。"另外一个听众问道:"当一个人既可以处于'第五阶层'又能被归为'第七阶层'时,怎么可能产生一种群体的意识?您想象得出由埃塞克斯大学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会是什么样子?难道是:'迄今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由第一、二阶层和其余阶层之间互相残杀的小战争串联起来的'?您不是这么认为的吧?"

英国广播公司听众的这些评论,体现了在大众的想象中"阶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含混不清的。对一些人来说,阶级就是生活方式和品位,意味着穿白色网球套装干园艺活。对另一些人来说,阶级等同于社会地位和受人尊重,如果在阶级框架中被重新划分到低的阶层就是一种羞辱。还有一些人将阶级看成是采取集体形式的抗争、塑造社会命运的社会类别。当政治家们呼吁"降低中产阶级的税收"时,他们仅仅是指"处于收入分布的中间区域的人"。另有许多人和罗斯教授一样,将阶级看成是标志一个人的经济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

大众用语中阶级意义的含混不清,同样见于更为学术的场合。在社会学或描述性或解释性的语境下,"阶级"一词常常被滥用;当然,人们会根据语境的需要,信手赋予阶级一个概念。如果考虑到阶级这个概念所要应付的那些纷繁复杂的描述性或解释性任务,我们就不难理解围绕阶级的辩论为何总是那么令人困惑。当然,这些辩论有时是实质性的——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时,(学者)会提议一些替代性概念;而更多时候,争论仅仅体现了学者们对于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有些社会学家声称阶级正在消亡,他们是指人们越来越少地在阶级意义上形成稳定的认同感,也就更少以阶级

为基础采取政治行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阶级仍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持续特征，而他们指的是生活中的经济地位依然很显著地由个体和各种有价资产的关系决定。

本书的主旨在于澄清一系列有关阶级的替代性的概念化，这些复杂的概念化植根于阶级分析的不同理论传统。书中的每一位作者都已在不同的阶级分析传统下探讨过有关阶级和不平等问题，并著作颇丰。我请他们每个人都为各自所处的阶级分析传统写一个理论宣言。这样做的目的是阐明他们所偏好路径的理论基础：摆出潜在的预设、系统性地定义每一个概念元素、指明概念的解释范围，并在需要的地方区分自己和其他人的路径。虽然这些路径可以或多或少地追溯到经典的社会理论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但本书中的章节首先并不是要在这些奠基人的背景下讨论阶级概念；此外，它更不应被视为有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或者其他阶级分析类型的权威性、正统性论述。每个传统本身内部就有很大差异，所以即使宣称属于同一条思想洪流，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阐明阶级概念的方式。最后，我也请这些作者尽量不要写成扩充版“文献综述”，如同有关社会阶级的教科书一样。本书的每一章中，我们将尝试厘清每一位作者研究领域中阶级概念化的分析性基础，依此阐明阶级分析中更大的分野领域。

本书将展示六个不同的视角。第一章的作者是埃里克·欧林·赖特，呈现在马克思传统下的阶级分析路径。该章的中心思想是由剥削过程定义的阶级概念，并将此概念与经济关系的替代性系统相连。第二章由理查德·布林恩(Richard Breen)写就，其阶级分析形式与韦伯传统以及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的研究有关。该章主要关注以个人的经济生活机遇为基础发展出的阶级概念，更具体地说是劳动力市场所提供、工作

组织所呈现的雇佣关系之特征。戴维·格伦斯基(David Grusky)撰写的第三章描述了涂尔干社会学理论传统之下的一种阶级分析。该分析的核心原则是,职业劳动分工的具体位置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同质化影响。因此,需要在分层系统的高度解组的(disaggregate)类别中辨别阶级的位置。艾略特·魏宁格(Elliott Weininger)的第四章呈现了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阶级分析有关的中心原则。在布迪厄的框架中,阶级的定义与不同维度的"资本"有关;这里"资本"被理解为一种资源的多维度空间,而这种资源可以生产权力、塑造行动者的机遇和态度。第五章的作者是奥格·索伦森(Aage Sørensen),他将介绍一种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推理影响很大的阶级分析图式,特别可追溯到李嘉图的"租金"(rents)概念,按照这种路径,在一个信息完备、竞争充分的市场中,阶级根本不可能存在;只有当某些排他性地抓住了由市场的不完善所产生的租金时,阶级才出现。在第六章中,简·帕库尔斯基(Jan Pakulski)阐明了一种基础,我们也许可以称为"后阶级分析"。他认为阶级本身,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传统下理解的阶级,已经不再是经验研究中有用的类型了。在当代社会中,不平等也许仍然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他认为不平等已经不再通过阶级被组织起来了。最后,本书的结论部分将讨论阶级分析的这些传统如何围绕不同的中心问题而固定下来,以及中心问题的这些差异如何投射到不同的阶级概念中去。

译者:吴菲[①](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

① 吴菲: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毕业,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封闭与同质婚。

目 录

图形 / i

表格 / ii

合著者 / iii

序言 / 1

第一章 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基础 / 1

第二章 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基础 / 34

第三章 新涂尔干主义阶级分析基础 / 58

第四章 布迪厄阶级分析基本原理 / 95

第五章 基于租的阶级分析之基础 / 141

第六章 后阶级分析之基础 / 181

结论 如果“阶级”就是答案，那问题是什么呢？ / 216

参考文献 / 231

术语表 / 245

译后记 / 257

图　形

图 1－1　阶级分析的三种模型 / *28*

图 2－1　工作维度（契约风险来源和雇佣关系形式）与职员阶级分类框架（摘自 Goldthorpe,2000，p. 223，图 10.2）/ *45*

表 6－1　不平等的构成——一个类型学 / *206*

表 格

表 2-1　戈德索普阶级分析框架的可能组合 / *47*

表 3-1　按照阶级结构化的类型和数量分类的国家 / *75*

表 3-2　生产领域中的社会性组织模型 / *89*

表 7-1　阶级分析的六个基础性问题 / *218*

表 7-2　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和布迪厄传统的生活机会问题 / *224*

第一章
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基础

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

阶级(class)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比在其他社会理论传统方面具有更大的理论抱负,反过来,这又加重了其理论基础的负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或与之联系密切的概念,如"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是一般历史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①的核心概念。这一理论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解释广泛的社会现象,例如:社会变迁的时代轨迹和发生在特殊时空的社会冲突,宏观层面的国家制度形式和微观层面的个人主观信念,大规模的革命和静坐抗议等。诸如"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发动机"和"现代国家的管理者是资产阶级委员会"之类的表述,就表达了以解释为重点的阶级概念的宏大理论抱负。

---

① Cohen(1978)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进行了系统且严格的表述。

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解释主张（如果说不是放弃全部的解释性理论抱负的话）。很少有学者再去捍卫"阶级第一位"（class primacy）的刻板说法。不过，阶级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在承担更多艰难的理论解释工作方面被寄予厚望。实际上，在激进的平均主义规范性原则的具体指引下，一个更好的结论是：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特别是社会学内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特色和活力的体现。因此我认为，"作为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才算比较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核心①。

本章的工作是以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传统高度一致的方式来展示阶级概念的核心分析基础。这本身是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他们并未就"阶级分析的核心概念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达成一致。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传统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阶级分析重要性的关注，即认为阶级分析主要是用来理解反抗资本主义压制的条件的；另一个是这一领域发起争论时所使用的语言——艾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恰如其分地把这一领域称为"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但是，这一传统却并不重视理论的精确定义和演绎性定理的发展。正是这个原因，本章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只代表了我在这一传统内部的具体立场，它并不是对通常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卡尔·马克思本人作品的权威解释②。

---

① 对"作为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更加广泛的讨论，参见 Burawoy 和 Wright（2001）以及 Wright，Levine and Sober（1993）。

② 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解释的传统里，有大量文献是对马克思本人作品中涉及的阶级概念和各种阶级分析观点的注解。对马克思本人处理阶级方法的说明，参见 Cotreel（1984，第二章）。对于各种可供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全面评论，参见 Wright（1980b）。与本章概括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有所区别的例子，参见 Poulantzas（1975）；Carchedi（1977）；Resnick and Wolff（1987）。

本章的阶级分析包括以下两点主张：其一，笔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与其他理论传统区分开来的最主要的概念是“剥削”(exploitation)；其次，以剥削为核心的阶级概念为研究当今社会上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本章的目的是论证上述两点主张。本章第一节展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要点，即它试图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首先要做的是澄清那些与阶级分析相联系的规范性问题。在第二节，我们将仔细研究构造阶级和剥削分析时所需的一系列概念性的解释。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部分的学究味有些浓，就好像读一本字典一样索然无味，但我却认为这部分对于清晰的概念推演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第三节详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韦伯主义传统关于阶级分析的一般性主张。这将有助于在第四节探讨马克思主义概念与韦伯主义概念的区别，并确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更加广泛的理论主张和发展潜力。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对剥削概念进行阐释——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关键因果机制之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关系将通过剥削机制而产生社会作用。最后，在第五节，我将简单地勾勒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所可能产生的学术成果。

一、大画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到底是什么

就其核心来说，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分析植根于对激进平均主义形式的一种道德承诺。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大愿系统地为这些道德承诺而辩护了。马克思自己认为探讨“公正”(justice)和“道德”(morality)是没必要的，甚或是有害的，并相信关于道德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只是对物质条件和行动者利益的反映。马克思不愿使用社会公正或其他规范性原则为社会主义辩护，相反，他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存在

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宿命。然而，马克思自己的作品里却到处充斥着“道德判断”、“道德暴力”和“道德幻象”。正是因为这一目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分析才从它与激进平均主义规范的关系里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为了完整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传统阶级概念的理论基础，我们有必要简单地澄清这一规范性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所隐含的激进平均主义思想可以用三个命题来表述。下面我将分别阐述这三个命题——但并不涉及这三个命题的适用条件和值得修正的部分——因为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澄清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特征，而不是为该理论自身进行辩护。

*激进的平均主义命题：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必将通过一种激进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而得到提高*①。马克思鼓吹的分配理论的经典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及马克思提倡的“无阶级”(classless)社会理想，都反映了激进的平均主义这一论题。马克思鼓吹的主要是一种物质资源的平均分配方式：一个家庭里，孩子的需求越多，就应该得到更多的资源，家庭里的每位成员都应该根据家庭的需要，尽可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作。这种分配方式也适用于公共图书馆：你只管考虑一下你需要什么书，无需为能否支付的起而发愁。这一思想深信，如果这些分配原则能够在整个社会得以推广，全体人类的生活必将会更加繁荣②。

---

① 这里所说的激进平均主义命题并非是关于公正的命题。激进的平均主义思想主张，人类生活在平均主义条件下将比在不平等和等级制条件下更加繁荣，但它并未规定达到这一繁荣状态必须用公正来保障。我相信这是一个社会公正的问题，但是这一信念在本文中并不是必需的。

② 关于精确的“平均主义”定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平均主义能成为一种合理化的规范性原则问题，已经成为众多争论的焦点，而且其中一些争论还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启发而展开的。对这一问题的全面综述，参见 Swift (2001)。因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有关公正的平均主义理论的探讨，参见 Cohen(1995)。

*历史可能性命题：在经济水平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通过物质资源激进而持续的平均分配方式来组织社会便具有物质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平均主义规范性原则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了一些永恒的人类价值——虽然也有可能如此——同时，它也体现在实践性的政治规划当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蓝图的核心是试图理解把道德理想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社会实践的条件。其基本思想如下：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增加、绝对贫困不断减少的时候，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实践性原则，激进的平均主义变得越来越可行。这一论题的最强烈的表达方式是，在物质贫乏没有克服之前，严格来说，平均主义理想不可能得到实施和维持；稍微温和一些的表达方式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使得物质资源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更加可行。

*反资本主义命题：资本主义阻碍了物质资源的激进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达成。*资本主义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把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使得激进平均主义具有物质上的可行性的程度，不过，资本主义也创造出了一些阻碍平均主义形成的制度和权力关系。当然，这也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戏剧性和悲剧性埋下了伏笔：这一过程既不断地创造出了人类繁荣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又阻碍了进一步实现生产潜力的生产条件的再创造。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只有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彻底克服这些阻碍。多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民主思想流派都同意“资本主义是平等的大敌”这种说法，但他们却拒绝承认资本主义能够逐渐过渡到平均主义的社会秩序。当然，激进平均主义理想的完全实现可能仅仅是一个乌托邦。但即使“无阶级”的社会难以形成，“少阶级”(less classness)的社会也可以作为一个核心的政治目标来追求，当然，这一目标仍需要通过不断地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

上述每一个论题都颇具争议，都需要更广泛的材料来进行论

证，但在本文中，我把它们看作是为思考阶级概念提供了广泛背景的一组假定①。不管阶级概念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传统里，它都有助于我们理解规范性的安排所需要的条件。这同时意味着阶级概念需要与资本主义理论而不仅仅是公平概念相联系，并且它需要在澄清平均主义替代现存制度的困境和可能性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开始深入探讨阶级分析概念的构成，通过这些概念的组成部分，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适合本文分析的完整的阶级概念框架。

二、阶级分析概念的构成

“阶级”一词既可以用作名词，又可以用作形容词。作为名词时，人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你处于哪一个阶级？”答案可能是“工人阶级”。作为形容词来使用，“阶级”一词构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如：阶级关系、阶级结构、阶级位置、阶级形成、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等。一般来说——正如下面的分析将要澄清的——我认为“阶级”一词作为形容词来使用更有意义。实际上，当人们经常把“阶级”一词作为名词来使用时，其实他们省略了

---

① 对这些命题的质疑十分普遍。对于激进的平均主义命题，有两种论点经常被提及：第一，即使平等可以促进人类繁荣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为了物质资源的完全平等而进行的再分配也是不公平的，原因是它剥夺了那些通过正当手段获得物质资源的人的利益；第二，激进的平均主义物质资源分配不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人类的潜力，而是不断制造出了消极、懒惰和死板。对于历史可能性命题，许多人认为，只有到足够多的物质激励促进人们在技术和资本方面进行不断投资的时候，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够维持。因此，任何向激进的平均主义状态的转移都会难以维持，原因是它将导致物质丰裕性的紧张。对于反资本主义命题，批评者认为，虽然资本主义有可能阻碍社会向激进的平均主义过渡，但它并不会阻碍人类繁荣。相反，资本主义制度为实现个人的生活理想创造了最多的机会。

很多的东西。例如，“工人阶级”一词通常只不过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的工人阶级位置”或“阶级冲突中的工人阶级集体组织”的简略表述而已。因此，我一般都会把这一术语作为形容词来用，只有涉及分类性概念领域时，我才把“阶级”作为类别性的名词术语来使用。

因此，为了厘清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础，我们需要正确地思考“阶级”一词作为形容词的含义。这里关键性的概念是“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其他阶级分析的概念术语——阶级斗争、阶级利益、阶级形成、阶级意识——的含义都是在与“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关联中派生出来的。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对于所有阶级分析中所遇到的问题，纯粹的阶级结构性概念都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政策在不同的时空的变化，“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显然是比“阶级结构”更重要的概念性术语。尽管如此，阶级分析的概念性基础仍然是理解“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问题，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这两个概念是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将从八个方面考察概念性的问题：1. 生产的社会关系概念；2. 作为生产关系形式的阶级关系；3. 阶级关系“差异”的含义；4. 阶级关系中的复杂性问题；5. 阶级关系中“位置”的含义；6. 阶级位置的复杂性；7. 宏观和微观层次的阶级分析；8. 阶级“行动者”(agency)。总的来说，虽然这八个问题与能否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清楚地阐述阶级概念有关，但它们中的多数也都与其他的阶级分析问题相关。

1. 生产的社会关系概念

任何生产制度都需要对一系列的资产、资源或生产要素进行配置，如工具、机器、土地、原材料、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这种配置方式用技术性的术语来描述就是生产函数——把各种投入在某

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最后得到某种具体的产出。这一配置方式也可以用社会关系的术语来描述：生产者在要素的使用及其生产成果的占有方面拥有不同的权利和权力①。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的实际结合和使用方式——正如它严格依赖生产函数的技术特性一样——主要依赖于权利(力)的运用。这些权利(力)的总和就构成了"生产的社会关系"。

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对资源所拥有的权利(力)是社会关系的特征，而不是对人与物关系的描述。例如，一个人对土地拥有的权利(力)，就界定了一个人与其他人在土地使用和土地成果的占有方面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调节和控制人们活动的主要方式是权力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系列有价物品的分配。

2. 作为生产关系形式的阶级关系

当人们对生产性资源拥有的权利(力)不对等的时候——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对某些特定的生产性资源拥有更多的权利(力)——这些关系就构成了阶级关系。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关系最鲜明的对比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劳动力的所有者，这是因为"所有"(owning)一词是对生产过程中使用资源的权利(力)的描述。

权利(力)并非指对所有东西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而仅仅指在生产过程中进行要素配置时所用到的资源或资产。资本家也不是指那些仅仅拥有机器的人，他不但拥有机器，而且在生产过程中还要调配这些机器，雇佣劳动力来使用这些机器，还要指挥整

① 这里所说的"权力"(powers)，指的是对资源的使用和处置方面的有效控制，"权利"(rights)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附加条件。"产权"(property rights)指的是"使用由国家强制执行的财产的有效权力"。许多情况下，在一个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里，权力和权利是紧密联系的。但即使以"产权"这种合法形式为主的控制方式不存在，对资源持久而有效地控制也仍然是可能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过分强调权利和权力的差别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这里我将同时使用这两个词语。

个生产过程，侵吞生产所带来的利润等。仅仅拥有这些机器还不能成为一个资本家。因此，阶级关系要想成立的话，完全占有资源并不是充分条件，还要有对使用资源所获得的劳动成果进行分配的权利（力）。一般来说，这意味着要对配置资源所获得的收益进行分配。

3. 阶级关系“差异”的含义

就某些使用“阶级”术语的方式来说，定性地讨论各种不同的阶级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阶级被简单地划分为几种普遍的类型，如“所有者”和“无产者”等。当然，阶级也有着数量上的变化——正如根据人口分布的变化划分人口学意义上的类型一样——根据贫富差距的变化也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阶级类型。但就阶级关系的本质来说，这些思路并未给阶级在性质上的变化留下多少理论空间。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认为虽然阶级关系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是要确定这些阶级关系之间差别的基础是什么。其基本的思路是把阶级关系的差异归结为生产关系中各种权力（利）的差异。例如，考察三种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最常见的阶级关系：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在奴隶制阶级关系中，说奴隶主“拥有”奴隶，就意味着奴隶主对于一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资源——“人”——拥有一系列的权力（利）。在极端情况下，奴隶主对奴隶拥有绝对的财产权。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人”拥有所有权是被明令禁止的。人们可以拥有私人的土地和资本，但是却绝不能拥有其他的“人”。这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成就之一：它已经完成了对于一种特殊资产的激进平均主义分配——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单位的劳动力，也就是他们自己。

运用这一思路，通常所认为的“封建主义”就可以被解读为一个由封建主和农奴共同对农奴的劳动力拥有所有权的社会。对于

封建主义的传统描述是，它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在一周的时间里，农民(农奴)有一部分时间被迫在地主的土地上劳作，剩下的时间才能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劳动。农民有部分时间为地主(封建主)劳动的义务，这意味着地主以占有农民部分时间的劳动力的方式拥有了对农民的财产权。这一所有权涵盖的内容比奴隶制下的完全所有权要少——因此，我们以“共同所有权”(joint ownership)来表示地主和农民对农民劳动力的共同所有。当农奴逃离土地以达到逃脱为地主劳动的义务时，地主有权强行将其追回。实际上，逃离土地意味着农奴已经偷走了地主的一些东西：也就是农奴的劳动力中属于地主的部分①。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主有权让警察追回被工人偷走的机器一样，封建主也可以使用强制的力量来追回被农奴“偷走”的劳动力。

4. 阶级关系中的复杂性问题

许多阶级分析的术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都以十分僵化、简单、两极化的语言来描述阶级关系。阶级斗争被描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地主和农奴(农民)、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斗争。从抽象层次上来说，这一简化的形象确实捕捉到了一些关于阶级关系的基本性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公开的冲突下确实隐藏着利益的对抗。但这种两极化的形象也具有明显的误导性，在具体的社会中，阶级关系从来没有这么简单。阶级分析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探究阶级关系中复杂的细节性问题。

在阶级关系中存在着两种特别重要的复杂性。首先，在大多数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关系往往是共存的，并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

① 对地主有权强制带回逃走的农民的一般表述是：农民被封建制的权利义务关系“拴在了土地上”。这一束缚的重点是地主对农民的劳动力(或至少是对劳动力成果，假如是采取租金的形式的话)拥有所有权，因此，阶级关系的内容实际上是围绕着以劳动力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利(力)关系展开的。

一起[1]。例如，在美国国内战争之前，南方的奴隶制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就是共存的。这个社会运作的具体动力机制和矛盾来自不同阶级关系原则的结合。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一些佃农耕种土地就包含着明显的封建主义因素，当然也包含着复杂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如果我们愿意把生产方式的国家官僚所有制描述为一种独特的阶级关系的话，那么，今天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把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阶级关系结合在了一起。为了完整地理解某一具体社会的阶级关系，就需要识别出不同阶级关系结合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其次，正如我们之前对封建主义的简单讨论中所看到的，人们对某种资源所拥有的权力(利)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权力(利)束集合，而不是简单的、单一的产权。当人们思考各种生产要素的权力(利)时，很容易把权力(利)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二元结构：要么拥有某种东西，要么就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所有权”似乎具备这样的特征：如果我拥有一本书，我可以对它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包括烧掉它，用它做垫脚来打开一扇门，把它送人，卖掉它，等等。实际上，即使对某种东西拥有所有权，事情也远不止于这么简单。一些权力(利)有“所有者”，另一些由其他人或集体部门所拥有。例如，让我们来想象资本主义工厂的机器。用通常的观点来看，这些机器为那些购买它们的资本家“所有”，因此，这些资本家可以卖掉它们，或使用它们来产生利润，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对这些机器的使用拥有绝对的、完整的权力(利)。比如说，只有在这些

---

① 描述各种阶级关系在不同的生产单位共存的术语是“生产方式的连接”(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最典型的连接方式是不同阶级之间依靠交换关系的形式而存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在南方，奴隶制关系存在于种植园里，资本主义关系存在于工厂里。种植园给工厂提供棉花，而工厂给种植园提供农业机械设备。

机器满足了国家设定的一些安全和环境方面的标准之后，资本家才能开动这些机器。如果工厂存在于一个高度工会化(unionized)的社会环境里，资本家就不得不雇佣工会的成员来操作机器。实际上，无论是国家对机器使用的管制，还是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都意味着对这些机器所拥有的部分产权已经从资本家手里转移到了集体部门。这同时说明，至少生产资料的部分产权已经被"社会化"了①。

在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复杂性其实是普遍存在的：政府对工厂生产行为的管制，工会在董事会中拥有代表席位，共同决定计划(co-determination scheme)的实施，工人获得了持股权，部分权力转让给管理者阶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财产的权力(利)被重新分解和再分配，而财产的权力(利)本来是基于"拥有生产资料"这样的思想中的。对权力(利)的再分配带来了阶级关系的变化。这些对权力(利)进行再分配的制度使得阶级关系明显脱离了简单、抽象的两极化形式。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了——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修正，在资本主义的私人控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对资本分配和利润控制的基本权力依旧存在——但上述现象也表明，通过各种权力(利)的分解、分配和重新组合，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阶级分析的目标之一就是理解各种变化了的阶级关系。不过，复杂性指的是阶级关系形式的复杂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因为我们讨论的社会关系仍旧是由人们对经济资产拥有

① 这也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和社会主义阶级关系*相互渗透*(interpenetrate)。如果不同阶级关系的*连接*(articulation)可以表述为不同的阶级关系存在于不同的生产单位中，彼此之间通过外部关系进行互动，那么不同阶级关系的*相互渗透*就可以理解为：在单一的生产单位中，对资产分配的权力(利)是通过同时结合两种不同的阶级关系而产生的。

的不对等的权力(利)所构成的。

5. 阶级关系中"位置"的含义

在实践层面,多数关于阶级的社会学讨论都集中在最优阶级位置的划分或称为"阶级分类"(class categories)上,而不是讨论阶级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多数经验研究特别是定量的经验研究,都是以个体层面收集的数据为中心进行分析的,所以,在社会结构中给个人位置进行定位就变得十分重要。具体到阶级分析,这意味着在阶级关系中给个人指定一个合适的位置。实际上,这种操作方法需要事先确定一个标准,该标准既能区分出不同的阶级位置,又能划分出阶级类型的数量。

以上述方式使用阶级概念进行研究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至少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我们不应该遗漏这样的观点:"阶级位置"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中——即阶级关系,而不是在个人的原子化(atomized)特征中——把个人分配到某一社会位置上去的。有关社会关系的思想,其背后的假定是:当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当人们以各种方式做出选择并行动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在和其他同样做出选择并行动的人的关系中被系统性的结构化了①。"社会关系"是探讨人类行为固有的结构性互动特征的一种方式。具体到阶级关系,这一思路主张对生产性资源所拥有的权力(利)对于理解人类行为结构性互动特征是非常重要的。阶级关系范畴里的"位置",指的是个人在结构化互动模式

---

① 人们是在与他人的结构化关系中做出选择并行动的,这为选择和行动问题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例如,这一思路表明,选择不一定非得以理性最大化为基础,行动也不一定非得是人们有意识的选择。同时,这一思路也表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思路不一定是成立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对于社会过程的解释可以化约为有关个人选择和行动的各种特征。社会关系自身应当也具有解释力。因此,我们这里所谈到的社会关系概念,既未暗含着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也不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观点的简化版本。

中的处境。

6. 阶级位置的复杂性

乍一看来，识别阶级位置不过是个简单明了的问题罢了。首先，你只需要界定清楚阶级关系的概念，然后，你就可以从这些关系中推导出一系列阶级位置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资关系是最核心的阶级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了两个阶级位置——资本家和工人。

正如我们在“阶级关系中的复杂性问题”一小节所讨论的，对于一些问题来说，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区分为两种就足够了。但对许多其他问题来说——如阶级位置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阶级位置的这样一个双阶级位置模型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如果我们想理解人们在工作中是如何形成主观体验的，或者是工会组织者在工作场所面临的困境，或者是政治斗争中人们形成不同联盟的发展趋势，或者是人们过上丰裕生活的前景如何等，对于这些问题，仅仅在一个阶级关系的两极化模型中知道了谁是资本家、谁是工人是不够的。

在阶级位置的两分模型解释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保留简单的两分模型（又称为“两阶级模型”），然后增加阶级分析过程的复杂性。比如说，为了理解人们在工作中主观体验的形成，我们可以引入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件的差异——自主的程度，监督的严密程度，责任的大小，工作在认知方面的复杂性，工作对体力的要求高低，升职的前景等，这些都是与理解工作体验相关的因素。对阶级关系中占据了工人阶级位置的人来说，可以把上述这些因素看作是工作体验变异的来源，在这一框架中，工人阶级的位置是在简单的两分阶级模型中得到界定的。第二种选择是，我们可以把上述所谓“工作条件”的差别看作是在具体阶级关系中对人们进行阶级定位的方式的差别。例

如，一个工人对其他工人所拥有的权威的程度，可以看作是对生产过程中权力（利）的具体分配情况的反映。

在本文的阶级分析框架中，我倾向于选择第二种分析策略，即直接把各种各样的复杂性并入到对阶级位置的考察中去。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要固守这样的信念：即我们想操纵我们的阶级分析概念，使得阶级位置能够尽可能地以我们想要的方式被解释。选择第二种分析方法其实是基于以下思考：所谓阶级位置的复杂性，实际上是对经济资源所拥有的权力（利）在不同的阶级位置间分配的具体方式的复杂性。

难点就在于以一种系统而严格的方式来把复杂性引入对阶级位置的分析中去，而不是简单地把复杂性看作是混乱与无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去思考导致复杂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并识别出这些原因在定位个人的阶级位置时的含义。对于阶级分析来说，有五个方面的复杂性来源特别重要：

1. 由阶级关系的复杂性推导出的阶级位置的复杂性：拆分阶级关系中的权力（利）

2. 把个人分配到阶级位置上的复杂性：同时占据多重阶级位置

3. 阶级位置短暂特征的复杂性：职业和职位

4. 阶级关系中的阶层

5. 家庭和阶级关系

（1）对权力（利）的拆分。如果与阶级关系相对应的权力（利）确实是一系列可分解的复合体，那么，它们必然可以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分解并进行重组。由此，便会产生一种我以前讨论过的阶级关系概念——即“矛盾的阶级关系定位”（contradictory location

within class relation)①。举例来说，可以把公司的经理看作是实施部分资本权力的人——聘用或解雇职员，决定是否使用某种新技术或是否变革生产过程，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在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中占据了资本家的位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般说来，他们既不能卖掉整个工厂，也不能把工厂里的资产价值转化为个人的消费，如果工厂的所有者不高兴了，他们还有可能遭到解雇。这样看的话，他们在阶级关系中占据的是工人阶级的位置。上述为了理解经理人员的阶级特征而实施的分析策略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在既定的阶级位置上，各种有关生产资料的权力(利)结合在了一起，共同界定了一系列真实而有意义的因果过程(causal processes)。

另一种"矛盾的阶级关系定位"基于以下方式：一些技术和资格证书赋予了持有者有效控制工作的诸多方面的权力(利)②。特别是对受到雇佣的专家来说情况就更是这样了，在和雇主的雇佣关系中，专家们对工作条件的控制组成了一种特殊的雇佣形式。不但对受雇的专家如此，对一些高技术的非专家性质的职业来说，也存在着雇佣关系中权力下放的问题③。

(2) 把个人分配到阶级位置上。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两份工

---

① 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参见 Wright(1985，第 2 章)和 Wright 等(1989，第 1 章)。

② 对工作条件的控制构成了劳资关系中权力(利)的重新分配，这种情况下，雇主不再有能力支配这类雇员的生产活动，并且被迫给雇员提供了一种长期稳定的公平合约，John Goldthorpe 称这一合约为"预期报酬"(prospective reward)。更极端的表述是——正如 Philippe Van Parijs 在 Wright 等(1989)的著作中所提到的，上述情况比较接近赋予职工部分财产权的性质。John Goldthorpe 把这种雇佣关系称为*服务关系*，目的是为了把它和通常的劳动工资关系区分开来。

③ 我已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系统地表述了此类位置中存在的对立阶级关系。在我早期的工作中(Wright，1978)，我把他们称作是"半自主的受雇者"(semiautonomous employees)，并强调了他们对工作条件的控制。在后续的研究中(Wright，1985，1997)，我把他们称为"专家"，并进一步强调了他们对知识和资格证书的控制，以及这种控制方式对剥削问题的影响。

作，在同一社会生产关系中，这两份工作可能拥有不同的阶级位置：一个人可以在企业中做经理或雇员，同时可以以自雇形式从事第二职业。一个同时兼职做自雇木匠的工厂工人，其在阶级关系中占据的位置要比没有做兼职的工人复杂的多。进一步讲，在资本主义企业里，一些处在工人阶级位置上的工人也可能拥有股份（或者是他们所在企业的股票，或者是其他企业的股票），虽然股份有限，但其占据的终究是资本家的位置。那些在实施“职工持股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ESOP”）的企业里工作的工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中所处的工人阶级的位置，只不过是他们不再仅仅处于他们原来所处的位置上：他们同时处于两个阶级位置。

(3) *位置的短暂性*。某些工作仅仅是人们职业轨迹中的一部分——工作的种类序列总是在不停地变化——这表明，这些工作的阶级特征也存在变化的可能性。比如说，在一些工作组织里，大多数经理人员开始时并非就处于经理的位置上，但是在经历了车间学徒阶段之后，这些人开始在管理等级阶梯上不断上升。即使他们有时和普通工人在一起工作，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与管理性的职位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这些信息对于理解此类工作的阶级特征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人们对于此类工作的兴趣和经历都明显受到了未来工作与现在工作的联系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人们因拥有目前的工作而在阶级关系中占据的位置称作“短暂的复杂性”（temporal complexity）。进一步地讲，因为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那么，阶级位置的暂时性维度也意味着人们在阶级关系中的位置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4) *阶层与阶级位置*。如果阶级位置是根据人们拥有的生产资料、从事的经济活动中所具有的权利（力）来界定的话，那么，阶级位置中的另一种复杂性主要是指受到权利（力）约束的资源的数

量和经济活动的范围。我们既能看到拥有巨额资本、并在全球雇佣了成千上万雇员的大资本家，也能看到在一个小地方、雇佣了为数不多的雇员的小资本家。虽然这两类人都被称作“资本家”，但他们掌握的权力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于处在工人阶级位置上的工人们来说，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和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上，其中，市场能力指的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索要不同工资的能力。如果一个工人掌握了一种比较稀有的技术，除了基本工资以外，他(她)甚至可以向雇主索要一部分“租金”。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他们既无法拥有也不能控制生产资料，为了生计，他们都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不同的是，这两类工人所拥有的技术水平是存在根本差异的。上述讨论表明，占据同一阶级位置的人们在某种资源的占有上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在同一阶级位置内部存在着分层现象。

(5) 家庭和阶级位置。人们不仅可以通过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控制和使用而形成阶级关系，还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和血缘关系——来塑造阶级关系。我们之所以关心一个人的阶级“位置”，是因为我们相信，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贯穿于他(她)整个生活的阶级关系将会有助于他(她)的经验、兴趣和选择等行为的形成。如果你和一个资本家结了婚，无论你做什么，你的兴趣和选择行为都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这一事实就是有关你的阶级“位置”的事实。我们可以把阶级位置问题的这样一种特殊维度称作“阶级关系中的间接性位置”(mediated locations within class relations)①。间接性位置对于理解儿童、退休人员、家庭主妇和双职工家庭中的成员的阶级位置来说特别重要。“间接性位置”的引入增加了阶级分析的复杂性，这一概念说

---

① 参见 Wright(1997，第 10 章)。

明，一个人的直接阶级位置——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而在阶级关系中得到的定位——和一个人的间接性阶级位置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假设办公室的一位女性打字员嫁给了一个公司经理。当从事有偿职业的已婚妇女的比重不断增加、并且她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不断增多时，女打字员和经理结婚的例子——一种“跨阶级的婚姻”，恰恰说明了阶级位置的复杂性①。

上述种种阶级位置的复杂性说明了我们通常讨论到的阶级是有问题的。人们通常会问：“这个社会总共有多少个阶级?”比如说，人们认为我本人对阶级结构的研究工作就是一个所谓的“十二阶级模型”，这是因为在我的一些作品中，为了研究阶级意识或阶级流动，我构造了一个能进行此类分析的十二种类型的阶级变量。具体到本书所讨论到的阶级分析框架，我认为人们对一个社会有多少阶级的提问实际上是误解了阶级位置与阶级的区别。一个阶级“位置”并非是一个阶级，它仅仅是阶级关系中的位置(location-within-relations)。在对阶级结构的分析中，阶级位置的数量主要取决于研究者所要分析的问题的精细程度②。对于一些研究问题来说，对阶级关系中的位置进行精细划分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和自身对各种资源所拥有的权利(力)之间的关系是具有解释意义的。例如，我在关于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关系的研究当中，发现进一步的细化阶级位置十分必要③。对于其他一些问题来说，把阶级关系中的位置进行粗略一些的划分或许能提供更多的洞见。在关于

① 1980年代，大约1/3的美国双职工家庭属于这种“跨阶级婚姻”的家庭，也就是说，约有12%的美国成年人生活在这种类型的家庭中。参见Wright(1997，pp. 226－227)。

② 我对阶级位置的“数量”的看法与Erickson和Goldthorpe一致，他们在文中写道：“我们相信唯一可行的答案是(对于一个社会有多少个阶级的问题)，阶级的数量只要达到有利于经验性的分析目的就可以了。”Erickson和Goldthorpe(1993，p. 46)。

③ 参见Wright(1997，第14章)。

阶级妥协问题的研究中，我就把整个社会仅仅划分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但这样一个简单的两阶级模型对于我所分析的问题来说已经足够了①。

7. 宏观和微观层次的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既有宏观，也有微观层次的分析。宏观层次分析的基本概念是阶级结构。在分析单位既定的情况下，阶级关系的总和就是分析单位的“阶级结构”。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某个企业、城市、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阶级结构。从学术传统上说，民族国家是识别阶级结构时最常见的分析单位。之所以这样说，部分是因为国家在对资源实施权力（利）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些资源构成了阶级关系的基础。不过，选取什么样的分析单位主要取决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对其他一些问题而言，国家并非总是最合适的分析单位。

宏观层次的阶级分析主要围绕着阶级结构对分析单位的作用而展开，而反过来，阶级结构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单位来界定的。例如，对国际资本流动是如何限制了国家政策选择的研究，就构成了研究特殊的阶级结构对国家造成冲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又如，在某个具体的部门，分析资本所有权的集中或分散是如何影响工会的组织能力，这是阶级形成方面的宏观层次研究。

微观层次的阶级分析试图理解阶级对个人造成的影响。分析的核心是阶级位置对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形成的冲击。分析非熟练工人的劳动力市场策略，分析技术变迁对阶级意识的影响，分析公司经理的政治贡献，这些都是微观层次阶级分析的例子。

微观和宏观层次阶级分析的联系方式十分复杂。一方面，阶级结构在体现宏观层次的效果时并不能独立于个体的行为和选

---

① 参见 Wright(2000, pp. 957 - 1002)。

择，也就是说，宏观过程是有微观基础的。另一方面，在微观过程里，个体在阶级关系中的位置塑造了个体的机会、意识和行为，这些都是在宏观背景下发生的，并且对微观过程的进展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微观过程受到了宏观背景的影响。正如所有的社会学分析一样，阶级分析也试图对微观和宏观层次及其互动过程做出理解。

8. 阶级"行动者"(agency)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阶级分析几乎都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考察了人们生活和行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本质，以及如何用阶级分析的术语来理解它们，但是关于行动者本身，我们并未过多涉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最终要讨论的是社会变迁的条件和过程，为此，我们需要对人们的行为模式进行类型化，以使这些改变和再造人们行动的社会关系能够得到理解。我们引入五个与此特别相关的概念：阶级利益、阶级意识、阶级实践（class practices）、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

（1）阶级利益：它指的是由阶级关系中的位置所带来的物质利益。物质利益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如生活水平、工作条件、艰苦程度、娱乐休闲、物质安全（material security）等。之所以把这些物质利益称作阶级利益，是因为人们在追求这些利益的过程中，受到了他们自身所处阶级位置的影响和型塑，并最终在他们的主动追求和外在约束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trade-offs）。对于这些物质利益的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沟通阶级关系和个人行动的理论桥梁。

（2）阶级意识：人们对他们自身阶级利益，以及实现这些阶级利益所需条件的主观感受。

（3）阶级实践：由个人或集体参加的活动，目标是追求阶级利益。

（4）阶级形成：人们形成的有利于追求阶级利益的集体。既包括为了集体利益而存在的、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组织，如工会、政党、雇主联合会等，也包括了一些松散的集体形式，如社会网络和社区等。

（5）阶级斗争：个人和集体在追求不同阶级利益的实践中所发生的冲突。这些冲突既包括单个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为了减少劳动的困难程度所实施的策略导致的冲突，也包括高度组织化的工人集体和资本家对于生产过程中权力（利）的分配问题所产生的冲突。

三、解释性的主张：阶级分析的元理论

阶级分析的元理论指的是，阶级（如阶级关系、阶级位置、阶级结构）——从上面所讨论的角度看——对个人生活和制度变化都有系统化的重要影响。人们可以把“阶级说了算”（class counts）作为一个口号。在微观层次上，一个人是否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售卖自身的劳动力，是否可以在劳动过程中告诉别人去做什么，是否拥有大量的资本，是否拥有合法的资格证书等，对他们的生活都有切身的影响。在宏观层次上，无论生产资料的分配和使用权是否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论这些权利（力）是被公共部门所支配还是由私人控制，无论人们在积累各种资产中是否存在壁垒等，在这些情况下，各种制度能否起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之所以“阶级说了算”，也就是承认对于基本生产资料的分配权利（力），对微观和宏观层次的社会分析都会产生系统性的重要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主张核心的是两条相对简单的命题，这两条命题都是关于阶级关系在微观层次上对个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命题 1. 你所拥有的决定了你所能得到的。

命题 2. 为了得到你所能得到的,你所拥有的决定了你不得不去做什么。

首先,第一条命题涉及收入的分配。因此,阶级分析主张人们对生产资料拥有的权利(力)是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你所拥有的决定了你所能得到的。"其次,第二条命题涉及经济活动的分配。阶级论题再次认为,对生产资料的权利(力)是人们为了获得收入而采取的策略和行动的重要性决定因素:无论是徘徊在街头找工作,还是对在全世界如何投资进行决策,还是为了偿还能使农场进一步维持下去的银行贷款而焦虑不已。"为了得到你所能得到的,你所拥有的决定了你不得不去做什么。"其他与阶级相联系的后果——投票模式、态度、友谊的形成、健康,等等——都是上述两个基本过程的具体表现。例如,阶级分析学者认为阶级位置有助于解释投票行为,这通常是因为他们相信阶级位置形成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机会,而生活水平机会影响人们的政治偏好,或者他们相信阶级位置会影响人们在工作时的生活体验(如工作活动中产生的体验),这种体验反过来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偏好。

这些并非都是无关痛痒的。举例来说,个人对生产性资源所拥有的权利(力)的大小可能与个人的收入水平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关系不大。假定福利国家能够给每一个人都提供维持体面生活水平的基本收入。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所得到的"和人们"所拥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是相互分离的。与此相似,假设我们的生活像彩票一样频繁而随机地变动,无论是在每一代人内部还是代际之间,资产的分配都不具有稳定性,这种情况下,即使资产和收入的关系仍然具有稳定性,我们说"阶级不再重要了"也是讲得通的。或者,我们假定决定你"为了得到你所能得到的,你不得不去做什

么"的关键因素是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而对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在解释个人的经济活动或条件方面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再次下结论："阶级是没有解释力的"（当然，除非性别、种族等因素是通过把个人分配到阶级位置上来影响人们最终的行为结果的）。纯粹的收入不平等或工作中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并不能证明阶级是重要的。笔者在这里想阐明的是，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拥有的权利（力）会对人们最终的行为后果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四、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①]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性阶级分析思路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人们所得到的"和"为了得到想得到的，人们不得不做什么"等表述，听起来非常像"生活机会"（life chances）。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思路也说出了同样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就如何在理论框架内运用概念进行思考，以及阶级解释范围的认识方面，两种理论思路还是有所不同的）。

之所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关键在于它对产生上述两个命题结果的中间机制的阐释。这里，核心的概念是*剥削*。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概念当中，这一概念最为重要。

剥削是一个复杂并且具有挑战性的概念。这个词意味着给个体之间在物质上的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指定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需要满足以下三条标准：

---

① 这部分的一些内容摘自 Wright（1997，pp. 9 - 19）。

> (1) 逆向相互依赖的福利原则(The inverse interdependent welfare principle)：剥削者的物质福利依赖于对受剥削者的剥削程度。在这种关系中，行动者之间的利益不但是不同的，而且还是对抗的，剥削者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对被剥削者的伤害。
>
> (2) 排他性原则(The exclusion principle)：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逆向相互依赖福利原则的实现，必须排除受剥削者获得其他生产资料来源的可能性。
>
> (3) 占用原则(The appropriation principle)：排他性原则赋予了剥削者一种物质上的优势，因为它使剥削者可以占用被剥削者的劳动成果。

剥削揭示出了从生产资料权力(利)上的不平等到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过程：至少从部分上来说，剥削者——根据他们对资源占有的排他性权力(利)——一旦占有了被剥削者的劳动剩余，不平等就产生了。

上述三条原则的前两条可以统称为非剥削性的经济压制(nonexploitative economic oppression)。在非剥削性的经济压制中，优势群体福利的获得仍然是以弱势群体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的，这种反向关系基于对经济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但在这种经济压制过程中，既没有对劳动力的占有，也没有劳动成果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转移。

剥削性和非剥削性的经济压制区别在于，在进行经济压制时，优势群体并不需要弱势群体。虽然优势群体的福利确实依赖排他性原则，但在两个群体之间却并不存在持续的相互依赖。而在剥削过程中，剥削者需要被剥削者：剥削者的福利以被剥削者的努力程度而定。举例来说，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北美和南非的欧洲殖

民者对待原住民态度的差别。在这两个地区，白人殖民者的物质福利都是通过禁止原住民获得土地而得到保障的。因此，殖民者的福利依赖于对原住民的剥夺(deprivation)，这种联系主要围绕着对资源的控制而展开。这两个地区最重要的差别体现在第三个标准上。在南非，白人殖民者非常依赖原住民的劳动力，起初雇佣原住民做佃户或者农场劳工，后来还雇佣他们做矿工。在北美，欧洲殖民者并不依赖美洲土著居民的劳动力。这意味着北美的原住民一旦由于被驱逐出土地而奋起反抗时，白人采取种族屠杀的策略就在所难免了。一则流传于19世纪的民间谚语很好地反映了白人对北美原住民进行经济压制的事实："只有那些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我们并未发现类似于"只有死了的工人才是好工人"的表达。我们可以说"好工人是听话的工人或是勤奋的工人"，但却不可能说出好工人是"死了的工人"之类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剥削限制了剥削者，这一点从北美和南非原住民的命运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①。

这种深入的相互依赖关系很容易引起冲突的爆发，原因有二：第一，剥削构成了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促使群体之间相互竞争，并且要求群体之间进行持续性地互动；第二，它赋予了弱势群体一种挑战剥削者利益的权利(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剥削意味

---

① 这里讲的剥削概念和索伦森(Aage Sørensen)的阶级分析方案(本书第五章)中提到的剥削概念是有区别的。关键的一点区别在于非剥削压制和剥削压制。索伦森不认同这种区分，并在欧洲殖民者对待原住民的态度上和我持不同意见："欧洲殖民者明确无疑地制造出了对抗性利益，并最终引发了冲突，然而有一点是不清楚的，根据劳动成果转移原则，我们到底应该添加什么。"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对抗性利益"是否存在的话，占有原则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剥削压制还是非剥削压制，毫无疑问都存在着对抗和冲突。但在这两种情形下，对抗其实是不同的：*在剥削压制中，剥削者依赖并且需要被剥削者*；在非剥削压制中，这种情况并不存在。索伦森对待剥削的方式实际上并未在以下两种情形中做出区分：一种情形是禁止弱势群体获得资源仅仅对这一群体造成了伤害；另一种情形是优势群体的福利还要取决于和弱势群体的持续性互动。

着对劳动力的占有。因为人类是有意识的行动者，不是机器人，所以人们总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劳动付出。由此，在剥削关系中对劳动力的压榨或多或少就显得不稳定，需要一种积极的制度设计来保证对劳动力压榨的再生产。对剥削者来说，通过监督、监视和惩治的方式来设计制度，其成本非常之高。在被剥削者之间实施这些制度的能力就构成了一种权利(力)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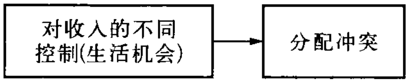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剥削是与支配(domination)问题相联系的。所谓支配，指的是在一种社会关系中，个人的活动受其他人命令的指示或控制。首先，支配的发生符合排他性原则：对某种资源的所有权赋予了个人一种权利(力)，这种权利(力)可以阻止他人对该资源的使用。雇主使用这种权利(力)可以雇佣或解聘雇员，这是支配形式的最好例证。不过，支配经常还会和占有原则联系在一起，因为对被剥削者劳动力的占有需要直接通过从属关系(subordination)实现，特别是在劳动过程中通过指挥、监督、威胁、恐吓等形式来实现。总之，剥削和支配共同界定了阶级关系中的结构性互动特征。

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相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也是通过个人对生产资料所拥有的权利(力)来界定阶级关系的物质基础的。但是对韦伯主义导向的阶级分析范式来说，权利(力)之所以是重要的，主要是因为它导致了人们生活机会(life chances)的差异，而不是因为它形成剥削和支配模式的不同。对资源的控制影响到了人们在交换过程中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capacity)，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了交换、特别是与收入相关的交换的结果。剥削和支配并不居于这种分析思路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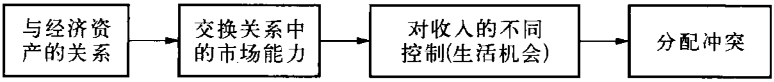
图 1.1 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阶级分析的不同。当然，这两种分析思路与简单的等级式阶级分析也明显不同，简单的等级式阶级分析直接通过人们收入的不平等来识别阶级身份，而

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则从分析社会关系问题开始，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是否能够获得经济资源。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具有相同的基本操作标准。它们的不同在于对这种共同标准的含义的阐发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型展示了由这种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两条并列的因果路径——一条通过市场交换产生，另一条在生产过程中产生——而韦伯主义的模型仅阐明了一条因果路径；马克思主义模型阐明了两条因果路径的作用机制，包括剥削、支配和交换中的议价能力，而韦伯主义模型仅处理了交换中的议价能力。换句话说，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策略是嵌套于马克思主义模型中的。

Ⅰ. 简单的等级式阶级分析



Ⅱ. 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



Ⅲ.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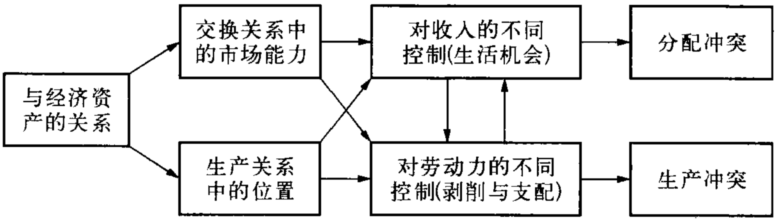


图 1-1　阶级分析的三种模型

上述两种理论的嵌套关系表明，对于某些问题来说，两种阶级分析思路在实践上的差别是很小的。例如在微观层面，两种理论思路在看待阶级对个人生活的冲击时差异就不大。如果人们想解释阶级位置对个人生活水平的影响，是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韦伯主义的阶级位置概念，其间的差别也不大。两种理论都认为，个人与那些能够带来收入的资产——特别是资本和技术——的社会关系，是界定阶级位置的关键①。

当然，就任何特定的社会学问题来说，韦伯主义者都可以把剥削和支配纳入它的阶级分析之中。韦伯主义分析框架的一个迷人之处在于，它对任何加入的因果路径都是完全开放的。不过，这种加入意味着在韦伯主义模型中输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论题，而模型本身并不会暗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在一本书中对阶级理论调侃道："在每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心中，都有一个韦伯主义的幽灵试图破茧而出。"上面我们所做的讨论实际上表明了一种互补性的观点，即"在每一个左翼新韦伯主义的心中，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试图隐遁身形、停留驻足"。

---

① 当然，对于任何两个学者来说，当他们为了应付不可避免的困难而做出有效的选择时，所采取的操作性标准都有可能不同。拿约翰·戈登索普(John Goldthorpe)和我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我们两个都承认：大资本家、公司主管和高级专家在阶级关系中所占据的阶级位置是不相同的，这是因为他们控制的资源不同，并且他们所处的职业关系的本质也不同。我们俩的分歧主要是在于操作层面，即在经验研究中应该如何对待这些类型。我把上述三种类型划分成完全不同的阶级位置，而戈登索普很大程度上出于实用性的考虑，把这三种类型合并成了异质性的阶层Ⅰ。从根本上来说，造成我们分歧的并非是阶级分析思路的不同：我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而戈登索普的分析框架更接近韦伯主义，实际上这两种思路都承认教授和资本家应该占据不同的阶级位置。我们的分歧实际上都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哪些方面需要坚持抽象概念和操作类型之间的等价一致性，哪些方面不需要这样做。就戈登索普所研究的问题来说，在他的样本里，由于合适的资本家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如果把资本家和教授合并成一个阶级类型，并不影响他所要强调的问题，因此，他最终选择了合并的操作策略。

五、成果：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优点是什么？

剥削和支配都是承载了规范性目标的分析术语。用它们来描述阶级关系表明了使用者的一种平均主义的批判立场。对于一些信奉激进平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学者来说，这样的术语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并非所有对资本主义阶级状况感兴趣的学者都认可马克思主义规范性分析的激进平均主义取向。如果人们认为推翻资本主义仅具有道德上的吸引力，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神话，我们该怎么办？甚至说的再苛刻一些，如果人们相信资本主义并不特别具有压迫性，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人们拒绝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分析思路，这是否也意味着必须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概念化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使用了剥削和支配的阶级概念所产生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规范性思路。

1. 联系交换与生产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逻辑断言，位于交换内部的社会关系组织方式和位于生产内部的社会关系组织方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实质性（substantive）而非定义性的（definitional）：无论是在交换还是在生产关系中，社会关系——它规划出了个人对生产资料所拥有的权利（力）——都系统性地形成了人们的阶级位置。当然，这并不是说交换和生产本身没有独立变化的空间，但即使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也是由阶级关系精心组织起来的。

2. 冲突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一个重要主张是在阶级关系的框架中

强调冲突。实际上，传统的社会学教科书通常都把马克思主义归为“冲突理论”的范畴。不过，这种分类方式并不太准确，因为冲突也是韦伯主义阶级观点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它简单地强调阶级冲突的重要性，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把冲突的产生理解为是由*阶级关系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而不是依情况而定的。剥削界定了相互依存的对抗性利益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剥削者的利益取决于他们对被剥削者实施伤害（惩罚）的能力。这不是简单的竞争，而是一种激烈的利益对抗。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中，透过这种利益对抗关系我们可以预测，整个阶级系统将充斥着各种冲突。

3. 权力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核心并非仅仅主张阶级关系产生了激烈的利益对抗，它同时还赋予了那些处于从属阶级地位的人以某种权利形式，人们可以使用这种权力来争取他们的利益。如前所述，正因为剥削有赖于对劳动力的压制，并且被剥削者总是能够对他们的劳动付出有所保留，所以当被剥削者面对剥削者时，他们能拥有抵制剥削的能力①。这是最关键的一种权力形式。它反映在了剥削者所采取的反抵抗策略中，剥削者被迫采取各种监督、监视、监管和惩罚措施。被剥削者正是拥有了这种抵抗能力——一种植根于相互依赖的剥削关系中的社会权力形式——剥削阶级才被迫让渡出一部分资源，以此来维护他们占用别人劳动力的能力。

4. 胁迫与应许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包含了如何内生地形成赞同意见的理论

①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讨论“对劳动力的压榨”问题时，并不需要接受“剥削”概念的规范性含义。这也是利用交易成本的视角研究组织中的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的中心议题。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阶级和剥削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请参考 Bowles and Gintis（1990）。

萌芽。基本结论如下：对剥削阶级来说，在剥削制度中压榨劳动力是有代价的，这是因为被剥削者天生就具有抵抗剥削的能力。完全依靠胁迫来支撑的剥削制度通常只是次优的（suboptimal），因为在多数条件下，工人们拒绝百分之百的劳动付出简直是易如反掌。因此，剥削阶级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办法来减少压榨劳动力的成本。其中一种办法是采取积极的措施，诱导被剥削者同意剥削。例如，通过发展内部劳动力市场来强化工人的身份和对公司的忠诚，或是从意识形态上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可取性（desirability）。不过，这些措施仍然是有成本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剥削制度看作是一种总是在胁迫（coercion）和应许（consent）之间寻求平衡的动态机制，其目的是为了压榨劳动力。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预测出：在剥削性的阶级关系条件下可能会出现哪些意识形态，在非剥削压制的条件下又会出现哪些意识形态。在非剥削压制关系中，压制性集团并不需要压榨被压制者的劳动力，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出现积极诱导被压制者同意压榨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对被压制者抵抗的完全压制——包括历史上的一些大屠杀——就变得可行了。此时，核心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压制性集团内部的道德顾虑，为此，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证明压迫者——而非被压迫者——实施镇压的合理性。诸如“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的宣传口号是讲给白人殖民者听的，不是讲给当地的原住民的。另一方面，在剥削性的阶级关系中，剥削者需要和被剥削者合作，因此，意识形态更加关心如何创造出赞同意见的问题，这使得意识形态承担了吸纳被剥削者利益的重担。

5. 历史比较分析

正如之前所设想的一样，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是影响深远的社会变迁理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变迁理论描绘了时代的

构型和历史的图景。即使我们抛开历史唯物主义不谈，马克思主义以剥削为中心的阶级分析策略仍然可以为我们进行历史比较分析提供一组丰富多彩的概念。剥削的具体形成机制界定了不同的阶级关系，反过来，这些有差别的阶级关系又暗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而言，为了再生产出他们的阶级优势，不同的阶级关系意味着他们需要面对不同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被剥削者而言，不同的阶级关系意味着他们拥有不同的机会来反抗剥削。剥削形成机制的差异，以及这些机制在不同社会具体结合方式的差别，都为我们进行比较分析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路线图。

综上所述，阶级概念是具有社会学理论优势的，它植根于生产关系和剥削与支配的联系之中。当然，这些概念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阶级分析注入到了道德评判当中。有关剥削与支配的阶级关系形成机制集中关注了阶级分析的道德含义。通过剥削和支配等概念，我们可以识别出哪些阶级关系是压制性的，哪些阶级关系对被压迫者造成了伤害，而不仅仅是创造出了不平等。阶级分析不仅是一个有关利益和冲突的科学理论，同时，它也是一个有关替代性道路的解放理论和一个有关社会公正的理论。虽然社会主义之花在全球遭到挫折，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性逻辑的思想依然光芒四射。

译者：马磊①（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

① 马磊：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相关研究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上，翻译学术著作一部（《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第二章
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基础

理查德·布林恩(Richard Breen)

一、导言

在“阶级分析”的宏大项目中，大量的研究致力于定义阶级并勾画阶级的边界。这是必需的，因为阶级分析是“对事先确定的阶级结构的结果和推论的经验调查”(Breen and Rottman，1995b，p. 453)。通过特定的阶级定义，社会学家们可以估计那些基于阶级的不平等程度，如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生活机会。这种路径不同于那种从社会不平等的经验分布中找出一种阶级结构的路径(索伦森将这种路径称为“名义分层”的路径，Sørensen，2000)。在阶级分析过程中，一开始就必须厘清所使用的阶级概念的理论基础，阶级概念必须能够被操作化，这样才可以声称阶级能够被经验所检验。如果我们来审视当代最主要的两种阶级分析方

法——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尤其是赖特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相关研究；和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这种阶级分析使用戈德索普提出的阶级分类框架——我们会发现这两项工作都是他们的研究中心内容。

本章我将要在广义的韦伯主义视野之下讨论一些阶级分析的相关主题。我首先简要叙述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所阐述的有关阶级的观点；这有利于我们明确韦伯主义阶级分析中所使用的主要参数，并暗示了这种阶级分析解释力的程度和边界。接下来，我将继续讨论，在一般情况下，韦伯是如何建议我们来操作化阶级的，并介绍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这种分类框架在概念上被广泛地认为是韦伯主义的（如，Marshall 等 1988, p. 14）。本章结论中，讨论了一些我认为是对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路径基础的批判，澄清一些我们对于新韦伯主义阶级分类能够解释什么的期望。

二、韦伯的社会阶级研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是决定人们生活机会的主要因素。根据吉登斯的定义，生活机会被理解为，个人所拥有的能够分享在既定社会中由社会所创造的经济和文化产品的机会（1973, pp. 130 - 131）。或者，简单地说，即个人能够获取稀缺有价值的成果的机会。韦伯（1978[1922], p. 302）写道："阶级地位应该是指：（1）货物供应的典型机会；（2）外在生活地位的典型机会；（3）内在生活命运的典型机会……"（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33 页——译者注）换句话说，一个阶级的成员分享了共同的生活机会。如果这就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具有这种共同的位置呢？韦伯的回

答是，市场根据个人带入市场的资源来分配个人的生活机会，并且这些资源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除了财产所有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区分外，还存在特殊技能和其他资产方面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资产只有在市场背景下才具有价值。因此，阶级处境只有在市场情境中才能辨识。

韦伯承认资产具有多样性，这些资产能够在市场中获得回报。这使得韦伯划分出一个可能的阶级，他称之为“经济阶级”。然而，社会阶级在规模上非常小，是经济阶级的集合体。他们不仅仅基于市场中的工作，其他因素也涉入其中，而韦伯特别挑选出这一阶级是因为社会流动。“社会阶级应该是指前面那几种阶级地位的总体，在它们之间在个人和上下世代人当中，可能很容易发生变化，而且一般也发生着典型的变化。”（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33 页——译者注）。韦伯提出，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共存在四种主要的社会阶级。在他们之间的社会流动很困难并且非常罕见，而流动在他们内部却很平常。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分是谁拥有财产和生产资料，谁不拥有这些；这两类群体都可以“根据财产的类型和市场中提供服务的类型来细分”（Weber，1978[1922]，p. 928）。由此划分的四个社会阶级分别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家和财产所有者群体”；小资产阶级；有正式文凭的工人（中间阶级）和那些不具有财产和生产资料，唯一资产就是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工人阶级）。

众所周知，韦伯将阶级仅仅视作社会中权力分配的一个方面。在韦伯的著名定义中，权力是指社会关系中某一位置的行动者实现其意志的可能性，不管这种意志是否遭遇抵抗以及这种可能性是基于什么（Weber，1978[1922]，p. 53）。地位群体、政党，与阶级一样，在韦伯看来都是社会中权力分配的主要现象。他们之间的

区别在于决定生活机会的资源不同。即使他们之间的成员身份可能会有所重叠,但是这些维度决不可以相互替代。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但在韦伯看来,地位群体和政党比阶级更有可能完成这一角色。对于政党而言,集体行动就是他们存在的目的和理由;地位群体的成员关系比阶级的成员关系更能够塑造个人的意识,从而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阶级的成员是否具有“阶级意识”取决于特定的偶然因素,如一般的文化条件,特别是阶级处境的因果关系的透明性(Weber,1978[1922],pp. 928 - 932)。与社会阶级成员关系相关的生活机会本身不会导致“阶级行动”的发生,这只有当“真正的条件和阶级处境的结果”被意识到之后才会发生。

对韦伯关于阶级观点的梳理,旨在帮助我们确立韦伯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边界。最为重要的是韦伯并没有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那样来假定,历史变迁的模式可以通过阶级之间关系的演进来解释,也没有假定阶级之间的冲突是一方(不合法的)的好处来自另一方的零和冲突。实际上,韦伯并没有假设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冲突的主要来源,或者说,阶级作为集体行动的必要来源。而且,韦伯的关注重点是市场是生活机会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这并不是说韦伯主义分析路径认为市场安排是不变的。韦伯指出,市场本身是社会行动的形式,为了他们自身的存在,而依赖于其他形式的社会行动,如特定的法律秩序(Weber,1978[1922],p. 930)。但是,在理解市场安排如何成为他们所发挥作用的形式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只关注阶级及阶级之间的关系。社会形式的演进是一个复杂过程,这一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正如韦伯自己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信念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角色。

韦伯对于阶级的评论是相当零散的。譬如,他在著作中对于

阶级冲突问题的论述就很少①。正因为如此，在定义韦伯主义分析路径时，相比较说它“是什么”，说它不是什么似乎更加容易。几乎所有的阶级分类框架，只要不公然宣称是马克思主义的，都可能被认为是韦伯主义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之间的分野并不像他们自身那样十分明确。但是，像我希望说明的那样，韦伯主义阶级分类框架有一个特别的要素，这一要素不但决定我们如何建构它，还决定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它在作为阶级分析中的解释性因素时的表现。但我认为没有必要“逐字逐句(to the letter)”(即使假定原本就是这样)地审视韦伯著作，并且，这里所描述的——我称之为新韦伯主义的路径——根据韦伯自己对于阶级那相当非系统的论述来说，也可能不是唯一的路径。

三、阶级分析的目标

作为一般项目而言，阶级分析认为阶级具有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社会结果的潜力。当然，最主要的目标是，检验阶级位置与生活机会之间的关系，但阶级分析的目标决不限于此。阶级通常被认为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结果。因为共享一个阶级位置的个人所组成的集体，倾向于类似的行为表达方式：阶级位置是个体行动条件的决定要素，而类似的行动通常在具有类似行动条件的人群中发生(参见 Weber，[1922]，p. 929)。但是，阶级意识与此不同，如韦伯所言，阶级意识只有在个体意识到“阶级处境的原因和结果之间

① 参见韦伯(1978[1922]，pp. 302 - 305)。在帕金(Parkin，1979)和墨菲(Murphy，1988)的相关研究中，新韦伯主义关于“阶级封闭”和阶级排斥与篡夺思想的提出。他们用更多的精力来讨论韦伯的地位群体而不是阶级。韦伯指出，“没有一种普遍的特性可以被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具体对抗类型”(1978[1922]，p. 930)。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在阶级之间存在一些冲突，但这些冲突并不遵循一种普遍的形式，相反，他们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

的联系”时才会发生。

原则上，阶级能够解释的对象不但包括生活机会的差异还包括整个行动的范围、行为、态度、价值等。但是，阶级与他们的结果之间的联系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经验事实，必须有一些理论或论据来解释，为什么阶级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能够显著地解释这些社会后果，尤其是生活机会的差异。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文继续叙述。下面，我们将转向下一个问题，韦伯是如何操作化社会阶级的。

四、韦伯主义阶级分类框架的提出

对于一个韦伯主义者而言，对阶级产生兴趣，是因为阶级将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位置与他们生活机会分布的不平等联系起来。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市场中出现的不同位置源于他们所占有的与市场相关的财产之间的差异。建构一个具有韦伯视角的阶级分类框架的一种可行方案是把那些拥有相同或类似财产的个体聚合起来。毕竟，韦伯将“阶级处境”定义为分享“生活机会的……特殊因果要素”(Sørensen，1978[1922]，p. 927)，因此，将阶级定义为生活机会的因果要素似乎比较合理。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主义收入方程中的解释变量至少可以用来描述某些阶级。

事实上，人们并不经常采用这种阶级分析的路径。因为，最重要的不是人们对财产的占有，而是财产在市场中的效用。由于某些原因，个人带入市场的资源和他们收到的回报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于是，焦点转换为市场处境以及辨识一系列能够聚合为阶级的结构性位置。索伦森(Sørensen，1991，p. 71)指出，阶级就是“结构性位置的集合。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和公司内部的社会关系决定了这些位置，阶级位置的存在独立于那些占据这些

位置的个人。他们是'空的位置'"。各种阶级分析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区分这些位置。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在阶级分析之前，就要弄清楚阶级原本是用来解释什么的。如果一种阶级分类框架的主要意图是抓住市场和公司内部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塑造生活机会的本质，那么，阶级就可以根据社会关系与生活机会分布之间的最大统计相关来定义。这种方法可以被视为纯粹归纳法（索伦森用"名义法"来表示）和我们常用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折中。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种阶级分析分类框架遵循这种方法，但是有学者建议用类似的做法来建构一套社会距离或社会优势量表（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ominance scales, Prandy, 1999; Rytina, 2000）。其他情况下，阶级分析的原则是将阶级定义为一种关于市场和公司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机会的分布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理论。在任何情形下，我们所刻画的公司和市场中的归类位置之间的边界，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可以很好地抓住所需要解释的差异之间的区分，在这里，是指生活机会之间的差异。但是，这会引起某种可能性，即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解释生产系统内部的位置是如何影响投票行为或某些类型的集体行动（姑且这样说），那么另外一种不同的原则可能更加适当。

韦伯视角的阶级分析，在定义上的唯一特色便是对阶级的兴趣是因为它们塑造了生活机会，因此，后一种策略通常被我们用来建构韦伯主义的阶级分类框架。然而，作为一种经验事实，这一阶级分类框架必须经常被证明是对各种行为、行动、态度、偏好等很好的预测指标。因此，阶级分析不但需要解释为什么劳动力市场和公司内部的位置之间的某些区隔会导致人们生活机会的差异，还需要解释为什么根据这种意图发展出的位置类别解释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后果之间的差异。但是，在进一步论述这个主题之前，我

们来审视一种常被称为新韦伯主义的阶级分类框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更加具体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可能更为有效。

五、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

戈德索普和他的同事们（Goldthorpe，1980；Erikson，Goldthorpe and Portocarero，1979；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提出的阶级分类框架在过去的20年中被广泛地应用于经验型阶级分析中①。起初，这种分类框架是根据市场和工作情况划分的职业类别提出的。市场处境是指一种职业的获得和收入水平，这与雇佣条件、经济保障和职业所有者的机会，以及经济发展的程度等相关。工作处境是指一种职业在生产过程的权威和控制系统中的定位（Goldthorpe，1980，p. 40）。很明显，职业分享了共同的市场处境和工作处境。这些职业被用来建构阶级，因而不同阶级的职业所有者会享有不同的生活机会。

但在戈德索普后期的研究中，他对同一阶级分类框架又提出了一些稍有不同的建构原则。“阶级分类框架的目的是要区分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内部的不同位置，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要区分那些根据职业所承担的雇佣关系所确定的位置（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p. 37）。”现在，阶级被用于解释两种主要的区隔：谁拥有生产资料和谁不拥有生产资料；以及在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群中，根据他们与雇主的雇佣关系本质所做的区分。这里，不同位置之间重要的分野是，这些位置都在劳动契约的规训之下，且通过和雇主之间的“服务”关系规制。劳动契约规定了具体的工

---

① 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有大量的描述，其中最明确和最细的是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1992，Ch. 2）的描述，在戈德索普（2000，Ch. 10）中还提供了一些关于阶级分类框架机制的一些延伸讨论。

作努力程度与薪水之间的交换关系，工人被高度监控；同时，如果服务关系越长，其间包含的雇佣关系越为复杂。

这种区分的基础在于，雇主必须确保雇员的行为要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雇员通常对自己的工作至少要具备一些判断力，譬如，如何完成自己的工作，工作应该付出多少努力，工作的负责任程度和创造性程度等(Goldthorpe，2000，p. 212)。因此，雇主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雇员的这些判断力在服务自己的过程中是否得到执行。执行得怎么样，取决于雇员所承担的工作类型。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根据不同类型的工作定制不同的服务契约。

根据戈德索普的理论，区分工作的最重要的维度是"资产特征(asset-specificity)"卷入的程度和监管的难度(Goldthorpe，2000，p. 213)。资产特征是指，一种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技巧、操作和知识的程度。相对而言，有些工作只要求普通的、非特殊的技能。在前一种工作中，雇员要对这些特殊技能进行投资，尽管这些技能对他到另一公司求职或做另一份工作时毫无益处。但是，同样地，一旦雇员获得这些技术，雇主就会尽最大努力来留住这些职员，因为这些技术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上不能购买。监管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雇主不能利用一切合理的透明的手段来评估职员在行动中符合雇主利益的程度。这是经典的"委托人/行动者"问题。在某些特定的工作中，职员拥有适当的自治权和知道如何准确完成工作所需求的判断力。因此，当职员(行动者)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符合公司的利益，而雇主(委托人)却不知道的时候，这种信息不对称便会刺激职员在和委托人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形下，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事。

资产特征和监管难度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定服务关系来控制，通过服务关系可以激励雇员按照雇主的利益行事。但是，这些激励必须协调好双方的利益。通过服务关系把"雇员的承担

义务和让他们积极的追求组织目标、职业成功以及工作期间的物质福利"联系起来(Goldthorpe,2000,p. 220)。为了保证服务关系的顺利执行,雇佣契约中的预期因素极为重要:"如,以一定的比例增加薪水,安全……和养老金的保证,以及较好的职业机会。"(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p. 42)就监管困难而言,这种解决方案常见于博弈理论的文献中:背叛而获得短期好处的诱惑通过对合作的奖赏的期望抵消,这种奖赏是延长的和长期的收益。

在资产特征和监管困难问题都不会发生的情况下也存在劳动力契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作任务要求一些技能,而这些技能也非特殊技能,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随时可以购买得到。监管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缺失的,因为雇员在服务雇主的过程中做什么以及他/她实际上生产了什么是可以观察的。因而,没有必要在服务关系中制定各种激励手段。戈德索普指出,当工作性质是非连续的,且双方都缺失试图维持长期关系的努力时,劳动契约的两个特征则成了一项负担。

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是如何划分的?戈德索普首先根据有无资产区分出一个自我雇佣和雇佣人数较少的阶级(小资产阶级),用阶级Ⅳ来标识(分类使用罗马数字)。进而他根据(产业)部门在阶级Ⅳ中细分出阶级Ⅳc,Ⅳc由农民和第一产业中的自我雇佣者组成;然后,他又从非农产业的雇主和自雇者中细分出阶级Ⅳa和Ⅳb,阶级Ⅳa由雇佣他人的小业主组成①,而阶级Ⅳb由不雇佣他人的小业主组成。因而,剩下的阶级就全部是由职员位置所组成的。因此,这部分阶级结构的形状取决于职业的特征,这些是否具有资产特征和监管困难当中的一种,或两种,或都没有。阶

① 在划分英国的阶级分类框架时,Ⅳ a阶级是指雇佣人数少于25人的小业主。

级Ⅰ和阶级Ⅱ由那些具有明确的服务关系的职业组成，他们的区别仅在于程度的不同。阶级Ⅰ是较高程度的专业技术人员，行政和管理人员，阶级Ⅱ的程度较低。在这些职业中，同时具有资产特征和难以监督的问题。另一个极端是阶级Ⅵ（技术体力工人）和阶级Ⅶ（非技术体力工人），他们与雇主之间具有明确的劳动力契约。阶级Ⅶ也可以根据部门细分为Ⅶa和Ⅶb，Ⅶa是非技术的非农产业工人，Ⅶb由非技术农业工人。劳动力契约还适用于其他“低级”的职业、常规的非体力职业（阶级Ⅲb）。这些职业“包括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机构的低级雇佣人员，机械操作工，柜台职员和服务业等”（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p. 241）。剩下的阶级中，阶级Ⅲa（较高级别的常规非体力职业）和阶级Ⅴ（低技术人员和体力劳动的监管人员），是由“那些雇佣关系以一种较为复杂的混合形式出现的位置组成”（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p. 43）。但是，导致这种混合形式的原因常常不同。阶级Ⅲa中的职业（典型的职员、秘书和其他日常管理人员）不要求工人具有特殊资产特征，但在监管上却有难度；而阶级Ⅴ恰恰相反。阶级Ⅲa的职业具有更多服务关系的要素却缺乏明确的职业结构，而阶级Ⅴ则具有明确的职业结构（career structure）却处于相对严密的监控之下，并根据工作的小时数来支付工资。图2.1，摘自戈德索普（2000，p. 223），展示了关于资产特征和监管困难与阶级特征的可能组合。为了说清楚这种关系，戈德索普花了大量的精力在组织经济学的文献上，确实，在计件工资（Akerlof，1982）和服务契约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雇佣契约通常被视为双方共赢的手段，双方通过这种手段来确定企业的生存能力并增加合约的总价值（Goldthorpe，2000，p. 210）。对于这种方案的一种批评认为，他过多地强调了效率，而忽视了职员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平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某种特殊的职业或职业群体可能会享有服务契

约中的某些要素，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符合效率最大化，而是工人们的讨价还价能力使他们以一种租的形式享有了这些要素。有学者认为在过去 20 年，某些工作雇佣条件的变迁（或者说是这些工作对技能要求或者监管他们的可能性的变迁）——有些情况下，是服务关系中的某些方面缺失——导致了工人在雇主面前讨价还价能力的减弱，这种说法似是而非（Breen，1997）。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某种职业的阶级分布将很难与根据效率划分的阶级结构相匹配，因而，在解释任何特殊的阶级结构时，注意力将会转移到其他偶然的历史因素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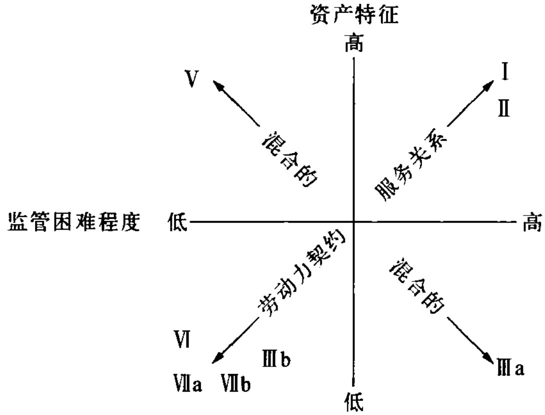


图 2-1　工作维度（契约风险来源和雇佣关系形式）与职员阶级分类框架（摘自 Goldthorpe，2000，p. 223，图 10. 2）

在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中，最分散的形式是 11 分类的阶级框架。在戈德索普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研究以及其他的研究应用中，使用的是 7 分类版本的阶级框架。不过即使是最集中的 4 分类版本阶级分类框架，也仍然保持了阶级分类框架之间的基本区隔。4 分类版本的阶级分类框架，包括服务阶级（包含阶级Ⅰ和Ⅱ），中间阶级（阶级Ⅲa 和Ⅴ），小资产阶级（阶级Ⅳ）和劳动力合

同阶级（阶级Ⅲb、Ⅵ和Ⅶ）。各种阶级分类框架的版本见表2-1①。在阶级分类框架中明显缺少的阶级是大业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因为在当今社会，大业主阶级一般都以组织形式而非个体形式存在，而少量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大业主阶级被放置在阶级Ⅰ中。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1992，pp. 40-41）为此提出两点辩护。首先，这些个体通常是企业所有者，同小资产阶级是实体的区别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区别。他们被放在阶级Ⅰ中，不是在阶级Ⅳ中，是因为“大业主倾向于最大限度地让自己卷入和管理行为和企业家行动中，以显示自己和那些工薪管理层之间的亲密关系，工薪管理层位于阶级Ⅰ，他们和企业主之间分享了巨大的企业所有权关系”。但是这种说法，不能让人非常信服，因为大业主不和任何一个雇主之间有服务关系，而阶级却是根据服务关系来界定的。就这一点而言，把他们放在阶级Ⅳ中可能更为妥当。其次，“大业主或大雇主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大约占服务阶级（即阶级Ⅰ和Ⅱ）总数的5%，并不能够视为资本主义精英的成员……况且，通常情况下，他们大多是商店、旅馆、饭店、汽车修理厂和小工厂或运输公司的所有者”（Goldthorpe，1990，p. 435）。女性业主在服务阶级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更小。这种观点也比较牵强，不能说明阶级Ⅰ而不是阶级Ⅳ就是大业主的最好归类。当然，作为实际存在的（假定在调查中得到大业主的频数是总体频数的反映）大业主，是相当稀少的，因为无论把他们归为阶级Ⅰ或阶级Ⅳ都不会对可能得出的

---

① 在7阶级分类版本中将阶级Ⅲa和Ⅲb放在一起，似乎很奇怪。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最早在戈德索普研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男性社会流动中就已经应用。在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后期的研究中使用的分类版本中，尽管与表2-1中的7阶级分类版本稍有不同，也是合并的阶级Ⅲa和Ⅲb，但是这一分类版本是为分析男性社会流动提出的。男性在阶级Ⅲb中占据的位置相对较少，并且男性占据的这些位置与阶级Ⅲa非常接近，而不是靠近女性占据的位置。这就是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1992，Ch. 7）在分析女性社会流动的章节中，将阶级Ⅲb和阶级Ⅶ合并的原因。

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如流动机会的不平等。然而，把他们归入阶级Ⅰ（而不是阶级Ⅳ里面的一个细分阶级）确实会导致这种阶级分类框架的理论假设和实际操作之间出现不一致。

表2-1　戈德索普阶级分析框架的可能组合

11阶级（最大分解的）版本	7阶级版本	4阶级版本
Ⅰ 上层服务阶级	Ⅰ 上层服务阶级	Ⅰ＋Ⅱ 服务阶级
Ⅱ 下层服务阶级	Ⅱ 下层服务阶级	
Ⅲa 较高级的非体力办事人员	Ⅲ 非体力办事人员	Ⅲa＋Ⅴ 中间阶级
Ⅲb 较低级的非体力办事人员		Ⅲb＋Ⅵ＋Ⅶ 体力阶级
Ⅳa 雇佣他人的小业主	Ⅳ 小资产阶级	Ⅳ 小资产阶级
Ⅳb 不雇佣他人的小业主		
Ⅳc 农民及其他农业自雇者		
Ⅴ 低级技术人员和体力劳动的监管人员	Ⅴ 技术人员和监管人员	Ⅲa＋Ⅴ 中间阶级
Ⅵ 技术体力工人	Ⅵ 技术体力工人	Ⅲb＋Ⅵ＋Ⅶ 体力阶级
Ⅶa 非农产业的半技术和非技术体力工人	Ⅶ 非技术体力工人	
Ⅶb 农业的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		

从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的早期版本到后期版本的变化，并没有操作上的差异。也就是说，职业作为划分阶级的基础仍然没有改变（下文将会讨论）。并且，人们会说两种形式在理论层次上可以相互协调，因为两者的差别只是位置之间的不同，后期版本的

位置是根据雇佣契约的本质划分的，早期版本的位置是通过市场和工作处境划分的，而正是雇佣契约的本质导致了市场和工作处境的差异。在两种情况下，阶级分类框架所反映的区隔都会导致生活机会的差异：阶级位置是“富裕或艰辛，经济有保障或经济无保障，可观的物质享受前景或无法摆脱的缩衣节食”的决定性因素(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p. 236)。

将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归入“新韦伯主义”是正当的——尽管戈德索普并不认可，因为他和韦伯主义都关注生活机会，且在阶级分析的范围上都持一种谨慎态度①。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的目的是试图探索“有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中的雇佣关系决定的位置，以及个体和家庭在这些位置中被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和他们所导致的生活机会的后果之间的中间联系”(Goldthorpe and Marshall，1992，p. 382)。并且，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并不宣称各阶级群体的行动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引擎”，也不假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剥削性的，阶级成员不会自动产生阶级意识并卷入集体行动中(Goldthorpe and Marshall，1992，pp. 383 - 384)。

六、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的边界问题

新韦伯主义阶级分类框架是一系列原则的集合，这些原则把阶级放到不同的位置上，这些原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的主要差异，这些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机会分配。在评估新韦

---

① 众所周知，戈德索普并不认为他的阶级分类框架是韦伯主义的。戈德索普在承认他的分类框架的原则很大部分来自马克思和韦伯时，他指出“我们自己的分类方法经常被认为是‘韦伯主义’的，或作为‘韦伯主义’讨论，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特别有用的或有额外帮助的……事实上，这是结果，而不是预先确定的”(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p. 37，fn. 10)。

伯主义阶级分类框架或其他任何阶级分类框架时，在不同的批评之间作出区分非常重要：有些批评是针对概念化的，或是针对理论基础的；而另一些批评则是针对具体的操作执行的。即使是对两方面的批评也需要通过经验来裁定。对阶级分类的一个常见批评是：在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组织中的位置存在巨大的差异，一种阶级分类框架，譬如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特别是那些包含相对较小规模的阶级分类框架，是如何能够反映位置之间的显著差异的，即如何反映影响在位者生活机会分配的位置间的差异[①]？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应认为，处于相同阶级的个体或家庭的生活机会的差异本身不是对新韦伯主义阶级分类框架的否定，因为个人享有的生活机会除了阶级位置之外，还受限于很多其他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处于相同阶级的人的生活机会差异在本质上并不是由于阶级本身的差异，而是其他因素的差异。但由此可能进一步提出批评，这不是最优的分类原则，可能存在其他更好的分类原则，这些原则使工作做得更好（这可能会，但不必要，导致对职业进行更细的分类）。例如，有人可能认为，职业声望量表可能会更好地反映不同位置间生活机会的显著差异。或者，职业本身可以作为分类的标准，职业本身的生活机会差异显著大于阶级本身的差异。回应这种质疑需要厘清概念和经验分析。首先，人们可能会质问是什么机制解释了由这些原因决定的生活机会的差异的。就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而言，雇佣关系的形式对生活机会有重要影响，因为不同类型的契约往往和不同的奖赏和激励相

① 韦伯采用了两套标准解决了这一质疑。阶级成员共享生活机会，但是社会阶级是由那些相互之间流动很频繁的阶级所组成。布雷格（Breiger，1982）运用这一思想分析了一个具有 17 个职业分类群体的流动表，并且其流动模式和潜在阶级结构（由最初的 17 分类结构合并的结构）都得到了和原始数据相同拟合优度的检验。但是，他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仿效。

联系。其次，人们可能会质问位置是如何以这种方式区分的。在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中，有两种类型的契约被用来解决雇主面临的资产特征和职员监管问题。建构阶级的其他原则，都会有这种类型的潜在机制，都至少有一定的似是而非性。最后，我们转向经验分析。在两种理论基础的阶级分类框架中进行选择的话，一项经验分析在考虑解释完整性和简约性的同时，要看哪种框架是生活机会的最佳预测指标。

这些批评是基础性的，不同于那些反对一系列根本原则的特殊操作化的观点，这些根本原则在批评者和辩护者之间达成共识。事实上，在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的研究中，他们从未采用完整的 11 分类版本，他们一直在 7 分类、5 分类和 3 分类[①]的分类框架中徘徊。他们注意到"在根据雇佣关系定义的阶级分类框架中，同时保持分类框架的根本思想……阶级的差异……也能明显的拓展，就可以这样做"(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p. 46，fn. 18)。这与他们所宣称的阶级分类框架是一种劳动工具(instrument du travail)而不是阶级结构的分布描述是一致的。

尽管根据位置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他们所体现的雇佣关系类型，将位置划分到不同的阶级中。然而，事实上，戈德索普从来没有通过测量这些位置特征并据此把他们归入不同阶级来操作化他的阶级分类框架。相反，是基于对职业的典型雇佣关系的了解，将职业归入不同的阶级。这样做有着实用主义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好处是，已经收集的数据可以转换为阶级分类框架。这

① 5 分类的阶级分类版本，将阶级Ⅰ、Ⅱ和Ⅲ合并为白领阶级；阶级Ⅳa 和Ⅳb 合并为小资产阶级；阶级Ⅳc 和Ⅶb 合并为农业工人阶级；阶级Ⅴ和Ⅵ合并为技术工人阶级；剩下的阶级Ⅶa 是非技术工人阶级。3 阶级分类版本，将阶级Ⅳa 和Ⅳb，与阶级Ⅰ、Ⅱ和Ⅲ一起合并为非体力工人阶级；阶级Ⅴ、Ⅵ和Ⅶ合并为体力工人阶级；剩下的农业工人阶级(阶级Ⅳc 和Ⅶb)。

一分类框架在 CASMIN(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比较分析)项目中得到应用,《持续的流动》(Erikson and Golthorpe,1992)便是这一项目的成果。但这不等于说相同职业一直被归入相同的阶级,职业的阶级定位可能随着时间变迁,而且相同的职业在不同的国家中可能会被归入不同的阶级中(这一点在 CASMIN 项目中是允许的,见 Erikson and Golthorpe,1992,pp. 50 - 51)。

由于雇佣关系的类型是根据一些不同的特征(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列出的有薪水增加、养老权、安全保障等)定义的,那么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不同的特征在职业内部所占的比重是如何确定的。例如,如果雇佣关系的这些维度是弱相关的,就会导致阶级类型中的潜在概念的操作化问题。伊万斯和米尔斯(Evans and Mills,1998)在使用 1984 年收集的英国数据分析雇佣关系的 9 个预测指标时提出这一问题。这些指标包括职员的工作是否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准时上班,工资支付方式(计件工资,按小时计算,按业绩计算等),工作升迁的机会,职员是否可以决定工作进度。他们根据这些使用潜变量分析并得出四类潜在阶级。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合理的,但是雇佣关系的各个维度在四个联合体中却不是独立变化的,而是共变的。并且,根据各阶级中每个项目的反应概率时,伊万斯和米尔斯近似地得出了四个阶级,分别是白领工薪人员、低级管理者和监管人员、非体力办事人员和体力工作者。例如,在是否需要准时上班方面,第一阶级和第三阶级的概率是 0.05,而低级管理者和监管人员是 0.54,体力工作者是 0.65。第一阶级和第四阶级可以视为服务和工资劳动力关系的两极,其他阶级是这两个阶级的中间阶级。并且,伊万斯和米尔斯发现,这些潜在阶级和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非常匹配:“潜在阶级 1 中有 78%可以归入戈德索普的阶级Ⅰ和Ⅱ,95%可以归入阶级Ⅰ、Ⅱ和Ⅲa。同样,不低于 89%的潜在阶级 4 可以归入戈德索普的阶级Ⅵ

和Ⅶab，96%可以归入阶级Ⅵ、Ⅶab和Ⅴ"（Evans and Mills，1998，p. 95）。他们指出，这一结果表明他们的阶级分类框架是高度标准有效的，也就是说，他们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划分了职业结构，并辨识出戈德索普和他的同事们在理论上特别关注的工作特征之间的分野。

在后来的分析中，伊万斯和米尔斯（Evans and Mills，2000）使用了规模更大的，最近（1996年）收集的英国数据，其中运用到8个雇佣关系的类似但不相同的指标。分析结果揭示了：

> 有一个较小的阶级（1），大约占总体的8%—13%，他们主要的报酬方式是工资收入和其他一些形式的奖金或额外收入，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加班收入，在辞职之前必须提前一个月或更长时间提出通知；可以自由决定上下班时间。在阶级谱的另外一端，是阶级（3），在总体中大约占35%—45%，其特征和阶级（1）相反……在阶级（1）和阶级（3）之间是阶级（2），大约占45%—52%，主要依靠工资收入，大多数人都有加班工资，在辞职之前必须提前一个多月提出通知；在工作时间方面比较复杂（Evans and Mills，2000，p. 653）。

不出所料，他们分别把阶级（1）、（2）、（3）分别定义为服务阶级、中间阶级和劳动力契约阶级。但是，在这项研究中，当回应这种分类框架的标准有效性问题时，伊万斯和米尔斯认为这种分类框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Evans and Mills，2000，p. 657）。

> 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中的阶级Ⅱ中，大多数都没有"服务"型的雇佣契约。服务阶级和中间阶级之间的分界线贯穿阶级Ⅱ而不是在阶级Ⅱ和阶级Ⅲa之间，我们也可以据此估

计阶级Ⅰ中有将近1/3的职员没有"服务"契约。

这对完全依赖职业类别作经验型分类的实践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至少在英国的案例和在服务阶级的定位上是这样①。时隔12年收集的两份数据，使伊万斯和米尔斯意识到，在职业类别和戈德索普的服务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些偏离。一个合理的假设认为，职业类别的膨胀导致职业作为雇佣关系本质的预测指标的有效性越来越弱，例如，越来越多的使用"管理者"这一职业类别来指代各种各样的职业。在任何情况下，回到雇佣关系的直接测量，都是有益的。这允许研究者对雇佣关系中的什么要素与特殊的阶级后果联系最紧密做出选择，这对研究中阐明阶级位置与阶级后果之间的机制也有明显的好处。事实上，一种阶级分类框架，如果缺乏对雇佣关系类型与生活机会差异之间相联系的机制的准确解释，是明显不足的。伊万斯和米尔斯的研究，展示了他们的分类框架对于雇佣关系之间差异的解释能力，很多其他的研究也表明阶级位置和生活机会差异（及其他后果）之间具有高度相关。但是，真正缺乏的是一种理论解释，作为阶级差异的结果的差异是如何被解释的，并努力使它们服从于经验检验。戈德索普和其他研究者（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Ch. 11；Breen and Rottman，1995b）已经承认了这个问题，并且戈德索普（Goldthorpe，2000，Ch. 11）近期开始寻找解决途径。为了使他们的解释机制能够支持已经提出的阶级理论，他们不得不在各种理论之间做出区分。换句话说，他们提出的解释机制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们并不能同

①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这种分析方法的一个困难，即他们是从雇员那里收集位置信息的，而雇员很有可能是根据自己的位置和经历来做出回应，而不是根据位置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来回答（例如，有关晋升机会的那些问题）。有关位置的信息最好从雇主那里收集。

等地解释多个阶级理论及其后果之间的联系。这种“具体的限定”将会成为发展一种令人信服的新韦伯主义阶级理论的困境。

七、阶级分析的单位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阶级都是位置的集合，而不是个人的集合。在阶级位置和生活机会之间暗含的机制是个人的生活机会来自他们所占据的特殊位置（或者从他们一生来看，是他们所占据位置的序列）。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占据其中一个位置，这时，个人的生活机会取决于他与在阶级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儿童的阶级位置来自他们的父母，已婚妇女的阶级位置在传统上依赖于他们的丈夫所占据的位置。然而，那些在阶级结构中没有占据位置的人，如儿童和不参加工作的已婚妇女，他们的生活机会不仅依赖于他们的父母或丈夫，还依赖于他们同父母或丈夫的关系。换句话说，家族关系或家庭关系干涉了市场与个人的生活机会。这一主题与在收入不平等研究中考虑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非常类似，都很难通过经验分析来表述。

尽管存在这些争论，将所有家庭成员都视为只占据一个位置的做法几乎是所有阶级分析理论的通用标准。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有位置时，就像只有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来源的市场安排一样，这种做法的问题相对不大，但当家庭中的配偶双方都参加工作时，这一做法就存在困难。有些研究者（如 Heath and Britten，1984）试图保留用一个阶级位置来代替一个家庭的做法，但这个位置由配偶双方共同决定的。还有一些研究者（如 Stanworth，1984）认为配偶双方应该有各自的阶级位置，而不是整个家庭在阶级结构中占有一个位置，家庭的命运是两者的函数。戈德索普和他的同事都不同意这些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

业生涯是不连续的，对她们进行流动分析将会出现大量的流动记录，而其中的大多数是人为的。家庭是阶级分析的适当单位，家庭及其成员的阶级位置取决于配偶双方中长期处于劳动力市场中的那一方。这种测量方法被称为“优势”测量法（Erikson，1984）。从经验上看，往往是一个家庭中的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停留的时间更长。“然而，不能假定事实就是如此……这种情景不难想象……在采用优势测量法时将会有很多家庭的阶级位置是根据女性的职业来排列的”（Breen and Rottman，1995a，pp. 166 - 167）。

将这些竞争的路径概念化的方法是用正式的方式来重述它们。假设我们的目标只是解释某些后果的差异，设为 Y，Y 是在个体或者家庭的层次上测量的（如个人的教育获得，或家庭的生活标准）；社会阶级，设为 X，有两种可能的测量（家庭中配偶双方各有一种），分别记为 X_m 和 X_w。于是，上面讨论的问题简化为 Y 与 X_m 和 X_w 之间方程形式问题，记为 $Y=f(g(X_m,\ X_w))$。f 是指 Y 与 $g(X_m, X_w)$ 之间的关系，g 是指 X_m 与 X_w 在阶级分析中是如何处理的。认为阶级成员是个人的路径认为，模型中 $g(X_m,\ X_w)$ 应等于 X_m 和 X_w，而被称之为传统主义路径的人把 g 以 2∶1 的比例将 $(X_m,\ X_w)$ 加权成为 X。在优势测量法中，$g(X_m,\ X_w)$ 是 X_m 或 X_w 中优势的一方的方程。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可以清晰地表明各个方程中的 g 是如何测量的，即可以指明一个潜在阶级 X 与其两个预测指标 X_m 和 X_w 之间的关系。这种正式的表达方式，为我们在经验上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案。由于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主要关注生活机会的分布，因而人们在解释个人生活机会差异的时候，可以决定如何选择 f 以达到方程的最大解释力。

八、结论

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建构阶级分类框架的原则是：描绘出

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中的位置差异的那些主要维度，这些位置差异对生活机会分布有重要影响。主要原则是其理论基础，对应的阶级分类框架是其操作化过程。因此，在经验调查中，至少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要知道阶级在解释生活机会的差异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和其他的社会不平等研究做比较时，如种族、性别等不平等研究。并且，一项调查研究的阶级作用强度要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之间可以比较。第二，阶级与其后果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及其关系强度都是一项经验调查必须关注的。但是，如果阶级只是关注与生活机会分布相关的那些主要区隔，那么阶级位置类似的成员，可能不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态度或卷入集体行动，等等。只要这些后果或其他后果的差异能在因果上追溯到生活机会的差异，或者决定生活机会的劳动力市场组织和生产过程的那些方面也决定了这些后果，我们便可以在他们和阶级之间发现联系。通常生活机会与一项后果（如集体行动）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就像韦伯说的，他们可能与阶级没有关系。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生活机会和其他后果之间都有着稳定的联系。回应我先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如果生活机会决定了某种类型的行动所发生的条件——包括人们拥有的利益（或要表达的利益，如投票）和他们所拥有的资源（这对于他们子女的教育获得非常重要）——那么，人们的阶级位置将会决定他们的行动方向。但是，如果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没有发现这种关系，阶级不是任何共同的或集体身份的基础，我们是认为阶级不重要呢，还是这种分类还不够？我的回答是，这些导致生活机会差异的那些区隔不是集体身份的基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面提出的那些后果形式并不构成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框架。例如，有关阶级的“共同体”式的思想（gemeinschaftlich ideas of class）——阶级是主观上真实的社区——就不是新韦伯主义路

径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①]。

但是，即使这些其他的后果不是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意义上理解的阶级组成部分，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的重要性仍然取决于与它们的相关强度，就像与生活机会的相关强度一样。如果阶级不能够显著的预测这些后果，人们将会对阶级逐渐失去兴趣。不过，很明显的是，在许多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领域中，并没有发现阶级的影响在减小的证据，相反，有些研究说明的阶级的影响正在增加。沙维特和布洛斯菲尔德(Shavit and Blossfeld，1993)合编的论文集指出，在整个20世纪的13个发达国家中，阶级出身对于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没有下降。伊万斯(Evans，1997)的论文说明那些宣称"阶级投票行为普遍下降"的观点是对这种现象在不同国家的复杂的变化趋势的错误描述。阶级投票行为表面上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弱化，然而，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这种变迁。最后，在社会流动研究中，布林恩和戈德索普(Breen and Goldthorpe，2001)指出，英国在20世纪的后1/4期间里，阶级起点决定阶级终点的程度没有发生变化，这种相关在控制教育获得，以及个人流动的测量中仍然成立。这一结果可以作为证据添加到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的报告中去，他们认为欧洲社会流动模式是长期稳定的。

译者：王甫勤[②](同济大学社会学系)

---

① 事实上，戈德索普自己的研究，以及那些应用他的阶级分类框架的研究，都很少关注这种人口统计学的阶级形态与其后果(相反，戈德索普[1980]早期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流动研究中比较关注这一点)。现在，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主要是用来测量生活机会不平等的一种手段。

② 王甫勤：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教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定量研究方法等，在《社会学研究》、《社会》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第三章
新涂尔干主义阶级分析基础①

戴维·格伦斯基(David Grusky)
加布里埃拉·加列斯库(Gabriela Galescu)

阶级分析传统不断受到后现代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批评家的诟病，他们认为，阶级概念在理解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的不平等方面，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②。这种状况的出现在很

① 感谢 Eric Olin Wright 和他的那些参加研究生讨论班的学生，他们对本章初稿的出色评论使得作者受益颇多。同时，也感谢以下诸位的建设性评论，他们是：Julia Adams, Jeffrey Alexander, Vivek Chibber, Dalton Conley, Paul DiMaggio, Kathleen Gerson, Guillermina Jasso, Michèle Lamont, Jeffrey Paige, Philip Smith, Margaret Somers, George Steinmetz, Kim Weeden, Bruce Western, 谢宇。在本章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之前已经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章，如：Grusky and Sørensen (1998), Grusky and Weeden (2001)以及 Grusky, Weeden and Sørensen (2000)。本研究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NSF, SBS-9906419)的资助。

② 可以参考 Hall, 2001; Pakulski and Waters, 1996a, 1996b, 1996c; Lee and Turner, 1996; Clark, 1996; Joyce, 1995; Kingston, 2000, 1994; Clark and Lipset, 2001, 1991; Pahl, 1989。

大程度上是由阶级分析学者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所有的学术作品关注的都是高度统一的阶级结构，这种抽象的阶级结构只存在于象牙塔中，却从未触碰过真实的外部世界。阶级分析传统由于不自觉地默认了唯名论的地位，而变得在各种批评面前不堪一击，尤其是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阶级分析之所以越来越依赖于神秘而复杂的语言体系，其主要原因就是生产领域的阶级边界越来越模糊，而阶级分析传统在面对这种模糊状况时也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

与以往阶级分析学者所采取的方法不同，本章的目的是在上述后现代主义路径之外提出一种新涂尔干主义的视角，以期在一个更加发散的层面上理解类阶级结构(class-like structure)的延续。我们认为，阶级分析其实并没有过时，无视生产领域而把精力一味集中在态度和行为的其他来源上(如种族、民族、性别等)是不合适的，我们需要意识到，劳动力市场仍然是通过阶级组合而成，只是这里的“阶级”与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相比处于更加具体的层面。在发散的层面上进行阶级分析的好处是，我们能够用共同体(gemeinschaftlich)也就是“微观阶级”(micro-classes)来取代传统阶级分析的名义类型，这些“微观阶级”嵌入于社会结构当中，因此无论对社会学家还是普通民众来说都具有鲜明的意义。

如前所述，在我们所倡导的新涂尔干主义阶级分析范式之下，我们毫不避讳对这种唯实论分类模式(realist classification)的偏爱，这些唯实论的分类实际上是各种阶级类型在劳动力市场被制度化的结果①。相反，那些在唯名论传统里工作的学者，则倾向于

---

① 这种界定掩盖了阶级分析的复杂性，包括：(1) 在区分制度化的类型和后续无法避免的分析者的人为“建构”时，学者所面临的操作上的困难(即使制度化的类型能够很好地代表目标)；(2) 在唯名论传统里从事研究的学者，偏爱对因果力量和因果过程(如剥削)的分析，他们认为，无论各种社会类型有没有在劳动力市场被制度化，这些力量和过程都是“真实”的。对于这一问题，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还会讨论到。

构建能够反映社会过程、社会力量和社会区隔的阶级类型，他们认为，即使这些类型只是低度制度化的（shallowly institutionalized），从分析的角度看它们仍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举例来说，一些历史理论已经被嫁接到了唯名论的模型中，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潜在”（但分析上是重要的）阶级类型，这一流派的学者认为，潜在的阶级类型最终会被行动者所意识到，从而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或是变成一种能够代表成员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制度化群体。当然，单就具体的社会过程或社会力量来说（如剥削、权威关系、雇佣条件、生活机会）——它们是产生阶级的基础，通过它们，阶级还会进一步地制度化——这一派的学者们多少还是有些分歧。众所周知，在各种模型之间做评判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特别是当这些模型都以历史理论作为基础，这要求学者们的判断不仅要适用于当前，还要能应用于遥远的未来。我们认为，眼下正是在现实中可见的生产领域内对阶级结构进行经验研究的大好时机①。

毫无疑问，我们的论证路线是涂尔干式的，但我们之前的工作并没有充分地触及这一点②。例如，在之前的一些作品中，我们确实承认涂尔干是我们思考的智力来源（特别参见 Grusky and Sørensen，1998，pp. 1192，1196，1219），但我们并没有就提出的微观阶级分析方法和涂尔干的一些论点之间的关系做更深入地探讨。现在该是弥补这一缺憾的时候了。然而，即便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模型已经“失宠”，并且可以说涂尔干模型在切中

---

① 对阶级类型的现实主义分析，借助于制度化过程，应该能为普通大众所认识。不过，大众的认识并非我们评判现实主义方法的标准，我们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制度化的取向，另一个是经验性的结果。

② 例如，Grusky and Sørensen（1998，2001），Grusky and Weeden（2002，2001），Grusky，Weeden and Sørensen（2000）。

了当代阶级体系背景的情况下(参见 Parkin, 1992,p. 1;Pearce, 1989,p. 1;Müller, 1993,p. 106;cf. Lee, 1995;Fenton, 1980;Lehmann, 1995),通过重构涂尔干的思想来进行阶级分析的学者还是屈指可数。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代的理论家对涂尔干的思想统统视而不见,而是说多数学者对涂尔干的解读往往集中在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本著作上,并假定它是社会学文化转向的古典源头(参见 Smith and Alexander, 1996;Meštrovi, 1992)。此外,现代的阶级分析理论家也会讨论涂尔干的《劳动分工论》,但讨论的结果往往是消极地驳斥涂尔干或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型,而不是从中借鉴一些有益于阶级分析的思想①。

在研究社会分层的学者倾向于把职业看作是整个分层系统的"支柱"的大背景下(特别参见,Parkin, 1971;Featherman, Jones and Hauser, 1975;Ducan, 1968,pp. 689 - 690;Parsons, 1954,pp. 326 - 329),上述情况可能让人感到疑惑,涂尔干为什么会被忽视呢?我们注意到,分层学者通常喜欢用社会经济的梯度特征(socioeconomic gradient)来测量职业,而涂尔干的工作并未明确地给这些学者提供依据。涂尔干在现代阶级研究中之所以会缺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工作并未预见任何通常的阶级分析思路,也就是说,他既不是把各种职业或工作归类加总成为抽象的阶级,也不是把它们换算成社会经济测量

---

① 例如,可以参见 Mouzelis(1993),Bottomore(1981),Tiryakian(1975),Dahrendorf(1959,pp. 48 - 51);Zeitlin(1968);cf. Pope and Johnson(1983),Hawkins(1994),Müller(1993),Thompson(1982),Lukes(1973),Nisbei(1952),Giddens(1971,1972,1978),Watts Miller(1996),Filloux(1993)。Lockwood(1992)近期的著作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他的这本开创性著作当中,Lockwood(1992)指出,涂尔干模型把工具性行为看作是不能够解释的"残差项",相反,马克思主义模型则把规范性行为看作是不能解释的"残差项"。从理论互补的角度看,片面强调涂尔干模型或马克思主义模型都是不完整的。

指标。

我们在本文中试图发展出一套基于劳动技术分工的阶级分析框架,这可以看作是对涂尔干思想遗产的明确继承。以往的阶级分析学者不但忽视了《劳动分工论》的存在,而且还避开了任何牵涉到劳动技术分工的议题,即便是非涂尔干式的技术分工议题也几乎没有涉及。实际上,赖特(Wright,1979)早在25年前就已经指出,"在劳动技术分工的框架内讨论阶级和位置关系的理论反思,相对来说还是不多"(p. 12),这一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成立(同样可参见 Kemper, 1972,p. 739)。为了弥补的这一理论缺憾,我们将试图探讨:(1) 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涂尔干是如何在劳动技术分工的基础上进行阶级分析的;(2) 如何进一步修正和改进涂尔干的阶级分析方法,以更适应今天的发展;(3) 虽然优于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眼下这种新的方法仍面临哪些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一、涂尔干和阶级结构:一些特定的"释经"

我们从探讨涂尔干如何提出阶级和职业的问题开始,所援引的材料不仅包括他为《劳动分工论》所作的著名序言,而且还包括他在《自杀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相关评论(特别参见 Hawkins,1994,该文就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在一些二手文献中,学者们批判涂尔干把阶级冲突仅仅看作是早期工业文明的暂时性特征,因而"忽视了持续性阶级分裂(class cleavages)的意涵"(Zeitlin, 1968, p. 235;也可以参考 Lockwood,1992,p. 78;Bottomore,1981)。众所周知,涂尔干之所以认为工业化初期的阶级冲突最终会消失,主要基于以下论点:(1) 国家控制和职业规范的增长将会对利益冲突形成一

种道德制约；（2）基于成就的社会流动（achievement-based mobility）的增加将促进结果不平等的合法化，人们更多地把结果不平等归因于天资、个人能力或投入的不同，而不是机会的不平等（例如，"机会平等"观念的兴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很难说以上建立在涂尔干传统上的论断完全一无是处，因为这些论断在向现代化工业主义转型过程中推动了重要进展。虽然涂尔干的早期著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后续的有关阶级冲突"制度化"的研究中（例如，Dahrendorf，1959），学者们一直在强调的两种制度化力量：规范准则（normative regulation）和精英分配（meritocratic allocation）。

阶级冲突的制度化促使当今的阶级分析理论家们低估了宏观层面的历史理论和历史发展叙事的重要性（参见 Holton and Turner，1989），转而使用阶级分类去从事一些比较折中的学术工作，例如对人类行为的微观层面（如投票、生活方式）的研究。接下来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由马克思及其他一些学者针对宏观层次的目标而做出的阶级类型划分，是否在有限的微观层面的研究问题上亦为最佳（Grusky and Weeden，2001）。当代大多数学者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于是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在劳动类型内部对阶级做出进一步的划分，以增强阶级模型的解释力。然而，这些努力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学者们所划分出的类型的制度化水平都很低，他们用尽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标准来捍卫他们的分类方案，结果只是证明了他们的分类还需要更进一步体现制度上的真实性（institutional veracity）。

在这种背景下，涂尔干派的学者的做法就非常具有启发性，因为他们重新把目光聚焦在了中间层次的群体类型上，这些类型从过去的劳动力市场中萌生，并且可能昭示着未来的群体类型特征。

换句话说，涂尔干对阶级分析的贡献同时体现在以下两点：(1) 消极的宏观层面故事，即有关大型阶级冲突的社会力量（例如，冲突的制度化）从长期来看将会消失；(2) 积极的微观层面故事，即一些“小型阶级”(small classes)（也就是职业共同体，gemeischaftlich occupations）将会在生产领域出现，并且型塑个人的价值观、生活机会和生活方式。本篇评论将注点那些被过去的阶级分析所忽视的小型阶级类型。之所以关注这一阶级类型，是因为它们能够显示出一些特性，而过去的阶级分析学者恰恰错误地把这些特性都归结于大型阶级。

在对上述微观层面的故事进行充分阐释之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涂尔干并没有讲清楚职业团体(occupational association)出现的机制，他只是以功能主义的思路简单地假定职业团体只要满足了整个系统的目标，那么它最终必然会出现。这种思路导致涂尔干将“正常的、理想的和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三个概念等同了起来(Lukes,1973,p. 177)。相比之下，马克思和多数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分析问题时都是强调发生机制的，通过使用诸如剥削、利益对抗和冲突等分析性概念，以达到解释最终状态(end-states)的目的。在涂尔干的某些作品中，虽然他也暗示了中间机制的存在，但总的来说，他没有对职业团体“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Bottomore,1981,p. 911)。不过，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涂尔干所描绘的最终状态在当今的不平等制度中，是否真的捕捉到了一些阶级发展的趋势？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概括涂尔干对“正常的、理想的和即将发生的（事情）”(Lukes,1973,p. 177)所持的观点呢？在下面的章节中，笔者将通过描述三种微观层面的组织形式来重新呈现涂尔干的这一问题。对涂尔干来说，这三种组织形式必然会在生产领域出现。

1. 职业团体的兴起

对《劳动分工论》最有启发性的解读是：涂尔干在生产领域组织化的层次（即阶级或“微观阶级”）上进行的扩展性论述[①]。当阶级分析学者总结涂尔干的这一工作时，他们通常会强调大型阶级的暂时性，即随着各种“正常的”适应性形式的出现，大型阶级将会逐渐消亡（即“消极的宏观故事”）；与此同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局部性的职业层面上（即“积极的微观故事”）社会组织的出现。与之相比，我们认为涂尔干所讲述的微观故事更值得人们深入思考，这不仅仅是因为局部性的组织能够显示出类似阶级的属性（下面将会进一步论述），而且还因为它能够替代传统的阶级形成的“加总论”的观点。实际上，涂尔干认为职业团体将注定成为“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主要组织形式（Durkheim，1960[1893]，p. 28），并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以及其他类型的中间组织形式（例如，家庭）。虽然涂尔干强调职业团体能够培养人们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和联系，但他也同样叙述了各种团体协会所可能承担的正式功能，这包括：(1) 建立和管理职业道德体系；(2) 解决团体成员与其他团体的冲突；(3) 在政治治理体系中作为一种基本的代表性实体（参见 Durkheim，1960[1893]，pp. 26 - 27；另可参见 Durkheim，1970a[1897]，pp. 372 - 382）。上述三种功能在局部层次上才能得到满足，因为“一个群体只有对某一活动足够了解、知晓它的功能、明白它的需求，才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它”（Durkheim，1960[1893]，p. 5）。

---

① 涂尔干对职业团体的看法是随着他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推进的（参见 Hawkins [1994]做出的出色阐释）。在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涂尔干开始提出职业团体的积极作用，不过在当时，他只是把职业团体看作是“一剂暂时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良药”而已（Hawkins，1994，p. 473）。直到 90 年代晚期，他的完整版本的职业团体“理论”才得以形成。

这些职业团体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行会，并且和今天无处不在的专业协会、手工艺协会有些相似。职业团体由来已久，其早期的形式据考在"(人类)开始进行贸易"的时候就出现了，这对涂尔干来说很有启发(Durkheim，1960[1893]，p. 7)。涂尔干推理道，既然职业团体的存在贯穿了近代历史，那么它肯定具有一种"永恒的真实性"(timeless authenticity，Parkin，1992，p. 77)指向一些重要的隐性功能。在这些功能中，涂尔干特别强调职业可以控制过度的野心和期待，只要通过促使工作者按照职业规范来计算期望薪酬，而不按一些遥不可及的标准。这样，由于传统社会秩序崩溃而导致的个人主义泛滥将得到抑制，因为工作者在职业的层次上服从于一种超越个人的新形式权威(Durkheim，1960[1893]，p. 10)。从结果上来看，《劳动分工论》中的宏观故事和微观故事是紧密结合的。大阶级消亡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职业的制度化和伴随而来不平等的合法化，这瓦解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并使得工作者确信不同职业(包括不同大阶级之间)不同薪酬是合理的、可接受的。如果说涂尔干有过关于历史的阶级分析理论的论述，那就是不同职业的区分为不平等提供了正当理由，使之令人接受。这样，马克思以及各种新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更为宏大的历史理论就被釜底抽薪了。

2. 集体良知的"局部化"

职业团体的兴起也与"秩序问题"以及涂尔干广为人知的解决方案有关①。社会学关注的是当传统形式的组织衰落时，细分化

① 众所周知，Parsons(1949;1967)试图把所有的经典社会学(包括《劳动分工论》)都解读为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与之相反，其他学者(尤其是 Giddens，1983)认为 Parsons 将自己的特殊问题取向强加在对其他学者(特别是 Durkheim)作品的理解上。

和专业化过程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包括利己主义泛滥、缺乏约束的个体行为的兴起以及对集体目标忠诚度的下降（参见Parsons，1967，1968）。这种关注转而诱发人们寻找一些补偿性机制（countervailing process），这些机制也许能够抑制或至少能够抵消个人化社会过程（的影响）。在上述传统中，涂尔干的观点常常为人所称道：他指出现代的集体良知已变成包含日益抽象的、一般化的情感，特别是强调个人尊严（即，“对个体的崇拜”）和人们自由地追求机遇而不受先天条件限制的权利（即，“平等的权利”）。实际上，虽然这些观念形成了深刻的个人主义式“宗教”（Durkheim，1960[1893]，p. 172），但为许多个体共同持有，现代的集体良知便由此形成。

然而，为了让上述有关观念的故事全面、完整，我们要同时讨论以职业为区隔的信仰之兴起，以及这些信仰如何抑制个人主义，使得工作者团结成超越个人的团体、从而抵消个人化的力量①。当然，涂尔干并不是主张现代职业将会衍生出类似传统社会里那种无所不包的道德体系（参见 Pope and Johnson，1983， p. 684；Hawkins，1994， p. 464），但他仍坚持强调职业道德的规范无论在过去或在未来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Durkheim，1960[1893]，p. 227）。这种团结的新形式无疑会将个体与局部的亚群体（即，职业）——而非整个社会本身——相连。因此，现代社会将趋向“道德的多态化”（moral polymorphism，Durkheim，1958，p. 7），即多元的，以职业为区隔的“道德生活中心”的兴起（Durkheim，1958，p. 7，也参见 Hall，1993）。在价值观的层次上，涂尔干式的解决方案不仅注解了高度抽象、贯穿社会体系的情感的整合功效，也适用

① 相关文章参见 Durkheim（1960[1893]，pp. 2，4 - 5，10），Pope and Johnson （1983，pp. 682 - 684），以及 Hawkins（1994）。

于理解“机械团结”得以延续的原因：更为具体、专业化的情感在职业团体内部渐进传承，重复地自我表达（参见 Parsons，1968，p. 339）①。

后来的法国社会学家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个论述路径。举个例子，布格尔（Bouglé，1971[1927]）把印度种姓制作为“道德多态化”的极端个案。职业团体严格按照等级来组织，各个群体之间的“不洁”交往（例如，通婚）是被禁止的，因此群体内部自我复制（即，世袭封闭，hereditary closure）的程度相当高。虽然对布格尔来说，印度个案代表了最纯粹的种姓体系，它不过是“整体趋势的特别扩大”（unique dilation of universal tendencies，Bouglé，1971[1926]，p. 28），而这趋势在所有社会中产生了深刻的职业区分。同样，哈伯瓦斯（Halbwach，1992[1945]）通过展示多态化在细分的职业（例如，将军、立法者、法官）以及大阶级中的体现，也提出职业滋生了独特的传统和意识形态（同样参见 Halbwachs，1958；Coser，1992，pp. 18－20）。涂尔干的“道德多态化”比喻在布迪厄（Bourdieu）最近的著作中尤为明显。在《区隔》中一书，布迪厄（1984）用非常细致的职业（例如，教授、护士）来描述惯习和它产生的区隔化生活方式，尽管这些职业仅不完美地表征了“存在的同质化条件”（homogenous conditions of existence，Bourdieu，1984，p. 101）。

对阶级分析学者而言，涂尔干范式的应用意义在于：与大阶级相比，细分的职业更容易成为产生不同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场所。用涂尔干的话说，每个职业都具有属于自身的文化，包括“特定的观念、特定的用途以及特定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

① 如果更为严密地应用 Durkheim 的术语，这里使用“机械团结”是不恰当的，因为后者只限于传统社会中集体良知，它包括集体共有的信仰和情感。这里我们使用了这个术语，仅仅因为它指明了相似的个体之间形成的职业内部团结。

(Durkheim,1956[1911],p. 68),工作者融入其中的过程那样自然却无可避免,就好像“呼吸周围空气”一般(Durkheim,1970b[1905],p. 286,Watts Miller 译本,1996,p. 125)。这些专业化的文化之所以兴起是因为:(1)自我选择的机制使得相似的工作者进入到相同职业中(Durkheim,1960[1893],p. 229);(2)与同事的社会互动巩固并阐释了这些共同的品味和情感(Durkheim,1960[1893],pp. 229 - 361);(3)一定程度上,在职者通过将自己与职业绑定并追求集体目标而达到他们共同的利益(Durkheim,1960[1893],pp. 212 - 213)。如果在实践中,群体的确是按照这个模式“局部化”了,那么在局部的职业层次上解释各式各样的阶级后果(即,态度,行为,生活方式),正是传统阶级分析的微观层面目标。事实上,涂尔干描述的是阶级和**立场**(stand)统一的过程,按照韦伯(Weber,1968[1922])的观点,上述情况在传统的加总阶级背景下很少发生。

3. 职业和有机团结

涂尔干对于秩序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两方面:(1)以职业为区隔的情感产生了机械团结(如前所述);(2)职业之间兴起的相互依赖性产生了有机团结。我们着手故事的第二部分,并探讨它对于阶级分析的意义。像之前一样,我们会发现细分的职业在涂尔干眼中仍是中心角色,但现在它们是相互依赖性的基本单位(即,“有机团结”),而非共同持有道德情感的蓄池(即,“机械团结”)。

我们的讨论自然而然地开始于一个持久不衰的观点(例如,Smith,1991[1776];Comte,1988[1830]),即职业的专业化和细分化产生了异化力量,使得工作越发格式化、重复化。作为回应,涂尔干(1960[1893])认为如果工作者处于与“临近职业的长期关系中”(constant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functions,

Durkheim,1960,p. 372),他们对于劳动分工体系中更大的角色更为敏锐,使得他们确信自己的“行为有超越自身的目的”(Durkheim,1960,pp. 372 - 373),这些异化影响从而会被抵消。在这个意义上,极端的专业化本身并不一定会产生异化,因为无论个体的贡献是多么卑微、重复、世俗,他们将认可并欣赏自己对集体事业的贡献①。值得强调的是,涂尔干还认为局部组织阻碍了加总阶级的形成。即,与“临近职业”(Durkheim,1960,p. 372)的长期接触使得工作者可以理解相互依赖性,并在自己工作中注入某种更大的意义,从而削弱了与之抵触的马克思式解读:工作是剥削的、异化的。在阶级分析的话语中,涂尔干很明显认为工作者重视中介组织的“关联特征”(relational features),然而利益的关联是那些在微观层次的显性合作与协调,而非宏观层次的隐性剥削。

对涂尔干而言,有机团结在规范上也通过职业规章来表达,后者使得工业冲突制度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劳资冲突。如前,他认为职业团体将是规范的主要推力和载体,因为职业团体足以接触内部的活动,并“知晓它的功能、明白它的需求、并且(了解它的)变体”(Durkheim,1960[1893],p. 5)。结果,职业协会将不断修订行为准则(codes of conduct),并且明确劳动如何分工的条款。在早期的工业体系,这样的规则要么统统没有(即,“失范的劳动分工”),要么就是没有得到所有方的同意而强制执行(即,“强迫的劳动分工”)。因此,冲突没有得到约束,而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变得诱人。当劳动分工越发深入时,涂尔干认为规

① 尽管怀疑论者有理由问:“毫无新意、日常生活的集体目标是不是足够激发出最一般职业的这种意义?”涂尔干的立场可以如此更好地来理解:当集体目标定位地尤其激烈或振奋人心(例如,英勇参战、建立社会主义)时,最微薄的贡献也将在道德上是重要的、有回报的。

则将会通过社会交往而自发产生，并写入正式的工业法律，社会主义和其他革命性图式的最初设想也随之崩溃。可以这样理解，所形成的规章作为微观层次的组织形式阻碍了宏观层次阶级的形成。

二、涂尔干是对的吗？

此时值得思考的是，涂尔干关于局部性组织兴起的故事是否有现实意义。虽然阶级分析学者通常会考虑马克思和韦伯的范式有没有“被证实”，有关涂尔干的阶级分析讨论却还没有得到类似地检验。相反，《劳动分工论》通常被认为是古老的“史前”社会学论著(Barnes，1990，p. 170)，因而阶级分析学者感到没有必要着手检验。

近代史告诉我们，紧盯着马克思、韦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似乎不甚明智。在很多方面，劳动力市场越来越“涂尔干化”，不仅仅是因为宏观层次的工业冲突得到了管制和压抑，也因为职业团体兴起成为现代和后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基石。如特雷曼(Treiman，1977)所提到的，现代工作者通常用职业性的术语来表达他们的职业期待；人们建立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学校来为工作者培训具体职业所需的技能；雇主们构建、招贴与职业对应的空缺(也参见Parsons，1954；Wilensky，1966)。四个动力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化”过程(occupationalization)：(1) 专业领域的长期扩张(它们通常有非常强势的职业协会)；(2) 新型准专业性职业(quasi-professional occupations)的兴起，以及为劳动分工中新型抽象技能而建立的协会；(3) 为了保证职业的(部分)封闭，对执照、注册、证书等手段更加频繁地使用；(4) 地方劳工组织(比如，美国教师联合会)日益壮大，使得包容性更强的劳工运动愿景逐渐

昭示出来，由此“局部的自我利益……成为时代的指令”(Marshall et al.，1988，p. 7；也参见 Visser，1988，p. 167)①。这些思考引发了克劳斯(Krause，1971)在很久以前总结道：“历史上，以职业为区隔的意识和行为要多于跨职业的结合”(Krause，1971，p. 87；也参见 Freidson，1994，pp. 75 - 91；Van Maanen and Barley，1984，pp. 331 - 333；Dahrendorf，1959)。确实，当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手工艺协会、联合会和相关的以生产为基础的协会时，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真正的跨阶级组织只是在历史昙花一现，而后现代的组织形式正在退回到局部主义。这种解读与涂尔干范式是一致的，即微观层次的组织更胜一筹，取代了加总式的阶级形成。

这当然不是说生产领域已经完全如涂尔干所预见的那样演化了。我们认为，涂尔干如先知般洞察了工作场所的职业化力量，但他很明显夸大了这些力量的作用及可能的影响速率。在下面论述的三个方面，涂尔干范式尤其经不起推敲。

1. 多功能主义(Multifunctionalism)和互相竞争的团体形式

在涂尔干的大多数相关文章中，他认为职业协会承担了许多功能，比如(1) 通过一些规范来管理劳动力市场：控制薪酬、工作条件和跨职业关系；(2) 提供一个**共同体**使得工作者可以“一起过同样的道德生活”(Durkheim，1960[1893]，p. 15)；(3) 作为“公共生活的基本器官”，负责选举议会代表(Durkheim，1960[1893]，p. 27)。按这些期待看来，当代的职业协会可能表现得不够好，特别

① 当然，当代关于“后职业主义”(post-occupationalism)的文献描述了以功能的弱化定义职位的逐渐消亡。这些文献基于这个论断：当代组织越来越依赖团队合作、跨领域培训、多重行动(multi-activity)的工作，以至于传统职业造成的区隔逐渐溶解(例如，Casey 1995)。这些变化如果真是在发生，应该视之为职业化力量新近而微小的缺陷，这力量曾统治了后涂尔干时期。然而，并不是没有人批评后职业主义者，有些人议论道“对组织化的职业逻辑(occupational logic of organizing)的要求事实上正在加强”(Barley，1995，p. 40)。

是在政治功能一方面。当然,许多政治行为都在具体的职业层次展开(例如,Abbott,1988),但职业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没有达到涂尔干描述的期望,即在公共治理中扮演核心、直接且正式的角色。相反,职业通常为高度专门化的利益而游说国家,最显著的是争取培训、认证从业者或者建立对劳动力供给控制的权利。即使在这个狭窄的领域,职业团体继续和其他团体形式相抗衡,最明显的是劳工组织。正如涂尔干所预料,劳动力和资本的冲突确实被平息和压制,这种结果既可以通过大工会的制度化,也可以通过取而代之的职业团体或地方手工艺联合会来达到。由此生成的团体形式的网络与涂尔干的预想并不一致:他认为多重目的的团体(all-purpose associations)将劳动力分成了一个个互斥的群体,排挤了所有与之竞争的组织形式,从而成为个体和国家之间唯一的中介①。

2. 不完全的职业化

在阶级结构的某些部分,职业团体甚至并没有出现,因为它们要么被相竞争的形式(如,工会)所取代,要么处于所有形式的社会组织都不可行的境地。例如,职业化仍未在低等的体力劳动部门发生,可想而知是因为技能水平较低、培训投资有限以及制造业发展迅猛。这些低度组织化的部门会保持无组织化(unorganized)么?会发展成某些形式的封闭和职业化么?还是会继续缩减规模甚至最终消失?答案尚不清楚。虽然技术的革新缩减了低度组织化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这个过程只是间歇性地起作用,并可能已到极限(例如,Spenner,1995)②。我们最好把当代阶级结构视为

① 与 Tocquiville(2000[1835])不同,涂尔干认为多种互相重叠的中介群体的扩张是负面的,标志了"缺乏或缺少中心权威"(参见 Hawkins,1994,p. 476)。

② 并且,即使在很好组织化的职业结构中,我们经常发现复杂的、互相嵌套重叠的职业协会的组合,这证明涂尔干所预测的简单结构是不正确的。

一块由许多道德共同体和唯实性职业所拼凑的复杂织布，之上点缀着纯粹唯名论类型的大片区域，这些区域中职业化进程尚未启动①。

3. 跨国的差异

劳动力市场职业化的程度在国家之间也有许多差异（见表3－1；也参见 Grusky and Weeden，2001，p. 210；Grusky and Sørensen，1998，pp. 1220－1222）。例如，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在制度化的职业群体上，因此可以认为是涂尔干范式的成功例子②。正如学者们一直强调的，德国有着发达的职业培训和学徒体系，从而激发了以职业为区隔的投资，并促进了对专业的忠诚和手工技艺的发展（例如，Blossfeld，1992）。在这种体系中，工作者必须在他们的职业早期对一个行当进行投资，（因为）重新培训的巨额开支塑造了相对封闭的职业群体。相反在日本，局部结构化（structuration）被制度所压制。典型的日本特征包括强调教育课程的通识化而非功能细分化、培养针对企业“nenko 技能”（即通过团队合作和不断轮岗的培训体系，Dore，1973）、对终身雇佣的组织化承诺（它在加强了个体与企业的缔结关系的同时牺牲了纯粹职业性的忠诚）、尚未成熟的企业工会体系（它包括所有专业化的功能因而清除了个体对技艺的忠心）（Ishida，1993；Cole，1979；Dore，1973）。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制造了“后职业化体系”，因而被某些评论家（例如，Casey，1995）认为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最后，瑞典对于涂尔干应该也是头疼的个案，因为不仅职业的团结被“活跃的劳动力市场”计划（“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s，Esping-

① 传统的阶级分析中，生产领域要么用唯名论、要么用唯实论术语来表达，因此，（学者）并未意识到现代阶级体系在根本上的混合性的特征。

② 然而在德国，加总阶级仍是发达并高度制度化的群体。因此，至少可以认为它并不完全契合于涂尔干的范式。

Anderson,1988,pp. 47－53)压制了,而且加总阶级的行动者变成了企业。这照涂尔干看来属于发展性异常(developmentally abnormal)而被明确排除。可以说瑞典提供了阶级形成的标准案例,即加总(阶级)的多样性,因为其手工艺协会主义早早就被跨阶级的集体议价形式取代了。结果,这种“异常”的组织形式有着比涂尔干想象中更强的生命力,至少在瑞典是这样。

表 3－1 按照阶级结构化的类型和数量分类的国家

加总的结构化(Aggregate Structuration)	解组的结构化(Disaggregate Structuration)	
	高	低
高	德 国	瑞 典
低	美 国	日 本

因此在某些国家和劳动力部门,涂尔干所强调的职业化力量被压制了。出现的主要问题是:(1) 这些抵抗的区域会不会最终被职业化力量所占领?(2) 它们会不会以既有形式存在下去,以证明当代组织问题有多样化的解决方案?(3) 这些区域是不是表征了涂尔干范式的某些基本要害,最终会广泛地显露出来,并扭转了先前主导的局部化和职业化的趋势?虽然这些疑问将进一步争论,但我们毫无疑问更倾向于(1)和(2)作为最合理的解释。当瑞典和日本独特的制度安排日益受到威胁,并且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阶级分析学者喜欢举出的替代性方案时,(我们)更坚信(这个判断)。

三、当代的阶级分析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涂尔干的一些观点是可圈可点的:他

预料了加总阶级的消亡(即,消极的宏观故事)和生产领域局部性组织的兴起(即,积极的微观故事)。如果我们接受了涂尔干对于近代史的解读,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应该怎样继续分析阶级?我们认为当代的分析至少存在着两个变化:(1)我们不该继续探求大阶级及其背后的社会学原理,并视之为阶级分析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了;(2)迄今的(学者)忽视了局部的层次,认为这与社会阶级的研究和理论建构无关,所以阶级分析的关注应转向(局部的层次)。下面,我们将逐个探讨这些问题。

1. 唯实主义解释的好处

对上述第一点,我们认为阶级分析已与当代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现实(institutional realities)脱节了:学者们描绘的阶级模式表现得好像仅在**分析**(analytically)上是有意义的,但其实没有法律或制度上的地位,并且对雇主、工作者或其他人(除了学界的一小撮人)不那么重要。举个例子,这个批判适用于诸如"半授权的监工"(semi-credentialed supervisors, Wright, 1997)、"操作工"(operatives,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专业人员和经理"(professionals and managers, Ehrenreich and Ehrenreich, 1977)、"常规的非体力工人"(routine non-manuals, Erikson and Goldthrope, 1992)的一些标准化社会类型。虽然这种常规的阶级类型在劳动力市场上仅仅是低制度化的,阶级分析学者仍在尝试为它们争辩,他们认为:(1)这与经典理论家的阶级分析"逻辑"是一致的(即,"释经"说);(2)它们虽然现在不明显,以后必然浮现出来并成为自为(für sich)阶级(即"潜伏"说);(3)在生活机会、政治行为或利益的其他后果方面,这些类型抓住了更多重要的差异(即,"解释差异"说)。最后的这个说法起码是可检验的,但实际上即使检验了,也仅仅证明了这种阶级模式有那么一些在解释方面的价值,并未否认其他的模式可能更为优越(例如,Mills and

Evans,1998; Marshall et al.,1988; Hout, Brooks and Manza, 1993; cf. Halaby and Weakliem,1993)。

这种传统"解析的"(analytic)方法基于这个逻辑：学者在研究时应该透过表面现象，试图洞察更加重要的潜在力量。正当人们认为表面现象具有误导性时，加总式分类也开始消亡——我们觉得这不是偶然的。毕竟在现代背景下，使用加总图式的学者们不得不用更深入的逻辑来解释，以至于将一些看上去是不好的(即，低制度化)扭转成好的。这个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极具现代性。在刻画过去的分层体系时，社会学家基本上依赖于很深制度化的类型(例如，三级议会阶层、种姓制)，好让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都看得明白。

今天的社会学家如果要回归这个策略，便会直接关注到涂尔干曾经预言的深度制度化类型的藏身处，即生产的微观层次。因此，现代涂尔干分析法的着手点是"单位职业"(unit occupation)，其定义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个技术上相近的职业群体—通过(1) 一个协会或工会，(2) 其执照或证书要求，或是(3) 在雇主、雇员或其他人之间广泛认可的、以效率(或其他方式)组织劳动生产和分工——被制度化下来。上述"单位职业"通过互相竞争的群体在劳动分工中对功能性位置(functional niches)进行法律权利的争夺而生成(例如，Abbott, 1988)。正如格兰诺维特和梯利(Granovetter and Tilly,1988)指出的，"我们那僵化、物化的概念说这个任务是护工的，那个是护士的，另一个是医生的……是法律、政治和经济斗争的结果，正如那些职业称谓一样"(Granovetter and Tilly,1988,p. 190)。因此我们使用社会边界来定义单位职业，它们由各种产生封闭的手段建构出来。与之相反，统计学家常用狭义的技术性概念来描述职业分类的建构，好像这样定义出来的类型仅仅是一些岗位的加总，它们的"基本功能和主要职责、任

务"相同(国际劳工组织,1990[1968],p. 5;同样参见 Hauser and Warren,1997,p. 180)。尽管所有的单位职业的确包含技术上相似的任务,这个条件就很难解释:通常职业的框架中为何那样分类?因为无限可能的岗位加总都可以满足"技术相似性"这个标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总能够找到社会建构的边界;相反很明显,劳动的技术分工是不同程度"职业化"的。某些区域仍然没有组织化,因其技能要求过低或其他阻碍(见上文"不完全的职业化"部分)。毋庸置疑,在这些区域中定义单位职业是困难的,因为要辨别一些社会性边界,它们有的尚未成型,有的可能永远无法巩固下来①。

2. 阶级分析学者应该关注局部性组织么?

我们希望前文成功地论证了以下事实:学者们耗费了太多精力寻找加总性阶级,而没怎么在解组的层次上、更深制度化的群体方面下工夫。批评家自然会驳斥道:局部性组织对于研究职业的学者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但对于阶级分析学者却显得层次太低,不值得注意(参见 Goldthorpe,2002;Kingston,2000)。这个反应虽然可以理解,却忽视了局部层次产生的类阶级行为。在另外一篇文章里(Grusky and Sørensen,1998,pp. 1196 - 1212),我们已经阐明了是职业在集体行动上代表了成员们、塑造他们的生活机会和生活方式、对非成员进行抽租和剥削,并在其他方面也像加总性阶级那样行动。如果阶级分析学者想证明:先进的经济体是互相竞争群体的"粗陋的"(lumpy)大杂烩(而不是天衣无缝的新古典主

① "单位职业"这个概念更像一个诡计,因为我们常常发现互相嵌套、重叠的复杂网络所构成的边界,因此往往无法轻易地将其还原成一系列可穷尽的、互斥的职业。这就意味着社会学家假设每个工作者必须归入唯一一个职业,因而处理数据非常粗糙。然而一旦继续依赖于这种简化的假设,我们就需要阶级分析学者在分解的层次上辨别主要的法律裁决(即,通过法律制度化的单位职业——译者注)。

义市场），他们最好回到局部性层次，分析那些在劳动分工的功能位置附近出现的职业协会。本节的目的就是将此论断详细展开，并证明其如何解释各个社会组织过程（即，认同、封闭、集体行动、相近结构化），阶级分析学者曾努力在加总的层次上做过类似尝试，却基本以失败告终。

（1）认同和意识：我们的讨论自然而然地从阶级体系的主观领域开始。尽管马克思和涂尔干都预期了一个大的清除过程（clearing operation），即生产领域外的团体（例如，以民族或区域为基础的关系）会萎缩，但他们对以下问题存在分歧：在发展过程中，是加总的还是解组的群体成为主要受益者？虽然加总的解释似乎战败了，但一些社会学家当然还是确信，加总的从属关系（affiliations）深深塑造了当代的身份（例如，Marshall et al.，1988）。然而主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post-Marxist）立场是：如今大阶级对于工作者的影响很弱。举例来说，埃米申和韦斯顿（Emmison and Western，1990）报告称只有7%的澳大利亚人选择大阶级作为“非常重要”的身份之一；其他评论家（例如，Saunders，1989）强调：当阶级身份是开放式问题时，被访者容易产生困惑、拒答，甚至清楚地否认阶级的存在。这些证据使得许多社会学家总结道，现在的阶级是一个“被动的身份”（Bradley，1996，p. 72），并且生产领域不再是身份形成的统治或首要场所（例如，Hall，1988；Pakulski and Waters，1996）。我们认为，这个结论言过其实，且没有顾及阶级分析的延续性力量，至少在我们看来是种夸大的形式。埃米申和韦斯顿的研究结论再次给我们带来启发，他们指出具体的职业群体持续成为当代工作者的主要社会身份（Emmison and Western，1990，pp. 247－248）。相似地，许多定性研究也说明职业的从属关系深深影响个体身份和自我定义，几乎可以证实涂尔干的“基要主义”（essentialist）观点，即这些关系提

供了最主要的身份①。这些结论不足为奇，人们往往在日常的互动中寻觅职业机会。例如公司时常会从客户和顾客那里询问职业相关的信息，同样，个人在聚会、商业会议或其他社交场合最先关注的也是工作信息。当(公民)结婚、出生或死亡时，当他们申请国家的福利、给国家上税时，当进行人口普查或劳动力调查时，当签发或遴选移民、市民、陪审团成员时，国家也都要收集具体的职业信息。相应的，这种解组性的“职业语言”蓬勃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而阶级的加总性语言几乎只限于在学术机构内说说。这个情况再明显不过，以至于阶级分析学者提不起兴趣挖掘其更深的真理，但当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以及对这种组织的主观理解时，其重要性不容小觑。

(2) 社会封闭：如果说阶级的主观模型一度在社会学大行其道(例如，Warner 等，1949)，那么如今关注社会过程的路径取而代之成为焦点；通过社会过程，阶级成员仅限于那些符合条件的人②。这些模型不仅强调封闭得到巩固的制度化手段(例如，私有财产、资格证明、执照)，而且关注被排挤的阶级挑战这些制度以及不平等延续的努力。封闭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学语言以理解阶级间关系，然而我们可以证明，封闭理论家描绘的阶级图式实际上是标准的加总式。例如，帕金(Parkin，1979，p. 58)提出的二元阶级解释(two-class solution)，包括了一个控制着生产性资本或专业性服务的排他性阶级，和一个被排斥于这些控制性岗位以外的附庸性阶级。这个默认加总图式的趋势，揭露了大阶级范式的霸权，从而导致阶级分析学者思考替代性方案的想象力匮乏，甚至

① 例如，参见 Zabusky and Barley(1996)，Mortimer and Lorence (1995)，Freidson (1994，pp. 89 - 91)。

② 参见 Freidson(1994，pp. 80 - 84)，Murphy(1988)，Collins(1979)，Parkin(1979)，Weber(1968[1922])。

那些赞同封闭理论的学者也难逃一劫。确实，如果摘掉传统阶级分析的有色眼镜来重新创造封闭理论，学者们可能会强调真实运转着的封闭性机构(例如，职业协会、手工艺联合会)绝大部分是那些体现“资格证明持有者本身”的局部联合体(Murphy，1988，p. 174)。在多数情况下，封闭的潜在机制(例如，执照、资格证明、学徒制)并不能确保人们进入加总性阶级，却只是在更为具体的职业层次负责控制着出(入)。相反，没有类似的组织来再现加总性阶级，也没有真正加总意义上的法律裁决或封闭手段①。

(3) *集体行动*：对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封闭有意义不是因为它提供了追逐纯粹局部利益的工具(例如，“贸易工会意识”，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而是由于它促成了贯穿阶级的利益(classwide interest)以及更宏大的阶级间冲突。当代社会学家所指的加总阶级，迄今却明显没有按照以上的理论化过程来行动。起初，以上情况促生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补救措施(例如，Poulantzas，1974；Wright，1985；Korpi，1983)；然而，随后便引发了后现代主义者更为激进的反应，他们认为利益越来越多地被定义和建立在生产领域之外(例如，Laraña，Johnston and Gusfield，1994)。尽管这种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但它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结构化定义的群体中可以不费力气地产生出许多集体行动，当然唯一的条件是(我们)改变过去的做法，在解组的层次上定义群体。在单位职业的层次上，三种主要的集体行动类型是：(1) 方

---

① 可以认为，加总性封闭的推动力在工作场所以外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举个例子，高等教育院校在一个广泛定义的职业性管理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内，通过以下两个策略生成封闭：(1) 通才式的高等教育学位可以“换来”这个阶级的职位；(2) 贯穿于阶级的互动仅仅局限在校园内部。类似地，居所的隔离也能看作加总性封闭的一种推动力，因为小区一般按种族、民族和收入被隔离，而不是具体的职业。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在加总性层次上的封闭边界，会比那些定义职业、并控制进入其中的(封闭边界)更模糊、微弱，并且不如它们制度化。

向朝下的，用来限制职业位置进入的封闭策略；（2）平行的，职业团体在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位置上的激烈竞争；（3）朝上的，寻求国家、雇主来巩固以职业为区隔的好处（例如，垄断保护）。这种在微观层次上对工具性行为的强调，与涂尔干的范式不无一致。当然，涂尔干只是敷衍地谈到职业团体的工具性诉求，但这大抵是因为他视其为理所当然，由此转而解释其更微妙、复杂、超越经济范畴的（entra-economic）功能（Durkheim，1960[1893]，p. 15）。对涂尔干而言，职业团体纯工具性的行为的影响既不复杂、也不深远，因为它瞄准直接的局部化利益（例如，工资、工作条件），而根本没有改革或革命性目标①。也许我们可以总结，解组式的阶级分析是一项不那么耗费心智的工程；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加总式的阶级分析学者也降低了他们的野心，并有效地抛弃了那无所不包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历史理论（例如，Goldthorpe and Marshall，1992，p. 385）。正如霍尔顿和特纳（Holton and Turner，1989）指出的，如今这种理论已经大抵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通常是“重新概念化非有机的（non-organic）**社会**（gesellschaftlich）关系的阶级，或是在经济阶级与社会阶级看似呼应的少数偶然时刻，对于阶级分析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Holton and Turner，1989，p. 175；也参见，Holton，1996；Goldthorpe and Marshall，1992，pp. 383－385）。

（4）近似的结构化（Proximate Structuration）：在这个意义上，阶级分析的目的更为局限，以至于如今大多数当代学者仅仅满足于讨论：阶级身份如何决定了个人层次的各种结果（例如，态度、投票行为、生活方式）？结果是，后续的“近似结构化”（Giddens，1973）分析要么讨论加总阶级的类别化效应，要么检验

① 虽然职业协会通常追求纯粹的局部性利益，这种协会的扩张却具有出乎意料的系统性后果，最显著的是“排挤”了阶级内部团结的其他（形式）。贯穿整篇文章，我们都在努力强调涂尔干微观和宏观故事的这个联结。

代表了工作(例如,"实质的复杂性")或具体职业(例如,社会经济地位)下潜在多重维度的变量的连续性影响。虽然这些路径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他们却忽略了(某些)解组性职业的**共同体**特征,这令人担忧。正如前述,现代封闭主要在具体职业的层次上被巩固,其产生的社会互动约束也造成相应分散的职业亚文化。正如涂尔干(1960[1893])很久以前描述的(也参见 Caplow,1954),互动的约束可以保存、阐释以职业为区隔的文化。相反,加总性阶级并没有那么强地影响二次社会化,也并不具有那么大的权威,相应出现的加总性文化一般而言更为广泛和抽象①。传统的生活方式、性情、态度分析之所以溃败,是因为职业**共同体**被视为唯名的类型,并且被随意地加总、维度化了。确实,当阶级分析的批评家们抱怨说"阶级效应"似乎很弱(尤其是 Kingston,2000;也参见 Pakulski and Waters,1996)时,并非意味着生产领域的效应真的很微弱,原因更可能是他们利用了那模糊的、高度加总的阶级操作化(实质性的依据请参见 Weenden and Grusky,2002)。

这给我们带来什么思考呢?我们已经在试图反驳:经常被认为是大阶级产生的社会组织性过程,其实在较低的分析层次反而能更清晰地表现出来。例如,我们已经强调了职业群体为自我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趋势,为巩固(部分的)封闭而捍卫阶级的边界,定义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以维系成员,并成为工作者的自我及他人认知方面、主观上有意义的类型。当然,阶级分析学者可以轻易地反击说,这些过程仅仅在加总的层次上展现时才与利益有关,但这样做无疑会关闭阶级分析复兴的重要通道,无法阻止后现代主义者击中大阶级的典型要害,并(误导性地)扩展说生产领域无

① 例如,参见 Lamont(2000,1992),Bourdieu(1984),Bernstein(1971),Kohn and Slomczynski(1990)。

关紧要。如果阶级分析学者跳出他们对大群体的沉迷，承认更小的类阶级群体的兴起，便极有可能发展出有关社会行为的更好解释(例如，Weeden and Grusky，2002)、建立起有关社会流动和社会封闭更唯实的模型(例如，Sørensen and Grusky，1996)或在阶级分析的微观层次上进行更有说服力的探讨(更多细节请参见 Weeden and Grusky，2001)。

四、有没有涂尔干式的剥削和租金(rent)模型？

前面的讨论指出，阶级分析学者长久以来寻找的、有意义的社会政治群体可能恰恰是解组的职业。相反我们证明了，在加总阶级框架下寻找类似的社会政治群体多么困难，因此阶级分析学者们不得不将目标局限在寻找有潜力成为这种群体的加总“结构性位置”(structural locations)。在这个范式下，许多作者关注的是辨别出剥削的潜在主轴，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主轴是构成“对抗性利益的客观基础”(参见 Wright，1985)——最终人们将看到这些(对抗性利益)，并诉诸更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群体。这节我们要达成两个目标：探求涂尔干有没有预见这样的剥削模型，以及在他的启示下，应该怎样有效地应用或修改这种模型。

1. 一个涂尔干式的起源？

围绕这些目标，我们应该着重关注大量基于技能的剥削(skill-based exploitation)的文献，因为它们尤其相关。在这些文献的背景下，赖特(Wright，1985)和其他人(Sørensen，1994，2000)将基于技能的剥削和抽租行为等同了起来，后者指通过有限的培训机会来巩固技能的回报，从而人为地限制了合格劳动力的供给。如果采取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这样来检验剥削：计算一生中合计有技能的劳动(skilled labor)酬劳超过无技能劳动力(unskilled

labor)的部分，有没有高过隐含的培训费用(例如，学校的学费、放弃赚额[foregone earnings])。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可以预想的是劳动力流向报酬最高的职业，使得所有工作者一生的酬劳是均等化的，不存在剥削性的回报(考虑培训费用后)①。然而，当建立封闭以限制流动机会、阻碍工作者自由地得到更高报酬或更理想的职位时，劳动力的均衡流动就被打破，抽租和剥削也就顺势发生了。例如，医生职业之所以薪水较高，可以视为是医学院“人为地”限制培训人数而造成的。

虽然有些时候，这种基于技能的剥削的呈现方式是经典马克思式剥削的推广，但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概念其实也有涂尔干式的起源。例如，涂尔干(1960[1893]，pp. 374－388)曾抨击加在自由流动上的限制，通过(1) 社会准则或法律限制了某些人从事可能的职业(例如，种姓体系、职业的性别区隔)，或是(2) 经济障碍或进入成本使得低等阶级的工作者无法考虑需要延伸搜寻和培训时间的职位；这个起源就在此出现。这两种“被迫流动”(forcedmobility)的效应都是通过铲除或削减受其影响工作者的退出威胁，以减少其议价能力。用涂尔干(1960[1893])的话来说，“如果社会的一个阶级因为生存，而不得不接受它服务的任何定价，另一个阶级因为手中的资源而幸免这种行为……那么后者对于前者就有了不正当的优势”(Durkheim，1960，p. 384)。通过直接或间接对劳动力市场干预，我们可以着手于开放流动力机会，以应对产生这种剥削的潜在趋势。也就是说涂尔干希望，不仅是通过直接移除加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之上的准则或法律限制(例如，移除对种姓阶级成员流动的禁止)，也通过禁止父母将财富和资产遗留给儿女、间接使得他们在竞争理想职业时具有优势

① 这里我们忽略了个人的努力、天赋和补偿性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性因素。

(Durkheim,1960[1893],pp. 30 - 31,374 - 388),从而使得市场机会均等化①。这个范式预示了当代对于剥削的理解,因其指出工作者的议价能力是他们在各自的职业内(调节)劳动力供求的一种功能。但同时,因为与由"租"生成的剥削性薪酬条款相比,涂尔干更多强调了"被迫流动"的不公和无效,也因为他更多关注的是那些工作者囿于不理想职业、不得不放弃的薪酬,而不是那些特权享有者采取限制竞争者的供给而抽取的租金,(所以涂尔干)只是部分地、不完美地预期了现代观念上的租金。

2. 对当代基于技能的剥削模型的改进

尽管涂尔干没能预想到有关租金的系统性模型,但当我们考虑如何改进当代基于技能的剥削模型时,他对局部组织的强调还是有启发性的。确实,如果封闭的现代制度(例如,职业协会、手工艺工会)限制了局部而非跨阶级的劳动力供给,那么照涂尔干的逻辑,抽租行为应主要发生在局部的层次上。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涂尔干对于职业团体超越经济的功能尤为感兴趣,但他承认这些团体也为其成员提供了"保障他们共同利益的力量"(涂尔干,1960[1893],p. 11)。这力量可以用来限制进入该职业的新人数量,防止互相竞争的职业扮演相似的功能,也可以催生劳动分工里的一个个小型垄断控制。然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认定一种包含并跨越许多职业的大"剥削阶级",认为这样加总的原则通常是解析的,即在结构上具有相似职位的工作者是同等程度被剥削的、拥有着相应的共同利益、并可能最终形成坚固的横跨性群体来推动这些共同利益。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阶级通常

---

① 通常在这点上很容易攻击道,涂尔干没有考虑到上等阶级的父母也把社会、文化资源传递给了子女。这个说法自有道理,但不宜夸大。虽然,涂尔干没有像当代社会学家那样多地考虑非经济的不平等,但他也认为即使不考虑经济遗产,某些"不合法的"不平等仍将不可避免地保持下去(相关讨论请参见 Lehmann,1995)。

没有制度的或社会的、组织的落脚点。也就是说，封闭制度大抵是在职业的层次上运转的（见上文“社会封闭”一节），因此租金也更可能在这个层次上发生。结果是，基于技能的剥削的基本单位是职业本身，而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是岗位、职业的异质性加总（heterogenous aggregation），其在结构上具相似的被剥削能力。当然以下情况也可能发生：即抽租的剥削者具有“结构上相似的”能力，并会最终团结起来，以保护那产生封闭和租金的资格认证制度（参见 Grusky and Sørensen，1998，pp. 1211 - 1212）。在这个意义上，解组的阶级图式可以用来刻画当代抽租的结构，而传统的大阶级图式可以作为一个假设，即未来的社会结构也许会简化。

更重要的问题自然是：抽租的潜在结构会不会影响（大众）如何理解利益及其利益诉求的方式？从新涂尔干的立场来看，会批判传统基于技能的租金的定义为太隐晦、学究化，以至不能在大众广为传播，特别是在（现今大众）广泛接受职业薪酬差异的适当性与合法性的情况下。涂尔干认为在所有的社会里，必将出现关于“不同职业群体所适合的……报酬水平”的共识，甚至在被迫流动和剥削能够解释可见的差异时，这些共识仍然游荡在社会里（特别可以参见 Durkheim，1951［1897］，p. 126）。职业结构应该被看作是一把双刃剑，创造封闭、抽取租金（即，“抽租”一面）的同时，通过使租金合法化使我们确信这是合适的、没有问题的（即，“租金合法化”一面）。合法化的途径可能依赖于“最好的工作者得去最重要的职业”（即，“功能主义”）、“市场决定报酬的神圣不可侵犯”（即，“市场合法化”）或是“应该补偿那些完成又脏又累任务的工作者”（即，“补偿差异”）等种种信仰。

不论哪种解释，结果是：人们通常接受职业间的收入差异，却严格审查职业内部的差异、有时将其拿来做为歧视的证据（尤其是与种族、性别或民族相关时）。举个例子，在同工同酬的立法（comparable worth legislation）陷入僵局时，反歧视的立法开始涌

现。这绝非偶然，为什么呢？我们只需注意到，反歧视立法旨在使得职业内部的薪酬不平等成为非法的，而同工同酬立法旨在禁止职业间不平等的固化，这种不平等通常通过功能主义的、市场力量的、补偿差异的文化理念合法化（参见 Nelson and Bridges，1999）。因此，一个职业化分类框架的制度化过程会引导我们将类别间的差异看成是适当并合法的。涂尔干（1951[1897]）认为发展具有合法性的“分类框架”（classification schemes）很重要，因为正是这些框架可以控制住潜在的破坏性欲望、防止了最弱者“无休止地扩张他们的抗议”（Durkheim，1951，p. 383，也参见 Zeitlin，1968，p. 275），（这个看法）的确很有见地。许多社会学家采取了更容易接受的价值中立观点，即这些合法化力量相当成熟，以至于会引起我们对以下租金理论的质疑：它们任何宣称抽租最终会显露出来、并激起之前潜在的抗争性利益。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仅靠基于租金的阶级定义无法挽救大阶级的图式。当（看到别人）使用传统的基于技能的租金定义时，一个新涂尔干主义者应该马上指出：（1）这种抽租更多发生在局部层次，这是大多数阶级分析学者没料到的；（2）正是职业分类框架的制度化使得职业薪酬的差异合法化，并压抑了抗争性利益的产生。结果是，也许微观阶级框架下的类型永远不会出现阶级分析学者所一直寻求的抗争属性。

五、（阶级）越分解就一定越好吗？

为了阐释新涂尔干的路径，我们已经提到了所有与之竞争的阶级分析模型。我们非常大致地描述了它们的特征，并为它们贴了如“大阶级”、“加总的”、“层级化路径”种种标签。尽管把这些传统的路径当作统一的总体很方便，但现在应该考虑，是不是所有的阶级模

型都在我们批评的面前不堪一击。如表3-2所示,我们区别了六种类型的框架和量级,每一种都是一个测量层次(即,连续的、类型的)和一个偏好的分析单位(即,单位职业、职业的加总、工作层次的加总)的结合。在前面几节,我们主要关注了量级化职业的模型(即,模型A和C)或是加总职业的模型(即,模型)D,使得我们可以批评说:在一个层级化量级中,当把"相似的"单位职业编入同一个阶级或相似的层次时,其异质性便被掩盖了。因为大多数社会学家默认采取了这些普遍分类的阶级模型,所以我们偏向于认为这类批评(即,类型A、C和D)是说得过去的①。同时,当然也有些学者试图把岗位(而非职业)视为基本的分析单位,来理解生产的社会性组织过程,那么我们的批评是不是也适用于这类替代性路径呢?

表3-2 生产领域中的社会性组织模型

测量的层次	加总或分解的类型		
	单位职业	职业的加总	岗位层次的加总
连续的(Continuous)	A类型的模型:声望、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量表(例如,Hauser and Warren,1997;Bourdieu,1984)	C类型的模型:霍林斯黑德职业量表(例如,Hollingshead and Redlich,1958)	E类型的模型:工作条件和岗位期待量表(例如,Kohn and Slomczynski,1990; Jencks et al.,1988)
类型的(Categorical)	B类型的模型:新涂尔干主义的微观阶级(Grusky and Sørensen,1998)	D类型的模型:新韦伯主义阶级(例如,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Featherman and Hauser,1978)	F类型的模型:新马克思主义"剥削阶级"(例如,Wright,1985)

① 在Erikson和Goldthorpe(1992)最近的著作中,他们试图按照工作层次的属性(即,雇佣情况)来构建他们的阶级框架,尽管这框架一直是在职业的层次进行操作化的。

我们可以把一个岗位(job)定义为“个人为经济报酬而进行的,明确而有时独特的一系列活动”(Hauser and Warren,1997,p.180)。在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岗位数量与工作者数量相当,因此学者们在处理岗位层次的数据时,甚至比我们呼吁的更为彻底地选择分解的策略。我们也许要问,一个新涂尔干主义者该不该被这样极端的解组的可能性所吸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回忆到单位职业是通过不同的封闭产生机制——比如团体、工会、发执照或证书的机构——而被社会构造的。正是通过让功能相似的岗位穿上这层“社会性外衣”,才使得单位职业成为相对同质化的类型。这种同质化的源泉有三个:(1)单位职业会挑选那些与既有职业的“刻板印象”相一致的工作者(例如,社会学吸引了“左倾”的应征对象);(2)清晰的培训方案使得未来从业者的态度、行为、世界观更深地被同质化(例如,研究院、职业培训、学徒制);(3)在职业边界内社会互动相对较多,由此强化了以职业为区隔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而在某种情况下,特别是当固执的(学者)超越了职业的界限以分解阶级时,使用解组方法可解释的好处也会减少,因为这些界限是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化、并产生同质性的。

呼吁E或F类模型的阶级分析学者会同意:稍微加总或给岗位一些维度化是必要的,但他们当然不选择加总到社会性建构的职业边界(的地步)。学者们反而同样青睐一种“分析的”路径,其目标是辨别岗位的技术性状况(例如,实质的复杂性、自主性),这些状况建构了利益、影响社会互动的过程或决定了利益的后果。很明显,这个路径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结论。然而拥有相同的抽象技术状况(例如,实质的复杂性)的岗位,并不是被社会性地组织成有意义的群体,因此这样找到的同质性是来自技术状况的直接影响,而与其他的诸如遴选、共同培训及互动性封闭等社会引入的效

应无关。如果不考虑这些社会性效应，将大大降低其解释力。

为了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分析性路径的局限性，让我们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即社会学家和他们似乎独特的“惯习”（Bourdieu, 1984）。例如，为了解释人文主义者、反拜金主义者（antimaterialist）或是社会学家的“左倾”文化及生活方式，一个新涂尔干主义者将强调：(1)社会学的“左倾”声誉以及由其导致的对应征者的自我筛选（self-selection）过程；(2)漫长的社会学世界观的职业训练所造成的自由化影响；(3)相似思维的同僚之间社会互动的强化效应。当然，社会学家的确也处在独特的工作条件下（例如，高自主性、高复杂度），但这些抽象的技术条件似乎会被前述的社会性力量所吞没。经济学家的案例可以提供一个有启发性的对比：毕竟，经济学家也在非常相似的条件下劳动（例如，高自主性、高复杂度），但却拥有相对保守的政治观和生活方式。为解释这种保守主义我们需要意识到，经济学家自我挑选了保守主义，且新古典主义路径的研究生训练强化了这种既有的保守主义倾向，以后与经济学家同僚的互动更是防止了一切可能的意识形态“摇摆”。因此，经济学家的保守主义是被社会性因素而非劳动所处的技术条件造成的。

E和F模型包含的纯粹分析性路径（的解释力）是较弱的，因为其阶级类型并不是通过挑选、社会化以及互动式封闭的同质性而整合在一起的。这个论证与之前批评A、C、D模型是完全一致的。虽然我们所偏好的微观阶级并没嵌套在岗位层次的阶级结构里（因此并不能严格地应用“解组”的说法），我们依然坚持认为社会学的唯实主义是有其好处的。

六、结论

在其备受推崇的《劳动分工论》序言中，涂尔干（1960[1893],

p. 28)预言职业团体将会逐渐“嵌入国家与个人之间”，并通过使工业冲突规范化及制度化，在具体的职业层次创造出新形式的团结，由此以解决社会秩序（失范）的问题。尽管研究涂尔干的学者会仪式般地反复陈述（这个观点），但阶级分析学者却从未视之为可靠的、可发展的模型。当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模型越来越受到攻击时，阶级分析学者通常退回到某种版本的新韦伯主义或是后现代主义，（然而）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到涂尔干所强调的职业阶层的结构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辟出新涂尔干主义的第三条路，重新关注劳动分工内的局部性组织。

这个“第三条路”与其说是提供现有的答案，不如说是开启新的研究问题。接下来，我们将列举五个重要的经验问题——每个都与阶级分析传统下通常探求的领域有关——作为新研究的范例（更多细节请参见 Grusky and Weeden，2001）。

大阶级的类型是否充分地抓住了社会阶级的效应？虽然我们已经指出，传统的阶级（分析）没能在生产领域发掘出解释性力量，但我们尚未给出任何经验性证据；这重担就压在了那些致力于改进既有分析路径的学者身上。在许多传统阶级框架里，其类型仅仅是具体职业的加总（参见表 3－2）。因此我们可以检验当硬套这些加总类型时，是否损失了大量解释力（参见 Weeden and Grusky，2002）。当然，我们指的是检验各种因素（例如，态度、消费行为、生活机会、生活方式）与“阶级的相关系数”。

加总式是否在阶级结构的某些区域比在其他（区域）更有依据？在某些阶级里，使用加总式的代价可能尤其高。举个例子，非手工工作者的生活方式有可能非常异质化，因为非手工部门的职业组织化程度高，因此从业者会接触到存在区隔的文化和社会化经历。与之相反，低等的体力劳动部门通常再现了一个相对同质化的区域，其职业化发展地很不成熟。虽然这种平常的解释看似

有理，却并未与任何替代（解释）不一致，最显著的是这个零假设：在阶级结构的区域中，学术界仅仅是对他们最熟悉那些的职业区隔更为敏感。

某些职业是否发展得尤其成熟？我们同样关注解组的结构化边界。通常的说法是，手工艺职业在融合工作和生活方式方面很典型（Mills，1956，p. 223），但我们怀疑在职业结构的其他区域，也存在着发展成熟的生活方式么？正如现有的证据表明，解组的结构化在这些条件下将最为显著：（1）培训要求严格、耗时长（例如，医生、教授）；（2）工作者被（社会）隔离或污名化（例如，清洁工、伐木工、马戏团从业者）；（3）招聘是高度自我挑选的，即依赖于社会网络（例如，演员）、经济上的进入障碍（例如，资本家）或是要求不寻常品味和技能（例如，殡葬工作者）。通过检验单位职业内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异质性，我们可以检验这些假设。

社会阶级是否如后现代主义宣称那样正在解体？在后现代的圈子里，主要的辩论暗含有关（社会）趋势的问题，最极端的观点认为生产领域所有形式的结构都将消亡。然而，为这种观点所积累的证据非常有限。确实可以看到，相关研究几乎都指向加总结构化的趋势，现有的证据甚至主要包括投票行为（例如，Evans，1997）、生活机会（例如，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以及一些别的通常意义上的结果（参见 Grusky and Weeden，2001）。因此，这些证据不能在一般认为的宏观的意义上支持“阶级去结构化（destructuration）”的假说。

大阶级模型是不是错误地呈现了社会流动的潜在结构？如果社会封闭主要在单位职业的层次被巩固（是对的），那么传统的加总式分析可能低估了流动机制的刚性（rigidity）和持久（persistence）的程度（Sørensen and Grusky，1996；Rytina，2000）。而且因为加总可以隐藏许多局部结构化的跨国差异，一旦流动数

据被解组，我们就会发现通常的统一的假设不再有理。虽然社会流动的既有文献浩如烟海，如果我们在微观阶级层次来重新审视，这些特别依赖于大阶级范式的文献也就经不起推敲了。

至此我们已经证明，“阶级效应”的传统研究需要重新审视一番。尽管大阶级范式可能仍然占据主流，但学界至少应该考虑也许它已经走上歧途，并且许多可解释的行为是在大阶级内部发生的。我们应该牢记，最初引入大阶级模型，是用来解释宏观层次的改革性事件及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参见 Grusky, Weeden and Sørensen,2000)。当阶级冲突被制度化下来时，阶级理论家们渐渐不再强调这些宏观层次的历史理论，转而叙述一些发展性事件(developmental narratives, Holton and Turner,1989)，并更倾向于用阶级类型来解释当代的微观层次行为(例如，投票行为、生活方式)，即一种更为“平和的”学术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为了与这个新的学术日程相调和，当代(学者们)沉迷于修补、调整和更正大阶级范式，在这个子领域进行徒劳的努力。当然很有可能的是，这些修复的努力可能通通于事无补。如果学者愿意认真地对待当代微观层次的学术日程，就需要他们跳出大阶级唯名主义的框框，竭力发掘局部的社会性组织，从而发展出新的微观阶级模型。

译者：马磊(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倪笑妍[①](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① 倪笑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2007 级本科生，研究兴趣包括上海世博会、社会服务机构和基督新教。

第四章
布迪厄阶级分析基本原理

艾略特·魏宁格(Elliot B. Weininger)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2002年1月辞世。此时,他或许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学家(见 Calhoun and Wacquant,2002)。作为多部经典著作的作者,他已然成为众多专业领域(包括教育、文化、"理论"以及知识社会学)不可或缺的参考标准;而且,对独立战争前后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卡比尔人进行的研究,使得他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也享有盛誉①。不仅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当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逐渐掌控政治话语权时,他却积极地参与到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对抗当中,从而声名鹊

① 要看有关布迪厄著作的一般介绍,可参考布迪厄与华康德(Wacquant,1992),及斯沃兹(Swartz,1997)、布鲁贝克(Brubaker)(1985)和卡尔霍恩(Calhoun)、李普玛(LiPuma)及波丝妥恩(Postone)的文献(1993)。

起(见 Bourdieu,1998a; 2001a)[①]。

在布迪厄的诸多作品中,社会阶级都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分析类别——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因此他通常都被归入当代重要的阶级理论家之中。然而,尽管社会阶级概念在其作品中如此重要,亦是其理论活力的根源所在,但在诸多二手文献中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然还是很模糊的。事实上,这一概念之所以如此难以把握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 无论是布迪厄的阶级概念,还是其他更为一般的概念,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沿袭某个"先驱人物"——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或其他一些人物——的传统,抑或是从这样一位人物中发展出来的某种传统。相反,无论是阶级概念,还是其他一些概念,布迪厄都是从这些社会学经典著作中视需要而借鉴的。
- 布迪厄极为反对将理论与经验研究割裂开来——几乎他的所有概念创新都是从具体的经验分析中发展出来的。这就为任何试图对其阶级概念,或其他概念提供一种"原理性"阐释带来了巨大困难[②]。而且还要求我们从这些概念的实际应用中提取出分析性命题时,要尽可能地减少曲解。尤其是在不同于布迪厄当年著书的时空背景的前提下进行解释,就更有必要将这些命题的实质含义与当时被创造出来的特殊情境分隔开来对待。

---

① 然而,政治参与对于布迪厄来说并不新(参见 Bourdieu,2002)。

② 布迪厄通常是怀疑这种试图脱离经验上的实际应用而去设计出在其著作的一套理论逻辑的(将这种方式嘲讽为一种"学究式的做法")。然而,尽管是尝试性的,但他确实进行对其各种理论概念的澄清。在社会阶级的问题上,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部分: Bourdieu,1987;1990b,pp. 122 - 139; 1991, pp. 229 - 251; 1998b[1994], pp. 1 - 18。

● 布迪厄避开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因为这种取向已深深地扎根于英语世界的很多阶级分析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人们几乎看不到标准多变量分析技术有多可靠。但同时，他也并不简单地推崇“定性”方法，而是在研究中综合使用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因为对这种资料的解释逻辑我们既不熟悉也不觉得浅显易懂，所以他的推论过程可能会难以理解。

● 与当代阶级分析的各种著名学派不同，布迪厄并未使用理性行动理论。他对社会阶级的解释主要在两个方面区别于这些学派。首先，他的行动理论围绕着“惯习(habitus)”概念，它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性情系统，这些性情系统会影响“思想，感知，表达和行动”(Bourdieu，1990a[1980]，p. 55)。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由惯习而产生的行动当然可以趋近理性行动理论所确定的行动，但它必须要被放到与惯习形成的社会情境足够相似时才能理解。换句话说，他认为理性是具有“社会界线”的(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p. 126；Bourdieu，1990a[1980]，pp. 63－64)。其次，布迪厄的阶级分析方法也为符号系统的分析保留了一块重要位置——而符号系统在假定理性行动的模型里几乎是找不到任何位置的。

由于存在以上这些困难，所以试图详细阐释布迪厄的社会阶级方法，是不能简单还原为一系列原理性命题的。相反，这种详述又必须首先要同阶级分析中的具体实践相分离。当然，在这里主要是指布迪厄的经典著作，《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Bourdieu，1984；最早于1979年出版，以下简称《区隔》)。通过对这部著作的具体考察(可以肯定，是综合考虑他之前和之后的相关著作)，我们可以领略布迪厄分析资料的独特概念体系和方法。

一、初步主题

依据20世纪60到70年代在法国收集的资料,《区隔》将社会阶级与身份群体(status groups)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其中,身份群体是依据韦伯的概念,被定义为享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一个群体①。然而,在进入正文之前,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阐明,因为它们使得布迪厄的阶级分析方法产生了很多独特之处:(1)符号系统分析在阶层分析中的意义和作用;(2)阶级间的边界问题。

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已经展开了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它们之后出现在《区隔》这本书上,布迪厄很明显是采用了韦伯著名的有关"阶级"和"身份群体"的解释。

> 一切都似乎表明韦伯反对将阶级和身份群体视为两类真实的实体,它们在不同的社会类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集合在一起……;[然而],如果要让韦伯的分析产生影响,则有必要将其视作名义上的实体……这都是由于选择了强调经济与符号方面的结果,因为在相同的现实条件下,它们总是共存的……(Bourdieu,1966, pp. 212-213;笔者的补充,强调的重点有所调整)

因此,布迪厄是从物质(或经济)与符号方面的差异来解释韦伯的阶层与身份的对比。而且,他主张这种分类并不应该被看成是二选一的分层类型,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群体。相反,这种阶级

① 如韦伯所讲的,"身份声望通常通过一系列事实来体现,那些试图归属于某一圈子的人,首先会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Bourdieu,1958,p. 187)。

与身份群体的区分应该仅被视作为一种分析上的便利——然而，布迪厄似乎也不愿接受这种看法。这种看法的结果是强调阶级分析是不能仅化约为分析经济关系的；而同时也需要分析符号关系，这大致上是顺着韦伯所指的身份区隔的含义延续下来的。

除了强调阶级分析同时具有经济和符号的维度之外，布迪厄也反对阶级理论的一个基本方面：即让人感觉其分析的首要任务是为各阶层划界。这种反对背后的理由在他的言辞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下面这段话：

> 众多“社会阶级”研究……仅仅阐释了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政治领导者不断地遇到……实践的需要，这些需要产生于政治场域中的斗争，比如……动员最大限度的选票，同时，还声称他们的方案是其他领导人无法胜任的。因此，他们就被谴责制造了社会群体与可动员群体的规模之间的边界问题，这些边界是在典型的本体论逻辑下产生的……(Bourdieu，1991，p. 246)

导致布迪厄要将阶级社会学与理论上为阶级划界区分开来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有关群体之间界线如何划分一直是政治斗争的基本形式，而布迪厄却毕生坚信政治与科学不能混为一谈(有关这一点，可参考多奈力[Donnelly]，1997)①。其次，他辩驳说，社会学家如果提前将群体划界，这是存在将阶级看成是一个“自在实体的风险的(在他们的研究实践中，甚至可

① 因此，在《区隔》中，布迪厄宣称“社会学用来指明它所建构的阶级的许多词汇都是从日常生活的使用中借用来的，而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它是用来表达(一般是好辩的)一个群体是如何来看待另一个群体的”。(Bourdieu，1984[1979]，p. 169)。

能在理论中)……但阶级却是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爱默贝尔[Emirbayer],1997,p. 283),换句话说,那是一种“本体论”的逻辑。布迪厄的这两种异议,部分源于其极度反感阶级间存在“真实”界线的观点(频繁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认为存在真实的界线,这些界线可以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分隔开——他们也同时提出定位这些界线的政治意义。布迪厄反对这些论述的基本假定,他极力强调“所有的社会学都应首先要从‘存在问题……和群体的存在方式问题’”出发(Bourdieu,1991,p. 250)。我们将会看到,这一问题将会告诉我们界线必须要从“社会实践”而不是“理论臆断”的角度来理解。

确定了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区隔》这本书了。第二部分(Ⅱ)将会勾勒出布迪厄对阶级理解的一个基本轮廓,是将它从整个复杂体系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将会让我们集中了解他在解决“存在问题……和群体的存在方式问题”时所体现的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有必要从布迪厄强大的概念体系中引入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概念——像资本、惯习、场域等核心概念。第三部分(Ⅲ)将会再次回到之前曾被暂时搁置的问题,因为当时只求对其理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搁置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还将专门讨论布迪厄的著作中所涉及的不同形式的社会控制方式彼此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起来的,又是如何在他一生中逐渐演进的。

二、布迪厄阶级理论概要

布迪厄将《区隔》这部著作描述成“是一种对马克斯·韦伯将阶级与身份相对立的观点的再思考”(Bourdieu,1984[1979],p. xii),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20世纪60年代,他就一直努力做着这项尝试,

尤其是因为它涉及经济与符号的关系问题。在布迪厄看来，身份(也就是生活方式)不同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阶级差异的体现。为了评价这一命题，他构造出一套独特的论述观点。首先，他假定阶级位置与"惯习"之间是存在一种因果关系的；其次，他假定惯习和不同消费领域的各种实践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这些消费实践从符号意义上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即一种"生活方式")。再次，布迪厄进一步断言正是这些实践构成了社会群体，也就是说，"身份群体"——它是通过位于不同阶级结构位置上的个人之间建立起的符号性边界来实现。然而，这一建立符号边界的过程是存在争议的，是通过被其称为"分类斗争"的形式而实现的。最后，布迪厄证明这种斗争只是"符号权力"发挥作用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

1. 阶级结构

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布迪厄的阶级结构概念是包含全部职业分工的。这也就意味着他比马克思理论赋予这个概念更为广阔的外延，马克思理论只是将阶级位置系统限制在对生产方式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权的位置。所以，布迪厄并未遇到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即决定如何处理那些不能用经典的"所有者"与"工人"分工来归类(或者是不能"完全地"或"令人满意地"用其来归类)的职业位置。因此，他的框架不仅有效地涵盖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忧伤之源——同时还囊括了位于多数阶级分析框架(scheme)边缘上的职业，包括公共行政与国家体系中的职位，所谓的"专业人员"和不少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及文化生产者。

按照布迪厄的理解，职业分工形成了一个系统。这就意味着劳动分工的各种职位的相互区隔与关联在一些因素上是具有理论含义的。对于布迪厄来说，这些因素是来源于"资本"的分配的。布迪厄将这些资本看作是"一系列可供使用的资源和权力"(Bourdieu，1984，p. 114)。同时，他进一步强调存在着各种类型的

资本，而它们又不能为某个类型的概念所涵盖。在现实当中，最重要的资本就是经济和文化资本（见 Bourdieu，1986；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pp. 117 - 120）①。然而，布迪厄在他的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将前一个概念看成是不言自明的，而后一个概念则要进行广泛而详尽的阐释（并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简单来讲，文化资本的概念仅仅是指一种文化上的特殊“能力”，虽然分配是不平等的，但同时作为一种“资源”或者是一种“权力”，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情境下也是有效的（见 Lareau and Weininger，2003）。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两个社会机构对于灌输文化资本是负有首要责任的：家庭和学校。文化资本最基本的特征在于获得它是需要投入时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被具体化为时间的（Bourdieu，1986，pp. 244 - 246）②。

布迪厄通过分析调查资料发展出了他的阶级结构框架，这些资料包含一系列个人所具备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指标，而这些资本由分布在职业系统中不同位置的个人所享有。这个模型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三个相互垂直的轴而组成的因子空间（factorial space）③。第一个

---

① 布迪厄之所以著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发现了第三种资本形式：“社会资本”（见 Bourdieu，1986）。这种资本形式对于布迪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处于次要地位的。然而，这个概念在他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时却起到了更为核心的作用。

② 文化资本或许以一种“客观的”形式存在——也就是，以物质实体的形式存在，它的生产或消费预示着一种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总量。并且，它或许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发生，意味着如同一种由官方代理机构保证的具体化能力，而官方代理机构是具有权力依法“保证”其存在的——也就是，以教育凭证的形式（Bourdieu，1986）。对于布迪厄来说，文化资本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异质性，类似的，它可以对于个人在跨越阶级位置分布的代际再生产中产生根本影响，“因为它的传播和获取的途径是经济资本更加隐蔽”（Bourdieu，1986，p. 245）。

③ 布迪厄更喜欢的统计技术是多重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MCA），一种与因子分析相似的技术，不过是用来分析定类变量的。MCA 的一个让他尤其感兴趣的特征是样本个体可以获得因子空间（factorial space）中的定类“特性”。这就使得标绘出空间中每一职业类型的成员的分布成为可能（见布迪厄提供的这种分析的概括性结果，Bourdieu，1984[1979]，pp. 128 - 129，对于“全”模型，也参见 pp. 262，340）。如果想看布迪厄使用 MCA 的有趣讨论，请参见 Rouanet，Acketmann and Le Roux（2000）。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轴依据在职者所具有的资本总量（经济与文化）将职业系统中的不同职位区分开来。布迪厄所指的阶级位置是这个轴上位置的函数。这样，他的资料显示职业分类中的不同成员，如工厂主、私营部门主管与大学教授，在轴的顶端相互重叠，所以享有相同的阶级位置；因而布迪厄将这些分类统称为“统治阶级”（有时也可称作“资产阶级”）。同样，体力工人与农民在轴的底端占据相互重叠，表示他们属于一个阶级位置，与前述的统治阶级相对；这些类别被统称为“工人阶级”（或者 les classes populaires）。在两者之间，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相互重叠的职业类别，如小业主、技术人员、秘书、小学教师，这些可统称为“小资产阶级”（见 Bourdieu，1984[1979]，pp. 128 - 129）。

因子空间中的第二个轴是用来区分阶级位置中的职位。布迪厄在这里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片断”概念表示这个轴上相互对立的职位。然而，这一术语却不应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理解，因为布迪厄赋予这个词的含义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布迪厄的阶级概念是依据人们所具有的资本构成来划分的——也就是在一系列可用的资源和权力中，经济与文化资本的相对优势来划分的。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职业类别才可以相互彼此区别开来，如教授和“艺术生产者”——这种职业是拥有最多文化资本，而最少经济资本的——是与工商业家相对立的——这些职业拥有经济资本优势，却具有较少的文化资本。位于这两极之间的是专业人员，他们具有相对均衡的资产结构。同样地，第二条轴也可将小资产阶级内部分为主要享有经济资本的小业主与主要享有文化资本的小学教师，而位于中间的是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和秘书①。

---

① 在他可用资料的基础上，布迪厄不能区分出工人阶级的不同群体；然而，他仍然坚信更好的资料能够让他划出这一对比（Bourdieu，1984[1979]，p. 115）。

而职业分工也同样在第三个轴上区分开来，这个轴像是对时间的准结构化处理。这条轴主要是通过人们所经历的阶级位置轨迹来划分的，而这些资本主要缘自其家庭出身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换句话说，此轴是对人们随时间经历的资本数量和构成的变化或静止来划分人群的。例如，布迪厄的资料显示专业人员比任何其他的资产阶级群体更可能出生在专业人员家庭中。可以说，他的研究方法为流动研究开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除了纵向流动(沿第一个轴)，流动或许还包括"横向"或者"横跨"流动(沿第二个轴)——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阶级位置与他或她所处的片断(fraction)位置是随时间共同变化的。布迪厄将后一种流动视为一种资本的"转化"，其中一种资本的优势是可以转换为另一种资本的优势①。

布迪厄通过这种方式构造的职业分类框架是试图创建一种客观的职业结构——即指个人所"占据"的位置，但它是以一种独立于人们之外的"准事实"方式存在的(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p. 27)。同样地，布迪厄将社会构成称为"社会空间"。它意指在社会形成及其演变中，重要"权力与资源"的各种组合而构成的一种客观关系系统。而且，它与我们熟悉的那些阶级分析传统发展而来的框架是有着较大差异的。尤其是，从方法论与理论的视角来看，布迪厄的"社会空间"概念与以往阶级分析有很大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形成"社会空间"的三个轴上——分别是资本总量，构成及生涯轨迹——而这三个轴被看作为一个连续的维度(Bourdieu, 1990a[1980], p. 140)。这就表明这个框架并未假定任何内在的阶级间断裂，这种断裂是指一个阶级难以进入另一阶级

① 结构中"横"轴上的流动是由布迪厄称作不同资本之间(如，广为流行的和教育相关的经济投入与回报)的"转化率"来决定的。这一比率是历史地变动的，它是那些拥有一种资本优势或其他资本优势的人相互斗争的产物。

的结构壁垒。所以,在这个"连续体"中,确定离散的阶级位置(和片断)只不过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罢了(见 Bourdieu,1984[1979],pp. 258 - 259,339)。与此相关地,虽然布迪厄似乎也使用其他研究经常用到的等级术语将社会空间概念化,用以表示连续体的"阶级"框架(比如,从他们所获的报酬来区分),但它与其他框架还是具有明显差异的,我们仅从它的"多维结构"框架中就可以窥探到(见 Bourdieu,1984[1979],pp. 124 - 125;Bourdieu,1991,pp. 244 - 245)。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不仅开辟了一条其他框架往往都忽略的分析流动形式的新方案(资本"转换"),而且也开创了一条其他框架难以意识到的分析冲突形式的全新道路①。

2. 阶级惯习

布迪厄通过引入"惯习"概念,在社会空间与实践之间建立起一条间接的因果链条。在他的解释框架中,惯习发挥着核心的衔接作用:"社会阶级被理解为一个客观决定系统,它必须被放到与'阶级惯习'的关系当中来理解,而不能放到与个人,或者是作为总体的阶级,也就是作为个体的一个集合的关系中来解理"(Bourdieu,1977[1972],p. 85,强调的重点被修改)。相比于布迪厄的任何其他概念,惯习这一概念引起的经久不息的有关"元理论"(meta-theory)的争论是最多的。在本文中,这些争论可以被有效地回避,我们将从《区隔》问题及其使用的阶级分析视角来讨

① 正如它们自己所暗示的,布迪厄的社会空间概念确实类似于由格伦斯基和索伦森(Grusky and Sørensen,1998)所发展的阶级分析的"发散的"取向,至少都是以职业系统为核心的。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两者在一些本质上的不同。尤其是,虽然格伦斯基和索罗森试图主张职业位置是具有很多传统上阶级享有的特性,但在他们的阶级分析框架内,很难说一个职业结构是与传统的阶级结构概念相类似的。这是因为它们不愿意确定一套变化或区分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在职业系统的全部位置之间建立起理论上有意义的联系。简单地说,它们的方法缺乏与布迪厄资本总量,构成和人生轨迹作为社会空间的组成维度方法的相似性。因此,人们或许会质疑阶级惯用语使用的普遍恰当性。

论惯习问题。

布迪厄是这样来描述他创造这一概念的基本目的的:“既要避开行动的客观主义,因其将行动描述为‘缺乏能动者’的机械反应;同时,也要避开主观主义,因其将行动描述为有意追求一种能意识到的目标……”(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p. 121)①。首先,惯习概念指一套社会建构的性情系统。他创造这个概念的目的是想用它来表示一种观点,也就是行动既非在明确地体察到外界规范后而产生的(也就是有意识地将行动纳入到一套道德规范之中),也不是通过理性计算而产生的(也就是通过核算不同行动选择所产生的相对风险和收益)。也不是要像实用主义理论那样,这种性情系统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下,行动可以通过一种预先的反思性(pre-reflective)方式而产生——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缺乏对规则和预期结果进行有意识地反思资源的基础之上产生。然而,惯习的概念却不能等同于习惯(从日常的意义上理解),因为习惯只能让反思进行到常规和简单重复的程度。相反,性情或许会产生行动——或者,布迪厄更愿意用“实践”——是高度自觉和富于创造性的。他经常喜欢举的例子是音乐和体育:一位卓越的音乐家能够在事先不排练的情况下却能即席演奏,并且恰能和谐地配合当时的情境;同样,一位出色的网球手也不会为了得分,还要在比赛前事先斟酌一下某种战略战术选择的后果(见 Bourdieu,1990b, p. 11;1990a[1980],pp. 52 - 65; 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 pp. 19 - 22)。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布迪厄的元理论是并不排斥理性选择和有意识地顺应规范的;相反,当我们的惯习被迫要来适应一种它并不熟悉的环境时,理性选择和有意识地顺应规范反倒是

① 也可见布迪厄与华康德(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p. 136):“惯习的概念解释了这一事实,即社会行动主体既不是由外因决定的物质微粒,也不是行为单由内在理性决定的流浪者。”

我们实践的源泉(比如,受过古典音乐训练的音乐家也可以参与到爵士乐团的演奏当中)。

依据布迪厄所言,惯习是由于每个人身处社会空间的位置不同而形成的;因此,它是存在经验上可变性和阶级特殊性的(依照布迪厄术语的含义)。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在布迪厄看来,惯习的形成并非是置于——至少不是主要置于——“生产”上。换句话说,虽然职业系统构成了布迪厄“阶级结构”的制度核心,但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生产车间(或者办公室)都不是特定阶级惯习所产生的原因。当然,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空间中的每个位置——也就是,每一种资本数量和构成的组合——都是与一定的生活情境相对应的,这被他命名为“阶级处境”(class condition)①。因此,他一直试图确定惯习形成的特定情境,尤其是那些必备的物质生活方面的经历②。在布迪厄看来,某个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典型特征就是其阶级处境状况,而经历这些阶级处境会在人们身上留下一系列性情的烙印。

布迪厄有时将这些性情称为“生成规则”(generative formula),他将它们定义为“一种习得的生成结构系统……是[它们]使得思想、感受和行动的……生产……成为可能”(Bourdieu, 1990a[1980], p. 55)。这些结构框架能够让行动者理解他们所处的特定情境和要素的含义,从而产生获取——通常是无需反思和计算的——一种“合适”(适合特定情境和要素)的行动(这就是布

① 参见索伦森(Sørensen)(这一部分)对以生活状况概念为基础的阶级概念与以剥削概念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所做的区分。在索罗森看来,为了解释阶级的形成过程,前者是以后者的“客观”——但却是“潜在的”——敌对利益的概念为基础的(如,阶级成员的集体行动)。正如下面将要展示的那样,布迪厄对这一过程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

② 惯习的最初形成过程是发生在每个人“最早的教化”中。之后,它可能会被新的经验所改动;然而,早年的经历会具有“绝对的重要性”(Boudieu, 1977[1972], p. 78; 1990a[1980], pp. 54,60)。

迪厄所宣称的为何一些社会科学家所观察到的行动者往往看似是在遵循理性选择或某种规范的结果)。一方面,这种能力是“有限的”:这表现在行动环境越是与惯习生成时所处情境相异,惯习就越可能呈现出无效性(个人失范)。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形成惯习的“结构框架”是可以转置的:在惯习形成情境的范围内,人们是完全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内自由穿行的。人们的实践虽然表面上看似不同,但却具备内在的一致性。其中,《区隔》中的“品味”(taste)现象就是这种“一致性”形成的一种形式,它也是《区隔》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

3. 阶级实践

正同上文所提到的,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存在问题……和群体的存在方式问题。”《区隔》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社会群体首先是在一定的消费领域下形成的。诚然,这种消费构成了布迪厄所强调的生活方式的重要背景。因此,下一阶段的解释将侧重于对各种消费实践和偏好资料的分析,同时也包括那些与“经典”(canonized)的文化形式(艺术、文学、音乐、剧院,等等),以及那些属于更广泛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形式(食物、体育、报纸、服饰、内饰,等等)。通过对资料进行对应分析,布迪厄能够说明代表生活方式的各种指标将呈现出一定的结构,而这一结构与社会空间是同构的(isomorphic,或者他更愿意用“homologous”)。具体来讲,他能够呈现出不同的实践和偏好会聚集在不同的社会空间内(Bourdieu,1998b[1994],pp. 4-6)。

因为惯习作为一种性情“系统”,不能被直接观测到,它必须要被阐释出来。因此,《区隔》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对各种偏好和实践进行定性的分析,这些偏好和实践集聚在每个社会空间内——也就是在每个阶级和群体中——这是为了确定隐藏在它们之下的特定“结构系统”(scheme)或“原则”(principle);同时,这些系统和

原则也通过对生活方式的一致性语义阐释来引导经济和文化资本的消费导向[①]。由此，布迪厄就证明在统治阶级中存在一着单一的生活方式，被其称为“区隔感”。首先，这种惯习表现为其卓然的审美敏感性。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境为其提供了许多表现这种敏感性的场合。而且，每个场合都创造了一种形式大于功能(function)的机会：

> 毫无疑问，艺术为其提供了最广阔的表现空间，纯化，精炼，升华多变的冲动或某种原始需求，这些意图没有一种是在实践中无法表达的。生活的独特风格——即形式高于功能，这将会导致对功能本身的否定——也都会在实践中产生相同的效果。在语言上，它使得流行的表达方式与经过高度审查的资产阶级语言形成鲜明对立……相同的应用方式也可在肢体语言中找到：激动、匆忙、鬼脸、手势同克制和代表庄严的泰然自若是相对立的。甚至首要品味的场域(field)也都是依据重要的对立而组织起来的，包括量与质、胃与味、物质与风俗，实质与形式的对立面。(Bourideu，1984 [1979]，pp. 175 - 176)

正如这段话所指出的，布迪厄辨识出了工人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惯习是“对立”(antithetical)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以“对必需品的品味”为主，这就更促使其首先考虑的是功能而非形式，更强调艺术具有道德含义，更会去要求获得能与本阶级整体相一致的选择(这也被看作是团结的隐性表现)。而小资产阶级的生

① 布迪厄在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中提取出语义一致性的能力产生了丰硕的分析成果，很遗憾，这里不能进一步展开论述。

活方式则表现为一方面渴望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却又感觉经济与（尤其是）文化资本的不足使其难以达到。因此，这些人更倾向于一种“文化亲善”：他们既追求自认为能得到“流行”审美形式（如“轻”歌剧）的“文化”（在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又也热衷于那些意图提高自身文化修养的活动。

此外，布迪厄还根据与各种位置相应的资产结构（也就是资本构成），对统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内部也进行了根本区分①。因此，那些主要享有经济资本的统治阶级——工商业资本家——主要是通过追逐奢侈品和精心打造的财富来表达他们的“区隔感”。而另一些人——“艺术生产者”和大学教授——则通过寻求一种最需要智慧的（且最为廉价的）文化审美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区隔感”。布迪厄是这样来概括这两种对立的惯习与生活方式的：

> 一边是读书，阅读诗歌、哲学和政治著作，《法国世界报》（*Le Monde*）和（通常是“左派”的）文学或者艺术杂志；另一边则是打猎和赌博，当要阅读时，读《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或者……《汽车杂志》（*Auto-Journal*）……一边是一流或前卫的剧院……博物馆、经典音乐……跳蚤市场（Flea Market）、野营、登山或散步；另一边则是商业旅行、昂贵的午餐、林荫大道剧场……音乐大厅、电视上各种真人秀节目……拍卖会场和“流行服饰小商店”、名贵汽车和轮船、三星级酒店和温泉浴。（Bourdieu，1984[1979]，p. 283）

① 布迪厄虽然不能够清晰地确定工人阶级的群体，但是强调这是他的资料的一个缺陷。

位于统治阶级这两极之间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特别是)高级主管人员，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既不像工商业资本家那样奢华，也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却热衷于富于"现代性"、"鲜活性"(dynamism)与"宇宙性"的生活方式：喜欢最新科技，乐于接受外国文化，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形容为是"挣脱束缚而悠闲的"(Bourdieu，1984[1979]，pp. 295 - 315)。布迪厄还对小资产阶级内部也做了类似的划分，其中经济与文化资本比率是随着那些人所标榜的"文化亲善"的类型不同而变化的。他同时也列举了那些由于生涯轨迹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阶级与片断(fraction)生活方式的差异。

布迪厄在《区隔》中列举的特定时空下的生活方式非常广泛，在此也就不必赘述了(若想了解富含历史背景的描述，可参见Lane，2000，pp. 140 - 165)。然而，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布迪厄对资料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不仅建立了一个社会空间结构与消费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还说明了这种对应关系是以主观的性情系统作为中介的，这些性情系统则是通过横跨不同消费领域来表达的；通过表达，这些指向一定"生活方式"的社会实践得以获得一种语义上的一致性。这样一来，不仅保持了与韦伯早年论述的一致性，还能够在阶级与身份(status)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然而，尽管这里做了较为详细地阐释，但这种分析仍旧是不完整的。首先，这是因为此种展示大多还是静态的，仅将实践定格在某一时点(snapshot)来研究。所以，

> 人们必须要从这种暂时的客观主义中走出来，"将社会事实当成物"的这种客观主义取向把它所描述的东西具体化了。社会位置，一方面将分散的部分以一种静态的秩序并列地呈现给观察者，同时也是一种战略的布局，在一种场域的斗争中

既是要被防御也是要被夺取的要塞。(Bourdieu, 1984 [1979], p. 244)

在布迪厄看来，生活方式的不同深刻地反映了个人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与社会空间自身结构之间的矛盾张力。这也体现了阶级之间和阶级片断之间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符号成分。似乎在这个命题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领略布迪厄全力将“阶级”与“身份”勾连起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4. 阶级划分斗争与符号暴力

在介绍完“资本”和“惯习”概念之后，布迪厄社会学第三个不得不讲的概念则是场域，这个概念是想要抽象出其对社会空间的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布迪厄将社会形成(social formation)的阶级结构概念视为一种客观的位置网络，这些位置相互之间系统地连接着，这种关联主要依赖于其在职业位置间所具备的文化和经济资本的分布。场域的概念就是要避免一种对社会空间过度结构主义的阐释——结构主义的观点往往只将“占据”不同位置的人们划归为结构关系的“承载者”(见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pp. 94 - 115)。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术语试图产生一种战场或赛场的感觉，更准确地说，是彼此相互遭遇的人们将会进入一种相互争斗或竞争的状态，双方都来自相对优势的地位(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pp. 16 - 18)。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的社会空间就等同于一种“社会阶级场域”(如 Bourdieu, 1984 [1979], p. 345; Bourdieu, 1991, p. 41)。在《区隔》中，这就意味着生活方式陷入到一种社会争斗中。

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如高级烹饪术或古董收藏，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区别于“心仪”的美食和大众化的装饰。相反，这些同一生

活方式元素(家具、食物,等等)的不同形式彼此形成一种等级关系;因此,生活方式本身也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按照布迪厄所说的,生活方式的等级"身份"是依据其与"正统文化"(legitimate culture)的距离决定的。后者指那些在文化上被普遍认可的,"有价值的","经典的"(canonical)抑或是在某些其他方面"出众的"的元素。因此,正统文化的构成永远是在定义中的,它是不断斗争的产物。所以,比如,当我们联想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用餐风格的每一个细节时,倘若将其联系到形成它的惯习时,这两者之间就不亚于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和两种人格的体现"(Bourdieu, 1984[1979],p. 199)。

布迪厄确定了至少两种与"正统文化"相对抗的情形。第一种是遵循成型的社会学"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模型。依据他对这个模型的理解,他认为对最"高贵的"(distinguished)事物和实践的竞争是永远存在的。这些事物或实践首先会被那些具有最多经济和/或文化资本的人——也就是被统治阶级或是其分支——攫取;紧接着,它们将会渐渐地沿社会空间向下蔓延开来;然而,就在它们逐渐变得"大众化"之后,前一批热衷者将抛弃它们,开始热衷于新的事物和实践,以此来保持他们品味的超凡脱俗。以这种准模仿的竞争形式,统治阶级或者是其中的某个分支不可避免地将会起着领导作用,从而变为"品味的创造者"(Bourdieu,1984[1979],pp. 247 - 256)。在布迪厄看来,工人阶级由于缺乏资本和其对立的性情,在这种竞争中往往是难以表达自我的;于是,他们更倾向于疏远他们,因为不情愿为小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充当一个反面"衬托"。的确,在布迪厄看来,工人阶级确实是无力参与到这场角逐(race)之中来宣扬他们文化形式的合法性的,因为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这种文化形式是难以具备合法性的(至少是含蓄地),他们还或许会被冠以"一种没文化品味"的帽

子(Bourdieu,1984[1979],p. 251)①。

当特定文化形式的正统性得到了制度上的认可,也就是那些高度封闭的"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的认可之后,往往就被神圣化了,于是,对于正统文化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采取一种"下渗"形式(Bourdieu,1990a[1980],p. 138)②。艺术仅被限制在狭小的制度空间内(大学部门、博物馆、美术馆、拍卖会场,等等),有限的交流平台(期刊、讲座,等等)和人际网络(艺术家或记者派系)中,这就是个典型例证。虽然布迪厄并不常将工人阶级与文化联系起来,但在相对较少限制的文化领域,他似乎是发现另外一种文化冲突形式。在这些情况下,合法性本身遭受到挑战:

> 饮食艺术依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人阶级能够明显对抗生活艺术合法性的领域之一。面对新的"清醒"规范……虽然它已经被社会最高层级的人广泛认可,但农民,特别是产业工人依然整日嗜酒无度。一个美食家不仅是一个会享受美食的人,他也是一个可以进入到广泛的、为人所熟知的——也就是,简单和自由的——关系之中的人,这种关系是由一同饮食

---

① 如果布迪厄已经确定了他理论假定下的不同工人阶级群体,当他被迫使去分析其内部两败俱伤的冲突时,或许他已经修改了对工人阶级文化被剥夺和消极性的无可争辩的严苛描述。然而,无论一个人如何评价《区隔》的这一方面,有一点必须要记住,就是生活方式的等级假定不能通过指出"流行的"(或曾经是"流行的")文化形式的神圣化(canonization)而被简单伪造。布迪厄完全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但是主张通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工人阶级文化形式的神圣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些文化形式对于拥有不同惯习的人具有完全不同意涵(见 Bourdieu,1984[1979],pp. 47-48,88, 372-374)。

② 在这些(相对)封闭的、自主的世界中的文化事物,和实践的"神圣化"过程并非是意见一致的。相反,布迪厄认为,它是尖锐的内部斗争的产物。这导致了在这样的社会或由不同阶级和群体形成的各种"公共领域"中(虽然工人阶级仍然完全在这种动力机制之外)的各种行动者之间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关系。布迪厄的一个导向性的假设是这些社会的分化是与形成这些潜在公共领域的分化相类似的——也就是,它们与社会空间大体上是同构的(见 Bourdieu,1984[1979],pp. 230-244)。

而维系和象征的……(Bourdieu,1984[1979],p. 179)

工人阶级唯一能实现自己独特风格的实践则是语言，夹带很多暗语……比如说，它能通过对统治阶级的道德和审美价值观的嘲讽和世俗化，来实现一种反权威的实践。(Bourdieu, 1984[1979], p. 395；也可参见 Bourdieu, 1984, p. 34;Bourdieu,1991,pp. 90 - 102)

如果说工人阶级对文化等级的争夺还是很罕见的话，在小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别对于正统生活方式的角逐则是异常频繁的。尤其是在后者中，对于正统文化内容和含义的斗争就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每一派都试图希望别人认可自己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优越性①。

布迪厄强调，构成生活方式的实践和事物并不仅仅是“表现”了形成惯习的框架结构。若欣赏某种音乐，则或多或少会排斥其他音乐；若欣赏某种美食，则会认为其他的都相形见绌；若欣赏某个画派的绘画，则其他的都会觉得枯燥无味。在以上所有这些情

---

① 布迪厄照例被人批评，说他强调 belle letriste 或者一种在法国已经过时的“炫耀的”的文化形式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这种文化形式从来就不适用于美国和各种其他国家。然而，事实上，正如雷恩(Lane,2000,pp. 148 - 157)中肯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在《区隔》中对于统治阶级的分析清晰地勾勒出了源于“经典炫耀文化”的完美典范身份的衰落(虽然是在它的早期)，这并非是要支持知识分子的有教养的文化，而是要支持管理人员或经理这样的现代主义文化。

或许可以说，最近几十年对美国文化消费的研究暗示出一种新的文化等级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彼得森和科恩(Peterson and Kern, 1996)所指的“文化杂食”的理想。在这种理想下，而非站在一种等级关系中，每种文化实践和事物的不同形式——例如，各种烹饪方法，音乐传统，或者文化类型——都被认为具有它们自身的有益典范，这将由它们本土特定的“文化环境”标准来评定，因此相互之间是不可化约的。因而产生了一套可以归结为文化“世界主义的”的社会规则，存在于一系列广泛的事物和实践的独特特征和内在含义的载体中。对于这种世界主义，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它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身份工具而发挥作用，并且强烈地预示着一种非对称分布的能力——这两者都是由布莱森(Bryson,1996)指出的，因此他创造出了一个新术语“多元文化资本”。

形中，都是将拒斥的实践或事物同具备它们的社会行动者联系了起来。换句话说，布迪厄认为，审美的敏感性影响了人们每日对食物、服式、运动、艺术及音乐的选择——甚至可以细微到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事实上，是以此作为媒介来象征他们的身份与谁相似，与谁不同。换句话说，通过这种日常消费的细节，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归类，以此达到与他人的同或异。意识到这种日常消费行为的符号功能其实就为分析“分类斗争”打开了出路，在这种分类斗争中，布迪厄还看到这种“易被遗忘的阶级斗争”。

正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布迪厄将社会空间理解为一个因子空间。讲得更清楚点，也就是这种“空间”是不具备天然边界的，因为它是由连续轴构成的。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互惠的社会分类行为，社会集体才能得以产生：相互联结的社会群体是通过这种为社会空间的“区域”从符号上划界的实践产生的（Bourdieu，1984[1979]，pp. 174 - 175，476；也可见 Bourdieu，1991，p. 120；Bourdieu，1990a[1980]，p. 140）。换句话说，他们是产生于对社会空间的感知，是通过对关系的紧密和疏远程度的符号化的准分类过程来实现的（布迪厄有时将其称为“类型化”[categoremes]，Bourdieu，1984[1979]，p. 475，是为了以此表明他们倾向于在一种预先的反思性层次上发挥作用）产生于对社会空间的感知。诚然，对于布迪厄来说，符号是一种“分隔力量……辨别，区分，在不可分割的连续体上划出离散的单元，从无差别中产生差异”（Bourdieu，1984[1979]，p. 479）这就意味着任何的社会集体都是自我分类与他人分类的相结合的符号行动而产生的结果，而且这种分类行动还会应用到他们自身（所以，也应用到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群体身上）。然而，不同的行动者对各种彼此间分化和分类的过程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相反，那些能够对社会空间感受产生结构化影响的分化力量在社会空间中并不是均匀地分布的，因为这种聚集在

事物和实践中的符号分化力大部分是源自它们与正统文化的距离远近，而这些事物和实践是发挥着分化功能的（见 Bourdieu，1991，p. 242；Bourdieu，1990a［1980］，p. 139；Bourdieu，1987，p. 11；Bourdieu，1990b，p. 135）。

对于布迪厄来说，彼此间的分化是通过实践而产生的，而这些实践是受蕴含于惯习中的品味原则引导的，因此其被置于反思意识的起点之下。然而，它们是符合一种实战逻辑的（就像网球选手击球）。结果，社会学家强迫要研究那些看似琐碎的文化“博弈”和日常生活中常规的消费选择。

> 每一个试图对社会世界分化进行探求的人都要首先分清群体内外人们所关心的利益。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些致力于实战逻辑的人们，“边界”群体，如“劳动贵族”，他们在徘徊于阶级妥协与阶级协作之间……在阶级之间划定边界是受到“归入”或“被归入”，“分类”和“联系”这些目标的影响的。（Bourdieu，1984［1979］，p. 476）

只要我们认识到在“阶级斗争”（通常的意义下理解）之前，造成群体间彼此分化的符号斗争会首先突显出来——也就是，在其中每个人都能够借此认清敌我——以及构成斗争目标的利益——那么，通过生活方式作为媒介的分类斗争（classificatory struggles）的重要性也就愈发明晰了（Bourdieu，1990b，p. 138）①。

然而，虽然作为分类实践对象的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特定的位置，并且他们的惯习之间相似或相异的程度在社会空间中

①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最近似于布迪厄的位置概念是由普沃斯基（Przeworski，1985）发展出来的。参见魏宁格（Weininger，2002，pp. 91 - 93），他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发挥着一种确定位置的功能，但并非所有的分类结构框架都具有相同的实现社会承认的可能。换句话说，不考虑那些能够推进一种划分框架的特定行动主体的符号力量，社会空间的结构——作为所有社会结构框架的真实指向物——必然会以它的可行性为条件(Bourdieu，1990b，p. 138)①。比如，一方面，小资产阶级试图从符号上建立一种对其内部“文化”一致性的认同；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经济”群体却有着一种内在的不一致性(implausibility)，因为这些行动者广泛地介入到了社会空间的条块分隔中，所以具有高度分化的惯习。简单地说，任何两个行动者成为相同社会类别成员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距离成反比的(Bourdieu，1991，p. 232)。然而，这也说明社会空间自身是没有固有边界的。在这个连续性结构中，对空间的符号“分区”(partitions)和划界，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群体，都构成了行动者实践因果上不可化约的重要部分(这些正好与一些学者对布迪厄高度决定论观点的频繁责难相对应)。这会产生重要的后果。首先，它意味着通过这些实践而产生的“社会阶级”轮廓绝非是预先建立的：社会空间的“分化”或许会以高度聚合或高度分散的方式

① 文化世界主义的文献足以对那些主张完全根除任何社会-结构联系的各版本的“后现代”提出质疑。在这些理论中，符号系统被理解为一种媒介，通过它，“对现实的社会建构”才得以产生，符号系统的效力不再是一种与现实相符或不相符的函数(或者对于任何“现实”，不仅它们自身)。“解放的”变体还做了进一步的经典假定，假定符号系统是比(现在已经被削弱了的)社会系统更具有延展性和可塑性的，表明身份是一种完全不受“出身和财富”束缚的反身性的自我塑造。这里，雷恩(Lane，2000，pp. 157 - 159)再一次提供了有用的提示，指出这种“后现代”的世界观的很多方面都已经被浓缩在《区隔》的章节中了。通过影射当时一些法国的哲学家，布迪厄追踪了生活方式的轮廓，并且假定这种生活方式是通过消费和“拒绝被约束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位置”而实现的。这种不可分性(unclassifiability)——某种社会上升的梦，一种拼命地反抗社会场域引力的努力——是“新文化媒介”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用来生产商业符号产品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尤其是群体内那些曾是统治阶级成员的人们，经历了一场未曾预料的向下流动(Bourdieu，1984[1979]，pp. 370，152 - 154，365 - 371)。

发生，而且它的每条组成轴都会产生无限可能的构造（Bourdieu，1987，p. 10）。所以，在一定的情况下，或许是它的“客观差异……再生出其主观上的体验差异”（Bourdieu，1987，p. 5）；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社会相邻群体……极有可能会产生……最大的张力”（Bourdieu，1990a[1980]，p. 137）。

边界产生于实践，而实践却指向主题上不同的目标（即对食物、艺术、时尚，等等），而且这些通过生活方式来划分的边界是不精确的。相反，这些边界是有必要保持不确定和模糊的（Bourdieu，1991，p. 234）。也正由此，它们也是难以持久的，仅存在于流动的和正在发生的实践中（Bourdieu，1990a[1980]，p. 141）。所以，不可否认，他们是多孔而易被渗入的。然而，作为“事实上差异的符号变形”（Bourdieu，1991，p. 238），它们对于其下的阶级结构的维持或转型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定还记得“实践分类法”，其中讲到通过他们行动实践的符号效果所构建的行动主体（agent）并不仅仅是强加在社会空间上的空格子。各种实践以及通过实践构造的不同生活方式，都与正统文化具有一种等级式的相关关系——就是（被理解为）一种经典文化。因此，在韦伯看来，社会分层同时也是一种对声望的分配。而且，布迪厄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人们之间正是通过附着在他们实践上的“身份”含义来彼此相互感知——换句话说，是通过声望的符号面纱——他们错误地感知了这些实践的基础：经济和文化资本，它们存在于惯习之下，并促使惯习得以形成。当不同的经济和文化资本被错误地感知为不同的声望时，他们就如同布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来发挥作用（见 Bourdieu，1991，p. 238）。这种作用能够被理解为一种“经常伴随权力运作的合法表演”，并且这种表演还能“扩展到所有实践，尤其是消费实践中”。所以，布迪厄认为，“权力拥有者的生活方式通过其权力使这种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因为它的可能性的

真实情况依然是未被认识到……”(Bourdieu, 1990a[1980], p. 139)。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对社会空间的错误感知——它描绘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主要特征,但更利于后者——也被称作“符号暴力”。

5. 从实践状态到客观状态:符号权力的形态

在布迪厄看来,不确定且易被渗透的边界是由(隐性的)相互对立的消费实践自由表现而产生的,或许也可被称作一种“初始划分”的权力(见 Durkheim and Mauss, 1963; 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pp. 12 - 15)。这些权力仅是一种特定形态——尽管是一种基本形态——而边界划分的制度或许会由此产生。的确,当划分不再仅仅局限于惯习在预先反思性阶段的“表演”(play)时,社会边界——以及由其构成的群体——将受到“法条化”(codification)的支配。根据布迪厄,“要改变方式来消除模糊与不确定性的影响,也就是那些被胡乱划分的边界和近似的界线,必须要产生清晰的阶级,划出明晰的边界,并建立牢固的边界……”(Bourdieu,1990b,p. 82)。这就意味着“正式化”的过程:区分群体的标准或许需要被确定,由此而产生的分类也要按逻辑予以细致甄别(比如,属于一类的成员能否就排除其成为另一类的可能,就如有关“跨阶级家庭”是否存在的争论)。正在进行法条化的边界与仅由消费实践所产生的社会类别化的情境弹性不同,它具有极强的精确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永久和具有强制力的。这样,法条化就可以被看作是对分化的“客观化”或“结晶化”,否则,它将仅是自发产生。因此,从性情的层面出发,布迪厄对群体形成的分析为其他多种现象的分析打开了出路;比如,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于“实践状态”中的差异逐渐转变为客观的“界线”。而且,法条化不但意味着一种边界运行方式的转变,同时它也意味着边界背后符号权力的转变。

> 在一种明显的状态下，使公众（即，客观的、可见的、可言说的，甚至是官方的）表现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能够产生群体效果的社会力量，必须要建立起整个群体内明晰的共识，而现实是公众还没有形成客观和集体的存在，仍表现为一种个人的和连续的存在状态。（Bourdieu，1991，p. 236）

正是在对符号权力不同状态的分析过程中，分类过程的复杂斗争过程才得以全面显现。

首先，我们或许可以说，任何群体——无论隐蔽还是公开地将彼此分隔的界线——一旦上升到话语层次，一种初步的法条便诞生了。当布迪厄想要指出，“任何以‘工人阶级’为主题（subject）的预言都在掩盖一个事实（也就是存在工人阶级的）”（Bourdieu，1991，p. 250）。对集体这个名字（或是社会标签）的语义学的指向，才使得它的边界有可能变得客观且主题统一，因为它至少暗含着可以被划分出界线的一群人和一种什么人能被纳入进去的准入原则（见Bourdieu，1984[1979]，p. 480）。由相似或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亲近或不相容的隐含感觉——“一串”相对的存在状态——现在可以被清晰地表述出来；群体的语义指向能够使其成员对自身和他人的身份有一种明确的认知（“他不是中产阶级；他是一名律师！”），由此，对个人的身份感赋予了一个明确的群体维度。此外，只有当一个散漫的（discursive）的身份在一个阶级（或群体）内被知晓和认同的时候，他们才可能为某个特定目标集体行动起来——也就是，被动员起来。所以，“社会阶级”，就像他们在社会理论中被描绘得那样——也就是，为“阶级利益”而进行斗争的群体——根本上是散漫而无层次的实体；就如同保留与转化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是要取决于集体行动的，而社会空间自身的形成与重构则是依赖于话语的。换句话说，社会群体的语义学指向必须被赋予一种“社会建

构”的力量，因为它能够产生一种明确认知的集体实体和一种集体行动的能力。然而，它也绝不是完全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无关：群体的语义学指向的有效性部分是源自它能够造成公开的社会分裂，这种社会分裂由于在语义前(pre-verbal)已经初见端倪，所以也就“并不陌生”了。而且，正如同这种分裂，话语也同样被社会空间的结构所制约，社会空间形成了它最终的基础(Bourdieu，1990b，p. 138)。

通过生活方式实践所产生的差异，个人无层次的类型化是会遭遇到抵抗力量的，因为每个人都同时既是划分者也是被划分的对象。而且，正是在这一划分归类中，人们享有着不同的左右划分的能力。而这种不平等会在钩心斗角的划分斗争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原因马上会阐明)。的确，对于布迪厄来说，工人阶级非常缺乏文化资本，以至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不能——而且他们经常并不认为他们有权提供——在公共领域的社交活动中进行“审慎的”判断(见 Bourdieu，1984[1979]，pp. 397 - 465)。因此，必须将为这一阶级发言的权力——述说他们的历史、政治观点、需要和主张——“委托”给一群专业的发言人，而这些人自身是由一些代表集体的组织(政党或联盟)来支持的。这样，阶级就获得了一种特定的(“转喻的”)“客观化”的存在形式，其中边界的维持和成员的动员都持续地由一群“专家”集团来“管理”：“‘工人阶级’存在于代表群体之中，并通过代表群体而存在，这些代表为其呐喊，抛头露面；工人阶级也存在于代表们给其灌输的信念中，并通过这些信念而存在……”(Bourdieu，1991，pp. 173 - 174，p. 251)。在这些话语所带来的初步法条化之外，社会机构或许会具有划分(instate)和管理阶级或群体边界的权力，这些边界是具有很强的坚固性和持久性的，而且这些社会机构这样做可能是独立于行动者自身所属的结构框架的，同时，这些结构框架是服从于他们自身的类型化过程的。布迪厄经常举的例子是教育机构拥有颁发证书的权力。在

劳动力市场上证书或多或少具有普遍认可的价值,它在拥有者与未拥有者之间建立起一个客观的边界。然而,与此同时,证书化也发挥了一种符号效应,因为它需要将一种“性质上的非连续体”转化到一种文化能力的连续体中:布迪厄指出(1990a[1980],pp. 137-138),在考试中最高分的不及格者与最低分的及格者之间的差异变为了性质上是不同的两类人。例如,“专业人员”与“专业技术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教育体系所特有的颁发证书,并将证书进行区分(“技术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权力造成的。

当将群体间彼此划分开的界线写进“法律”时,它们才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客观性(Bourdieu,1987,p. 13)。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完全法条化编纂的符号系统:法律被一群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群体解释、应用、创造出来,并且这些过程被限制在一个制度领域内,其中,条款的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它获得了“法典”的完全正式化的地位(Bourdieu,1990b,pp. 79-80),并呈现出最大的精确性。此外,法律的边界是“强制的”,违反是要受到“官方”机构——也就是国家的分支机构——的惩罚的。

国家自身位于我们所要定位的层级的顶端。依据韦伯的方式,布迪厄是在“对一个有限的区域内的物质和符号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垄断”的意义上来定义国家的(Bourdieu,1998b[1994],p. 40)。首先,这就意味着国家,且只有国家才拥有施加分类原则的合法权利,并且这些分类原则具有“强制”效力,或者(就如同学校发布证书这个案例中所讲的这样)拥有“裁定”所有这些原则效力的权利(见 Bourdieu,1990b,pp. 136-137)。除了它制定和推行法律的权力之外,国家也通过那些致力于统计人口和规范各种行动的机构,而广泛地参与到各种社会分类中(比如在经济领域,随着职业分类的发展或对工作条件的规定)。这种权力对分类斗争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这些分类斗争主要发生在较低层次的法条化

过程中(比如,通过动员话语)。一方面,国家可以嵌入到社会秩序的一系列类别中,但由于国家分类的强制性特征,实则限制了其对社会行动者开放的空间。然而,另一方面,通过被动员的机构和部门的诉求,国家的权力自身可以变为这种斗争的目标:"群体的诉求在官方分类中能否存在取决于它们是否有能力使自身得到认可、关注和承认,以便赢得社会秩序中的一个位置"(Bourdieu,1984[1979],pp. 480 - 481)。国家的认可为"一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身份提供了一种官方定义",这样"也就将这些身份的享有者从全部人对全部人的符号斗争中解救出来"(Bourdieu,1991,p. 240)。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再次回忆起通过国家的分类行动而产生的(或者是由它批准认可的)集体是不能从社会空间强加的空"格子"意义上来理解的。而是在建立边界时,国家也分配了"优势与责任"(Bourdieu,1984[1979],pp. 476 - 477;也见 Bourdieu,1991,pp. 180 - 181)。因此,比如,在生产背景下,国家的成功诉求可以是要求证书、许可证考试和其他正式的进入标准,这些标准就构成了职业壁垒,而这些职业壁垒会导致社会封闭和"租金"的产生①

---

① 为了保持职业秩序的一种"现实主义"概念,格伦斯基和索伦森(Grusky and Sørensen,1998,p. 1,195)被迫将国家建构的职业分化视为一种"唯名论者"的行为,这种唯名论者的行为仅可以在占据各种职业的人已经动员了自身或成功地使国家设置一些具有进入障碍的职业中才能找到相应的现实基础。正由于这样,格伦斯基和索罗森并没能意识到国家机构通常享有的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相对于那些被划分的),实际意味着他们对分类系统的建构很可能是受国家部门自身利益的驱使而实现的,正像各种历史研究已经呈现的那样(见 Donnelly 1997 年著作和其中的引用)。而且,对这些情况的承认也决不需要落入到认识论的唯名主义,正如他们看似假定的那样。由官僚机构强加的分类体系要恰好达到同时得到在职者和在外者的同时认可的程度,它才能被描述为一种神奇的事物(with Durkheim and Mauss),它将制度定义为一种社会虚构(Bourdieu,1991,p. 251)。如同多奈力(Donnelly, 1997, p. 115)所讲的,相关的问题是"官方的分类会对国民的意识和行动产生什么后果?"总而言之,有必要认识到在批准"管辖范围"问题之外,国家对于职业秩序的结构化过程也产生了独立的影响——并且还要认识到,承认国家的作用不需要危及认识论上的"现实主义"取向。

(然而,必须重申,布迪厄所指的生产——相对于消费来说——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因为形成牢固纽带和集体动员的场所很可能是在当代发生的①)。

渐渐地,我们的讨论已经从消费实践所产生的弥散的(discursive)、浮动的边界进入到了国家授权的、固化的(rigid)、强制性的边界。然而,无论是社会行动者,还是研究它的社会学家,都从未遇到过哪一个世界是无符号差别的。这就是说,这种讨论依赖于一种抽象,在这些抽象中,先假定所有的客观符号壁垒都是等价的,以便通过分析弥散的身份定位、集体动员和国家的"正式化过程",最终发现未法条化(uncodified)状态的分类(或生活方式)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见 Bourdieu, 1990a[1980], pp. 122 - 134)。用这种方式发展出的一个解释对布迪厄至关重要: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是"历史的产物"(Bourdieu, 1987, pp. 8 - 9),并且要完全理解它们,社会学只有"重构产生社会分化的历史力量",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它们,社会群体才得以产生(Bourdieu, 1991, p. 248)。

然而,这就说明,如果是为了追踪阶级划分的起源,我们就必须将先前放在客观符号结构周围的阶级划分移开;如此一来,事实就变得十分明晰了:无论符号分割是弥散的,还是已经被法条化的,社会都"总是已经"被无数的符号分割撕裂开来。因此,参与到互相分类的行动者——无论是通过消费实践,话语,还是任何其他的符号媒介——都早已使自己的生活深深地浸入到一个业已分化的世界中。因此,他们的社会体验通常是一种区隔的体验。并且,作为浸入(尤其是初级社会化时期)到一个业已分化的世界的后

① 若想看历史性研究,并大量引用布迪厄概念体系,通过对国家的生产和申诉来绘制出一个新的职业类型的产生,可参见波坦斯基(Boltanski, 1987[1982])干部形成的研究和华康德(Wacquant, 1991)对它的讨论。

果，现存的社会分类结构不可避免地刻印在人们的惯习上。换句话说，惯习也融入了“视野与分化的原则”(Bourdieu，1998b[1994]，p. 46)——意味着一种对世界中存在的事物和人严格划分的普遍趋势——惯习是从形成它的社会环境中吸收而来的：“社会分化变成了分化的原则，构成了社会的外在形象”(Bourdieu，1984[1979]，p. 471)。这就使得惯习具有一种趋向惯性(inertia)的趋势——也就是，趋向它自身早期遇到的分类结构实践的再生产(见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p. 133)。这种趋向越是盛行，阶级(群体)间的界线就越多地被写入法律，因此也就越具有一种正式地位(Bourdieu，1990a[1980]，pp. 138－139)。然而，如果分类结构没有一定的修正和交替，它是不太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首先，这是因为一些事件可以改变资本的分配，如经济转型。其次，社会空间是如此的高度分化，这保证了多重分类系统的存在，而且相互之间存在永恒的竞争；恰恰就由于这种竞争才创造了符号。布迪厄估计，“在社会空间的中间(intermediate)位置，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空间中，实践和位置关系的不确定性达到了顶峰，当然也包括符号作用的强度”(Bourdieu，1990b，p. 133)。

三、强化统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布迪厄对阶级的理解具有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使得它与对此问题的其他处理方式区分开来。这包括他将阶级结构概念化为一个多维的社会空间；强调消费并将其视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所具有的经济与文化资本可以被“戏剧化”地展现出来；以及冷静地将视线集中在实践的符号维度；一方面将其作为趋近结构所必不可少的桥梁，另一方面，被其作为社会阶级(或群体)建立同一成员关系的方式。然而，与此同

时，在对布迪厄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进行解释时，我们不可避免将社会进行了简化，将其他的统治形式暂且搁置起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引入了其他一些元素来解释，如区域，特别是性别。因为在《区隔》之后的一些年中，布迪厄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所发展，我们将首先具体阐明一下使这部著作富于生命力的一些假定；接下来，我们将详细阐述他在之后的著作中的修正，尤其是男性的宰制（Masculine Domination，Bourdieu，2001b[1998]），来考察这对他早期阶级理解的意义。

1. 复杂的原因

"区隔"绝不仅仅关注不同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对于实践的影响。相反，各种其他的"分层"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区域和（对于更小的程度）民族——也都经常被提及。然而，尽管社会学传统上将这些因素视作不同的统治或分层基础——假如给定一个特殊结果的话，除了阶级，这些基础或许会（或不会）起作用——布迪厄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这种方式，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社会空间中的特定位置与所形成的惯习，及由惯习而产生的特定实践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描述一个人在社会空间位置中的不同方面（也就是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和生涯轨迹）与一系列人口学特征的相关关系（性别、年龄、民族，等等），以及这些特征会共同影响惯习，布迪厄的观点变得更加明晰了。

> 要以一种既统一又具体的方式来解释实践的极端多样性，人们必须首先要与仅认识到前后直接决定的简单次序结构的线性思维决裂，然后努力重构出现在各个因素中相互缠绕的关系网络。因素网络的结构性因果关系是不能被化约为……一系列线性关系……的累积效应的；每一个因素都是从其他因素的效应中发展出来的……（Bourdieu，1984

[1979],p. 107；翻译有改动）

布迪厄所指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可以从具有因果联系的一系列因素系统来理解(Weininger,2002,pp. 68 - 71)。如同前面所讲到的,这一系统包括由个人的社会空间位置和人口学特征所产生的效应。在主张因果关系完全是交互作用时,布迪厄是指对形成惯习的每个因素的影响(并通过它影响特定的实践)是随着这个人对每个其他因素的"评价"而变化的。这事实上是对艾伯特(Abbott[2001])所提出的因果逻辑上的"主效应假设"的一种扬弃——也就是说,假设除非那些原因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以从经验上体现出来,否则它们就是彼此独立运行的①。

但是,布迪厄也对交互作用的因素系统在概念化方式上设置了重要的限制。这些限制关涉到对交互关系的解释。他所选择的术语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从社会空间位置中产生的因素被认为是"首要的",而人口学特征被认为"次要的"因素(见 Bourdieu,1984[1979],pp. 101)。这就意味着,对于布迪厄来说,交互作用可以从人口学特征影响效应的变化上来理解,而这些变化是由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变化而产生的。更具体来说,依据布迪厄的解释,如性别等因素对惯习的影响是根据社会空间位置而发生变化的,但反过来却并不成立。布迪厄的观点在下面一些论述中是显而易见的：

当一方在社会阶级向上移动时,尤其是朝着……统治的["知识的"一极],性别上整套社会构建的差异将会削弱,其中

① 布迪厄社会学中的这个方面在其英语作品中通常是不被关注的。而在其法语作品中却是极为关注这一方面的(如,Accardo,1997,pp. 191 - 211)。

女性倾向于分享典型的男性特权，如阅读“严肃的”报纸和对政治感兴趣，而男性毫不犹豫地表达兴趣、性情或品味，而品味在其他地方可能会被认为是很“女人气的”(Bourdieu，1984[1979]，pp. 382 - 383；我的增补)。

惯习总是“有性别差异的”；然而，它的结果(指它所产生的实践)是依据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而变化的。因此，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和生涯轨迹是第一位的，而“次要”因素所具备的含义则是受到社会空间位置作用的；相反，社会空间位置对“次要”因素的影响并非是系统性的。而恰恰是布迪厄所宣称的首要因素，即资本总量和构成，才对其他因素(年龄、性别、居住地，等等)决定实践的形式和价值产生影响 (Bourdieu，1984[1979]，p. 107)。

对因果关系的这种相当模糊的推论是很明显的。在提出与社会空间位置相应的因素对于惯习的形成具有首要影响时，布迪厄是想强调它们对实践的解释——纯粹是元理论基础上的——是更为重要的。此外，他也宣称它们是社会冲突爆发的首要因素：“在次要因素(比如性别或年龄)基础上动员的群体没有那些在他们处境的首要因素(也就是，在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和生涯轨迹上)基础上动员的群体更持久和深入”(Bourdieu，1984[1979]，p. 107)。换句话说，在“全部人对全部人的符号斗争”中，性别、年龄，或种族的分类基础上的框架结构与生俱来地就不如没有那些与社会空间结构轮廓一致的框架结构(如社会阶级)更可能获得认可。

2. 截面分类

在之后的著作中，布迪厄抛弃了那个与社会空间位置相关的“生活状况”是惯习的最根本决定因素的假定，超越了“次要”因素如性别的作用。这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总量，资本构成和生涯轨迹的首要原因地位的扬弃。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发现他对社会学

的描述与不同社会统治基础的历史特殊性更加协调一致。这些可以明显地反映在他有关性别的著作中。

有一本很薄的书，广泛地描绘勾画了布迪厄广阔的理论轮廓的很薄的书——《男性的宰制》。这部著作旨在就打算提供"一种对无意识的考古历史，毫无疑问，无意识已经被建成一个非常原始的，非常古老的社会状态；而且它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我们每个人的惯习，无论是男是女"(Bourdieu，2001b[1998]，p. 54)。布迪厄所追寻求的分析策略是与众不同的：重返到他早期对前现代的卡拜尔人(Kabylia，位于阿尔及利亚东北部)的人类学研究所获得的资料中，他试图解释这种"男性中心的宇宙论"，它在人们对惯习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以及通过它们所逐渐建立起来的制度和实践。在沿着性别统治在宇宙中是相对较为明显的推论而向前迈进时，他后来试图通过与当代社会的对比，找出广泛存在于地中海地区"永恒不变的"的特征。

与《区隔》相对，布迪厄之后的著作将性别统治当成"符号暴力的典范形式"(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p. 170)。像所有的群体身份一样，性别是一种社会分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一定有一个东西存在于划分男女身体的"神秘边界"上，划分出男性和女性(Bourdieu，2001b[1998]，p. 2；这个词语来自 Virginia Woolf)。布迪厄认为，这种划分原则源自亲属系统，在亲属系统中，婚姻起着一种建立联盟和在家庭间分配声望的作用。在这个系统中，女性作为交换的对象而非主体发挥作用，他们的价值就存在于他们符合"男性中心"的女性柔弱的理想类型(Bourdieu，2001b[1998]，pp. 42 - 49；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pp. 173 - 174)。(而男子刚强有力的特点是与男性的理想类型相一致的)作为一种可以融入惯习中的特殊符号结构，性别是与阶级存在高度不同的：它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获得了一种刚性和持

久性，其他的任何划分原则都难以与其匹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性别是一种植根于“确定无疑且无可辩驳的自然属性”的符号系统之中，因此，它具有比其他任何属性都更加“自然化”的特征——也就是，它通过建立在一种看似自然的基础上，从而获得合法性地位(Bourdieu，2001b[1998]，p. 13，23)。限于篇幅，本文已不可能对这部著作，以及它在布迪厄全部著作中所占据的位置进行全面的讨论；而我只想指出他对阶级与性别之间关系的一些修正(这些修正通常是较为隐晦的)。

诚然，《男性的宰制》确实包含一些论述，让人回忆起《区隔》中论及的因果论辩，《区隔》中社会行动的性别特征是依赖于阶级位置的：“身体属性可以通过对框架结构(scheme)的感知来理解，这种感知在评价行为中的使用是依赖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Bourdieu，2001b[1998]，p. 64)。然而，其他的一些论述补充了以上这些论述，在其他论述中阶级与性别的关系有所转变。比如在描述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的分析性转型时，我们发现布迪厄断言：

> 观察到相对于经济结构的性别结构，以及相对于生产方式的再生产方式的非凡自主性确实让人感到惊讶。在贯穿几个世纪，横跨经济与社会的差异之中，我们竟然从其本质特征中发现了相同的分化体系。(Bourdieu，2001b[1998]，p. 81；也见 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p. 174)

当布迪厄意识到性别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惊人的连续性时，这迫使他赋予性别结构一种如同经济结构的自主性。此种做法与他早期对待性别的做法截然不同(当时，是将其视为一种“次要”因素)。这促使布迪厄重新设计了一套研究计划，这套研究计划集中考察“那些维持性别结构持久性的行动主体和机构的历史”

(Bourdieu，2001b[1998]，p. 83；斜体字被移除)。包含在这个过程中的机构有教堂、国家、教育系统和家庭(Bourdieu，2001b[1998]，pp. 82－88)。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每个机构是采取何种方式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内、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建立起法条化的区隔的。布迪厄认为，虽然近代和当代的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已经明显地缓解了性别的不对称性，但是，“深藏在这些统治下的一些机制仍在起作用”(Bourdieu，2001b[1998]，p. 56，88)。正是在他对这些机制的讨论中，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了他对阶级与性别关系的修正：

> 无论他们在社会空间的位置如何，女性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她们被一些消极的符号因素同男性分隔开，如黑人的黑色皮肤，或者一些受到污蔑(stigmatized)的群体成员特征，负面地影响了她们的一切，这就是一系列系统的共同差异的来源：尽管一个女性主管与……一位生产线上的女工之间的差距很大，但她们之间还是有一些是共同的。(Bourdieu，2001b[1998]，p. 93)

类似的表述清楚地表明，在保持不同历史时期性别结构的“自主性”的同时，布迪厄将性别分化看作是一种对实践进行结构化的“独立”力量。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很多“交互”关系，但现在却被看作是一种完全“对称”的关系——也就是，性别和阶级位置都各自被用来缓和另一个因素对实践的影响。因此，相对于《区隔》中的因果逻辑，我们找到了像这样的表述：

> 社会位置本身就是具有性别特征的，并且……男性在为了保卫他们的工作而反对女权主义者的同时，也在试图保护

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思想，尤其是在社会分工中像体力工人或军人这样的职业；他们大都将其归入唯有男人才能胜任的职业，这种观念几乎都源于他们价值观中对于男子汉气概的刻板形象。(Bourdieu，2001b[1998]，p. 96)

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布迪厄晚期的著作都采用一种标准化的“多元”逻辑的因果解释框架。这些修正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对“群体存在……和群体存在方式”的不同看法。尽管布迪厄总是认为社会阶级——作为“视角和分化”的符号原则——不得不建构群体在分类斗争中与其他原则(包括性别)进行竞争(如 Bourdieu，1987，p. 12)，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依然在《区隔》中赋予元理论以首要地位。一旦这种首要地位被取消，阶级必须要在相同的水平线上与其他原则进行斗争，并且符号领域也将迅速失去和谐一致性，就像在特定社会中性别与种族这样的不和谐关系一样。尤其是，当不同分类系统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分类系统组合不再能够被阶级术语自行解释的时候，那种失去和谐一致的情况就越发的严重①。这种情况的一种后果是，当社会阶级被理解为通过社会分类实践产生的群体时，它的命运甚至比历史上的社会阶级话语变迁都更具偶然性。

四、结论

布迪厄认为，“群体存在……和群体存在方式的问题”是

① 通过将四种“特殊制度”的历史串联，华康德(Wacquant，2002)使用相同的解释方式来阐释美国阶级和种族分化的形成与维持过程。

"所有的社会学都应当首先回答的问题"。在他毕生的社会学研究中,这个问题始终都居于核心地位。诚然,在他晚期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有所修正,但他的焦点依然没有改变,其实只是更加深入了而已。布迪厄是一直假定阶级关系是受限于其他的统治形式的;在他的晚期著作中通过取消了原来赋予阶级的特权地位,他已经开始完全开放地接受一种观点,那就是:历史是由各种统治形式错综复杂地"交织"而成的。所以,尽管他的阶级理论——与其多维的社会空间概念——已远离了把社会化约为两极的传统观念(最显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但在一些著作中,如《男性的宰制》却清楚地表明了一种观点,社会阶级仅仅是复杂的分类多棱镜的一面①。因此,尽管将赋予社会阶级的首要地位取消了,但布迪厄的著作对各种社会分类形式的冷静关注依然是前后一致的,即社会分类形式可以被理解 principia potestas——一种根本力量——它促使符号暴力发挥作用。

为了发展布迪厄"群体存在和群体存在方式"问题对于阶级分析的意义,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著名的短论"雾月十八"中。在马克思对 1851 年政变进行解释时,众所周知,法国的农民被形容为"一麻袋土豆"。每个农民家庭都被束缚在一小片土地上,并且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持久的社会契约,并缺乏有效的"沟通手段"。结果,他们难以将自己组织动员起来以获取利益,而只能保持在后来的评论者所提到的一系列"连续的"生存状态。于是,马克思认识到,在我们试图想知道农民是否与资本家、无产阶级或其他阶

①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世界的二分概念是将社会简化为阶级与其他的社会分化形式的单一的对立,尽管这一概念划分是极不可能的,但在经验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级“结成同盟”之前，我们必须要首先询问他们是否有能力将自身组织起来。虽然这或许是事实，但布迪厄依然提醒我们，那些分享着相同生活境遇的一群人无论是沟通、还是持续的社会互动，都不足以形成一个社会群体，更不要说是一个能被动员起来的群体。无论利益被认为有多么的“客观”，它们都从来不能独立地激发集体的社会行动，而且按照马克思所说，要想形成组织，面对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阻碍。当然，如果不考虑将技术限制降到最低，那么，必然在利益和集体行动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而它只能通过无限的力量来填补——首先，这种力量要以“符号”归类的方式来实现。为了“他们的”阶级而进行组织和动员的社会行动者必须首先认识到他们自己是同一社会群体的成员，是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敌人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认清自身（和其他阶级的对手）起码是分享一定的阶级认同（identity）的。

其实，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进行着成为动员先决条件的符号工作。因此，从社会学上把握它是很难的。或许唯一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阶级分析形式是能够将结构分析与遍布于社会互动中的无数交互分类行为的现象学分析融合起来。然而，这种融合恰恰是传统的阶级分析学派们难以发展出来的。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极其明显。在这些传统中发现一种分裂并不难。一方面，对于历史学家（如 Thompson，1966[1963]）和民族志学者（如 Fantasia，1989）来说，“阶级”必须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下才能产生。这种研究必须通过细致观察日常活动的细节或历史记录才能得到飞跃，为的是通过组合和分化过程来确定阶级的形成，这一过程或多或少会产生关联的社会群体。然而，与此同时，这些过程多是局部性的事件，它不能系统地联系到

广泛的阶级结构中①。更具体地说，这种研究难以观测到分类取向会随着结构位置的变化而系统的变化，或者取向会随着身边资源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且，当人们越认识到阶级结构自身是高度分化和多维的，这种局限就越发严重。另一方面，认为阶级结构最为重要的分析家们(如 Wright，1997)能够将个人归类到详细的结构“图谱”之中。然而，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划分社会行动者的话，那么，为了获取“阶级形成”的过程，他们就会被放错位置。这种研究的特征则是为了满足于考察个人的观点和实践是否与他们所在的结构位置所预测的情况相一致。然而，这种研究却没能够看到社会阶级的“建构主义”维度。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

> 通过假定行动和互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从结构演绎出来，一个人“从理论群体到实践群体的流动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政治斗争问题与政治活动问题需要强化一种对社会的分类与分化的原则，即使这个原则在现实中被完好地建立起来。(Bourdieu，1987，p. 8；也见 Bourdieu，1991，pp. 233 - 234)
>
> 并且，可以补充的是，对理性行动理论的依赖仅会加剧这种元理论基础上对群体认同和行动的漠视，并削减甚至消除符号对群体认同和行动的解释地位)。这或许可以表明，布迪厄对阶级的整个处理方法就是试图在一种经验分析上逻辑一

① 大概 40 年前，汤普森(Thompson)开始研究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工人阶级的形成，如下：“现在经常存在一种倾向性，就是将阶级想象为一个事物。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这并非是他的意图，然而，这一错误却对之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会产生误导。工人阶级被假定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它几乎能够在数学上被精确地界定出来——那些与生产方式存在一定关系的人。一旦假定它能够演绎出工人阶级所应具备的(但很少真的具备)的阶级意识，如果‘它’恰当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真正利益。”(Thompson，1966[1963]，p. 10)然后他继续说，“阶级由那些创造自己历史的人来定义，并且，最后，这是它仅有的定义”(Thompson，1966[1963]，p. 11)。

致的原则下，从方法论上整合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视角。（见 Bourdieu，1984[1979]，p. 483）

布迪厄分析方法的结果是，唯名论与唯实论者之间对于阶级无休止的争论被误导了。这些观点的对立必须要从与阶级分析论者相对抗的另一种方式来理解。相反，唯名主义和唯实主义或许只能被称作社会过程的不同时段而已（Bourdieu，1990b，pp. 128－129；Bourdieu，1991，p. 234；也见 Bourdieu，1984[1979]，p. 169）。必须要强调的是，社会行动者分布于客观的结构位置中，这些结构位置为任何特定一组个人分享相同的生活方式，相同的集体身份或者成为组织成员的可能性创造了条件①。然而，如果个人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由这一结构产生的不同的可能性，尤其是能同时分割和联合他们的边界的话——无论是由消费形成的模糊、渗透的边界，还是写入政策和法律的严格、准确的边界，这些结构所孕育的这些不同可能性都会促进社会群体的产生（见 Bourdieu，1984[1979]，p. 169）②。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阶级仅能从两种"部分"独立的力量的结合中才能产生：分别是源自社会空间结构的客观可能性和阶级存在的主观"信仰"。正如华康德（Wacquant）所说的那样，"阶级既不单独存在于结构中，也不单独存在于能动者身上，而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是经过历史上的生产，再生产和转型而产生的"（Bourdieu and Wacquant，1991，p. 51）。当布

① 当普提斯（Portes，2000）指出格伦斯基和索伦森（Grusky and Sørensen ，1998）的理论时，一种认为阶级仅"存在"于一些类型的经济自组织（指职业）中的观点，可能会引出一些不可思议的结论，也就是一些个人——或许是大部分人——是"无阶层"的。而且，这些观点对于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也难以提供多少洞见。

② 当然，以能否来团结和动员社会的功能视角来评判这种表达是否"充分"的标准与将其视作一种分析结构来评判其是否"充分"的标准是不同的，后者是用来进行社会学研究而建立起来的（见 Bourdieu，1984[1979]，p. 473）。

迪厄宣称阶级既是由“存在”，也是由“被感知的存在”定义的时，他恰恰表明的就是这个观点(Bourdieu,1990a[1980],p. 51)。

布迪厄总是试图避开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的宏大历史叙事。在他晚期的著作中，阶级被剥去了在他早期著作中享有的一切元理论特权。结果，这种取向能够为解释一定的现象提供工具，并且这些现象通常是在“解构”工人阶级的意义上(不加选择地)提出的。因此，布迪厄及其同事于1993年发表的《世界的重量》这部著作(Bourdieu et al. ,1999)，对法国社会导致的民众痛苦提供了一种民族志的解释。这部作品包含了丰富的证据和对工人阶级种族对抗的分析，这些工人阶级是紧跟着工业经济的变迁和转型，及证书和职业关系的变化而出现的。此外，在大量引用布迪厄的观点的基础上，查尔兹沃斯(Charlesworth,2000)对英国北部的一个叫罗瑟汉姆(Rotherham)的小镇进行了民族志研究。这项研究记述了一个生活方式“衰败”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工人阶级的青年们找不到他们在政治话语中的位置，并且与以工会为中心的传统(它们是自行消解的)相分离，他们尽管享有相似的生活境遇和生活方式，却表现出一种群体认同，而这种群体绝非是一种散漫的语义表达(discursive articulation)。在这些情况下，他们的符号存在被化约为布迪厄所称的一种“‘自在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特有的实践和事物首先被当作受剥削的标志，进而被当作一种受蔑视的标志(见 Charlesworth,2000,esp. pp. 150 - 202)。

在所有的分层理论家中，布迪厄因赋予社会分类的符号化实践一种核心地位而脱颖而出。由于我们前面所考察过的原因，这种超越社会阶级问题的核心论点最终囊括了所有的社会分类形式(性别、种族、国家，等等)。在布迪厄看来，这种符号是一种强大而又非常难以捉摸的权力，能产生一种“神奇的魔力”(Bourdieu,1991,p. 233)。分类作为对符号化结构框架的应用，本质上是一个

双面的过程。一方面，它将个人分类、分化、分隔开，并以此建立起社会群体："社会魔法总是能够从连续中产生出断裂"(Bourdieu，1991，p. 120)。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认同，而通过集体认同，社会行动者渐渐认清了自己与他人。另一方面，分类也是对潜在的权力、资源和特权的一种"戏剧性的展示"——无论这些是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男性特权等形式出现的。在这种展示下，分类发挥了一种媒介作用，通过它，获得社会声望的主张得以表达并得到认可(或反对)。由这两种发挥作用的方式，分类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改变产生影响。

当分类结构框架被沉积到性情，并同时被塑造到事物秩序当中(即话语、机构和法律的秩序中)时，惯习和事物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这种关系是能够发生对抗变化的。特别是，仅依靠谴责和"符号刺激"是不足以使主客观之间根深蒂固的一致性发生断裂的。然而，布迪厄却坚决主张，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掌握巨大文化资本的社会科学家，在对抗压迫(subordination)的斗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压迫存在于——至少是部分地存在于符号暴力中。知识分子能够以一定的权威对社会发表评论，并因此干预到它的表达形式中，他们有能力减轻统治的作用，否则这些统治就会被忽视；同时，他们也能减轻被征服的经历，否则它们或许早已超出言语的限度(见 Bourdieu et al.，1999)①。然而，这种能力也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特别是，一方面，社会科学家在探求不同的分类策略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会将他们的能

① 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布迪厄总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关键学科。如果没有科学，而仅仅是隐藏的，那么，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很关键的，没有选择科学的科学家不得不选择去做出一种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隐藏的就是一个秘密，在没有人被委托保守它的情况下，它却是一个保守得很好的秘密，这是因为它对"社会秩序"的再生产有贡献，"社会秩序"是以对再生产的最有效的机制的隐藏为基础的，所以它服务于那些在维持现有秩序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人的利益。

力置于危险中；另一方面，当他们允许话语被某种特定的分类观点所操纵时——他们试图赋予这种分类观点以“科学”的权威（和气质）。例如，曾有人粗略地宣称某个社会阶级会“死”或“生”，这经常成为特定群体或某一派人的代表性策略的委婉表达（Bourdieu，1987，pp. 2－3；Bourdieu，1990b，pp. 179－180）。

布迪厄总是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由于所掌握的文化资本而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就表示他们远非是些“自由漂泊者”。因此，他们的分层倾向——经常是依赖于声望或特权的分配，也就是将文化置于物质之上——是对社会学研究开放的，就像其他阶级和群体那样。布迪厄（Bourdieu，1998[1984]；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pp. 62－74；也见 Bourdieu，1990b，pp. 177－198）满怀激情地承担了这项工程，将其想象成为一次运用社会学来反思社会运行方式的机会，而社会对于那些为了谋生而思索它的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与此同时，由于认识到知识分子占据着社会空间中一块决定性的位置，布迪厄也反对将这些人称作是被统治者的“有组织”的代表。同时，上述观点也是对其毕生主张的有力证明，他主张社会学要对社会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乐于接受它所暗示的政治实践的不明之处。

译者：项军[1]（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1] 项军：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即将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家庭、劳动力市场与社区。

第五章
基于租的阶级分析之基础

奥格·索伦森(Aage B. Sørensen)

一、导论

有关阶级概念的文献非常之多,争论的焦点是“阶级”这个概念应该包含哪些属性。关于哪种阶级分析方案最适于描述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阶级分析方案和理论。达伦多夫(Dahrendorf,1959)主张阶级应该通过权力关系来界定。奥索沃斯基(Ossowsi,1963[1958])和后来的赖特(Wright,1979),构建了以交互分类的产权和权力统治关系为依据的阶级分析方案。戈德索普的阶级分析方案则基于财产、职业和权力关系(Goldthorpe,1987; 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三者的分布。帕金(Parkin,1979)和墨菲(Murphy,1988)着重分析闭合的阶级关系,而吉登斯(Giddens,1973)则强调“结构化”的程度。

马克思提出阶级概念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历史理论，用以解释社会不平等、社会运动、社会冲突和政治过程。马克思的理论一经产生便具有非凡的解释力，其理论机制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剥削产生利益对抗。在下列情况下，利益便可以说是敌对的：当一个行动者或者一群行动者的所得排除了其他人享有同样的好处。经过阶级形成的过程，对抗阶级成员认识到他们具有共同利益，并成为参与社会冲突并最终改变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集体行动者。

本文的论点与马克思类似，认为剥削意味着阶级间的优势和劣势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一个阶级的不利地位是另一个阶级处于有利地位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产生了利益对抗，当利益相关者维护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是阶级意识发展的结果时，就会产生阶级冲突。这种因果关系还暗示：只有改变阶级构成，才能改变阶级间有利地位和不利地位的分布状况。

将剥削看作阶级间优势和劣势地位的原因是一种解释不平等的结构理论，因为不平等的根源在于阶级间的关系，而不在于阶级成员个人的努力和技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级，如新马克思主义者常喜欢用到的齐美尔（Simmel，1908）对此的阐述，是“空置位置”（empty places）。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够与标准经济学理论对话的社会学理论，后者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从市场上获得基于技能、能力和身体资本的不平等回报。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者们一致认为马克思原创的剥削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剥削建立在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弃置已久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由于劳动价值理论偏离了整个理论体系，一种更充分的关于不平等的结构理论应当成为理论家修正阶级概念时的主要诉求。然而，原始的剥削理论的问题受到的关注非常之少，在少数关注剥削的特例中，主要是经济学家罗默

(Roemer，1982)对剥削概念的分析。但是，罗默的剥削概念非常笼统，并不一定会导致可以引起阶级抗争和革命的利益对抗。

在有些人看来，一种疏于具体阐释的剥削理论意味着每个人都成了韦伯主义者(Murphy，1988)。但是韦伯的阶级概念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不平等的结构理论，更无助于判断什么时候阶级对于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才有意义。于是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本质要素消失了。当然，这种忽略并不影响阶级概念在经验研究中的适用性，它可以用于解释各种各样的行为和态度，以及社会流动(如戈德索普提出的概念)，还可用于解释阶级形成过程(如新韦伯主义者提出的一些概念)。

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韦伯主义者之间关于阶级概念的分歧并不是最主要的。更有益的区分是：阶级作为冲突群体，冲突源于剥削；阶级作为个人行动和思想态度的决定因素，个人行为和思想态度是不同阶级相应的生活条件的结果。两种阶级概念都具有反映处在一定阶级地位的成员占有资源和资产的程度和种类的属性。和马克思一样，我提议使用基于产权的阶级概念，但是用于本文的财产权概念比通常使用的法定财产权定义要广泛。它指的是一种经济产权，被定义为通过直接或间接交换获得一种资产回报的能力(Barzel，1997)。其中某些权利得到国家支持并成为法定权利，但是人们通常还能从一些不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权利中获益。产权界定的便是个人的财产，我认为作为生活条件的阶级概念反映了个人的全部财产。这些财产中的部分可能包含在能够产生回报和报酬等租金收益的资产中。租金是对占有固定供给资产的回报：因为市场中单个的资产所有者控制着这些资产的供给，于是供给对价格增长没有反应，即失去了价格弹性。我主张将剥削阶级定义为可以提供生租资产(rent-producing assets)占有权的结构化位置。根据生租资产定义的剥削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

对抗，因为租金给生租资产的拥有者带来好处，这些好处的获得是建立在非所有者的损失的基础上。根据生活条件定义的阶级位置间并不一定存在利益对抗，因为个人所控制的财产可能不含有生租资产。

下一节将对最重要的阶级概念进行简单回顾，并将重点放在与这些概念紧密相连的不平等理论上。接下来是对基于财产的两个阶级概念的发展和充实。最后一部分将讨论本文提出的阶级概念对当下社会事件的解释力。

二、不平等理论与阶级概念

“阶级”意义的多样性使得围绕阶级的争论也常常显得模糊不清。为了澄清争论，在这里有必要将阶级概念按照理论抱负的不同层次加以梳理。在最低层次，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根据分层的某一维度对人口进行的纯名义分类：如收入、职业声望或社会经济地位。这些概念并未对阶级的边界以及经验存在作出说明，也没有揭示分类所基于的不平等的各维度何以存在。尽管新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其他概念来描述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差异，这些概念仍然有其用处。

在下一个理论层次上，我们可以发现对阶级的经验存在进行了说明的阶级概念：通过可识别的边界确认可观察的群体。我将称这些概念为“生活条件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它们经常出现在一些社区研究中：按照不同的生活条件来确立不同的生活方式(Warner，Meeker and Bells，1949)。或者说它们更近似于一系列阶级指标：如职业、教育、收入、收入来源、居住条件等。这为研究不同阶级的生活条件提供了测量指标。它们在有关阶级及其后果的经验研究中极为有用。

最近的研究中，这类阶级方案中最杰出的是戈德索普(Goldthorpe,1987)提出，并由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加以阐明的方案。这个方案应用广泛，在经验研究中非常有用。戈德索普(Goldthorpe,1987)强调一个正在形成中的阶级——即要实现阶级集体行动——它的成员至少应当对他们的阶级处境有共同的反应。这个问题部分地反映他们的阶级处境有多相似。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利用职业种类来鉴别同质性阶级。此方案可用于确认流动类型，也可用于分析教育机会的不平等(Erikson,Jönsson,1996)和态度行为差异(Marshall et al. ,1988)。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韦伯主义的方案，但是戈德索普拒绝这种归类。格伦斯基和索伦森(Grusky and Sørensen ,1998)拓展了这种确认同质性群体的方法，并得出最后总结：以职业类别为分析单位，从而形成了这种特定的分类方案。当然，如果研究者所关心的是提供一个基本的分类以便识别同质性群体，并服务于其他各种研究目的，上述总结是可信的。

社会化和灌输机制并不独与阶级相关，但是阶级的解释机制可以解释生长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的态度行为差异。因此，生活条件意义上的阶级是一个表达了社会结构的布局的基本概念。这些阶级方案对结构位置间的重要差异进行了描述，但并不意味着能够预测革命。如同名义概念，这无碍它们在有关生活方式差异的调查中发挥用处，而这正是它们所试图描述的。近来对阶级概念的阐述强调阶级分析不能忽视依地域不同而呈现的文化差异(Bell,1987)，有学者认为阶级的后现代主义解释中出现了新分裂(Eyerman,1994)。格伦斯基和索伦森(Grusky and Sørensen,1998)提供了对各类分析路径的全面回顾。

这些阶级概念并没有提出或假设一个关于不平等以及不平等是如何产生利益的明晰理论，但是推测可得：导致不同生活条件

的不平等，是通过市场和其他机制产生的。虽然戈德索普把市场，职业关系和权威作为分析基础，但是这些关系和实际方案之间的联系没有得到详细说明①。

谈到阶级概念的理论渊源，韦伯通常被列为是与马克思齐名的另一位鼻祖②。韦伯把阶级明确置于社会的经济组织当中，从而实现了对阶级仅仅进行描述性定义的超越。"阶级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归根结蒂是市场情况"(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48 页——译者注)(Weber，1968 [1946]，p.182)。实现和保持特定资产价值的需要产生了围绕其可能形成冲突的阶级经济利益。韦伯采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人们如何获得基于资产和资源的不平等的回报。但是，这个理论并没有说明在何种条件下经济利益是对抗性的，即导致冲突。极有可能的是，韦伯主义的阶级之所以具有对抗性利益并不是因为一个阶级以另一个阶级的损失为代价而获得优势。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当中，不存在交易成本，因而无法获得以他人损失为代价的持续的优势和超过市场的回报③。因此，阶级位置变得无关紧要。

---

① Goldthorpe (2000，pp. 206 - 209)最近开始了这项工作，他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易成本经济学。

② 在阶级分析的文献中指出韦伯阶级概念的重要性显得有一点点意外。韦伯在《经济与社会》(1978)中的两个地方提到过阶级，但都是短小的片段。虽然马克思可以说也从未对阶级概念进行专门细致的阐述和发展，但他的所有著作的中心分析旨趣都是阶级。阶级对韦伯来说似乎从来就不是重要概念。这并不是因为当韦伯在写那些现已编纂在《经济与社会》中的片言只语时，德国缺乏由马克思提出的这个概念的其他定义和讨论。Geiger(1932)就列举了 16 种德语学者对阶级的定义。除了马克思的定义，大多数都来自 20 世纪的头几十年。由于只有韦伯和马克思的著作被译成了英文，韦伯就理所应当地被认为发展了可与马克思分庭抗礼的阶级概念，即使韦伯只有些许片段论及这个概念且在他的著作中阶级亦不显重要。

③ 这是新古典经济学里的完全竞争的瓦尔拉斯模型(Walrasian Model)的经典结论，在这个模型中，所有的利润和租金都会在均衡中被清除掉。当然我们不能苛责韦伯忽略了这个理论对经济的理想化的设想，但是韦伯及其追随者没有能够确立提供显著优势的结构位置，这使得韦伯的理论要弱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要产生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必须存在可获得的并非暂时性的好处①。

韦伯并没有强调产生对抗性利益的优势的暂时性和持久性之间的区别。他提供了两条线索来区分不同的经济利益。其一是用人们在充满经济机会的市场中所卖出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的经济利益。其二可在下面的说明中推出：

> 对物的占有的支配如何进行分配的方式，仅仅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本身就创造着特殊的生存机会。根据边际效用的规律，它排除无财产者参与对所有高价值货物的竞争……它为所有那些得到货物供应、一般不依赖交换的人垄断着交换赢利的机会。（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7-248页——译者注）（Weber，1946，p. 181）

我将在下文论述垄断概念与阶级分析密切相关②，并将给出比韦伯所提出的更多的具体理由。所谓的新韦伯主义者们通过融合韦伯关于地位群体和阶级的想法，把精力集中在对进入某一阶级的限制条件上，即阶级封锁（classic closure）。这个被吉登斯（Giddens，1973）、帕金（Parkin，1979）、墨菲（Murphy，1988）和其他学者所强调的概念，暗示阶级有需要保护的优势或特权，但是除了一些关于财产和证书的一般说明外，学者们并没有给出线索指示财产和证书是否以及何时会产生可形成阶级行动基础的利益对抗。

在理论抱负的最高层次上，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在我前文所描

---

① 如 Hayek（1948）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完全竞争性市场中却没有了对竞争的激励。

② 这一点将会通过垄断租金的概念来诠释，垄断租金将在下一节加以讨论。

述的意义上，提供了一个关于不平等的结构化理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在定义阶级关系时的核心步骤是剥削；即通过此步骤一个阶级获得了以另一个阶级的损失为代价的经济利益。在封建制度下，剥削是赤裸裸的：庄园主占有农民的一部分产品，或者更甚的是强迫农民工作日的一部分无偿地为他的地产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显得更隐蔽了，因为工人看上去是自愿为了工资而工作。但是，工资并没有反映工人生产出的产品的价值，产品价值等于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力的价值——这是一个抽象的量，并不一定等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工资等于交换价值，或者说劳动价格，它反映的是生产这种劳动的成本，就像其他的价格一样。工资和工人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差值是产生资本家利润的剩余价值的源泉，是所有资本家活动的最终目的。剩余价值由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它，因此资本家以工人利益的损失为代价而变得更加富有。很明显，这两个阶级应当是具有对抗性利益的。

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所表明的，马克思对不平等和压迫的解释相当引人注目。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穷困是由于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产权安排，工人必须使工作的一部分时间用来为资本家增加财产，这的确是非常诱人的设想。它不仅提供了对不平等的理论解释，还指出了有效的解救方法：必须改变产生剥削的阶级关系。但是，工人对剩余价值的权利，由马克思首次提出并在《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发展，只是一种规范性的说明。剩余价值不具有像价格那样可观测的经济量的含义。马克思在第三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提出劳动价值的剩余价值总量与价格总量一致。尽管如此，“作为一般规律，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完全掩盖了利润的来源和真实性质——不仅为资本家掩饰太平，也使劳动者蒙在鼓里”(Marx，1959b，p. 58)。剥削来源的隐蔽性质使得经验性的使用这

个理论变得不可能，这也是劳动价值理论面临诸多异议的根源。

剥削是资本家对劳动的占有，正如封建主义条件下地主占有劳动一样。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资本家获得的越多，他从工人那里得到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因此，对于资本家而言，剥削方式格外重要。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由此具有双重含义：法定所有权和统治。在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讨论和重新解释时，这一点被认为是其概念的核心要素①。新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通过强调韦伯主义的阐释中缺乏对剥削方式的关注，而把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和韦伯主义的构想区别开来。占优先地位的阐释是在生产阶段定义阶级②。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韦伯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为了避免劳动价值理论遇到的困境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权力维度上，这是错误的。

两个经常被引用的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进行重新解释的方案都将剥削方式作为阶级概念的主要要素（Dahrendorf，1959；Wright，1979）。达伦多夫（Dahrendorf，1959）从阶级概念中剔除了作为剥削基础的法定产权，只保留了统治或权威，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概念的最激进的形式。

达伦多夫的理论其问题在于他从没有细致阐述为什么权威关系会产生对抗性利益，而这正是阶级得以形成的根基。劳务契约是自愿签订的，代表服从权威和获得报酬之间的交易。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服从权威可能感到的不适和疏离感应当通过

---

① 除了雇佣关系中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结构也包括在内，我们得到的详尽的阶级概念由 Poulantzas（1975）发展而来。

② 主要的特例是 Roemer（1982）提出的阶级概念，下文将有所讨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确实有必要在生产阶段加以定义的评论性文章，请参看 Wright（1982），赖特后来修正了他的立场（e. g.，Wright，1997）。

更高的工资加以补偿，如西蒙（Simon，1957）在他对劳动合同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可见，这并不会形成对抗性利益。除非诉诸劳动价值理论，否则权威和统治并不会产生剥削。

赖特（Wright，1979，1985）立场鲜明地将所有权和权威进行交叉分类，得出了一些阶级类别——这也是奥索沃斯基所采取的方式。由于调查总体的大多数没有或者只有很少财产，大多数的阶级分类是通过权威进行的。赖特的概念被广泛用于经验研究中。只有戈德索普的阶级概念在经验性的阶级分析中才能与之分庭。赖特（Wright，1979）声称他的第一个阶级方案基于剥削理论，但是他从没有提及或讨论过这个理论。晚期的赖特（Wright，1985）采用了由罗默（Roemer，1982）提出的剥削理论，并相应修正了他的阶级方案：保留权威（现在被称为"对组织资产的控制"，Wright，1985，p. 79）作为阶级关系的一个主要维度。

用赖特的阶级方案进行的研究发现了权威（authority）对收入具有影响，但是权威效应并不要求一种阶级解释。权威通过计算下属的数目加以测量，但是这个数量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计划中建立的职业途径明显高度相关。所以要确认这种影响是一种真正的权威效果，对普通职员和业务岗位进行区分是有必要的，然而这件工作还从没有做过。为了证明权威本身对收入的影响而去证明一项经济原理是很困难的，更深入的论述请参看索伦森（Sørenson，1991）。

马克思在特殊的权威关系中引入了剥削方式作为他的阶级概念的核心要素，他并不是要解释管理者和监督者的收入才这样做，而是因为劳动价值理论要求阶级概念具有双重维度。如果摒弃劳动价值理论而代之以新古典边际生产率理论，剥削方式就显得不必要了，因为在边际生产率理论中，并没有对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加以区分。在边际生产率理论中，工人被付给与他对产品所做出

的贡献相等的报酬：懒惰的工人得到的报酬少于勤奋工作的工人。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够保证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不会多于也不会少于他对生产做出的贡献。

马克思没有使用边际生产率理论，因为他还不知道它。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他显然与后者具有共同的认识。他很有可能接受了关于这些市场的一些经典理论。如罗默所言："竞争性经济的新古典模型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他们对理想化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不错的阵地"(Roemer，1982，p. 196)。

罗默试图构建出一种和现代经济学理论、马克思发展阶段概念的原初意图一致的剥削理论，后者是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赋予所有者以非所有者的损失为代价获得利益。因此生产性资产的不平等导致了剥削：穷困的行动者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依赖于富裕者的存在①。罗默对此给出了博弈论的解释：如果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员退出经济关系时能够获得好处，那说明剥削是存在的。

这个由市场经济中不平等资产的分配而来的剥削概念，具有些许奇特之处。罗默(Roemer，1986)指出如果我们允许行动者拥有不同的时间偏好，那么很有可能剥削地位和财产将会呈现负相关。罗默对他的阶级概念的此种特性的解决方法是完全抛弃整个概念②。由此构建一个令人满意的不平等的结构化理论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理论上最为雄心勃勃的由马克思首创的根据剥削定义的阶级概念，确实提出了对抗性利益如何形成继而阶级冲突如何产生的一整套解释机制。但是，这个理论依赖于如今早已被经济学理论所摒弃的劳动价值理论。种种想通过引入权威使其复活的尝试都

---

① 这有时被称作级差地租或李嘉图地租，更多讨论请参看 Sørensen(1996)。

② 根据罗默所言："剥削理论是我们没有必要再保留的理论住处，它曾经养育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理论家族，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朝前看。"(Roemer，1986，p. 262)

不尽如人意，因为权威是否是剥削和对抗性利益产生的源泉并不能得到清晰的说明。那种认为剥削基于各种资产的不平等分配的方案也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还有另一种解决方法。这就是保持马克思所竭力主张的以产权作为剥削的源泉的立场，而不是把所有的财产都视为剥削的源泉。我另作提议，仅限于将所有权或对生租资产的占有所产生的不平等作为剥削的源泉。生租资产或资源产生的不平等使得所有者利益的获得是以非所有者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如果生租资产被重新分配或者被消除，非所有者境况将得到改善。基于租金的含有剥削定义的阶级概念能够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保持一致，因此避免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问题。它还避免了罗默所讨论的异论。

三、阶级和财产

马克思认为划分阶级的基础是是否拥有基于财产的回报的权利，韦伯认为财产对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的产生至关重要。剥削是一个以他人的损失为代价而获得经济优势的问题。这种权利——获得基于财产的回报——于分配确实不可或缺，我将在后文说明。

获得回报的权利可以反映法定所有权的状况。但是，获得由资产或资源提供的回报的权利不需要对此做出法律意义上的有效性规定。根据巴泽尔(Barzel，1997)的观点，经济产权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个体直接消费或者通过交换消费一件商品或资产的能力，换言之，即对一件商品或一种资产的使用的控制。这些经济权利可能通过法律的形式强行规定，因此得到加强，但是它们并不需要国家规定其有效性而得到支持。产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固定的。保护和加强产权的个体行动或者集体行动都有可能使其发生改变。这些行动引起交易成本，这是对权利进行转移、获取和保护所

需的成本。下面将给出相应的阐释。当交易成本为正的时候，产权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产权的转让和保护受到阻碍，或者变得不可能。正交易成本的出现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巴泽尔（Barzel，1997）强调资产的一些属性测量成本很高，并且它们的实际或潜在所有者也不可确知。那些有权利从这些属性当中获得收益的人们易于获得对它们的支配权。对权利的转让，使得行动者能够充分实现资产价值，但是可能需要花费大额成本，因为产权流转的成本是昂贵的或者受强力阻碍。集体行动可以实现对垄断产权进行重组，但是代价相当高昂①。

举个例子说，在现代公司里，股东并不拥有组织的所有资产，而是与组织内外的其他方共同享有这些资产，他们都拥有从资产的不同属性获得收益的权利。管理者能够获得收益是因为股东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而不能完全控制管理者对资产的使用。其他雇员也能获得收益（下面将论及），比如说，通过对自己工作努力程度的把持。所有权被分割并不意味着作为剥削基础的产权概念应该被摒弃，摒弃产权的概念正是达伦多夫（Dahrendorf，1959）②所主张的。比如，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性资产个人法定产权的缺位并不意味着个体不能从控制这些资产的使用当中获益。只是在这些社会当中产权受到了更多的约束，且很难确定哪些人获得了利益（Barzel，1997）。

巴泽尔所提出的更广义的产权概念暗示着：在一些情况下，

---

① Barzel（1997）和其他学者（参看 Eggertsson 1990 年的评论）主张采用产权的路径来分析经济制度，他们把交易成本看作缺乏充分信息和预见的结果。这反映出他们关注的仅仅是自由交易。我认为强力，或者联合其他行动者发动并维持集体行动的成本，阻碍了行动者去充分实现他们的资产价值。

② Dahrendorf（1959）不认为财产应当成为阶级形成的基础，他得出这种主张的根据是：在生产方式中消除了私有法定产权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平等依旧存在，将法定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行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度蓬勃兴起。达伦多夫的论断所基于的是一个过度限制了的产权概念，在此不做赘述。

个体——即使是奴隶——通常也拥有一些资产产权(Barzel,1997, p. 105)。这意味着所有的个体都拥有一些财产——即使它只是执行差事的能力,通过完成差事他们能够得到工资。

一个简单的公式可能会有助于说明情况。我们用 v_j 代表资源或资产 j 的价值,这里价值通过资产使用寿命期间 j 的资产收益来确定。这些收益通常是货币形式,也可以是社会的或者心理的。接着,定义 c_{ij} 为行动者 i 对资产 j 的权利,或者 i 对 j 实施的控制权。这样 i 所拥有的财产总量为:$w_i = \sum_j c_{ij} v_j$,这里 w_i 代表行动者 i 的财产①。

个体通过最大化他们的资产收益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就需要把资产应用于生产商品或服务。这通常意味着他们需要使用由其他行动者控制的其他资产。因此,他们需要与其他的行动者进行交易。一个农民需要土地来最大化他投注于耕作的努力和技巧的收益;一个工人需要一个雇主、机器和原材料来实现她的主要资产——劳动力——的价值。这些资产通常由其他行动者控制或所有——地主拥有土地,资本家拥有机器。这些资产可以由需要它们的行动者购买到,或者租到。这里的租金收入是指资产使用权的转移②。劳工可以租出她的劳动力给资本家以换得工资作为回报,或者反过来说劳工租用了资本家提供的资本并为资本家创造了利润。各种租中,这些耐用资产和资源所附带的租金收入尤

---

① 这个公式与 Coleman(1990)对市场交易系统中权力的定义颇为相似。在一个没有外部性的系统中,行动者交换资源的控制权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科尔曼将他的公式看做是这个交易过程的均衡结果。本文没有引入类似的均衡概念。再者,科尔曼着重于任何种类资源的交换。本文的主要兴趣在于生产性资源。资产和资源要产生有价值的财产,就必须能够产生收益,因此必须被用到生产过程中去。

② 在租金收入(rentals)和租(rents)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些混淆。前者指的是一个行动者为了取得报酬而将某种资产的使用权转移给另外的行动者(劳动工资,资本利息)。这些报酬构成资产受益权持有者的回报。回报的一部分可能是经济租,下面将会详细讨论到。

为重要，如果资产易主，巧妙的会计操作能够将租金收入转移给新的所有者。

对于作为生活条件的阶级而言，行动者享有的财富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处境。行动者控制的资产则决定了他们的收入。所控制的资产还决定了行动者的收入和收入变动区间。工人的工资收入由努力程度和工作技能决定，但是就业机会的变动则会影响工人的收入区间。对某种资产拥有者社会地位的集体评价形成时，这种资产会获得一定的社会声望。这种社会声望会形塑拥有者与其他行动者的交易机会，进一步形塑经济偏好和经济利益（韦伯意义上的利益）。总财产和它的组成成分通过型塑福利、经济机会以及使这些机会最大化的投资行动，产生了不同的行为性情（behavioral dispositions），这能够解释与生活条件意义上的阶级相联系的灌输机制和社会化机制。这一点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详述。

当个体需要同其他行动者进行交易，以获得可以实现他们的财产收益的那些资产时，后者便能够对所需资产的供给实施控制。流转成本或者其他成本可能会阻碍个体另选资产供给者，这种资产的供给可能是受自然条件的天然限制，也有可能是这种所需资产的供给者产生了垄断。这便使得控制所需资产的行动者能够以远远高于资产使用成本的价格对使用这种资产要价。比如，在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地方的煤矿主可以从工人的低工资水平中获得很大好处，因为工人找不到可替代性的职业①。这种垄断对工人的劳动回报的实现构成了阻碍。否则，同样的回报可以在他处获得，而煤矿主则只需支付更低的生产成本从而从生产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这种产生于对资产供给实施有效控制的好处便是一种经

① 此煤矿主即获得了买方独家垄断优势。

济租。

租还可能反映信息的缺乏。组织经理人员可能获得远远超过保证他们安心工作所需的利益,因为他们能够控制现金流,而这是股东们所不能掌控的。或者说由于这种资产的可获得性依赖于另一种特定资产的存在,因此它的供给受到了限制。总的来说,租阻止其他行动者充分实现基于他们资产的回报的优势。租对剥削阶级的出现来说非常关键,因为那些从租当中获益的人会致力于保护他们对寻租资产的占有权,而那些被阻碍充分实现资产收益的人们则能通过消灭租而获得利益。因此,租会产生对抗性利益和冲突。

要搞清楚租是如何产生的,有必要更进一步考察最大化生产性资产收益的交易过程。如果行动者 j 不占有某种资产,而为了最大化自己资源的回报所需要的这种资产的租金价格是 j 需要支付的成本,如果 j 拥有这种资产,那么租金价格则是 j 的回报。这意味着他的财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他相关的资产的价格。这些价格通常情况下取决于市场供给。如果行动者 j 需要为其支付租金的某种特定资产的供给增加,价格就会下跌,那么行动者 j 的财产就增加了,因为他支付了较少的成本。需求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影响资产的价值。这是正常状态下的情况。

现在假定行动者 k 控制了一种资产,j 需要这种资产来使自己的资产得到使用。行动者 k 可能占有土地,这正是行动者 j 所需要的,以便获得 j 所具有的劳动力和农业技能的回报。他们会协商一个使用土地的价格,这个价格对 j 来说是一种成本,它减少了 j 从他的劳动和技能中所获得的利益。当协商价格时,j 和 k 会比较其他农民为使用土地支付的成本。长远来看竞争会保证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能够保证 j 获得维持其生存并能在土地上工作,且对地主所支付的任何成本(如筑栅栏的材料)做出补偿

的收入水平。当然，j 会试图买下这块地而不是租下它，但是这对最终结构无关紧要：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租金由购买土地的资本的租金取代，即，利息。

要达到竞争性均衡状态，有一点很重要：土地供给能够随着价格变动。此外还要求土地租用者必须是可流动的，可自由选择土地所有者们提供的租地机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即土地价格是固定的并且土地供给是有限制的，或者土地租用者——农民——受到强力或者法律的限制而不能自由流动，那么土地所有者则能够以远远高于假定的竞争性价格要价，竞争性价格刚刚足以支付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成本。实际价格和竞争性价格之间的差便成为经济租。

租是超过竞争价格的那一部分资产报酬，或者说超出了足以导致资产被使用的价格。因此资产 i 的租可以定义为：$r_i = v_i^a = v_i^c$。这里 v_i^a 是 i 的实际价值，v_i^c 是竞争条件下出现的价值，并等于使资产得以被使用的成本①。这些价值体现在资产使用时期内产生的收入流。

租的存在依赖于资产所有者控制供给的能力。关于这点我已经提到过一个经典例子：封建主义性质的租赁合同。土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支付农民的劳动报酬②，收益的另一部分则用于支付地主在土地上的资金花费。剩余部分则是租赁关系中所获得的租，即不需用于雇佣工人也不需用于保持土壤肥力的那部分报酬。

---

① 租是通常被称为利润的一部分，但是利润的计算经常包括资本的报酬，即利息——作为过往储蓄的报酬，还包括资产所有者由于管理资产而得的工资。当利息和工资相加等于市场回报率的时候，后者就不是我们所说的租。

② 古典经济学将土地看做租的主要来源，即地租，以强调收益对土地所有权的依赖（马克思就用了这个术语）。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土壤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部分土地产品”（李嘉图著、周洁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 页——译者注）（李嘉图，1951[1821]，p. 67）。

这种好处由地主所得，因为他拥有他所控制资产的收益权①。但是租的收益把一种不利强加给了农民，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和技能的全部价值。

租并不一定必然与土地相联系。所有具有固定供给、且被最大化收益的行动者需要的生产性资产都有可能产生租；或者说租可能是获得必需资产的交易成本的结果。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949[1920])花了大量心思发展租的概念，他把这个概念的应用扩展到任一种生产性资源或资产带来的收益。他表明租亦可能以下面几种报酬的形式出现：使用有限供给的资本或劳动力；使用资产和劳动力的独有组合形式，如那些特定技术和特定人员的组合；使用不寻常的不能通过培训获得的罕有才能(音乐天赋，艺术创造力，体育才能等)。租还可能产生于雇佣关系中：当雇主因为监督成本过高而不愿意将工资与努力程度挂钩的时候，工资不变，工人会通过控制自己的努力程度而获得好处。总而言之，租的关键属性在于：它是资产报酬或资产收益的一部分，且是超出使得供给出现的必须成本的那部分。

土地与租的联系不只是历史的偶然，它还反映出土地租赁制度通常具有长期性，因此租也具有长期性。在竞争性经济中，租可能产生于工业生产中的技术革新或者其他重要的供给限制。因此，当他人发现拥有一种特殊的资源能够获得超额利润或曰租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这些他人会增加这种资源的供给。这会减少超额利润直至其消失。马歇尔(Marshall，1949[1920])将这种暂时租称为准租(quasi rents)。在资本主义生

---

① 这是个典型安排。还可以说地主的收益是源于提供保护的回报(North and Thomas，1973)，但是这至多只能解释这种安排的起源。Barzel(1997)亦指出收益可能会随着农民和地主之间合同形式的不同而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在一些特定的安排下，农民却能通过削减土地的肥力，获得基于地主的损失的一些好处。

产当中这种暂时租很常见,它在我们下面的讨论中还将发挥重要作用。

有一点对于我们的分析非常重要,必须加以强调:租是资产所有者获得的好处,不包含在使得资产投入使用所需要的成本内。如果竞争性的报酬足以使地主愿意让农民使用他的土地,那么根本上来说任何多出的报酬都是不必要的。多出的部分是无本之利。对农民来说,降低,或者清除租(如果可能的话)具有很明显的好处。对地主来说,相应的,维持租有同等的好处。因此租产生了对抗性利益。特定种类的租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及社会变迁尤其重要。这些特定的租是持久的,来源于对生产性资产的持久性产权,它们导致优势和劣势的明显分野。这正是阶级形成的基础:资产所有者要保护他们的产权,而非所有者则试图消灭它。

总而言之,从作为生活条件的阶级的意义上来说,个人的总财产,定义为所控制的资产,决定她的生活条件,因此决定她的阶级位置。下面还将论述到:生活条件等后果不仅仅取决于总财产,还取决于财产回报随时间的变动(这决定了财产价值随时间的变动)。总财产的一部分可能产生以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收益。如果资产各种属性的所有权的分配采取另外的形式,这些他人的收益会得到改善。这些“生租”的部分则界定了剥削阶级。下文中将进一步阐述这些想法:以个人总财产界定生活条件意义上的阶级,同时将剥削阶级的概念建立在拥有对生租资产的收益权的基础之上。

四、财产和生活条件意义上的阶级

如上文提到的,大量研究表明生活条件意义上的阶级能够强

有力的预测各种结果①。但是关于这些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讨论却少得多。当然,有关社会化的丰富文献说明阶级与重要的社会化差异有关。确实,价值观、生活方式具有阶级间的差异。但是,这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步。到底是与阶级生活条件有关的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

我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阶级成员的长期财产(lifetime wealth)以及财产收益的预期变动。大量证据表明,当阶级间在资源种类或者财产间的异质性越大的时候,社会阶级则能解释越多的生活结果差异。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考虑的不是截面的收入分布,而是长期的财产状况,是后者决定了经济学家所称的永久性收入(permanent income)和消费模式(consumption pattern)。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会将她的生活方式根据青年时期的收入定位,而是根据与她的人力资本相称的长期预期生活条件定位。

再者,财产收益的差异非常重要,尤其对于阶级间不同的社会化模式而言。一个早期的研究文献发现社会阶级和所谓的“延迟满足的能力”间有强相关(参看 Schnerder and Lysgaard,1953)。70 年代这个研究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因为它被视作有“怪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意图。最近,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同一现象做出了不同解释(参看 Ainslie,1992)。人们通常以非常高的比率贴现(discount)未来的回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阶级或者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人们在时间感(time orientation)方面存

① 用社会经济地位(SES)做自变量的很多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富裕程度”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地位(Goldthorpe and Hope,1974)似乎反映了生活条件与职业间的联系,社会经济地位由人们占有的财产来衡量。戈德索普等的阶级方案和社会经济地位衡量的阶级地位没有根本区别,除了前者是非连续的测量,可能更有利于描述社会经济地位所忽略的非线性的差异。但如果将社会经济地位分组,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生活条件的定类变量。关于非连续的阶级方案是否失掉一些社会经济的效应,学术界仍有争论 (Hout and Hauser,1992)。

在明显差异。相对于处于较高社会经济水平的人们，处于较低社会经济水平的人们有能力对其人生进行规划的时间跨度（time horizon）短很多。具有高贴现率的人们在他们的健康和教育上的投资很少，对孩子亦如此。

阶级间时间感或延迟满意度的差异反映了生活条件的不确定性，即回报的差异。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受害人”的错，而是一种对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性收益的理性反应①。对不确定性投资的银行也会收取高额利息——银行通常都被假定为理性行动者。总资源水平越低，不确定性对人们投资自身和孩子的影响更大。资源越少，能起缓冲作用的则更少。

一个人的总财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个人的、人力的和身体财产，这些中的大多数是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在家庭或学校中获得的，一些是通过在职培训获得；另一部分则是在雇佣关系中获得的财产。

财产的个人部分独立于行动者的雇佣关系而存在，它有几个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的多少尤其重要，它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健康而获得。在这当中可能存在一些能够寻租的技能。

最后，财产的数量很明显取决于由家庭背景提供的身体天赋。身体天赋还能通过后天的独立于劳动力市场卷入的创业努力和投资得到增强。天赋的差异产生人力资本投资动机。这些差异合起来则解释了戈德索普阶级方案倍加强调的非垂直性，比如说，农民的生活条件。个人财产的这一部分很明显是整个阶级结构分析的核心要素。

个人还能从雇佣关系中获得财产。他们可能有机会获得能够

---

① 在最近的人口研究中可以找到证据（Dominitz and Manski，1997）：人们的不安全感在不同人口特征的群体中有差异，尤其当研究者从财产的分布和财产收益的差异的角度来进行预测的时候，这种不安全感的差异更明显。

增加人力资本的在职培训。在工作中获得的那一部分人力资本对于这个工作和公司来说可能具有专有性，这便赋予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由于占有专有性人力资本或者参与集体行动，工人可能获得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因此增加劳动力资产的价值，即获得了租。在这种条件下，与竞争性市场中的开放的雇佣关系相比较而言，雇佣关系则成为封闭性的。由此导致的雇佣关系的延长对回报的变动至关重要，因此对财产差异的后果来说亦如是，因为雇佣关系越短，财产回报的差异则越大。雇佣关系的持久对于从关系中获得的财产来说亦不可缺。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处在稳定雇佣关系中的人们对自身和孩子的投资要多于那些处于相对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中的人们。拥有大量人力资本并处于稳定雇佣关系的专业人员应当是对自身和孩子投资最多的。因此，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称为"服务阶级"的那些人在给孩子提供有保障的将来方面做得尤其成功。即使这个想法没有经过严密专业的验证，但关于社会流动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大量研究都证实了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且处在持久的雇佣关系中的专业人员具有保障子代获得成功的能力。

五、财产、租和剥削

发展剥削理论的关键在于界定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经济产权的持有者以非持有者的损失为代价而获得好处。上述通过获得经济性生租资产的所有权而实现财产转化的过程则很好地解释了剥削的机制。

租的概念符合关于不平等的结构理论的要求。租产生于与生租性资产所有权有关的社会关系（基于自然天赋的租是一个鲜明例外，下文将另做讨论）。优势的剥削阶级是处在社会结构中的这

样一些社会位置：个人被赋予生租性资产或其属性的控制权或经济产权。弱势的被剥削阶级则被定义为缺乏这些权利①。改变生租性资产的产权关系会改变财产的分配从而改变阶级结构。

生租性资产的拥有者能够从持续的利益流中获益，而那些没有获益的人们则能够从获取资产所有权中获益，抑或通过摧毁产生租的社会组织而获益。当行动者为自身利益而行动时，他们会建立社会组织和发起一系列社会过程来保护或者摧毁租的收益。新韦伯主义者对这些安排做过出色论述。这些过程包括封闭(closure)以及侵占(usurpation，Parkin，1979)，它们同时也是从认知阶级利益到阶级意识觉醒、从而采取阶级行动实现利益的过程(Giddens，1973)。阶级行动的展开不仅要求成员有阶级归属感，而且阶级利益必须是持久的。

临时租和持久租的区分对分析阶级形成过程尤为重要。阶级形成不仅取决于产生对抗性利益的结构性位置上的成员的稳定性(如戈德索普和吉登斯指出的)，还取决于租产生的优势劣势间的转换速度。这直接意味着封建主义制度下的结构性冲突和阶级斗争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普遍，这是因为封建主义制度下的租更为恒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发生过革命即可为证。

租之收益的时间分布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横向不平等(cross-sectional inequality)并不必然表示持久租会带来长期优势。举个例子，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较高教育水平人群的高收入是

---

① Wright(1997)对剥削的定义与此相关，虽然他的定义并没有使用“租”这个概念。除了对阶级间优势和弱势的因果联系做了阐明，赖特还指出剥削的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优势阶级依赖弱势阶级的成果和劳动才成为他们所是。因此欧洲殖民者驱逐美洲土著并不是剥削，因为他们并没有依赖美洲土著而获得好处，他们所谓的是“非剥削性的经济压迫”(Wright，1997，p. 11)。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显然产生了足以引起冲突的对抗性利益，所以劳动成果和劳动力通过什么条件转化成剥削品仍不甚明了。

对高昂培训成本的一种补偿，并不会产生持续一生的优势。因此，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阐述的机制，获得技能并不能产生租，因此也不会形成阶级。这就是新阶级理论普遍忽视的地方。新阶级理论认为一个基于技术和教育的新阶级已经出现（Gouldner，1979；Konrad and Szélenyi，1979）。当然，教育产生租，但是以往所用的教育成就的测量（如 Wright 的阶级方案）并不能将租和人力资本回报分离开来。教育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将于下文深入探讨。

围绕生租资产产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的类型根据所考察的资产类型而相异。封建制度便可看做为了分配土地租的收益而建立的精巧组织设计；重商主义是与工业生产相适应的制度安排的延伸。马歇尔定义了现代工业社会三种类型的租：（1）垄断租，基于对某项资产供给的垄断，比如说一家有线电视公司从地方政府那儿获得发送电视信号的垄断权；（2）复合租，生产性租或资产专用性的独特组合，如一个工人获得的仅限于某个特定岗位的技能；（3）基于天然禀赋的租，如专业篮球队员的弹跳能力和接球能力。下面将一一讨论每种租的属性。

1. 垄断租

对生产的人为或者社会限制产生垄断租。垄断可能以很自然的姿态出现，因为规模收益的增长使得其他人进入生产的成本非常昂贵，如汽车生产业。通常垄断还能产生于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和专利。最后，规范某物生产的协会类组织——如商会和工业协会——也会产生垄断。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产品供给对价格不敏感，租将会出现并一直持续到垄断被打破。

为了使阐述更加清晰，我们假定垄断者的生产条件中，规模收益是个常数，所以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但是当前的论证过程的关键点都不依赖于此假设。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产出和价格分别为 q_c 和 p_c，价格随着产品成本相应变动。垄断者能够以高于

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p_c的价格 p_m要价。这会引起单位产出收入的增加，所增加的收入归于生产者，所增加的收入便是租——高出使生产行为发生所必须价格的部分。除了产生租以及相应的增加不平等外，垄断还减少了社会财富，因为在 p_m的价格水平下产出更少了。这就是垄断租所产生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它是一种社会财富的损失，社会资源的浪费。

当然，垄断收入的增加是其他人也想要的好处。如果其他人因此而成功进入市场，那么所导致的竞争最终会消除垄断租，使价格降至 p_c，供给增至 q_c。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对最初的生产者来说，暂时优势是一种准租。

这种情况假定其他人能够进入生产领域。如果生产技术、政府或者商会产生了高昂的进入成本，那么竞争则会围绕获取垄断权而展开。这种类型的竞争则为典型的寻租，即为了争夺生租资产的零和竞争。试图获取生租资产或资源所投入的努力与成本当然会减少垄断的收益。确实，想获取垄断权的人们会愿意支付同等的成本来得到它，所以租的收益完全消失了。寻租的成本并没有增加社会产出，因此也是资源浪费(Tullock，1980)，除“无谓损失”之外的又一种浪费。

寻租的性质取决于垄断权是否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如果能，那么这笔买卖可能会引起一大笔财产向第一个垄断权所有者转移，而下一个买主并不会意识到租的存在。比如说，农民通过农业补贴的形式获得的租提高了土地的价值，随之提高的还有需要支付的报酬，这就消除了初始优势。一旦确立，产生租的垄断则很难消除，即使垄断完全被资本化或者租已经消失了亦如此。很明显新的所有者有强烈的兴趣获得他们曾经为之支付的租，即使他们的优势已经消失了。塔洛克(Tullock，1980)曾经举过一个出租车奖章制度的例子，与纽约市的那个例子相仿。奖章被卖掉，给初

始拥有者带来了巨大收益，但是对于接下来的所有者则只有普通收益率。它们的存在给消费者带来了福利损失。削减这种损失只能通过取消对出租车驾驶的限制，而这样做基本上不可能不损失当前奖章拥有者的利益。

劳动力市场的垄断租的形式多种多样。由于工会集体行动，或政府认可的专业证书，或者其他职业证书使得职业和工作岗位对行业/组织外部人员不开放的时候，职业租(employment rent)便产生了①。工会开办只雇用工会会员的企业，或者通过类似学徒制而分配工作岗位的时候，也会产生租。当工会引入平均工资制度，给予生产率最低者市场工资水平时，这将显著改变租的分配(相关证明请参看 Freeman and Medoff，1984)。职业协会也能产生租——当他们仅仅向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们开放就业机会；或者当他们通过控制教育机构而控制职业招聘时。医学院即是明例。总的来说，教育资格证书，作为职业筛选工具，或者作为进入职业专业教育的途径，为持有它的人带来了垄断租。下文还将进一步讨论资格证书。

职业租引起的寻租行为其实是一种针对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的零和竞争(Hirsch，1976)，我称为“空缺竞争”(vacancy competition，Sørensen，1983)。专业租不只是一种垄断租。职业位置在没有工会和职业协会的作用下也可能是闭合的。在内部劳动力市场，职位的闭合并不需要集体的共识，因为资产专用性产生的复合租的存在也能产生闭合，尤其是一些专业技能，下文将继续讨论。

垄断租的重要性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前所述，租产生

① Bowles 和 Gintis(1990)用“职业租”这个术语来定义效率工资：即为了引导工作努力而设置的高于市场的工资，下面将加以讨论。

的无谓损失是一种外部性(externality),减少了社会福利。科斯(Coase)就外部性提出了另外一种竞争性的观点。科斯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化的经济系统中(此假设更有利于发展理论),产权的配置能够消除外部性——包括那些由垄断租产生的外部性。其中一个例子是在土地上吃草的牛践踏了玉米。通常认为牛的主人应当对种玉米的农民的损失负责,但是科斯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是非对称的。关键问题是避免践踏的成本是否高于修筑篱笆或赶走牛群的成本。理性行动者会比较这些成本,进而就修筑篱笆的成本进行讨价还价,这便可以消除外部性。将此思路应用于租的情况,则意味着生租资产的非所有者应当与所有者达成协议,作为不消除垄断的补偿。这样在一个竞争性经济体中长时期存在那些能够保持效率而又不产生垄断租的制度(包括那些看起来产生垄断租的制度)。

垄断产生的收益通常要比给他人造成的损失要小。因此科斯谈判能够消除福利损失,通过废除垄断,产出的增长会产生竞争性状态。尽管如此,如果寻租成本由垄断者承担,他的损失之大会使他需要获取对这些成本的补偿。这比较难以实现,如前文所述。因此,当寻租成本高昂时,垄断租会持续存在,如之前的寻租文献中指出的那样(如 Tullock,1989)。

就算不考虑寻租成本的问题,当科斯理论应用于更多种类的行动者的时候,仍然存在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由迪西特和奥尔森提出(Dixit and Olson,1996)。科斯在阐述双方对称性讨价还价的想法时所假定的个人理性,并不一定产生所要求的集体理性,尤其当事人一方是一大群弱势的行动者时。这里存在为减少组织内“搭便车”行为所产生的大额交易成本(Olson,1965),迪西特和奥尔森(Dixit and Olson,1996)指出即使不存在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的单位收益(大规模群体的单个成员的平均收益)非常之

小，以致集体行动不会发生。这些组织问题正是阶级形成文献所关心的，或者说应该关心的。社会运动的文献中，关注这些问题的很多。当利益足以导致行动的发生时，研究者都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集体行动等问题上。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文献却与新韦伯主义者所发展的阶级形成的文献分离开来。

2. 复合租或资产专用性租

两种独立资产或资源对彼此来说如此特殊，以致对它们的联合使用的报酬超出了任何一种资源单独使用的报酬，这时候便产生了复合租。马歇尔关于复合租的一个绝佳案例是所有者和占据有利市场位置的雇员之间的联合优势（Marshall，1949[1920]）。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建在溪水上的磨坊，这给磨坊主和溪水主人带来了联合租。如果磨坊的选址只有一个选择的话，那么磨坊主的租和水源所有者的租则无法分离："它们的价值超过该地基用于其他场合时所具有的价值的差额，其中有多少归地主所有，只能用'协议'的方法加以解决。"（马歇尔著、陈良壁译：《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35 页——译者注）（Marshall，1949[1920]，p. 520）

复合租产生于被交易成本的研究者们所称作的资产专用性。比如说，当工人获得特定职业培训，从而使他在某家公司的生产率高于另一家（Becker，1964），这时候就会产生复合租。此外，监管和代理问题也可能产生复合租。如果工人和公司的匹配被解除，产生联合优势的复合租则会消失，因此为了避免这种阻断，雇佣关系会闭合起来。针对这些问题有两类解决途径。

第一类是通过组织生产消除复合租，这时交易成本问题消失了，雇佣关系变得开放。这便意味着不使用产生联合租的专有技能。这里的去技术化是指消除对专有技能的需要，与去技术化的初始含义相异。后者由布雷弗曼（Braverman）发展得更加明晰，它

暗指资本主义将消除对劳动力市场中所有技能的需要。虽然经过多番尝试,学者们并没有发现去技术化的趋势,况且,雇主将不可避免地通过降低总技术水平而获得收益——这在理论上也说不通。但是,较少专业在职培训所带来的复合租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策略。

第二类方法是降低复合租的重要性,而非破坏封闭的雇佣关系。这可以通过增加效能的组织设计实现。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大量组织学研究提供了增加公司复合租持有比重的组织解决方案。其中卓有成效的方法是建立激励工作效能的晋职计划。该计划利用了工人工作效能间的相互依赖性。这种效能产生于针对职业阶梯工资收入这种地位商品的零和竞争。

职业晋升阶梯产生横向不平等(cross-sectional inequality)。赖特的阶级方案将这种不平等归为由权威关系而产生的阶级。但是,根据延期付款(deferred payment)理论(Lazear,1995),晋升阶梯的设计使得职业生涯初期的工资低于市场工资——这通过培训加以合法化,到了职业生涯后期高于市场工资。这种制度形式使工人依附于公司,并且使得复合租得以维持:工人在职业晋升系统中的资历决定了她获得正租还是负租。这并不意味着以整个一生来看工人将获得剩余。因为考虑到教育投资,横向的分配并不能反映长期优势。如果晋升阶梯如期运行,那么它们既能够激励效能,又能为雇主获取复合租,这与权力结果的解释路径迥然相异。

将晋职制度看做夺租(rent-capturing)制度的解释还意味着:雇主有拖欠工人在职业末期可获得的正租的动机——当正租出现时就解雇工人。这样做会给私营企业带来声誉问题,但如果很多企业参与这种共谋行动,那么声誉问题就不存在了。

激励工资制度是激发效能和获取大份额复合租的另一种手

段。通过付给雇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企业能够提高效能，因为出于失去工作的担忧，工人们不大会选择偷懒①。赖特(Wright，1979)用效率工资来解释“半自主”雇主的收入优势②。他最近的阶级方案提出了一个对管理者的工资优势的相似解释，称为“忠诚租”。效率工资被克鲁格和萨默斯(Krueger and Summers，1987)用于解释产业间无法归结为不可测量的工人特征或补贴的持续性的工资差异。

3. 自然天赋租和文化禀赋租

马歇尔(1949[1920])认为租产生于生来有之的“天赐礼物”，这种天然禀赋又导致生产具有旺盛需求产品的能力。当某些特定项目(如篮球运动员的身高)所需要的身体特征源于基因时，租则直接反映基因禀赋。或者，当个人禀赋有利于特定的技能培训(如学术成就)时，租则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在后一种情况中，禀赋不一定是来自基因的。文化禀赋对学习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对那些不在指定的文化中社会化的人们，或者对那些缺乏所需要的文化资本的人们来说，习得这种禀赋本身就是非常难的事情(Bourdieu and Passeron，1990[1970])。文化资本因此可被看做类似于基因天赋的租的来源之一。

将个人禀赋产生的租作为结构性不平等的来源之一似乎自相矛盾。这是因为这些租具有与阶级分析相关的重要社会影响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然天赋和文化禀赋所产生的租对资格证书

---

① Bowles and Gintis(1990)将效率工资的产生看做“竞争性交易”(contested exchange)的结果，竞争性交易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的资产所产生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② 效率工资理论提供了对非自愿失业的一种解释(Solow，1979)。工资优势使失业成为一种规训手段，因为失业后的工人通常只能得到竞争性工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高度集中产业中的失业更加频繁，如汽车业和钢铁业——与经验证据相一致。

③ 基于个人禀赋的租所具有的其他社会含义请参看 Sørensen(1996)。

的出现具有重要影响。

在很多职业当中一般意义上的才能就能产生较高的生产率和较高的工资。同时较高的生产率还能通过培训获得。假定生产能力强且未经过培训的工人和能力稍差但接受了培训的工人拿同样的工资，那么能力稍差的人们所支付的培训成本对能者来说则是一项剩余。随着对资格证书需求的扩大——即对教育的需求的增长，越有才能的人获得的租则越大。其他人因此寻求更多的教育，拿更高更昂贵的教育资格证书。这种自我激励式的需求是"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研究的主题。大额的租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提高学费的动机。因此他们也参与了分享由文凭主义产生的租。这些租允许教育机构聘请名师来培训容易被教化的学生，从而提高教育机构的名声，进一步提高他们所授予的文凭的租①。

那些拥有高文凭的人们希望把这种优势传递给他们的子代。通过赋予子代与培训相关的文化资本而使这个过程更为容易。但是，文凭的存在仍然十分重要。当然有高文凭的人们不能替子代获得卓越能力，但是通过提供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途径，仍然很有希望为子代赢得一张值钱的教育资格证书。没有这些资格证书，来自较高社会地位家庭但能力稍差的孩子可能不得不与来自卑微家庭的更有才能的孩子们竞争重要岗位。通过资格证书得到加强的职业垄断能够保护来自高地位家庭的能力稍差者，使其免于在与来自较低地位家庭的更有才能者的竞争中落马。文凭因此提高了高地位群体将自身优势传递到能力稍差的下一代的能力，或者为更有才能的下一代的优势锦上添花。高地位群体具有强烈动机设立文凭壁垒，正如新韦伯主义者所强调的(Parkin，1979；Murphy，1988)。

---

① 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总的来说，由个人禀赋产生的租意味着：通过教育扩招增加教育机会的平等性会增加由自然和文化禀赋产生的租。这些政策因此得到了那些已经获得可观的个人禀赋租的人们的支持，如教授①。

六、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阶级和集体行动

寻租活动为影响政府的日常事务和福利政策提供了斡旋空间。社会运动发起者通过赋予弱势者租而游说政府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大公司则通过赞助竞选活动以游说政府制定有利于提高大公司的租的法规政策。租有时候使得不同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处于对立状态——当土地所有者和工业生产性资产所有者发生冲突时，他们会联合工人和资本家维护为某些企业或产业带来租的进口规定和贸易壁垒。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行动与寻租有关。保护生租资产产权的阶级行动与 19 世纪晚期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所想到的阶级行动具有不同的含义。在马克思的概念里，要产生阶级优势垄断和资产专用性并不是必须条件。攫取劳动剩余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这揭示出资本主义无休止地追求即使一直下降的利润率的本质特征。尽管如此，当劳动剩余价值理论被摒弃后，资本主义生产中永远存在着隐蔽形式的剩余——马克思正是这样构想的——这个观点则不可能得到支持。主要的阶级行动将是寻租、维护现有租和消灭租。

至于寻租、维护租和消灭租是否能够延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

① 过去工人阶级政党确实对平等化教育机会的政策提出过质疑（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请参看 Erickson and Jönsson，1996）。

义发展的宏伟设想，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动力机制则是通过技术革新、发展生产以及利用广告创造需求来获得生租资产。无休止地追逐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利益——通过企业公司的重组，以收购兼并或撤资的形式——亦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些过程产生的是一种准租，通常很快会被竞争消除掉。私人资本家因此有得有失，有时候能够获得大笔财富。虽然他们的财富来自准租，但不会随着准租的消失而受到损害。随着这个过程出现的是市场的扩张和全球化——这已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了。

持久租的出现需要私人资本所有者采取集体行动。资本家集体行动的主要形式便是建立卡特尔。当然卡特尔的建立很可能受到政府反托拉斯法的阻碍。尽管如此，卡特尔依然可能通过董事会之间各种各样的网络组织而产生实际作用，但是破坏协议的动机随时都存在。获得持久租的更有效的方法是从国家那儿寻求庇护以维持租带来的好处：通过颁发许可证或者其他阻止竞争者进入的形式。一大批说客都试图获得这种优势，而向立法者陈述采取他们所希望的行动的影响和好处。国家需要产生垄断租的理由是相关法规能够给民众带来公共利益，否则这些利益将付诸东流：如称职的医生、安全的汽车等。

马克思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构想是否能够用基于租的剥削阶级的概念加以延续呢？马克思过于悲观的预测通常被引用作为对他的理论进行修正的主要理由。马克思认为随着剥削的加剧，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也会随着增长——自马克思写作的时代后，经济的增长否决了这个观点。很长一段时间，在大多数国家还出现了相对不平等的减少。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又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自那之后，只增不减。然而，这并不足以支持马克思关于日益加剧的两极

分化和工人阶级的同质化趋势的观点。尽管如此，最近的大量研究文献表明资本能够轻而易举消除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以租的形式获得的优势。这加剧了不平等的增长。

资本将得益于消灭劳动力市场的垄断租，提高复合租的持有份额或消灭复合租的根源。当资本家从生产效率的增长中获利的时候，消灭劳动力市场的租就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而当他的财富取决于对他的生产效率的评估时，资本家则能得到进一步的好处。股票市场能够提供这种评估。在不平等增长的那段时期，股票市场亦大幅度增加了股东的财产，同时使得消灭劳动力市场的租成为卓有回报的事情。消灭租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每一种都增加了不平等：(1) 消灭通过工会集体行动产生的租；(2) 消灭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租和复合租；(3) 贬低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

工会以两种方式产生租。他们为受到工会合同保护的工人提供工资溢价。当雇主试图躲开工会时，非工会成员的工人也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些具有高度熟练技术的工人则能获得更多好处。如弗里曼和梅多夫(Freeman and Medoff，1984)所言，即使工会确实能够带来利益，这种租也是极其微薄的。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减少工资不平等。工会在减少生产率不等的工人间的工资差异方面尤其在行。所以说，工会为低技术，或曰低生产率工人，创造了大量的租。

工会权力的式微是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变化之一。这种式微不仅表现在工人中工会成员的数量锐减，还体现在工会增加工资和维持谈判协定的能力的下降。工会成员的数量从非农劳动力的1/3 减少到现在的 16%。工会对工资结构的影响远远胜过会员数对后者的影响(Mitchell，1985)。尽管如此，随着会员数目的减少，工会权力也衰落了。这明显体现在妥协次数的增多、罢工次数的减少以及工会要求的缓和(Mitchell，1985)。关于这些趋势如何增

长了不平等，请参看福廷和勒米厄(Fortin and Lemieux，1997)。他们还指出放松对高度密集型产业的管制消除了这些产业中工人和企业获得的复合租。

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产业中，内部劳动力市场中，以及传统上没有被工会组织化的工人群体中(如白领群体)，封闭的雇佣关系和复合租则普遍存在。这些场合中的复合租则通过解雇手段而被消灭了。不能撤销的解雇降低了工作的稳定性，但并不一定降低就业率。尽管如此，失去工作稳定性意味着工人同时要失掉他所获得的任何形式的租。人们在有了工作稳定性的保障的情况下工作通常是做得最差的。如果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出现，他可以换掉工作。而换工作的时间与生产率的增长并无必然联系。因此一个封闭的雇佣关系体系，如内部劳动力市场，产生的职业类型则反映了只有租增加，而不提高生产率。这些职业结构常常被裁员措施所破坏。

在过去的 15 年中，美国的总解雇人数从 1979 的 120 万增长到 1980 的 140 万，到了 1993 这个数字增加到 340 万。1982 年解雇人数为 262 万，20 世纪 80 年代从那以后这个数字从未跌破过 200 万。而 1991 年经济衰退期间又出现抬头，从此则保持稳定态势。在所有解雇人员数目中，白领工人的比重显著增长至近 40%(劳工统计局 BLS，1998)。在裁员和公司股票业绩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强的联系，这暗指金融市场迫使企业采取裁员措施，很多案例中确实显示了这一点(Love，1997)。

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相联系的复合租也会随着工作重组和生产技术的其他变动而消失。或者说，通过外包和分包业务消除劳方的资产专用性，从而消灭复合租。关于这些变动的讨论有很多，其中包括资方如何支持新型雇佣关系的演进。

因裁员和工作重组而消失的雇佣租通常意味着工人被迫到劳

动力市场中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且并没有多少选择工作种类的余地。这表示裁员后的新工作很可能要比前一个工作差。同时，这也意味着新岗位上裁员工人的生产效率和工资的匹配形式很可能不同于前任工作。于是，撤换职位会使得个人的实际生产效率与工资水平更紧密的挂钩。有证据表明与1970s相比，1980s工资和生产率具有更紧密的联系（Levy and Murnane，1992；Mitchell，1985）。之后霍尔泽（Holzer，1990）发现了一个比梅多夫和亚伯拉罕（Medoff and Abraham，1981）所著述的更佳的匹配模式，但是这两个研究不具有可比性。尤恩，墨菲和皮尔斯（Juhn，Murphy and Pierce，1993）的研究发现不可测量的技能之回报的增长带来了不平等的增加。

我们还注意到行业内的不平等的显著增长，这与工资和个人禀赋强烈相关的观点相吻合。这个现象在所有行业都存在，但在管理者和销售人员这一行尤其明显。事实上，所有男性的总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15上升到1989年的0.332，但是管理者和销售人员合计的同期基尼系数从0.322上升到0.353。其他所有职业合计的基尼系数从0.302上升到0.312（Ryscavage and Henle，1990，p. 11）。不平等的增长使得结构性位置在解释收入差异方面不那么重要了①。

不平等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高薪酬工人收入的增长以及其他人工资水平的停滞或下降。租的破坏导致了工资水平的停滞和下降。高薪者收入的增长来自于资本分享的租，工资的增长由于以下理由而正当化：20世纪70年代顶级管理者获得的工资太低，以致他们没有足够的激励做到最好，特别是他们会纵容其他雇员

① 大量有关加拿大的研究表明工资不平等的增长使得“结构性”特征或者职业特征的重要性下降了（Myles，Picot and Wannell，1988）。

寻租(参看 Jensen and Murphy,1990)。

股票市场的估值对这种局面的改变非常重要。另一种提升管理者激励的机制是通过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outs)迫使管理者尽力排除企业懈怠以偿还收购债务。杠杆收购能让顶级管理者变得更加富有。最后,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增加优秀管理者的租,董事会认为这些强硬的管理者具有他们所需要的能力。

最近,最低工资实际价值的下降亦减少了生产率较低的工人的雇佣租。由于最低工资的存在这些工人获得了高于他们的竞争性工资的报酬。这产生了更多的贫困,因为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保证竞争性工资必须高于贫困线。劳动力市场租的破坏——也许不应该包括高薪管理人员——使得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流畅,因为大多数人们没有什么优势或特权需要维护。结果是结构性减少,即位置性不平等更少,而总体上的不平等增加了。因此,即使最近的趋势不会导致更大程度的同质化,但是租的破坏产生了一个较少结构性回报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将它与结构性优势联系起来,工人阶级的同质化的观点或许能够得到支持。结构性优势指的是工资收入较少取决于个人禀赋而更多依赖于职业选择和集体行动。

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产生良好的生活条件。现代社会,要为人口中最穷困的那一部分人们提供像样的生活,一些租是必要的。这些租由国家通过收入补贴和其他福利品的方式发给穷人。现代福利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但是同时为所有人都提供了寻租竞争的平台,其中包括那些强大的利益集团所在的中间阶层。对福利国家中的寻租和护租活动的探讨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在另一篇文章里(Sørensen,1998),我探讨了福利品供给的传统规范的崩溃以及其导致的寻租机会的增长。

七、结论

阶级概念的合理基础应该建立在产生经济收益的资产和资源的产权上。我们应该从广义上构想产权的概念。它们是直接获得或者通过交易间接获得某种资产回报的能力，即经济产权（Barzel，1997）。有些产权受到国家支持，因为是法定权利，但是人们仍然能够从非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权利中获得好处。产权限定了行动者所拥有的财产种类和数量，因此我认为“生活条件意义上的阶级”实际上反映的是个人所拥有的总财产。财产的一部分可能是产生收益和报酬的资产，或曰生租资产。租的分配则产生了可能从事集体行动的剥削阶级。

分析人们的态度、行为和社会化类型如何随着社会结构位置的不同而变化时，生活条件意义上的阶级是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一个出色的例子就是戈德索普提出的阶级概念（Goldthorpe，1987；亦可参看 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本文构建阶级方案的主要目的就是界定在总财产、财产种类以及财产的时间变动性方面呈现同质性的群体，并以此解释生活条件的差异。依此可推测，这些群体在自身和子女身上的投资数量和种类会呈现显著差异。因此我们得出的阶级方案包括非垂直性的维度：它反映的是人们占有的财产种类和时间变动性，后者一般产生于雇佣关系的稳定性与否。

本文中的阶级提案克服了韦伯主义和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中一直被诟病的问题：没有说明人们为什么应当对当前的社会地位感到不快从而参与到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去。持久租确立了对抗性利益。那些没有拥有生租资产的人们则需要忍受租所导致的不利地位。消灭租使得非生产性资产拥有者获利，而租的接受者则能

从维护他们的优势地位中获利。作者在本文中展示的方案则提供了一些洞见。准租的概念表明垄断租通常是暂时性的，与之相联系的利益不能持久。因此，不仅结构性位置成员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对阶级形成颇为重要，而且租带来的好处随时间的变动对预测阶级形成亦相当重要。租为文凭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由于后代能力的不确定性，文凭被用作维持和传递代际优势的手段。

基于租的剥削阶级概念为最近出现的收入不平等的增长以及消灭劳动力市场租的裁员措施提供了解释。

阶级行动主要是行动者围绕寻租、保护寻租特权以及消灭结构性位置上的租——如内部劳动力市场——采取的活动。此论点意味着：一个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劳动力市场于资本家阶级有利。在过去的几十年，资本主义在消除劳工的租方面做得很成功，这一点本文已经加以说明。消灭租产生了一个更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一个较少结构性而更流畅的市场。一般的阶级方案越来越不能适用于解释一个无租的劳动力市场。租的消灭产生了更多的劳动力市场的内部不平等，而给拥有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财富——比如资本家——不管他们是旧世家、新兴企业家、养老金管理者或者是拥有共同基金的大学毕业生。随之出现的社会与马克思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预测相吻合："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Marx，1959[1848]，p. 323)。

因此，基于租的阶级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预测是：劳动力市场当中，结构性位置上的租终将消失。一个结构化水平更低的社会将因此产生，我们一直所讨论的社会结构将没有藏身之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则消失得很慢。这导致了财富

向拥有生租资产的人们的转移,即使这些资产仅能产生准租——准租所产生的财富并不会随着租的消失而消失。财产不平等由此而增长(Wolff,1995)。

如果将马克思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宏伟设想用租的分配的思路加以解释,前者仍然能够站得住脚。寻租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劳动力市场租的消除则产生了一个具有结构上的同质性的工人阶级,即,一个福利没有结构性保障的工人阶级。

译者:赵勇①(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① 赵勇: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家庭社会学、消费者研究。

第六章
后阶级分析之基础

简·帕库尔斯基（Jan Pakulski）

当代阶级理论均为马克思主义的后裔。正如赖特在本书导论所言，他们与其古典前辈有同样的理论抱负——获得广泛的解释力。他们将不平等和产权关系、雇佣关系的类型联系起来，旨在描绘和解释不平等的结构，尤其是经济意义上的生活机会不平等。他们的学术旨趣还在于发现产生社会冲突的经济对立，特别是转型期的社会冲突。与此同时，阶级理论与各种不同的解释流派分庭抗礼，竞争者之一便是非阶级的不平等理论。后者所包含的概念和主张主要衍生自托克维尔主义、涂尔干主义和韦伯主义理论传统。非阶级的不平等理论主要包括下列理论：强调劳动分工和职业闭合的职业分层理论；从种族、性别和民族-国家等方面探寻不平等和冲突之根源的地位不平等理论；关注政治权力、组织内权威等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张力的权威理论。非阶级的不平等理

论流派和阶级理论的局部融合使得流派之争更加复杂。如本书前几章所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几经修正，阶级、职业、地位和政治权力之间清晰的分析边界开始消融。因此要权衡阶级理论和非阶级的不平等理论的优劣，一些备受争议的定义必须得到澄清。此文中的阶级，遵循以下几条假定：(1) 从根本上说，阶级是一种经济现象；(2) 它以社会"团体性"的形式呈现；(3) 阶级位置在意识、认同和对抗等方面得以呈现；(4) 阶级产生政治经济领域的集体行动——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潜在力量。

如上所述，阐述阶级理论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效度问题，即阶级理论的关键主张与经验事实的相符程度；其二是关联度问题，即凸显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等级、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能力。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关联度问题，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都受到了批评[①]。批评指出：阶级分析突显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等级、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能力正在下降。这是因为"阶级构型(class formation)"——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联合——在衰落。其他类型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对抗浮出水面，其中包括种族隔离和性别隔离、公民权的影响、政治权力的分配和精英行动的影响[②]。关联度低导致当代阶级分析和政治实践(社会运动，政党活动)绝缘，退而成为抽象的学术追求，相对经典理论前辈的强大动员能力，只能望其项背。

阶级分析的捍卫者们则争辩道：经典阶级模型需要更新和细化。埃里克・赖特、理查德・布林恩、戴维・格伦斯基和奥格・索

① 此批评见于 Pakulski and Waters (1996a,b,c),Clark and Lipset(2001)。
② 对阶级理论关联能力的最佳考验是它是否有助于阐明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历史进程：共产主义国家的形成，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败落，公民权的普及，"新社会运动"的涌现(包括公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绿色运动、少数族群权利运动)，欧洲共产主义的挫折，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

伦森等理论家均对阶级理论做了修正。这些新修正的阶级理论显示出卓越的理论前景和分析潜力。然而，理论家们仍然面临一系列的困境。第一个困境是理论身份困境，阶级架构越有效，关联性越强，它与其竞争者则越相似，尤其相似于韦伯主义的地位分层和涂尔干主义的职业分层。这种分析理论(analytic-theoretical)的变形①面临这样的质疑：褪去了关键理论要素的“阶级理论”是否还值得被称为“关于阶级的理论”。第二个困境是解释力的折中。阶级理论的主张越精细清晰，对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等级和对抗的解释能力则越弱。因此，修正后的阶级理论和非阶级的不平等理论(性别、种族、职业和政治等)经常并行竞争，阶级架构的关联性进一步受到质疑。阶级理论将何去何从？其发展不甚明朗——或者效仿竞争对手，或者湮灭。

本文的分析策略与阶级理论的拥护者们迥然相异：我主张将阶级理论纳入一个更广泛、更复杂、更多元——但是更少决定论——的展示了社会变迁历史理论图景中，而不是重新建构、更新或者“发展”阶级理论。这项工作的第一步是将“阶级”特殊化为一个历史性的分析概念。这意味着将阶级看作是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工业社会——所特有的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换言之，社会不平等的“阶级性”和阶级理论的关联度应是随着历史步伐的推进而呈现差异。不平等的“阶级性”在工业社会达到了顶峰，但随着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日趋逼近，“阶级性”正在走向衰落。当代发达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但多数不平等并非源自阶级。渐趋复杂的非阶级性质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对抗的增长，呼唤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②。

---

① 由 Waters(1991)提出，Pakulski and Waters(1996b)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② 这些框架在其他文献中有详细说明——见 Pakulski(2004)。下文中我将只概述“莫基性”的非阶级分析的主干框架。

一、阶级概念诸层面

在流行话语体系中，“阶级”是社会等级和结构性不平等的同义词；但在社会分析和学术话语体系中，“阶级”具有更加特殊和严格的含义。这些含义——阶级概念的语义层次——反映了“经典理论原型”的中心主张：

- 围绕产权和雇佣关系（阶级结构），分析其对社会不平等的形塑作用，即社会权力和生活机会（主要指收入）的分布。
- 分析阶级结构对其他社会关系的塑造和社会结构化过程中的基石作用。与之相对应，一方面是指阶级结构的形成——即阶级构型；另一方面是指“社会集聚”类型的形成。
- 分析由阶级结构形成社会对抗和公开冲突的过程。这里暗指阶级斗争不仅形塑了不同的社会政治阵营，且依然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

阶级的这些特征产生了三个问题：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关键“权力资源”的获得，即阶级与社会等级之间的相关强度如何？阶级构型的程度，即阶级和社会分化的关系强度如何？阶级对抗形塑社会冲突的程度？因此，在分析当代发达社会时，关于阶级概念的关联性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必须对“阶级构型”和“阶级冲突”的议题做出回应，而非仅仅谈谈“阶级不平等”的范围——阶级结构所引起的不平等（主要由产权和雇佣关系决定）。阶级不仅仅是阶级位置，还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对抗性集合体。

进而言之，相对非阶级的不平等理论而言，阶级决定的不平等有多显著呢？相对非阶级的社会分化（如职业、种族、民族国家），

阶级分化的强度如何？相对非阶级认同（如性别、地区、宗教），阶级认同有多强烈呢？阶级引起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发展趋势如何？主张对阶级理论进行修正的学者（如赖特）认为：阶级仍然很重要，但是它的社会政治显著性因时因地而异，通常不是特别显著。如是，若可以证实阶级的显著性不仅相对较低，而且正在下降，那么对阶级理论进行重构、修正的理由则显得不那么充分了。因此致力于发掘其他替代性的理论或许能够获得更佳的解释力。

阶级分析的替代性理论中，最常提到的莫过于韦伯主义分层传统的多维度分析、涂尔干传统的职业分化分析、托克维尔传统中关注公民社会、权力分层和精英形成的路径。虽然阶级理论家们会以其中一些主张作为修正阶级分析的跳板，但是我将说明它们作为阶级理论的替代性解释之基础时，在解释发达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对抗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社会（非阶级）分析的传统基础

在很多方面，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945[1862]）对社会不平等和它们的现代根源的想象基本上呈现了马克思的阶级图景。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阶级会出现两极化的趋势，而托克维尔则描绘出更加乐观的图景：实现平等的条件逐步推进，民主实践的扩张，以及平等主义的原则和信念的普及——这些都阻止了社会的两极化。据托克维尔所言，这种日益推进的民主化趋势反映了一系列相关社会事实：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商业和工业的扩张、富裕程度的提高、公民社会的壮大（尤其是公民组织）以及文化领域日益民主化的趋势。同时，托克维尔认为社会互动和社会流动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开放，产权的流动性增强，财产的分配更加平等。新的（民主的）社会秩序不仅仅是平等主义取向的，而且也

是个人主义取向的。个体，而非团体性质的集合体，成为倡议和提案的关注中心。而这些促进了动机、品味、兴趣和行动的个人化和大众化。平等和民主，换言之，促进了“相似性”，这种特性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均化，而非两极化。在共和民主制高唱凯歌的情况下，托克维尔预言，“追求平等的热情”将遍及人类生活和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

当代社会不平等研究者对托克维尔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共和民主制下产生的社会等级的新形式。新的社会等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第一，它是扁平化的——因为公民权的普及不仅表现在授予大众选举权，还体现为“风俗的民主化”(democracy of manners)。现代公民鄙视傲慢，并且质疑一切自我宣称的优越地位。在各个社会阶层，不拘礼节的平民作风习以为常。这促进了高度的社会流动——民主等级制度的第二个特征。在共和制的民主社会中，通过获得经济成功而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比比皆是，并广为称道。成功，它最显著的表现形式是财富，是众人钦羡不已而纷纷追逐的目标。这样的观念进一步平抑了职业地位之间的差距——这是共和等级制的第三个特征。在整个社会的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行业变得更加开放，因为绝大多数的专业技术人员成为被雇者。等级似的严格的社会分工或者被削弱了，或者完全消失了。虽然财富的不平等依然持续存在，但是他们并没有产生社会距离和社会分化。新富者们并没有因此而提升社会地位形成一个新的与他人隔绝的贵族阶级，他们也没有垄断政治特权。即使买通官员、挪用政治战利品等腐败行径依然很普遍，但是至少财富和权力在形式上得以分离。第四，等级制度的扁平化和社会距离的缩短还体现在教育的大众化和公共信息的广泛传播。学校是开放的，教育被视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渠道，而文化程度的普及形成了大众媒体传播的社会基础。这又反过来培育了表达公意和成熟的公民参与的条

件。最后，性别分化也受到了民主化趋势的影响：父权主义崩溃瓦解了，虽然婚姻生活仍然给妇女们强加了无法解除的桎梏，但是妇女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性。这使得托克维尔能够更加坚定地宣称："我认为，使父子和主仆，总的来说就是使尊卑处于平等地位的社会运动，也在提高妇女的地位，并且必将逐渐使妇女与男人平等。"（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59 页——译者注）

托克维尔还指出了实现这种进步的"平等状态"（我们称为"无阶级的不平等"）的阻碍因素。首先，即使奴隶制被废除了，种族融合的前景依然不甚乐观。而更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是：黑人对于民主的渴望会引发非正式的隔离和对抗。说得乐观一点，他预言对美洲印第安人的隔离会一直持续，与之相伴随的是其文化的逐步重构——如托克维尔反讽似地指出的——在"尊重人性法则"的名义下。其次，工人和商业精英间平等化的实现也不会一帆风顺。尽管如此，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种族的和职业的隔离也不太可能会形成具有凝聚力的集体；商业精英的流动性太大，由于竞争内部分化得太厉害，社会异质性太强，因此，商业精英很难形成一个具有内聚力的团体①。

马克思主义和托克维尔主义对现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分析分别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两张面孔，提供了分析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两种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分化标志着一种新形式的等级压迫、剥削和统治，它隐藏在"自由劳动契约"、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平等主义态度的温情面纱之下。马克思主义者备受赞扬的

① "老实说，今天虽然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因此，他们只是一伙人，而绝不是一个团体……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永久的，每时每刻都在随着利害关系而离合。"（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198 页）

地方在于：他们揭示出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暗面，并将阶级不平等归结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劳动力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托克维尔主义的洞见同样深刻：现代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正与风俗、公民地位的水平化并驾齐驱，或者说后者使前者显得不太重要。共和民主制产生了新的财富等级，但同时工业社会福利的增长填补了社会距离的鸿沟。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阶级分化，而是民主选举的政治暴君和政治上虚弱的被物质利益所困扰的居民之间的分野①。

爱弥儿·涂尔干(1933)提供了另一种阶级分析的理论图式。涂尔干将社会不平等置于社会分化的情境中来看，他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不断增长的社会互动或"道德密度"的结果。在涂尔干的眼中，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等级形式的社会功能，并不如社会等级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这个问题来得重要。在传统社会，社会等级是僵化的，并由意识形态加以正当化，在现代社会，社会等级是开放的，通常享有功能上的合法性。

涂尔干对不平等做了非常重要的区分：社会意义上可接受的不平等和强加的不平等。前者是指对工业秩序具有功能性意义，并反映集体价值观和理念的不平等。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前者反映与"神圣性"的距离：神圣性指那些特别的、禁忌的、令人生畏的观念、物体和话语。神圣领域与一个社会所珍视的普遍标准和价值观相呼应。如果社会不平等反映了这些社会价值观，它就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这种价值基础体现为与"功绩"相关：投入、勤奋和效率。相对而言，不具有合法性的不平等——包括一系列受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谴责的歧视——或者缺乏价值观基础，或者源自强制性的劳动分工(forced

① 托克维尔在"专制的民主"中分析过这种危险。

division of labor)。强制性的劳动分工是非精英阶层和特权的标签。

在涂尔干看来，由于财产的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是具有合法性的。和马克思、韦伯不同的是，涂尔干认为财产具有一种神圣宗教属性，他将所有权所带来的特权看做是财产的神圣地位的衍生，因此具有合法性。涂尔干认为，伴随着产权制度产生的具有合法性的社会排斥显示出与远古禁忌仪式清晰的联系。类似地，涂尔干把性别的等级化与远古流行的分类法——包括象征分类法——中的神圣领域联系起来，他认为这些分类学形塑了社会观念和社会距离，尤其是在“我们”和“他们”间做出区分。涂尔干对“原始分类法”的研究形成了社会人类学中研究不平等的理论基础，这一思路后来由皮埃尔·布迪厄重新启用。

同样地，涂尔干还认为政治不平等——尤其是与国家角色有关的不平等——都带有残留的神圣性，这种历史残留的合法性的来源和功能意义上的合法性同样重要。国家领导人身上通常带有部落酋长和“家长”(patre familias)所具有的神圣权威的残留色彩。同时，国家作为“社会的头脑”这一特殊角色决定其必须赋予国家精英以权威和自主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等级制度由于其功能上(社会协调)的重要性以及与神圣领域的关系而得以加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权威性职位招募候选人，或者候选人就职这些职位时，必须以一种仪式性的方式进行。即任职者必须通过展示德行、优秀的仕途经历来证明他/她胜任其位。

涂尔干对不平等的社会学研究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在于对职业等级的形式及演化的关注。社会分化(著名的“社会分工论”)被涂尔干抬高到很高的地位——它是现代化的基本进程。社会分化导致了社会等级、同业公会、阶级等社会单位的碎片化。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涂尔干预言由社会分化将导致更大的等级制集合体的碎

片化和解体、职业团体成倍涌现;职业团体间更有可能和谐相处,而不是处于冲突性的状态,这是因为行业组织和国家将使经济竞争规范化。在新的分层体系中,职业团体将处于中心位置,因为它们带来了认同、地位和物质利益。职业团体的这种中心角色将由于国家的作用而进一步加强,国家将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最重要的维护者。

根据涂尔干的说法,"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逐步盛行的个人主义也塑造了社会等级的形态,个人主义的盛行体现在越来越重视个体权利。然而,令涂尔干担忧的是,职业团体正在明显的聚合成为更大规模并具有潜在冲突的利益集团。由于它们的维系纽带是"机械团结"式的,即基于意识形态上建构的"共同利益",因而不适用于"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由此,涂尔干认为即使雇主所享有的"好处"被认为是"不正当的",阶级构型和阶级两极化也是不可能的。阶级团结的原则和社会分化的原则不相容,阶级斗争的对抗性意识形态与有机联系所形成的共存互补的意识形态相冲突①。因此,涂尔干预言:在政府规制的条件下,将会出现持续的基本上和谐(虽然总是受到失范的威胁)的职业分化,而不是阶级构型与阶级冲突。

戴维·格伦斯基(2001,p.18;本书第三章)紧随涂尔干的脚步,主张应当将职业看作现代社会等级的基本单位。大规模的类似阶级的实体只是名义上的,它们没有形成真正的、有意义的团体,而职业团体不同于此。职业是自然分化和有机社会集聚的结

① "如果某些阶级为生存所迫不得不为其他阶级服务,而其他阶级由于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就不用去服务了,尽管这些资源不一定是靠某些优先地位得来的,但后者也会对前者形成一种支配力量。换句话说,只要人类生来就有贵贱之分,就肯定会有不公平的契约。"(涂尔干著、渠敬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42页)

果。它们形成了名副其实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ies)(而不仅仅是协会),并且产生强烈的认同。职业还受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各种形式的报酬规定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职业。再者,职业还是人们施展事业抱负的主要渠道,它促进了生活方式、品味和消费的相似性。即使职业群体暂时集合成大规模的阶级,这个集合体亦会是非常脆弱的。

格伦斯基建议应当把职业看作“真正的阶级”——这是值得商榷的。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能够支持这两个术语(或概念)的融合:阶级和职业团体。格伦斯基试图建构一种涂尔干式的剥削理论(通过租的榨取),但是问题重重。格伦斯基似乎全然不顾涂尔干关于职业分化的卓越见识所基于的功能主义。这使格伦斯基远离了涂尔干社会学中职业分化的分析传统,而转向了韦伯主义式的市场闭合理论。与帕金(1979)和墨菲(1988)一样,格伦斯基主张职业团体和专家团体成为社会闭合的主导形式——这种闭合既可能是剥削性质的,也可能是自卫性质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功能分化和闭合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前者是缓和冲突的良药(减少竞争);后者则意味着冲突和压迫。只有当职业团体被看作是社会闭合的承载者时,他们才像类似于阶级的对抗性团体。因此,建构职业闭合和租金榨取的理论意味着与涂尔干理论的核心主张分道扬镳。这种偏离的理论代价就是:放弃了涂尔干主义关于职业分化的洞见,格伦斯基对职业集聚的缘由的解释力则减弱了。更进一步,他还面临经验事实上的困境,那就是(由于国家“撤销管制”而导致的)职业闭合程度的下降和发达国家里工业冲突的衰微。这些事实似乎更符合涂尔干所预期的趋势,而非衍生自闭合理论的预测。

非阶级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冲突分析的最主要的奠基人当数马克斯·韦伯,他在浩繁但非系统化的《经济与社会》(1978

[1922])中有相关注释。这些注释特别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争论口吻——“左翼韦伯主义者”和持支持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忽略了这一点。韦伯反对马克思将阶级作为席卷一切压倒一切贯彻一切的具有普适主义倾向的分析中心，分析内容包括阶级不平等、阶级剥削、阶级分化和阶级对抗。韦伯亦阐述了关于社会分层的替代性观点：在这个框架里，社会权力和生活机会由市场才能、已确立的关于荣誉的文化惯例、组织权力（尤其是在国家的分析框架下）共同形塑的结果。这几个不同的“生成机制”可能相互独立起作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平等则由占主导地位的分配原则所决定；它们也可能互相结合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社会权力和生活机会的社会不平等则呈现出复杂的等级形式。不管哪一种方式，市场、地位和权力位置很少能构成团体形成的社会基础。团体的形成还涉及包含意义的文化领域（Weber，1978 [1922]：pp. 306－307，927－939）。

韦伯和他的追随者们都令人信服地争辩道：应当坚持在理论分析上将上述三种“生成机制”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维度——阶级、地位和政党——分离开来；应当将社会分层和团体形成看做是复合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机制形成不同的社会不平等。韦伯及其信徒的这些争辩很明显的是指向试图将三种机制全部归为单一阶级概念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者，后者常常假定不平等的位置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同构性①。韦伯主义者还提醒道：认为不平等的结构、团体形成的类型、社会行动的规律具有对

① 在所有“生成机制”里，只有相对普遍、相对重要的领域对社会不平等的类型、分层的形式和整个社会的类型起重要作用。如韦伯所察：“取决于分层的主导形式”，“我们应当称为‘等级社会’而非‘阶级社会’”（Weber，1978[1922]，p. 306）。韦伯所分析过的历史上的社会类型中——除了现代西方社会——绝大多数都被其称为“等级社会”，在这些社会里，阶级不平等并不是最重要的社会不平等。

应性的假设需要谨慎对待。上述三个方面很少重合。“社会阶级”,比如说,反映的是社会流动和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壁垒,它们通常是跨阶级边界的。类似地,“地位群体”形成于生活方式和消费类型,很典型地越过了阶级分野。

和其他“经典”精英理论家一样(维弗雷多·帕累托,加塔诺·莫斯卡,罗伯特·米歇尔斯),韦伯也非常强调政治权力的集权化在塑造现代社会不平等中的重要作用。另外,他们还主张:是政治权力——尤其是现代国家的权力——为现代社会的特权提供了道德支持。权力不仅仅来自市场能力、对生产手段的控制,还越来越多地来自组织,即来自对政治统治方式的控制。因此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提升精英的地位——比如说处于大型组织顶端的紧密团结的寡头集团。即使在正式的民主制社会,精英和大众间的鸿沟也必然会持续下去,但是权力等级也可能通过采纳正式的民主程序而产生稳固的合法性。没有阶级的平等主义可能只是一个理想梦境,但是开放的政治秩序和负责任的民主精英却是有可能实现的。

韦伯的权力社会学为批判阶级分析提供了起点,同时也为寻找分析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工和社会对抗的新的路径提供了一块便捷的跳板。韦伯主义社会学中社会不平等的主要“生成结构”(generative structures)为市场/财产、公意/共识(communal)和权威关系。它们分别反映:产权和市场自由;已确立的价值观念和荣誉分配的惯例;法团科层制的力量(尤其是在国家领域)。它们一起形成了社会权力和个人生活机会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变换而呈现差异。然而,这些社会基础并不一定与社会关系形成的方式、社会集聚发生的方式、社会分工的形式以及社会对抗的形式相一致。等级制社会这些方面的事实说明:社会集聚与社会闭合、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的形成、文化距离的形成

和政治动员都是相对自主的过程——它们都嵌入在主流的意义系统之中。社会分工可能沿着阶级-市场的路径演化，也可能沿着民族的、地域性的(国家的)、政党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或者宗教的路径演化——如当代新韦伯主义者(如，Giddens，1973；Scott，1996)和社会空间理论家、差异接触理论家(如，Laumann，1973；Steward et al.，1980)所设想的那样。

三、不平等的复杂结构

社会不平等会因“生成机制”间的互动的复杂程度而呈现差异，还会由于社会联结度(social articulation)、社会团体形成的程度而呈现差异。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形成持续性的等级制的程度——也同样是因时因地而异。层级间社会联结度也是如此，这种联结一般通过共享的身份认同实现。当某个层级社会文化联结削弱了——层级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群体认同和团结削弱了，社会距离缩短了，层级间的分隔成为变动不居的了——社会不平等则会呈现出复杂地非层级的形式。这使得我们有必要检视已有的看待社会不平等、社会分隔和社会对抗的方式。这工作包括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1. 认识到生成结构的多样性

如多数分析工业社会和现代化的理论家们指出的那样，马克斯·韦伯更是特别地指出，阶级常常与不平等的其他方面相重合，相竞争(Weber，1978[1922]，pp. 306 - 307，927 - 939)。即使最关键的资源种类间能够相互转化，但是他们很少积累进而集结成一致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分隔。这是因为阶级、地位和政党衍生自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在这些方面社会资源分配的合法化遵循不同法则。阶级所依据的法则是“每个人根据财产和市场技能”获得阶

级位置。阶级位置的诉求无视地位诉求的规范，因此，阶级的形成具有革命性的社会影响。政党—权威等级制度所依据的原则是“根据每个人的职级”规定每个人的位置，即与组织权力中心的等级距离。现代国家科层制在产生这些行政级别秩序方面格外有效，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的主链。最后，地位诉求遵从的是“根据已建立的社会惯例”来区分地位等级的原则。这些地位归属的惯习很明显植根于传统之中（如对神圣文本的传统诠释，已建立的文化实践等），但是它们也随着社会意义上可见的“区隔”形式一同演化。

2. 承认教育和知识的影响

当写到早期中世纪欧洲的地位群体的时候，韦伯提到，虽然很简短，新形式的教育“文凭主义”：大学、商学院和工程学院等文凭的兴起，以及各个领域对教育证书的普遍追捧，促成了科层制和办公室当中一个特权阶层的形成。正是这些证书使得其持有者有底气追求与名门望族的联姻，并要求成为“荣誉法则”的适用者……索取“值得尊敬”的劳动报酬，而非根据工作绩效确立的薪水，索要有保障的晋升前景和养老保险，最后，宣称垄断有利的社会经济地位。

文凭的成功取决于文凭持有者维持、保护和加强其权利的能力。韦伯和他的当代信徒（尤其是哈罗尔德・帕金和弗兰克・帕金）都强调，这些文凭的种类，尤其是专家，对地位的诉求唤起了基于地位的分配原则的复兴（“根据教育文凭”规定等级位置）。但是它们对基于传统的地位诉求持质疑和对峙的立场。因此新兴的教育地位群体对待基于传统和阶级的等级诉求的态度至少是十分矛盾的——如果说不是彻头彻尾的敌意的话。因此一方面技术行业封锁经常有利于产生市场垄断，另一方面它又无视“赤裸裸的产权”。当代的专家、知识分子和管理者构成了地位类型的群体，而

非阶级。

这种当代形式的地位群体在世俗化的和法理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活动。他们反映的是机会平等和看重能力的普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意识形态与阶级准则不相容。它必须调适自己以适应地位区隔——这是社会文化学派的阶级理论家(如皮埃尔·布迪厄)、声望分层主义者(如爱德华·希尔斯)、人力资本理论家(如加里·贝克尔)和后现代主义学者们秉持的观点。教育的特殊地位(特别是获得高等教育)来自它作为"能力指标"的便捷性,而不仅仅因为它是市场技能的来源。高等教育成为基于成就和能力划分等级的普遍原则的最重要的社会表达。教育的重要性是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①。

3. 认识到公民权和民主制的影响

托克维尔对进步的"平等状态"的分析为当代公民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研究提供了一块跳板。但是刁诡的是,正如研究公民权和民主制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公民权的扩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扁平化,但是也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等级和分隔。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的直觉和韦伯的想法不谋而合,虽然托克维尔将新的"暴政"倾向与公民社会的衰微联系在一起,而韦伯则将这种倾向归罪于"表决式民主"的趋势,后者是大规模的民主化和科层制主导地位的内在要求。托克维尔主义者和韦伯主义者都将政治分层看作是横跨——有时候是盖过——传统的地位等级和经济上的阶级分隔。

韦伯在他的历史分析中认为平等主义性质的公民地位会随着西方城市和民族国家的扩张而产生,托克维尔的分析预言了这一

① 教育种类不仅仅能形成重要的地位位置,还可能成为等级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基础——对教育同质婚、交友网络、政治流动(请参阅新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的文献强有力地佐证了这一事实。

趋势。马歇尔(1950)和特纳(1990)先后对英国公民权的扩张进行了论述,公民权在覆盖面上和权利范围上都在扩张。刚开始公民权只包括基本的公民自由,后来公民权的范围扩展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尤其是社会权/福利权的加入,使得公民权成为反对“财产的权力”和“现金交易关系”的阵地,从而影响了社会不平等的格局。虽然大多数社会分析家将公民权的扩张看作平等主义趋势的缘由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指出其所具有的等级隐义。“非公民”的出现——灾民、非法移民、政治难民、被宽容但是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客籍工人——预示着一个新的公民社会的“底层阶级”的形成,并凸显了通过公民-政治排斥所塑造的新的不平等维度。

4. 承认性别和种族关系的影响

性别和民族-种族不平等的新形式值得特别的关注。这两种不平等都近似于“地位不平等”——它们都产生自传统的社会习俗,并由意识形态加以强化,再被植入长期存在的歧视性的社会实践中,尤其是在家庭领域。性别不平等通过传统的文化规范和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得以一代又一代的再生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在传统的社会中(一般是前工业国家)最明显,以及为什么阶级关系的变迁(如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并不能彻底改变它。反之,与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世俗化相联系的迅猛的去传统化过程却缩短了性别差距。

性别和民族-种族不平等继续影响公共领域,导致职业、市场分割和政治角色的“性别化”和“种族化”。但是它们很少产生性别等级或种族等级。职业和市场分割的性别化表明:社会分层的驱动力的混合化——这增添了当代社会不平等的复杂性。这种驱动力的混合化包括两种分层机制的相互渗透——这使得厘清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市场机制的扩张将市场本身变成一个“准文化”的领域。反过来,形成于市场之外领域的地位习

俗则与"市场能力"挂钩——通过工作环境中广为接受且通常视为理所当然的各种限制和便利设施而彰显地位差异。换言之,市场运作反映的是形成于市场之外的共同规范和社会关系。同时,这些规范和关系正是借效率、生产率等市场逻辑加以合法化和强化。

如上述例子所意味的,混合化不仅仅限于市场和公共关系的渗透。相似的渗透过程同样发生在市场指令系统和共同规范间。比如说,工业生产的集中趋势则是伴随着公司管理者职位而出现。公司管理者的生活机会是市场技能、等级位置和公司规模及其战略位置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当私人部门和国有部门的等级制度在共同体融合过程中互相结合时——像 20 世纪中期西欧发生的那样,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①。

四、分层和社会构型

日益增长的混合化预示着工业阶级的解体和工业社会的远离。这体现在日益复杂的等级群体的格局中——我们现在必须称为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指的是结构化的垂直类型:社会等级加社会分隔。不平等的位置集聚体通过社会相似性得以联系,通过社会距离进行分隔。它还涉及等级性质的社会集聚和闭合的过程。这些过程是可逆的;因此不平等类型的变迁既指去层级化,也可指沿着阶级路径和非阶级路径的重新层级化。

1. 社会集聚和社会闭合

在分层的过程中,社会不平等逐渐呈现某种稳定的社会等级

---

① Ralf Dahrendorf(1959)、C. Wright Mills(1951,1956)和当代精英理论家们都分析过社团精英和其管理的"白领"阶层的出现。

的形式，同时还会形成关于优等和劣等的类型化关系，制度化的融合和排斥，以及社会距离与社会亲和规则。诚然这是个度的问题，但是“适当的分层”要求社会具有一定的组织化程度，即，通过社会集聚和社会闭合形成一个相对清晰和稳定的垂直结构。如果没有这种可识别的“社会阶层”，那么谈论层化的社会则没有什么意义。

社会集聚通常指的是不平等的不同侧面相互重合以便产生社会识别；社会闭合指的是持续的社会距离和社会亲和的形成。因此阶级分层，尤其是在19世纪晚期的英国，包含了我们称为“地位篡夺”（地位贬抑）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通过阶级和传统的地位位置持续重叠和融合而实现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通过通婚实现联合则反映了这种融合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工匠和产业工人的地位被贬抑了。

追寻韦伯主义的路线，我们可以说社会阶层之间的显著区分取决于社会闭合的程度、阶层成员限制重要社会互动的能力、社会人口的闭合和代际间再生产的能力。社会闭合的最佳指标是阶层间通婚的程度和经济角色的代际连续性。不同性质的层之间（可能是阶级、地位群体，或者政治等级）的通婚则加强了社会再生产。这种再生产还可以通过社会文化惯习的形成得以实现——社会区隔和社会烙印通过惯习而获得意义并合法化（即使这种区隔从来没有被挑战过，如布迪厄所指出的）。

当代分层社会学家的关注点集中在“职业阶级”，即基于劳动技术分工、财产和雇佣关系而形成的垂直的位置集聚①。关于职业阶级的形成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细致透彻的研究。有些批评

---

① 需要注意的是地位要素亦卷入了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使得这些群体最终成为社会阶级的是群体成长的社会基础，换种说法，塑造了社会阶级的是融合-排斥的社会基础和相关动机、利益的类型（虽然很难界定，但在社会阶级构型过程中则表现为“阶级利益”）。

指出"职业阶级"的边界是可渗透的、变动不居的。当它们要实现团结的时候,很明显地遵循的是"文凭本位"的路径。尽管如此,这种文凭本位,尤其当其涉及教育文凭和成就合法化时,它遵循的是地位群体形成的逻辑(Turner,1988)。同样地,种族和民族—层级(如,美国的黑人、澳大利亚土著等)也可以看作是现代形式的等级分层的例子。它们或者与社会政治等级相贴合,或者横跨后者。当代精英和"政治阶级"则是基于政治影响力形成的等级秩序中的社会集聚①。

职业阶级的研究者们指出具有松散的垂直化组织结构的社会集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繁荣景象反映出日益增进的分化(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中心论点)侵蚀了大规模职业集团内部的同质性,如工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但是在过去这些集团非常接近于阶级,而现代职业分化如此琐碎以致不可能形成阶级。社会组织的形式似乎遵循的是渐进分化的模式——它既是技术性质的,也是社会性质的。

2. 共同体和群体

至此,我们讨论了社会形成的第一个方面:集聚和闭合。两者都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它们导致了霍尔顿(Holton, 1996)和特纳(Turner, 1996)(根据滕尼斯的经典分类)所谓的共同体(gesellschaftlich clusters)和阶层。共同体的形成则需要通过强烈的社会文化联结:即集体认同和团结的产生。这种强有力的形式很明显是通过有力的领导和组织得以实现的。当不同的社会类属达到了这种的认同和团结时——虽然这种局面鲜少出现——它们则转化成为共同体,并且可能产生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者,典型的例

---

① 社会主义社会的党官僚阶层和政治寡头权贵阶层也是这个阶层的极佳例子。更多的信息请参看古典精英理论家和 Wesolowski(1977)关于阶级分析的著作。

子是政党活动和社会运动。

共同体、群体的形成是社会分层视角的中心议题。从涂尔干的视角看来,分层的过程就包含了群体内团结、群体间距离的形成,以及伴随之的对主流价值和其他社会价值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排序。这种分析路径道出了分层过程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社会分层和社会界限的形成,体现“与神圣的距离”的社会声望的评价和排序,内部认同的形成和内聚力建设。后者涉及强有力的集体民意代表和内部规范的形成。

涂尔干社会学中关于不平等的论述更加注重普遍的分化和界限的形成,而不太重视垂直的等级——“严格意义上的分层研究”。这反映了一种广为人知的反对等级秩序论的涂尔干观点:那些自认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人们更倾向于持这种观点。共同体和群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形成具有共识的等级秩序。如果答案是会,这些秩序——反映了共享价值观(或曰与神圣事务的距离)——则是不稳定的。社会分化(即形成横向群体)的干扰作用、社会分层(垂直型的秩序和排序)则会成为研究社会距离和社会团结的学者的最爱议题①。

新韦伯主义者和精英理论家则重视在国家权力等级框架内形成的垂直性共同体。两者均视之为复合性质的。之所以称为共

---

① 参看,布迪厄(1984[1979])和 Bottero、Prandy(2003)。如涂尔干(Durkheim, eg. 1933, pp. 356 - 358)和他的追随者们所指出的,劳动分工的持续产生了职业分化和分层。在下列情况下这可能导致“社会阶级的分化”:当职业分化同“病态的”(涂尔干用语)社会区隔相结合,且社会“分工”变成社会“离散”,规范性约束失效的时候。“工人阶级”(复数形式)的形成、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工业冲突是大规模工业中劳动分工的症候。尽管如此,即使是在“个体崇拜”和高度分化的“道德共同体”(价值多元主义)的大肆扩张的环境下,涂尔干还是看到了职业分化和整合出现规范化约束的趋势。职业分化的最终模式,如帕森斯所言,具有高度的变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阶层的形成同时遵循了社会的和地方的“评价机制”,因此阶层的形成应当是按照地位准则——而非阶级准则——来运行。

同体，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相似的沟通渠道、共同敌人，并且具备提高共同体凝聚力的有效领导。这种共同体的纽带的最主要特征是共享的身份认同——于一种流行的已获得社会认可的标签。这种认同——容易形成个人身份认知——形成了集体团结行动的基础。最有代表性的公共权力集团莫过于政治精英了。实际上，一定程度的内部凝聚力和“团体性”是精英的一个基本特征。

等级性质的公共团体实际上很少存在，因为它们的形成和社会再生产需要消耗巨大的集体能量和集体资源。这是因为社会距离必须通过模式化的互动和生活方式的区隔（Weber）才能被培植出来。共同体的维持还依赖于文化区隔的再生产以及对共享价值的仪式性的重申（Durkheim）。这样看来，下列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强公共团体的莫过于历史性形成的地位群体，如“经典的”印度种姓。大规模的共同体的当代形式——民族和专业协会——并不是特别适合于阶层分析。在仅次于国家的层次定位现代社会阶层的尝试，尤其是在发达社会，鲜有成功的先例。

这经常导致一个有问题的区分——社会等级的“客观的”（结构的）和“主观的”（意义上的）方面。阶级结构，比如说，有时被阶级理论的支持者们看做是独立于行动者/主观（通常是虚假的）的意识，且只与社会观念、规范和社会交往的实际模式松散相关。在一些对阶级分析持赞同态度的评论中，如贝克（Beck，1992）和埃德（Eder，1993），也将阶级视为“客观”的物质基础阶层，基于此而产生纷繁多样的高度个人化的“主观”认同、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这种分析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起“调节”作用的联结环节没有得到详细说明——它将会削弱分层理论的解释潜力，并将让位于认同形成、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形成等补充性的解释。布迪厄（1984[1979]）主张采用这类的“调和”和补充性解释，他坚持认为

"阶级构型"由两个过程组成：惯习的形成和普遍的等级分类①。问题在于这种调和性质的因和果可能互为因果。我们并不清楚惯习和普遍的等级分类是否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社会场域（多重资本的分布），或者说是被后者形塑。尽管更加正统的阶级理论家将物质-经济"基础阶层"作为意义的最终决定因素，一些修正理论家，如布迪厄，则主张分析更加复杂的因果结（causal complexes），并接受了社会文化决定论。

3. 社会行动者

精英和组织化的政治团体是重要的社会行动者，包括社会运动倡导者和政治说客。有时候会出现集体行动者，一般是层级化的共同体——可能是阶级，也可能是职业的、民族的、公民的或者混合的共同体。他们可能采取一种阶级风格的动员——即诉诸产生于雇佣角色和市场能力的利益和团结来进行动员——或者采取地位式的风格，权力政治的风格，或者各种风格的动员方式的组合。诉诸民族-种族的排斥和歧视的动员（如公民权和少数人权利运动）和诉诸共享宗教和种族的动员（如反西方原教旨主义者运动），则诠释了这种混合型的动员策略。

集体行动者的出现预示了社会政治分裂的深化。如李普赛特和罗侃（Lipset and Rokkan，1967）所提醒的，西方主导的社会政治分裂源于民族和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产生了明显的阶级对立（雇主-工人），同时也出现了部门之间的断裂（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在欧洲，社会分裂的组织化和形式化发生于 20 世纪伊始，并完成于精英人物成功地发动阶级斗争。这些精英，和他们所带领的组

① 如 Brubaker（1985，p. 761）所指出的：布迪厄定义阶级所在的概念空间并不是生产，而是普遍的社会关系。阶级的区分并不是基于与生产方式的不同关系，而是通过相异的存在条件、由于相异的存在条件而产生的相区别的性情系统和不同的资本禀赋。

织，形成了由特定阶级的支持者所组成的垂直性团体，并与后者相互呼应。精英们呼吁为这些团体所代表的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奋斗，通常诉诸就工作和生产问题的集中辩论，强调财产权和雇佣合同中非对称关系的社会隐义，并且将他们手头的政治活动与反映左翼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捆绑起来①。尽管这种阶级形式化在过去产生“工人阶级”运动和政党（同样还有一些“中产阶级”政治运动）中被证明非常成功，但是它总是与其他形式化运动分庭抗礼，如国家的、地区的、宗教的、公民的和民族运动。而且后者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已然成为主流，有力的例子就是“新”社会运动的成功动员，它产生了大量新的政治政党，并促进了新的精英派系的诞生。

4. 多样的社会构型(social formation)

由上文所述，结构化不平等的程度依社会联结度和复杂度而定。在最低层次上，它们指的是松散的社会等级——形成于资源的不均分布。不平等的结构化形式——社会分层——意味着最低限度的垂直性集聚。高度的社会分层包括层化的共同团体的出现——这个过程与鲜明强烈的群体认同的形成相关。基于共同团体而形成的阶层也可能催生社会集体行动者。这是一个持续的不可逆的过程——基于阶级联盟的运动、政党和精英的兴衰说明了这一点。不平等的交叠、分化的重合可能巩固社会分层，而错综切割的不平等——尤其当其与开放的社会流动相结合的时候——则导致去层级化。去层级化和再层级化通常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旧的结构让位于新的模式。

等级化团体形成社会构型的程度倾向于依其在分层秩序中的

① 参见 Clark and Lipset (2001)的模型。Sartori(1969)，同精英理论家们一样，都强调上述的结构化过程。

位置而定。一般情况下，由精英形成的社会等级顶端的社会构型最鲜明。实际上，鲜明的社会构型(共识，内聚力和互动)已被看作是精英的定义性特征。社会上层也会形成社交圈、权势集团、俱乐部和其他排他性程度不一的地位群体。而中层和底层则较少呈现出结构化的特征，学者称为流动的“中产大众”(如，Broom and Jones, 1976)。

五、不平等的构成——一个类型学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最低度的社会构型——在此之下我们只能讨论社会不平等，而非社会分层。虽然这种关于界限的裁定必然显得武断，但是在不平等和分层之间做一个类型学的区分却是非常有益于描述去阶层化和再阶层化的社会趋势。斯坦尼斯洛·奥索沃斯基(Stannishlaw Ossowski, 1963[1958], pp. 89 - 118)和丹尼斯·让(Dennis Wrong,1976[1964],pp. 5 - 16)曾经在阶级分析的论辩框架内讨论过这两种社会趋势。他们构建了一系列术语，如“非平等主义非阶级性”(non-egalitarian classlessness)、“无分层的不平等”(inequality without stratification)和“无阶级的不平等”(classless inequality)。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可能以一种无分层性质的形式出现，就如同无阶级性质的分层。这些关于不平等的构想可能沿袭了地位群体或者政治等级的思路，也可能来自对经典的阶级概念和社会阶层概念的分解。

欧洲前现代社会阶级(“社会秩序”)的衰落表明了去阶层化的社会趋势，在这之后出现的再阶层化则是工业社会阶级构型的过程。由于前现代社会阶级等级秩序残留下一批贵族，这使得工业社会阶级构型的进程显得较为复杂。贵族在工业社会的地位就如同城市“知识阶级”中特殊的“地位阶层”。另外一个关于去阶层化

的案例来自苏维埃社会。在这些社会，继政治革命之后，掌权的共产党试图抑制阶级秩序的形成。这个过程包括对社会上层的“清洗”，同时伴随的是政治等级分层的迅速形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党国官僚和政治权贵(nomenklatura)的出现。

学者们勾勒的社会不平等的类型概括在表 6-1 中，这里的类型学基于两个维度：(1) 复杂性的程度，涉及主导的动力类型和它伴生的主导性资源分配原则；(2) 社会构型等级化的程度/强度，分为强和弱的两个级别。上述两个维度的交叉形成四种类型：主导性分层，主导性不平等，混合分层和复杂不平等(表 6-1)。

表 6-1　不平等的构成——一个类型学

动力结构	社会构型程度	
	高/强	低/弱
单一/主导动力和低复杂度	主导性分层(如“阶级社会”)	主导性不平等
多元/混合动力和高复杂度	复杂/混合分层	复杂的“无阶级”不平等

这种类型学为更加精确地定义一些重要概念开辟了道路。在阶级社会，产权/市场驱动的不平等是最显著的形式，且阶级构型的程度高。个体间生活机会的不平等主要反映他们在产权地位和市场禀赋上的差异；家庭成员的生活机会则反映了一家之主的市场禀赋。荣誉和影响力衍生自阶级位置；社会沿着阶级界限分化。当阶级构型很强时，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则会通过组织化和集体行动体现(阶级政治)。这种类型非常接近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家们所倡导的模型——如下所示——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中期的西欧社会则符合这种类型。

阶级不平等的特征是：阶级生成的不平等占据社会不平等的

主导地位，但是社会构型的程度较低，阶级内部的社会联结较弱。虽然社会权力主要根据“各人的财产和市场禀赋”来分配，但是仍然没有出现可辨识的阶级群体，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有人认为这种类型的不平等实际上是正在经历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19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非常接近这种类型，至少他们提到了主要阶层内部的联结程度。虽然当时按照地位高低进行分配的准则逐渐削弱，阶级塑造的不平等开始超过财产制度(estates system)形塑的不平等，但是阶级构型仍在襁褓中。

复杂的社会不平等和混合分层指的是这样的社会构成：一个社会中，不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一的不平等动力基础。反之，生活机会是围绕一个结合了阶级地位、地位位置和权力位置的复合维度而形成。性别化职业阶层和市场分隔，种族/民族性质的“社会底层”聚居区则是这类混合不平等的例子。如果各个维度重合程度高，且社会阶层围绕复合维度形成，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属于复杂/混合不平等类型。为了精确描述这种类型当中的阶层，我们需要使用多个描述性概念，如“非技术移民妇女”、“城市白领黑人”和“天主教知识分子”。

如同任何一般形式的理想化类型学，这个分类在帮助解决阶级争辩的焦点问题方面提供了绵薄之力。它给出了一个分析领域，但是无助于将边界进行操作化。有人可能会持异议，认为这个框架有所偏倚，即它使得主导性分层(包括“阶级社会”)显得不太真实，比起其他类型来说，这个类型更难识别，更难找到对应的社会类型。反对者们可能还会说，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分化还经常与公共/国家权力关系形塑的分化相互重合，因此在现实中，这样由单纯一个维度主导的社会不平等类型非常稀少。对于这些反对意见，我的答案是：第一，他们没有抓住重点。虽然我没有做具体的“边界界定”，但是我承认阶级分层和阶级不平等具有同其他类型

同等的现实可能性。实际上，在上文中我已经指出过处在世纪转折点的西欧社会非常接近阶级社会类型。这种社会构成的特征持续到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几十年，并在社团主义的运作框架内通过社会政治化的过程加以再生产。第二，这个类型学旨在用于描述趋势，而不是用于将具体案例归类。因此，它的普适性和理想-典型性则不那么可靠。

如果说当代发达社会的社会不平等与表 6-1 中的第四种类型最相似，即复杂（“无阶级的”）不平等——这也许是最受争议的主张。这意味着在当代发达社会当中的社会不平等围绕多重维度形成，社会构型的程度低——结果是形成多元的、连续性的和跨维度的等级，其形成社会联结弱、成员流动频繁的群体。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Pakulski and Waters，1996）曾经在碎片化与偶发性的主题下，以“地位-传统等级”的名称分析过这种构型。只有在去层级化和阶级解构的历史框架下，才能看到现代社会正在向更复杂的分层体系转变。这正是我们要转向的分析视角。

六、现代趋势——阶级的短暂历史

如同韦伯指出的，西欧社会阶级构型的过程，尤其是工人阶级团体的形成过程，不仅仅反映了形成阶级所需要的重要条件——空间上的集聚、良好的交通条件和清晰可辨的“阶级敌人”——在特定时空的重合，还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精英们对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领导力的使用。政治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成功地使大生产部门的体力劳动者（主要是工业劳动者）相信他们享有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且应当着手已经设计好的社会重建。工人的阶级意识、阶级团结和阶级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项政治力塑造的成就。它们体现的是工厂系统中整齐划一的工作条件、地

域上的邻近，以及在战争流动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科层化和民主化所带来的新的机遇。即使功能性的、职业的和生活方式的分化侵蚀了工作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共同性，阶级联合和认同仍然能够通过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塑造加以维持。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皮佐诺(Pizzorno)，他的主张可以简要地表述为：实际上正是利用政治的方式灌输的阶级认同，使得运动领袖们得以界定——从而诉诸——共同的阶级利益。即使是最激进的工人阶级运动，布尔什维克，也认识到了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对于弗拉基米尔·列宁和格奥尔格·卢卡奇来说，是党——更准确地说是党的领导——真正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它的利益。

爱弥儿·涂尔干曾经预言了"工人阶级"的分化。工人阶级内部的凝聚力是一种机械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团结。阶级分野和阶级冲突反映的是早期工业化阶段的失范状况，而不是一个"正常"趋势。日益推进的功能分化和个人主义，涂尔干预言，将侵蚀掉工作和利益的共同性，而国家则会促进职业联合和工团联合。社会变迁的过程，伴随着社会工程的推进(指由职业团体、教育、国家活动和民间宗教[civic religions]所推动的规范化过程)，将会模糊掉阶级认同和阶级分化的界限(overarching)。社会公民意识和民族主义将成为与阶级式的团结相对的意识形态竞争者。

事实证明，上述预测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社会分化的过程、日益强化的个人主义、少数民族和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力队伍——这些都削弱了形成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阶级构型。公民权的扩展，尤其是社会/福利权的扩展也带来了同样的后果。社会阶级得以存续主要倚仗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组织的运作，运作元素有：与阶级相关的意识形态，阶级导向的政党活动、具有阶级属性的精英。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方式急骤分化的时代，坚持不懈的"阶级政治"维持了阶级的生命线。自由社团主义者对阶级政党

和阶级政治的支持（如“民主形式的阶级斗争”和社团磋商[corporatist deals]），有利于阶级认同的存续。刁诡的是，坚持以制度规范阶级斗争的做法恰恰削弱了后者（Dahrendorf，1959）。阶级斗争转化成国家层次的集体协商谈判的合法化程序。这种由国家掌控的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阶级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新政治浪潮的兴起。

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理论家来说，将阶级看做是意识形态的、以政治手段组织起来的实体的观点听起来像异端邪说。尽管如此，这个视角可能有助于解释学者们关于阶级的一系列判断：阶级解体（Dahrendorf）、碎片化（Lipset）和阶级政治式微（Clark）。从这个视角出发，阶级的历史变得更加容易理解：阶级构型首先被职业分化和市场细化削弱，社团磋商的瓦解进一步瓦解了其根基，最后随着社团主义的萎缩和全球化的推进，阶级精英、组织（政党和工会）和意识形态的解体彻底将阶级摧毁。由此，阶级社会的历史解体过程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1. 早期现代工业化社会（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个时期阶级分化与地位分化相互重合，因此加剧了社会阶级的构型。社会和政治的构型在社会/政治谱系的两端最为明显：体现为体力工人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两大阵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机会平等）和政治上的公民权诉求逐渐侵蚀了地位的分化。这标志着地位分层向阶级分层的转型。

2. 现代工业社会（组织化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个时期的阶级分化程度高，并且政治上联结（阶级政党、运动、意识形态等等）。科层制、专业等级制和阶级分化相互结合又相互重叠。国家层次的组织化不平等通过国家在社团磋商的框架内加以处理和掌控。工业发展和城市化便利了中产阶级的社会联结，塑造了中产阶级的崛起。但是，逐步推进的职业分化和市场细化导致了主要阶级

的碎片化。这预示着阶级分层向混合分层的转型。

3. 晚现代/后现代,后工业社会(无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工业阶级解体。社团磋商的瓦解、全球化、激烈的社会分化和日益兴盛的个人主义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的、以政治手段组织起来的)阶级的解体和重新分层。在阶级解体过程中复苏的传统地位不平等显得变动不居,更像是一个地位集市(status bazaar)。而这昭示着混合分层向复杂的(无阶级)不平等的转型。

七、转向复杂的(无阶级)不平等

向第三个阶段的转变标志着社会不平等类型的变迁。如果我们采用地理类比法(即分层景象的基础),后现代化相当于一场大地震,完全摧毁了之前鲜明的、集聚的和层化的阶级和地位构型。分层,这个概念需要接受批判性的检验,以适应复杂的社会不平等的景象和理念——后者更少层级化、更少国家的组织化色彩。

后现代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分化——本质上是功能性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分化[①]。分化不仅仅包括功能的专业化、新区隔的出现和新边界的形成,还包括这个过程的透明(显)化、不断增长的反思性和对边界形成过程的清晰认识。这种透明化(显化)剥离了赋予社会分化"自然而然"特性的合法化步骤。不仅如此,它

---

① 对这些进程的分析一直是自埃米尔·涂尔干到皮埃尔·布迪厄等社会学家的分析中心。比较与众不同的理论要素有:(1) 灵活的专业化侵蚀了工作任务的一致性和职业种类的同质性。需要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作角色大量涌现。不稳定就业的领域扩张。(2) 更多层面的人类产品/活动的商品化趋势(如品牌、软件、基因物质)带来的市场交易领域的扩张和多样化。对信息、信号和符号的可获得性成为生活机遇的重要方面。(3) 跨越科层制公司等级或其内部的水平型网络的激增。等级关系的明确性下降。(4) 新的通讯信息技术带来的新形式社会关系的大量增长。(5) 消费增长,尤其是符号和服务的消费。与消费方式和品味相关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认同的涌现。

还使得社会区隔、社会边界的组织化社会再生产问题重重。结果，这些边界变得局部化，并且变动不居，他们的维持则依赖于组织的巩固。因为组织成本高昂（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说），社会构型遇到了阻碍。产生于分化过程的新地位惯例缺乏持久性；规范相互竞争，边界是流动的可渗透的。如皮埃尔·布迪厄指出的，他所称为“现代阶级”的边界就像闪烁的火苗般不稳定。

持续的激烈分化削弱了现存的社会构型。工作内容的碎片化和专业化伴随着他们的重组，尤其是在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部门，这种重组以“灵活的专业化”任务团体的形式出现（Piore and Sabel, 1984）。灵活的专业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功能性角色的进一步模糊，职业种类的进一步碎片化和终身职业制的瓦解。大多数服务业工人经历的非连续性的、横向工作流动也与报酬和工作条件的分化紧密相关。工作质量因素（如工作环境，灵活的工作时间，生态安全和工作压力等）成为重要的考量，因此也进入了日趋复杂的本来就是分化的地位评价标准体系中。多重的市场细分使得神圣的社会等级的概念问题重重。社会分化模糊了社会分层的边界。

在最发达的社会，社会分化的效应随着消费中心化而放大。富裕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减少，用于消费的时间增多。它还在整个社会经济等级中拓展了炫耀性消费。再者，如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88）所指出的，消费越来越象征化，并日益与社会秩序相关联。含有行为编码、并促进群体形成的分类体系则日益脱离了生产/雇佣关系、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消费对象（consumer objects），本质上是语义上的，开始形成自主的社会建构的运作体系。这种建构构成了社会分化，而非社会分层——因为限制消费的活动并不能轻易等于具有共识的评价——进而导致了程度较弱的易变的构型。

与社会分化相呼应的是逐日增长的个人主义。如涂尔干和齐美尔暗示过的，个人主义同时既是社会分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根据涂尔干的看法，个人主义伴随着“有机”社会团结的出现，并且更喜好互补的相异性，而非相似性。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其提升到社会“元法则”(meta-principle)的高度时，个人主义进一步削弱了集体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工程的运作，因此阻碍了社会阶级的形成。在高度个人主义化的文化当中，弱联系和短暂联系超越强联系和持续的集体纽带，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实现和培养群体团结——而非短期的防卫性质的互动——成为越来越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促进了基于弱联系的现代组织的形成，如风尚准群体(stylised quasi-groupings)——时尚产业的典型特征。上述这些更多地表明了社会分化而非社会分层的特征。

分化和个人主义的结合过程影响了共同体关系的形成——通过强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多元主义。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价值体系的贯通融合更加稳固了这个过程。地位准则和它背后的价值体系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并且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因此使得维持一个稳定的等级制度变得不太可能。传统的地位群体或者衰落了，或者分化了，因为闭合和系统的排他很有可能受到质疑。如果新的地位共同体形成了，要维持他们的地位则需要持续不断的协商谈判。结果，地位群体的形成也面临重重阻碍。弱联系的、不稳定的和地方化的组织成为主导类型。

公民权向社会/福利权的扩张最近受到了抑制。但是，人们对权利的要求从来没有中断过，且愈演愈烈，主要是在文化/象征领域——如要求获得大众媒体非污名化报道的权利。这又一次表明：基于地位群体形成的社会距离和社会歧视体系越来越难以合法化和维系。种族、民族的、年龄和性别等歧视形式受到来自道德的、政治的和象征符号各个层次的挑战。它们甚至会被质疑为用

语歧视——这种现象经常被称为“政治正确性”问题。它们虽然建构了社会关系和社会距离，但是当这种社会距离不再受到宗教、法律、道德、大众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正确的语言习惯的支持时，即使地位不平等还会延续，自由主义公民权会阻碍社会分层秩序的形成——虽然可能以一种隐蔽的地方化的方式。

大众民主化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不平等的类型。如韦伯所预期的，民主转为一种日益全民表决式的或称为大众的形式。组织化的政党参与人民党(Volksparteien)的式微——来自大众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内部的新政治的侵蚀，打破了政治表达和政治组织的社团限制。这进一步削弱了社会构型。如克拉克和李普赛特(Clark and Lipset,2001)揭示出的：政治组织的类型已经脱离了它应该来自的社会阵营，就像脱离旧时的“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包裹——这曾经在“民主的阶级抗争”的框架内得以形成和发展。“新政治文化”助长了政治分化和短期联盟；它体现的是一种“议题政治”，以及对短期抗议运动的回应，而不是组织化的有阶级基础的政治运作和社会断裂。

八、结论

如果上面对后现代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工业时代的阶级不平等和分化将让位于复杂不平等。随着这个转型的出现，阶级分析以及相关的研究注定会逐渐淡出学术视野。这并非说阶级分析不正确，而是因为它将焦点放在了一种正在消逝的社会构型上。一种能够把握不平等的变迁轨迹的更普遍化的社会分析形式则能够给社会学提供更充分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武器。托克维尔、涂尔干和韦伯等古典传统的不平等分析曾经提到过这些工具。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传统的社会分析更加适用于日趋复杂的“后现

代情境”。它将阶级的概念特殊化，并且动摇了阶级分析的基本假设：阶级结构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分层的主要基础。

究竟应该对阶级理论进行重构和更新——如本书的其他贡献者所主张的，还是发展一种根基更广泛的关于不平等和对抗的社会分析？哪一种策略更好，或更能够抓住当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对抗的重要特征，更具有理论解释力？我们应当指出，这个问题还未见分晓。而且，考虑到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分析范式的性质，这种不见分晓的状态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①。因为最终，对这个学术争辩的裁定，很有可能既来自学术共同体对阶级理论和非阶级竞争理论的效度检验，也来自政治实践者们所使用的最流行和最有吸引力的概念和话语。

译者：赵勇（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① 对竞争范式的讨论，请参看 Pakulski(2001)。

结论

如果“阶级”就是答案，那问题是什么呢？

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

本书所探讨的阶级概念是根据不同的问题而阐发的，而这些问题所指向的答案都是阶级。用来回答不平等的广泛历史变化的概念，与那些用来回答个人在当代社会的主观身份的概念是不同的。相应的，这些问题都嵌入在更为广泛的理论框架之中。理论框架所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帮我们提出问题。问题的提出并非简单地来自对经验世界的好奇与想象，它产生于好奇与想象，同时依靠理论假设来组织，并受到规范性思维（normative concerns）的激发，最后还要与经验世界相结合。这里所说的假设和思维指的是那些能够告诉我们哪些问题更重要，或是能够帮助我们区分哪些工作是阶级概念能够胜任的。如何对本书所讨论到的各种阶级观点进行分类呢？一种方法是把这些观点都放在阶级分析要考虑

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进行考察，这正是本章所要做的。

以“阶级”为中心进行思考时，有六个问题尤其重要：

1. 分配性位置(distributional location)：“个人是如何被客观地定位在资源不平等的分配性位置上的？”

2. 主观性的显著群体(subjectively salient groups)：“如何解释个人或群体在不平等结构中对自身和他人进行的主观定位？”

3. 生活机会(life chances)：“如何解释人们的生活机会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

4. 对抗性冲突(antagonistic conflict)：“哪些社会裂痕(social cleavage)形成了系统性的公开冲突？”

5. 历史性变化(historical variation)：“如何描述和解释不平等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变化？”

6. 解放(emancipation)：“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制和剥削，需要做哪些改变？”

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更多的问题。例如，阶级通常被当作以下类似问题的部分答案：“为什么人们会把选票投给特定的政党？”“如何解释人们在消费模式、品味和生活机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与我们上面所列出的六个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具有密切关联。比如说，投票问题与解释人们的生活机会问题、主观身份问题、对抗性冲突问题等都具有密切关联。人们之所以会把阶级差别与投票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不同阶级间的利益和身份认同是相互对立的。同样，生活方式问题与生活机会问题、主观认同问题联系紧密。可以看出，上述六个问题已经能够在阶级分析的框架内产生各种复杂的组合和变化，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上述六个问题的讨论上。

为了解决不同的问题，本书中所讨论的几种阶级分析方法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阶级概念。表 7－1 区分了三种能够联系具体

问题和阶级分析思路的方法：首先，一个具体问题可以构成一种特定分析方法的基石。这样的问题往往与更宽广的理论背景相联系，而阶级分析的工作恰恰就定位在这些理论框架当中。具有基石作用的问题也界定了阶级概念在理论框架内发生作用所要满足的核心标准。如果由某种分析思路所界定的阶级概念并非是解决基础性问题的主要手段，那么这意味着，要么是阶级概念本身需要修正，要么是整个理论框架需要进行一个大的调整。其次，还有一些问题，它们虽然也位于阶级分析理论框架的核心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是从属于那些基础性问题的。这些从属性问题有助于区分阶级概念的解释性和描述性范围，但并不能产生界定阶级的主要标准。如果阶级——在某种分析思路下界定的阶级——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那么就会限制这些概念的理论抱负，但不太可能破坏这些概念的核心目标。最后，一些问题可能在阶级分析的经验研究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但对整个理论结构来说却是次要的。

表 7－1　阶级分析的六个基础性问题

阶级分析方法	基础性问题					
	1. 分配性位置	2. 主观性显著群体	3. 生活机会	4. 对抗性的冲突	5. 历史性的变化	6. 解放
流行用法	* * *	*	* *	*		
戴维·格伦斯基（新涂尔干主义）	* *	* * *	* *	*	*	
简·帕库尔斯基	* *	* * *	* *	* *	* *	
皮埃尔·布迪厄	* *	* *	* * *	*		
理查德·布林和约翰·戈登索普（新韦伯主义）	* *	*	* * *	*		
奥格·索伦森	* *	*	* *	* * *		

续 表

阶级分析方法	基础性问题					
	1. 分配性位置	2. 主观性显著群体	3. 生活机会	4. 对抗性的冲突	5. 历史性的变化	6. 解放
马克斯·韦伯	*	*	* *	*	* * *	
埃里克·欧林·赖特（新马克思主义）	*	*	* *	* *	* *	* * *

注：* * * 涉及阶级概念的基础性问题；* * 涉及阶级概念的次要问题（从属于基础性问题）；* 与阶级概念相关的其他问题，但并非处于阶级定义的中心位置。

以"阶级"为答案进行思考的问题：1. *分配性位置*："个人是如何被客观地定位在资源不平等的分配位置上的？" 2. *主观性的显著群体*："如何解释个人或群体在不平等结构中对自身和他人进行的主观定位？" 3. *生活机会*："如何解释人们的生活机会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 4. *对抗性的冲突*："哪些社会裂痕形成了系统性的公开冲突？" 5. *历史性的变化*："如何描述和解释不平等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变化？" 6. *解放*："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制和剥削，需要做哪些改变？"

下面让我们逐一审视上述六个问题，来看一看这些问题到底是怎样和本书中讨论的各种阶级分析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完成这一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本书所讨论的各种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明确地回答上述六个问题，而且这些方法背后所暗含的问题还不止是一个。因此，我把本章的手稿寄给了本书中那些还健在的作者，让他们来评价我对他们分析思路的对比和讨论，根据这些作者的意见反馈，我又对本章进行了重新修订。虽然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说明本书的作者们都同意我对他们作品结论的概述，但在这里我也没有收到强烈的反对意见①。

---

① 戴维·格伦斯基（David Grusky）就本章的一个早期版本提出过许多问题。特别地，他认为他的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讨论的是微观层次上个人结果的差别问题，并且他还提出可以增加一个新问题："*个人层次的结果*：如何解释人们在生活机会、生活方式、态度、政治行为以及其他制度化参与方式方面的差别（如，婚姻、会员身份、宗教归属和其他自愿性的组织身份）？"我对本章进行了修订，以回应格伦斯基的上述问题。我认为，上述六大问题中的前三个足以涵盖格伦斯基关于微观层次差别问题的提问，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新问题来说明了。

一、分配性位置

当我们询问"个人是如何被客观地定位在资源不平等的分布位置上的?"等类似的问题时,阶级通常是分析的核心。这种情况下,阶级是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来定义的,其常用的度量指标是收入或财富。这一分析思路表明阶级是一个等级序列形式的概念(gradational concept),它就像梯子上的一个横档,每一个横档都有其特定的名字,例如,上层阶级、中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中下层阶级、下层阶级和底层阶级等等①。这种阶级概念在大众话语中随处可见,至少在类似美国这样缺少工人阶级政治传统的国家里,这种阶级概念是很流行的。当美国的政客宣称要为"中产阶级进行减税"时,他们说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指的就是位于收入分配中间档次的人。这种情况下,阶级并没有按照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客观位置来划分,例如,按照人们的公民身份、权力、对先赋性歧视制度形式的屈服等方面来划分人们的阶级归属。

二、主观性显著群体

阶级作为一种分析思路,还出现在诸如"如何解释个人或群体在不平等结构中对自身和他人进行的主观定位?"等问题中。对于这类问题,阶级是可能的答案之一。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阶级:"阶级是能够产生主观性显著经历的社会类型,反过来,显著性的经历又塑造了人们的身份,在一个经济分层的体系中,人

---

① 对等级序列型和关系型(relational)阶级概念的比较,请参考 Ossowski(1963[1958])和 Wright(1979,pp. 5-8)。

们使用这种身份来定位他们的社会类型。”[①]在这一定义下，阶级特征的实际内容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某些情况下，作为主观分类的阶级概念将主要围绕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展开，另一些情况下，它将围绕着详细的职业分类而展开，还有些情况下，它以人们的收入水平而展开。有时候，主观阶级分类体系的经济内容十分明确，比如按照收入水平或职业进行分类；另外一些时候，它的经济内容却显得不那么直接，比如“上层阶级”的表达方式。阶级的数量也在根据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主要取决于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是如何经历与界定各阶级、各群体的相对差别的。换句话说，阶级与其他形式的主观显著性评价——如宗教、民族、性别等——是不同的，它可以包含经济维度的内容，但却并非依赖经济术语而界定。

有关主观身份认同形成的问题，对本书中所讨论到的三种阶级分析方法来说都特别重要。皮埃尔·布迪厄阶级分析方法的核心之一——正如艾略特·魏宁格(Elliot Weininger)所指出的——就是讨论象征性分类方式(symbolic classification)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位于人们生活方式差异和集体身份背后的含义。虽然象征性分类以及人们对这种分类方式的抵抗并非总是围绕着阶级来展开，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分类方式与人们以阶级为基础的生活机会差异还是紧密相连的，因此，象征性分类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构成了布迪厄阶级分析的核心。

对于戴维·格伦斯基和简·帕库尔斯基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主观性身份同样显得非常重要。格伦斯基认为阶级应该是“*真实的*”群体，而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名义分类方式。一个真实的群

---

① 阶级的这种界定方式并非旨在对主观身份和分类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我们可以把阶级看作是一种产生经历的过程，但经历转化成身份还需要通过文化实践才能完成。在布迪厄的作品中，位于阶级和身份之间的文化因素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体，其边界必须对群体成员的生活机会和经历有实实在在的微观作用，这种作用将显著地影响他们的认同、团结和行动。换句话说，格伦斯基认为，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真实的主观显著性边界对应于相对分离的职业类型，而不是对应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所谓的“大阶级”(big classes)概念。对于那些把职业类型看作是真实群体的人们来说——这些群体不仅仅是形成了一种分类方式，而且还具有主观意义上的重要性——分离的职业类型被制度化了，这个制度化的过程系统性地产生了对这些人具有显著影响的经历和机会。同样，帕库尔斯基也把主观身份和群体形成问题置于他阶级分析方法的核心位置。在并不漫长的历史中——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稳定的群体身份是围绕着市场和生产中的经济不平等而产生的。不过帕库尔斯基指出，到了20世纪末，原来植根于经济的群体身份开始瓦解了，各群体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了，个人生活正在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横跨原先的阶级类型边界，其他种类的身份在这时变得更加重要了。据此，帕库尔斯基认为，阶级不再成为诸如“如何解释个人或群体在不平等结构中对自身和他人进行的主观定位”之类的问题的答案①。

三、生活机会

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阶级”概念能够更好的回答“如何解释

① 在分析这些问题时，格伦斯基和帕库尔斯基最大的差别不在于他们最终的结论，而是在于他们希望怎样运用“阶级”这个概念。格伦斯基使用“阶级”这个概念来区分高度分离的主观性职业群体；帕库尔斯基使用“阶级”这个概念时显得更保守一些，他把这一概念主要限定在格伦斯基所谓的“大阶级”上。无论怎样，这两位学者都承认，在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所定义的“阶级”类型不再能够解释主观群体身份，特别是对那些拥有真实边界的连贯性的群体来说。

人们的生活机会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之类的问题。这一问题几乎在所有的阶级分析方法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相比涉及分配性位置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限制条件也更加苛刻，因为在这里我们不是要简单地描述如何在一个分层体系中给个人分配位置，而是要识别出一些因果机制，这些因果机制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分层体系的重要特征。当用阶级来解释不平等时，阶级的概念并不是通过社会位置的显著性特征，而是通过人们与各种资源或资产的关系来界定的。因此，阶级成为一个关系性的(relational)而不是等级序列型的概念。阶级的这种使用方法和决定人们生活机会的其他因素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地理位置，由先赋性特征所决定的歧视形式，或是基因特征。当然，地理位置、歧视或基因在阶级分析中也起作用——例如，这些因素可能会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出现在不同的阶级位置上——但我们这里所说的阶级定义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是如何和那些能带来收入的资产发生联系的。

生活机会问题与机会平等的规范性问题密切相关。对自由社会里的物质和地位不平等所持的普遍观点是，只要每个人获得成功的机会都是平等的，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在道德上就不是不可接受的。这个问题在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研究方面特别重要——在什么程度上我们才可以说，出生在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的孩子在取得成功方面拥有相同的机会——同时，它也产生了代内机会平等的问题。因此，在讨论作为决定生活机会因素的阶级概念时，机会平等是一个规范性的背景因素。

在所有的阶级分析方法中，解释人们生活机会的差异都居于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和布迪厄来说。这三个学术传统的作者都使用阶级概念来探讨如下问题：与人们发生联系的各种资源，是如何深刻地形塑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和生活策

略的？不过，正如表7-2所示，这三种阶级分析的学术传统在对问题的精确表述，以及这些问题在他们理论框架中所占的重要性方面还是有所不同的。

表7-2 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和布迪厄传统的生活机会问题

	形成人们生活机会的重要资源			三种阶级分析问题的相对重要性		
	资本和劳动	人力资本	文化资本	生活机会	历史变化	解放
马克思	×			3	2	1
韦　伯	×	×		2	1	
布迪厄	×	×	×	1		

对人们生活机会的阶级分析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你所拥有的决定了你所能够得到的。"不过，这句话并没有告诉我们"你所拥有的"到底是哪些资源或资产，"你所能够得到的"又是哪种结果？布迪厄对资源的类型和生活机会这一概念的范围都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在布迪厄的阶级分析方法中，涉及人们生活机会的资源包括金融资产（通常所说的资本）、技术和知识（或称人力资本），还有他宣称最重要的文化资本①。布迪厄对生活机会的范围的解释也更加广泛，他认为，生活机会不仅包括经济意义上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包括获得象征性报酬的机会，这些象征性报酬对社会地位中

① 布迪厄在其作品中并没有指明生活机会的分析到底该使用多少种类型的资本。一方面，正如艾略特·魏宁格所指出的，把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区分为不同的"资本类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说，布迪厄所讨论的第四种资本——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不过他没有使用这种资本来解释人们的生活机会——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们生活机会的阶级差别。人们嵌入在由社会资本构成的社会网络里，这种网络有助于人们追求各种目标（即"生活机会"）。当然，这一点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关系不是很大。重要的是，布迪厄在他的阶级分析方法中，采用了比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更广泛的资源类型来解释人们生活机会的差别。

的不平等现象来说相当重要。对布迪厄而言，与三种资本形式的关系，决定了人们能够获得物质产品或象征性地位的机会大小。相比较之下，在生活机会的问题上，马克思采取了比较狭窄的资源定义。至少在他相对系统地探讨阶级问题时，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界定阶级的资源就是资本和劳动力。在韦伯的阶级分析思路里，像布迪厄一样，他也把技术看作了是一种资源，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这一资源塑造了人们的市场能力和生活机会。还有一些新韦伯主义的学者，像布林和戈登索普，把与职业相关的特征也看作是一种市场能力——如复杂技术工作中的权威和责任——这些职业特征确实也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机会①。

在生活机会问题上，第二个区分三种学术传统的方法是看生活机会问题在他们各自的理论框架中所处的位置。马克思之所以采用了相对比较狭窄的资源定义，是因为马克思最终关注的是社会解放和历史变化，而不是个人的生活机会。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系统性地探讨生活机会问题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韦伯主义的思想引入到他们的阶级分析当中。

在韦伯自己的阶级分析框架中，生活机会问题也并不居于核心，相反——我下面会详细论述——他更加关注的是历史的变化。他之所以会关注市场能力，主要来自他对历史变化和资本主义特征的理论思考，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特征指的是市场社会的一种高度理性化形式。对于许多新韦伯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只考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事实的新韦伯主义学者来说，韦伯原来关

---

① 准确地说，在一种职业当中，权威和技术复杂的工作都不能算作是“资产”或“资源”，这和资本、技术等资源并不一样，因为一个人并不能真正地“拥有”权威或一份技术复杂的工作。不过，在职者确实能够对权威和复杂工作的实施产生有效地控制，并且这些权威和复杂工作确实能使他们具有获得收入的优势，所以，把权威和复杂工作引入韦伯主义的阶级概念中也不为过。

注的历史变化问题被边缘化了，而生活机会问题却成了这些学者在进行阶级分析时的核心。

在布迪厄的阶级分析中，生活机会问题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对布迪厄来说，更加广泛的一些问题，如时代的历史变化或社会解放问题，相对来说都是次要的，并且也不会对他的阶级分析概念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相反，布迪厄认为，阶级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关注生活机会与主观身份之间的交互作用。

四、对抗性冲突

阶级分析中的第四个问题——“哪些社会裂痕形成了系统性的公开对抗和冲突?”——进一步增加了利用阶级概念进行解释的复杂性。正如上面提到的第三个问题一样，第四个问题也表明了阶级概念和导致人们在经济机会方面出现不平等的原因是紧密相连的。但与第三个问题所不同的是，使用阶级概念回答第四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识别出那些能够产生利益冲突和直接对抗的经济不平等。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人们经济机会条件的共性就判断他们属于同一个阶级，判断人们是否属于同一个阶级，主要是看哪些内在的因素使得人们在追求经济机会的过程中相互竞争。这里所说的阶级，既区别于那些完全没有经济因素的社会裂痕——如宗教或民族，同时也不同于那些经济裂痕的非阶级形式——如经济部门或地区的分割。

有关对抗性冲突的基础问题——虽然在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也有用阶级来解释社会冲突问题的——我们这里主要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虽然韦伯也把阶级看作是社会冲突的潜在基础，但他明确地拒绝了如下的主张，即从本质上来说，阶级关系具有能够产生直接冲突的趋势。相反，马克思把冲突看作是阶级关

系固有的结果。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激烈的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但他确实认为：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由对抗性的阶级利益产生的剧烈冲突将会定期重复发生；其次，冲突会在反复的爆发当中得到强化①。虽然“阶级冲突是历史的发动机”这一名言过于简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动态变化理论，但对阶级概念来说，这句话确实表达了冲突问题的重要性。

既然阶级分析的中心问题是解释冲突，那么诸如“剥削”之类的概念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剥削的概念主要是通过一个阶级的劳动力被另一个阶级所占有来阐明。而在索伦森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剥削概念则是通过压榨经济租金的过程来实现。上述两种分析思路中都没有把利益冲突看作是阶级的一种特性，而是认为它就嵌入在阶级关系的结构中②。

五、历史性的变化

阶级分析的第五个问题围绕着广泛的宏观问题而展开：“在社会组织的不平等方面，我们如何来描述和解释它们的历史性变化？”③这

---

① 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两点结论。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阶级冲突会反复爆发”是下面这个命题的基础：为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超级结构”(super structure)，因为一旦资本主义制度消亡了，那么它所孕育的激烈社会冲突必将不复存在。另外，“冲突会在反复的爆发中得到强化”是以下论断的基础：通过革命性的斗争，资本主义必然会被消灭。

② 索伦森的租金理论和马克思的劳动占有理论之间的差别在于，马克思认为剥削者的物质利益取决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持续互动，而不是简单地把被剥削者排除在租金的产生过程之外。正如第一章所讲到的，我把索伦森的“剥削”概念归为“非剥削的压制”。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 Wright(2000)。

③ 这里，我所要表达的是历史的*变化*问题，而非历史的*轨迹*或历史的*发展*。当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满足于仅仅解释历史时代的结构性变化，它还需要对历史发展的图景给出一个一般性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

个问题需要宏观概念，而不是能够解释个人生活的微观概念；并且它需要的是能够解释不同时空变化的宏观概念。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传统中都特别重要，但这两个学术传统却使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历史性变化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不平等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最主要方面是：不同经济制度*在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方面的手段*是有差异的。具体来说，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剥削发生的具体机制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发生机制是：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得资本家能够雇佣无产阶级工人，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使得他们能够占有工人的劳动。而在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剩余的压榨主要是通过直接实施强制性的权力来实现的。上述两种组织经济关系的方式都构成了阶级结构，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剥削阶级对经济剩余的占有之上的，但由于占有过程的不同而导致了它们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对韦伯来说，历史性变化的中心问题是*各种不平等形式的相对重要性*，特别是阶级和地位①。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键性区别不是两者的阶级结构，而在于一个社会以权力和不平等为基础，而另一个社会以地位为基础。虽然封建社会也存在阶级——在封建社会的市场中，参与市场交换的人们拥有不同的资源和市场能力——但是，市场制度是从属于地位秩序（status order）的，地位秩序才是决定地主与农民的优势和劣势的基础。

历史性变化问题也出现在帕库尔斯基和格伦斯基的阶级分析中，但他们的中心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中，社会不平等所发生的阶级变化。对帕库尔斯基和格伦斯基来说，阶级（或格伦斯

① 这一点在韦伯的历史社会学里经常出现——主要是*理性化*问题。对韦伯而言，阶级是经济不平等的最具理性化的形式。对韦伯阶级分析中所涉及的理性化和阶级的讨论，请参阅 Wright(2002)。

基所谓的“大阶级”)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段特殊时期——大约从工业革命开始,直到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的出现——不平等是如何在社会层面得以形成的。他们既不像韦伯关注的是阶级秩序和地位秩序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也不像马克思关注的是各种剥削形式的大规模历史性变化问题,他们关注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结构化和协调一致的不平等体系,是如何转化成后现代社会中碎片化的、相互交叉的复杂不平等体系的。

六、解放

在用阶级来回答的六个问题中,最后一个问题是最具争议的:“怎样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压制和剥削?”这个问题不仅要求我们对产生经济不平等的机制进行解释,还要求我们对不平等进行规范性的判断——哪些是所谓的压制和剥削形式——以及对诸如社会解放之类的政治规划做出规范性的评价。

我相信,上述问题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精髓,并且也给其他的五个核心问题注入了特殊的意义。在解放的思路下,历史性变化的问题包括试图理解社会关系在未来的可能形式,这一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阶段关系中的剥削和压迫成分都被消灭的过程中。阶级分析的历史性变化问题不仅围绕着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比较而展开——这是两种在经验上可以观察得到的阶级关系形式——而且,这一思路还将探讨资本主义和假想的共产主义的区别(“假想的共产主义”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平均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与此相似,在阶级冲突问题中,社会解放的思路所包含的观点是:把阶级关系中的利益对抗表述为“剥削”和“压迫”,表明了这些关系所产生的冲突涉及社会公平问题,而不

仅仅只牵涉道德中立的物质利益问题[①]。因此，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宏大理论框架中，阶级概念的使用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批判而不仅是描述和解释资本主义社会。

对阶级的讨论经常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对立，我们在上文中所评述的各种阶级分析框架也经常表现为各种敌对的阵营，这些阵营都试图赢得更多的支持者，同时击败更多的反对者。由于学派的林立，那些对阶级分析感兴趣的学生通常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即：为了学习阶级分析方法，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在决定选取某种方法的同时，也排斥了另外一些方法。如果换一种思路，各种方法都紧紧围绕几个共同关心的关键性问题展开，同时，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具体的经验资料来检验，那么，不同的阶级分析框架也许会提供一个更好的概念框。如此看来，一个人在研究阶级流动问题时可能是一个韦伯主义者，但在研究阶级的生活方式时，他（她）可能变成了一个布迪厄主义者，而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他（她）还可能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译者：马磊（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①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当我们使用社会学理论进行概念识别时，规范性问题十分重要。例如，戈登索普就明确地质疑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中的规范性导向。他曾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述索伦森以租金为基础的（rent-based）阶级概念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一个脚注中，戈登索普指出了剥削概念"是一个在社会学的词汇表中消失了的词语，我本人非常乐意看到这一现象的发生"。他进一步辩论道："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里，这个词语把规范性主张和实证性的主张混为一谈，我认为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最后，他总结说："如果这个引起众多争议的概念（剥削）只不过表示了人们在零和冲突（zero-sum conflicts）中的对抗性利益的话，那么这一概念的使用虽然没什么坏处，但确实也没有太多的必要。"（Goldthorpe，2000，p. 1574）。

参考文献

Abbott, Andrew,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ccardo, Alain, 1997 *Introduction à une sociologie critique: Lire Bourdieu*, Bordeaux, Editions Le Mascaret.

Ainslie, George, 1992 *Picono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kerlof, G. A., 1982 "Labor Contracts as Partial Gift Exchang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2, pp. 543–69.

Aronowitz, Stanley, and William DiFazio, 1994 *The Jobless Fu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arley, Stephen R., 1995 "The Technician as an Occupational Archetype: A Case for Bringing Work into Organization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Stanford University.

Barnes, Barry, 1995 *The Elements of Social Theory*, London, UCL Press.

Barzel, Yoram, 1997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2nd ed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udrillard, J., 1988 *Selected Writ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 Poster, Cambridge and Oxford, Polity and Blackwell.

Baxter, J., and M. Western (eds.), 2001 *Configuration of Class and Gen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London, Sage.

Becker, Gary S., 1964 *Human Capital*,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ell, Daniel, 1976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The New Class: A Muddled Concept," pp. 455–468 in *Structured Social Inequality*, edited by Celia S. Heller, New York, Macmillan.

Bernstein, Basil, 1971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1,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lossfeld, Hans-Peter, 1992 "Is the German Dual System a Model for a Modern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33, pp. 168–181.

Boltanski, Luc, 1987 [1982] *The Making of a Class: Cadres in French Societ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ttero, W., and K. Prandy, 2003 "Social Interaction Distance and Stratif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2, pp. 177–197.
Bottomore, Tom, 1981 "A Marxist Consideration of Durkheim," *Social Forces* 59, pp. 902–917.
Bouglé, Célestin, 1926 *The Evolution of Values*, translated by Helen S. Sellar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71 [1927] *Essays on the Caste System by Célestin Bouglé*, translated by D. F. Pococ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66 "Condition de classe et position de classe,"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7:2, pp. 201–223.
1977 [1972]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pp. 1–17.
1988 [1984] *Homo Academicus*, translated by Peter Colli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a [1980]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b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Matthew Adams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ranslated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a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b [1994]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a *Contre-feux 2: Pour un mouvement social européen*, Paris, Editions Raisons D'Agir.
2001b [1998] *Masculine Domination*,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Interventions, 1961–2001: Science sociale et action politique*, Marseilles, Agone.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90 [197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J. 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urdieu, Pierre, Alain Accardo, Gabrielle Balazs, Stéphane Beaud, François Bonvin, Emmanuel Bourdieu, Philippe Bourgois, Sylvain Broccolichi, Patrick Champagne, Rosine Christin, Jean-Pierre Faguer, Sandrine Garcia, Remi Lenoir, Françoise Œvrard, Michel Pialoux, Louis Pinto, Denis Podalydès, Abdelmalek Sayad, Charles Soulié, and Loïc J. D. Wacquant,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ranslated by Priscilla Parkhurst Ferguson, Susan Emanuel, Joe Johnson, and Shoggy T. Wary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90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18:2 (June), pp. 165–222.

Bradley, Harriet, 1996 *Fractured Identitie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een, Richard, 1997 "Risk, Recommodif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Service Class," *Sociology* 31:3, pp. 473–489.

Breen, Richard, and John H. Goldthorpe, 2001 "Class, Mobility and Merit: The Experience of Two British Birth Cohort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2, pp. 81–101.

Breen, Richard, and David B. Rottman, 1995a *Class Stratific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5b "Class Analysis and Class Theory," *Sociology* 29:3, pp. 453–473.

Breiger, Ronald L., 1982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3, pp. 578–611.

Broom, L., and F. L. Jones, 1976 *Opportunity and Attainment in Australia*, Canberra, ANU Press.

Brubaker, Rogers, 1985 "Rethinking Classical Theory: The Sociological Vision of Pierre Bourdieu," *Theory and Society* 14:6, pp. 745–775.

Bryson, Bethany, 1996 " 'Anything but Heavy Metal': Symbolic Exclusion and Cultural Dislik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pp. 884–899.

Burawoy, Michael, and Erik Olin Wright, 2001 "Sociological Marxism," pp. 459–486 in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Jonathan Turner,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98 "Worker Displacement, 1995–1998," Labor Forces Statistics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news release, August 19, 1998,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Calhoun, Craig, and Loïc J. D. Wacquant, 2002 " 'Everything is Social': In Memoriam,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Footnotes* 30:2, pp. 5–10.

Calhoun, Craig, Edward LiPuma, and Moishe Postone (eds.), 1993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plow, Theodore, 1954 *The Sociology of Wor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archedi, Guglielmo, 1977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Casey, Catherine, 1995 *Work, Self,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Charlesworth, Simon J., 2000 *A Phenomenology of Working Class Experi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rk, Terry, N., 1996 "The Debate over 'Are Social Classes Dying?'," working paper, Conference on Social Class and Politics, Woodrow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Clark, Terry N., and Seymour M. Lipset, 1991 "Are Social Classes Dying?,"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6, pp. 397–410.

Clark T. N., and S. M. Lipset (eds.), 2001 *The Breakdown of Class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oase, Ronald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pp. 1–44.

Cohen, G. 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le, Robert E., 1979 *Work, Mobility, and Particip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leman, James S., 1990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Randall,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omte, Auguste, 1988 [1830] *Introduction to Positive Philosophy*, edited by Frederick Ferré, Indianapolis, Hackett.

Coser, Lewis A., 1992 "Introduction: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pp. 1–34 in *On Collective Memor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treel, Allin, 1984 *Social Class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Crook, S., J. Pakulski, and M. Waters, 1992 *Postmodernization: Change in Advanced Society*, London, Sage.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vishnah, and Mancur Olson, 1996 "The Coase Theorem is False: Coase's Insight is Nonetheless Mainly Right,"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D.

Dominitz, Jeff, and Charles F. Manski, 1997 "Perceptions of Economic Insecurity: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Economic Expecta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1, pp. 261–287.

Donnelly, Michael, 1997 *Statisical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Salience of Social Class*, pp. 107–131 in *Reworking Class*, edited by John R. Hal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ore, Ronald P., 1973 *British Factory –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Duncan, Otis Dudley, 1968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Problems in the Measurement of Trend," pp. 675–719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Eleanor B. Sheldon and Wilbert E. Moore, New York, Russel Sage Foundation.

Durkheim, Emile, 1933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1897]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John A. Spaulding and George Simps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0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lated by George Simps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6 [1911] "Jugements de valeur et jugements de réalité,"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19, pp. 437–453.
1958,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translated by C. Brookfield,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70a [1897] *Suicid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0b [1905] *La Science sociale et l'action*, edited by J. C. Filloux,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Durkheim, Emile, and Marcel Mauss, 1963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translated by Rodney Needha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der, K., 1993 *The New Politics of Class*, London, Sage.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Eggertsson, Thráinn, 1990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hrenreich, Barbara, and John Ehrenreich, 1977 "The 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Radical America* 11, pp. 7–31.
Emirbayer, Mustafa,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pp. 281–317.
Emmison, Michael, and Mark Western, 1990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Identity: A Comment on Marshall et al.," *Sociology* 24, pp. 241–253.
Erikson, Robert, 1984 "Social Class of Men, Women and Families" *Sociology* 18:4, pp. 500–514.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rikson, Robert, and Jan O. Jönsson (eds.), 1996 *Can Education be Equalized? The Swedish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Erikson, Robert, John H. Goldthorpe, and Lucien Portocarero, 197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pp. 1–34.
Esping-Andersen, Gösta, 1988 "The Making of a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pp. 35–66 in *Creating Social Democracy: A Century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in Sweden*, edited by Klaus Misgeld, Karl Molin, and Klas Amark,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Evans, Geoffrey, 1992 "Testing the Validity of the Goldthorpe Class Schem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 pp. 211–232.
1997 *The End of Class Politics? Class Vot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vans, Geoffrey, and Colin Mills, 1998 "Identifying Class Structure: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the Criterion-related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Goldthorpe Class Schem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4:1, pp. 87–106.
2000 "In Search of the Wage-Labour/Service Contract: New Evidence on the Validity of the Goldthorpe Class Schem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pp. 641–661.
Eyerman, Ron, 1994 "Modern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707–710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edited by David Grusk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Fantasia, Rick, 1989 *Cultures of Solidarity: Consciousness, Actio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rkers*,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atherman, David L., and Robert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Featherman, David L., F. Lancaster Jones, and Robert M. Hauser, 1975 "Assumptions of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 pp. 329–360.
Fenton, Steve, 1980 *Race, Class, and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Emile Durkheim*, Paris, UNESCO.
Filloux, J.-C., 1993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Durkheim's Sociology," pp. 211–228 in *Emile Durkheim: Sociologist and Moralist*, edited by Stephen P. Turn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ortin, Nicole M., and Thomas Lemieux, 1997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Rising Wage Inequality: Is There a Linkag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2 (spring), pp. 75–96.
Freeman, Richard, and James L Medoff, 1984 *What Do Unions Do?*, New York, Basic Books.
Freidson, Eliot, 1986 *Professional Powers: A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mal Knowled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rofessionalism Reborn: Theory, Prophecy, and Poli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eiger, Theodor J., 1932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oziographischer Versuch auf statistischer Grundlage*, Stuttgart, F. Enke.
Giddens, Anthony, 1971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Durkheim's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pp. 1–50 in *Emile Durkhiem: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nthony Gidde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8 *Emile Durkhei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3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ociology," pp. 40–67 in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ldthorpe, John H., 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A Response," pp. 399–440 in *John Goldthorpe: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edited by Jon Clark, Celia Modgil, and Sohan Modgil,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2000 *On Sociology: Numbers, Narrativ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Occupational Sociology, Yes: Class Analysis, No – A Comment on Grusky and Weedens' Research Agenda," *Acta Sociologica* 45, pp. 211–217.
Goldthorpe, John, and Keith Hope, 1974 *The Social Grading of Occupations: A New Approach and Sca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oldthorpe, John H., and Gordon Marshall, 1992 "The Promising Future of Class Analysis: A Response to Recent Critiques," *Sociology* 26:3, pp. 381–400.

Gordon, Milton M., 1958 *Social Class in American Soci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ouldner, Alvin,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Seabury Press.
Granovetter, Mark, and Charles Tilly, 1988 "Inequality and Labor Processes," pp. 175–221 in *Handbook of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Newbury Park, Sage.
Grusky, David B. (ed.), 2001 *Social Stratific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Grusky, David B., and Jesper B. Sørensen, 1998, "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5, pp. 1,187–234.
2001 "Are There Big Social Classes?," pp. 183–194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2nd edn., edited by David B. Grusk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Grusky, David B., and Kim A. Weeden, 2001 "Decomposition without Death: A Research Agenda for a New Class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 44, pp. 203–218.
2002 "Class Analysis and the Heavy Weight of Convention," *Acta Sociologica* 45, pp. 229–236.
Grusky, David B., Kim A. Weeden, and Jesper B. Sørensen, 2000 "The Case for Realism in Class Analysi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4, pp. 291–305.
Haiku, F. A., 1948 "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 in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Or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laby, Charles N., and David L. Weakliem, 1993 "Ownership and Authority in the Earnings Function: Nonnested Tests of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pp. 16–30.
Halbwachs, Maurice, 1992 [1945] *On Collective Memor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Glencoe, IL, Free Press.
Hall, Stuart, 1988 "Brave New World," *Marxism Today* (October 24–29).
2001 "The Meaning of New Times," pp. 859–65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2nd edn., edited by David B. Grusk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Hall, Stuart, and Martin Jacques, 1989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Hauser, Robert M., and John Robert Warren, 1997 "Socioeconomic Index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A Review, Update, and Critique," pp. 177–298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97*, edited by Adrian Raftery, Cambridge, UK, Blackwell.
Hawkins, M. J., 1994 "Durkheim on Occupational Corporations: An Exegesis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 pp. 461–481.
Hayek, F. A., 1948 "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 in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Or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ath, A. F., and N. Britten, 1984 "Women's Jobs do Make a Difference," *Sociology* 18: 4, pp. 475–490.
Hirsch, Fred, 1976 *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llingshead, August, and Frederick Redlich, 1958 *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Wiley.

Holton, Robert, 1996 "Has Class Analysis a Future?," pp. 26–41 in *Conflicts about Class: Debating Inequality in Late Industrialism*, edited by David J. Lee and Bryan S. Turn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Holton, Robert J., and Bryan S. Turner, 1989 *Max Weber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olzer, Harry J., 1990 "The Determinants of Employee Productivity and Earnings," *Industrial Relations* 29, pp. 403–422.
Hout, Michael, and Robert M. Hauser, 1992 "Symmetry and Hierarchy in Social Mobility: A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ASMIN Model of Class Mobilit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8, pp. 239–266.
Hout, Michael, Clem Brooks, and Jeff Manza, 1993 "The Persistence of Classe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8, pp. 259–277.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90 [196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ISCO-88*, Geneva, ILO.
Ishida, Hiroshi, 1993 *Social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Jap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encks, Christopher, Lauri Perman, and Lee Rainwater, 1988 "What is a Good Job? A New Measure of Labor Market Suc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pp. 1,322–357.
Jensen, Michael C., and Kevin J. Murphy, 1990 "Performance Pay and Top-Management Incen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pp. 225–265.
Joyce, Patrick, 1995 *Cla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hn, Chichi, Kevin M. Murphy, and Brooks Pierce, 1993 "Wage Inequality and the Rise in Returns to Skil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pp. 410–442.
Kalleberg, Arne L., and Ivar Berg, 1987 *Work and Industry: Structures, Markets and Processes*, New York, Plenum.
Kingston, Paul W., 1994 "Are There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41 i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13, edited by Robert Althauser and Michael Wallace, Greenwich, CT, JAI Press.
2000 *The Classless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ohn, Melvin L., and Kazimierz M. Slomczynski, 1990 *Social Structure and Self-Direction*, Oxford, Blackwell.
Konrad, György, and Ivan Széle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Korpi, Walter, 1983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London, Routledge.
Krause, Elliot A., 1971 *The Sociology of Occupa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Krueger, Alan B., and Lawrence H. Summers, 1987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Industry Wage Structure," pp. 17–47 in *Unemploy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s*, edited by Kevin Lang and Jonathan S. Leonar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amont, Michèle, 1992 *Money, Morals, and Manners: 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The Dignity of Working Men: Morali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Race, Class, and Immig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ne, Jeremy F., 2000 *Pierre Bourdieu: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Laraña, Enrique, Hank Johnston, and Joseph R. Gusfield, 1994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areau, Annette, and Elliot B. Weininger, 2003 "Cultur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ory and Society* 32:5–6, pp. 567–606.
Laumann, E. O., 1973 *Bonds of Pluralism*, New York, John Wiley.
Lawrence, Paul R., and Davis Dyer, 1983 *Renewing American Industry*, New York, Free Press.
Lazear, Edward P., 1995 *Personnel 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ee, David J., 1995 "Class as a Social Fact," *Sociology* 28, pp. 397–415.
Lee, David J., and Bryan S. Turner (eds.), 1996 *Conflicts about Class: Debating Inequality in Late Industrialism*, London, Longman.
Lehmann, Jennifer, 1995 "Durkheim's Contradictory Theories of Race, Class, and Sex,"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pp. 566–585.
Lenin, Vladimir I., 1927 *Collected Works of V. I. Leni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evy, Frank, and Richard J. Murnane, 1992 "U.S. Earnings Levels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A Review of Recent Trends and Proposed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0, pp. 1,333–381.
Lipset, S. M., 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Lipset, S. M., and S. Rokkan, 1967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pp. 1–64 i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S. M. Lipset and S. Rokkan, New York, Free Press.
Lockwood, David, 1992 *Solidarity and Sch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ove, Geoff, 1997 "The Diffusion of Downsizing among Large U.S. Firms, 1977–1995: The Role of Firm Status," Ph.D. dissertation, Joint Program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nd Departments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Lukes, Steven, 1973 *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Allen Lane.
Marshall, Alfred, 1949 [192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n., London, Macmillan.
Marshall, Gordon, David Rose, Howard Newby, and Carolyn Vogler, 1988 *Social Class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Unwin Hyman.
Marshall, T. H., 1950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x, Karl, 1959a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p. 315–355 in *Capital,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Other Writings by Karl Marx*, edited by Max Eastma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59b [1894] "Capital, Volume 3, Chapter 9," pp.54–59 in *Capital,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Other Writings by Karl Marx*, edited by Max Eastma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64 [1894] *Selected Works: Volume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edoff, James J., and Katherine Abraham, 1981 "Are Those Paid More Really More Productiv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6, pp. 186–216.
Meštrović, Stjepan G., 1992 *Durkhei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Mills, C. W., 1951 *White Colla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6 *The Power Elit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Daniel J. B., 1985 "Shifting Norms in Wage Determin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Mortimer, Jeylan T., and Jon Lorence, 1995 "Social Psychology of Work," pp. 497–523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sychology*, edited by Karen S. Cook, Gary A. Fine, and James S. Hous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Mouzelis, Nicos, 1993 "The Poverty of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y* 27, pp. 675–695.
Müller, Hans-Peter, 1993 "Durkheim's Political Sociology," pp. 211–228 in *Emile Durkheim: Sociologist and Moralist*, edited by Stephen P. Turn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Murphy, Raymond, 1988 *Social Closure: The Theory of Monopolization and Exclus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yles, John, Garnett Picot, and Tedd Wannell, 1988 "The Changing Wage Distributions of Jobs," *Canadian Economic Observer* 4, pp. 4.2–4.12.
Nakane, Chie, 1970 *Japanese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Nelson, Robert L., and William P. Bridges, 1999 *Legalizing Gender Inequality: Courts, Markets, and Unequal Pay for Women in Americ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isbet, Robert A., 1952 "Conservatism and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pp. 167–75.
North, Douglass, and Robert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Western Capit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ssowski, S., 1963 [1958] *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London, Routledge.
Pahl, R. E., 1989 "Is the Emperor Naked? Some Questions on the Adequacy of Sociological Theory in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3, pp. 709–720.
Pakulski, J., 2001 "Class and Politics" pp. 36–49 in *The Breakdown of Class Politics*, edited by T. N. Clark and S. M. Lipse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Globalizing Inequality*, Sydney, Allen and Unwin.
Pakulski, Jan, and Malcolm Waters, 1996a *The Death of Clas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b "The Reshaping and Dissolution of Class in Advanced Society," *Theory and Society* 25:5, pp. 667–691.
1996c "Misreading Class as Status: A Reply to Our Critics," *Theory and Society* 25, 731–736.
Parkin, Frank,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 New York, Praeger.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Durkhei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sons, Talcott, 1949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Pure and Applied*,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4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pp. 69–88 in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7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Equality and Inequality in Modern Society, or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visited," pp. 13–72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edited by Edward O. Lauman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mpany.
Pearce, Frank, 1989 *The Radical Durkheim*, London, Unwin Hyman.
Perkin, H., 1989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Peterson, Richard A., and Roger M. Kern, 1996 "Changing Highbrow Taste: From Snob to Omnivo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pp. 900–907.
Piore, Michael J., and Charles F. Sabel,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Pope, Whitney, and Barclay D. Johnson, 1983 "Inside Organic Solidar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pp. 681–692.
Portes, Alejandro, 2000 "The Resilient Importance of Class: A Nominalist Interpretation," pp. 249–284 in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14, edited by Diane E. Davis, Amsterdam, JAI Press.
Poulantzas, Nicos, 1974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Prandy, Kenneth, 1999 "The Social Interaction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19, pp. 215–249.
Przeworski, Adam, 1985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snick, Stephen, and Richard Wolff, 1987 *Knowledge and Cl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cardo, David, 1951 [1821]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Vol. 1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ited by Piero Sraff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emer, John,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Should Marxists Be Interested in Exploitation?," pp. 260–282 in *Analytical Marxism*, edited by John E. Roem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uanet, H., W. Ackermann, and H. Le Roux, 2000 "The Geometric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s. The Lesson of Bourdieu's *La Distinction*," Bulletin de méthodologie sociologique 65, pp. 5–18.
Ryan, William, 1971 *Blaming the Victim*, New York, Orbach and Chambers.
Ryscavage, Paul, and Peter Henle, 1990 "Earnings Inequality Accelerates in the 1980's," *Monthly Labor Review* 113:12, pp. 3–16.
Rytina, Steven, 2000 "Is Occupational Mobility Declining in the U.S.?," *Social Forces* 78, pp. 1,227–276.
Sartori, G., 1969 "From the Sociology of Politics to Political Sociology," pp. 65–100 in *Polit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S. M. Lips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unders, Peter, 1989 "Left Write in Sociology," *Network* 44, pp. 3–4.
Schneider, Louis, and Sverre Lysgaard, 1953 "The Deferred Gratification Patter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2, pp. 142–149.
Scott, J., 1996 *Stratific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UK, Polity.

Shavit, Yossi, and Hans-Peter Blossfeld (eds.), 1993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Shils, E., 1968 "Deference," pp. 104–132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edited by J. A. Jack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mel, Georg, 1908 *Soziologie*, Leipzig, Duncker & C. Humblot.
Simon, Herbert, 1957 "The Employment Relation," pp. 24–45 in *Models of Man*, New York, Wiley.
Smith, Adam, 1991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Amherst, NY, Prometheus.
Smith, Philip, and Jeffrey C. Alexander, 1996 "Durkheim's Religious Reviv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pp. 585–592.
Solow, Robert M., 1979 "Another Possible Source of Wage Stickines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2, pp. 79–82.
Sørensen, Aage B., 1983 "Processes of Allocation to Open and Closed Positions in Social Structur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2, pp. 203–224.
1991 "On the Usefulness of Class Analysis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Acta Sociologica* 34:2, pp. 71–87.
1994 "The Basic Concepts of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Class, Status, and Power," pp. 229–241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David B. Grusk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Social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5, pp. 1,333–365.
1998 "On Kings, Pietism and Rent-seeking in Scandinavian Welfare States," *Acta Sociologica* 41:4, pp. 363–376.
2000 "Toward a Sounder Basis for Class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6, pp. 1,523–558.
Sørensen, Jesper B., and David B. Grusky, 1996 "The Structure of Career Mobility in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pp. 83–114 in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y*, edited by James N. Baron, David B. Grusky, and Donald J. Treim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Spenner, Kenneth I., 1995 "Technological Change, Skill Requirements, and Education: The Case for Uncertainty," pp. 81–137 in *The New Modern Times: Factors Reshaping the World of Work*, edited by David B. Bill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tanworth, M., 1984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John Goldthorpe," *Sociology* 18:2, pp. 159–170.
Stewart, A., K. Prandy, and R. M. Blackburn, 1980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Occupations*, London, Macmillan.
Swartz, Davi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wift, Adam, 2001 *Equality, Freedom and Commu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Therborn, Göran, 1988 "A Uniqu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Sweden," pp. 1–34 in *Creating Social Democracy: A Century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in Sweden*, edited by Klaus Misgeld, Karl Molin, and Klas Amark,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E. P. 1966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Thompson, K., 1982 *Emile Durkheim*, London and New York, Tavistock/ Routledge.
Tiryakian, Edward A., 1975 "Neither Marx nor Durkheim . . . Perhaps Web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pp. 1–33.
Tocqueville, A. de, 1945 [1862] *Democracy in America*, London, Longman.
2000 [1835]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Bantam.
Treiman, Donald 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Tullock, Gordon, 1980 "The Transitional Gains Trap," pp. 211–121 in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 Seeking Society*, edited by James S.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 Economics of Special Privilege and Rent Seeking*,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Tumin, M. M., 1953 "Reply to Kingsley Dav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pp. 372–384.
Turner, Bryan S., 1988 *Status*,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 Outline of a Theory of Citizenship," *Sociology* 24:2, pp. 189–217, 190.
1996 "Capitalism, Classes and Citizenship," pp. 254–262 in *Conflict about Class*, edited by D. J. Lee and B. S. Turner, Harlow, Longman.
2001 "The Erosion of Citizenship,"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2:2, pp. 189–209.
Van Maanen, John, and Stephen R. Barley, 1984 "Occupational Communities: Culture and Control in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6, pp. 287–365.
Visser, Jelle, 1988 "Trade Unionism in Western Europ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Labour and Society* 13, pp. 125–182.
Wacquant, Loïc J. D., 1991 "Making Class: The Middle Class(es)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pp. 39–64 in *Bringing Class Back in: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Scott G. McNall, Rhonda F. Levine, and Rick Fantasi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2 "From Slavery to Mass Incarceration: Rethinking the 'Race Question' in the US," *New Left Review* 13, pp. 41–60.
Warner, W. Lloyd, Marchia Meeker, and Kenneth Bells, 1949 *Social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es.
Waters, M., 1991 "Collapse and Convergence of Marxist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20, pp. 141–172.
Watts Miller, W., 1996 *Durkheim, Morals and Modernity*, London, UCI Press.
Weber, Max, 1968a [1946] *From Max Weber*, translated by Hans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8b [1922]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c [1946] "Class, Status and Power," pp. 180–195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Hans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922]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eden, Kim A., and David B. Grusky, 2002 "Class Structu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Weininger, Elliot B. 2002 "Class and Causation in Bourdieu," pp. 49–114 in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vol. 21, edited by Jennifer Lehmann, Amsterdam, JAI Press.
Wesolowski, W., 1977 *Klasy, warstwy i wladza*, Warsaw, PWN (translated as *Classes, Strata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78).
Wilensky, Harold L., 1966 "Class,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American Workers," pp. 12–44 in *Labor in a Changing America*, edited by William Haber, New York, Basic.
Wolff, Edward N., 1995 *Top Heavy: A Study of Increasing Inequality of Wealth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Wright, Erik Olin,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a "Class and Occup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9, pp. 177–214.
1980b "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9:3, pp. 323–370.
1982 "The Status of the Political in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11:3, pp. 321–352.
1985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Verso.
1996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Class Analysis," *Theory and Society* 25, pp. 697–716.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Working-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January), pp. 957–1 002.
2002 "The Shadow of Exploitation in Weber's Class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pp. 832–853.
Wright, Erik Olin, Andrew Levine, and Elliott Sober, 1993 *Reconstructing Marxism*, London, Verso.
Wright, Erik Olin *et al.*, 1989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Verso.
Wrong, D., 1976 [1964] *Skep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Zabusky, Stacia E., and Stephen R. Barley, 1996 "Redefining Success: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on the Careers of Technicians," pp. 185–214 in *Broken Ladders: Managerial Careers in the New Economy*, edited by Paul Oster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eitlin, Irving M., 1968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术语表

安德鲁·艾伯特(Abbot, Andrew) 73, 77, 128
凯瑟琳·亚伯拉罕(Abraham, Katherine) 176
艾伦·阿卡多(Accardo, Alain) 128
阿克曼(Ackermann, W.) 102
乔治·安思丽(Ainslie, George) 160
阿克罗夫(Akerlof, G. A.) 44
杰弗里·亚历山大(Alexander, Jeffrey) 58, 61
资产特征和阶级(asset-specificity, and class) 42
斯蒂芬·巴利(Barley, Stephen) 72, 80
巴瑞·巴恩斯(Barnes, Barry) 71
约拉姆·巴泽尔(Barzel, Yoram) 143, 152-154, 158, 178
让·波德里亚(Baudrillard, Jean) 212
奥利奇·贝克(Beck, Ulrich) 202
加里·贝克尔(Becker, Gary) 168
丹尼尔·贝尔(Bell, Daniel) 145
肯尼斯·贝尔斯(Bells, Kenneth) 144
巴塞尔·伯恩斯坦(Bernstein, Basil) 83
汉斯-皮特·布洛斯菲尔德(Blossfeld, Hans-Peter) 57, 74
鲁克·波坦斯基(Boltanski, Luc) 125
温迪·博泰罗(Bottero, Wendy) 201
汤姆·包特摩尔(Bottomore, Tom) 61, 62, 64
泽兰斯汀·布格尔(Bouglé, Célestin) 68
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 Pierre) 68, 83, 89, 91, 95-133, 136-140, 170
资本,概念与变异(capital in, concept and varieties) 101-104
原因的复杂性(causal complexity in) 127-129
阶级的解释作用(causal role of class in) 129-133
阶级行动者(class agency in) 108-112, 133-138
阶级分析(class analysis in) 95-140
阶级与身份(class and status in) 97-98, 112
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 in) 101-105
阶级划分斗争(classificatory conflicts in) 112-120
阶级的"建构主义"维度(constructivist dimension of class in) 136
文化与阶级(culture and class in) 114
阶级的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lass in) 121
场域(field in) 112
性别与阶级(gender and class in) 129-133
惯习与阶级(habitus and class in)

105 -108
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 in) 120 - 126,139 - 140
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 in) 112 -120
萨姆·鲍尔斯(Bowles, Sam) 31, 166,170,
哈里特·布兰德利(Bradley,Harriet) 79
哈里·布雷弗曼(Braverman, Harry) 168
理查德·布林恩(Breen,Richard)序言第3页,34,45,53,55,57
罗纳德·布雷格(Breiger,Ronald) 49
威廉姆·布里吉斯(Bridges,William) 88
恩·布里顿(Britten,N.) 54
克莱姆·布鲁克斯(Brooks,Clem) 77
罗格斯·布鲁贝克(Brubaker, Rogers) 95
迈克·布洛维(Burawoy,Michael) 2
克里格·卡尔霍恩(Calhoun,Craig) 95

资本(capital)

布迪厄的阶级与资本概念(class and, in Bourdieu) 101 - 104
资本构成(composition of) 103
资本总量(volume of) 103
资本主义,阶级关系(capitalism, class relations in) 9,228
古列尔莫·卡尔切蒂(Carchedi, Gugliemo) 2
凯瑟琳·凯西(Casey,Catherine) 72,74
公民权与阶级(citizenship, and class) 196
泰利·克拉克(Clark. Terry) 59.182, 204,210.214

阶级(class)

学术讨论中的模糊性(ambiguity in academic discussion)序言第2页
大众想象中的模糊性(ambiguity in popular imagination)序言第1-2页
阶级和异化(and alienation) 69
阶级和资产特征(and asset-specificity) 42
阶级和态度、生活方式(and attitudes and lifestyles) 91 见词条"布迪厄":惯习 (in Bourdieu: *see* habitus)
阶级与公民权(and citizenship) 196
阶级与民主(and democracy) 196
阶级与教育(and education) 195 另参见词条"教育"(*see* also education)
阶级与性别(and gender) 196 - 197
阶级与不平等(and inequality) 144 - 152
原因的多样性(multiplicity of causes) 194 - 195,205 - 208
阶级与劳动契约(and labor contract) 42 -43
阶级与生活机会(and life chances) 35 - 37,145,155,159 - 162,222 - 226
阶级与市场(and market) 36
涂尔干的阶级与职业团体(and occupational association, in Durkheim) 65 - 66,72 - 73
涂尔干的阶级与职业(and occupation, in Durkheim) 71 - 72
阶级与种族(and race) 197 - 198
与服务关系(service relations) 41 - 42
与符号权利(symbolic power)见"布迪厄",120
与国家(the state)见"布迪厄" 193, 123 -124
用作名词和形容词(as a noun and as an

adjective)　6
流动的边界(boundaries,shifting)　212
概念(concepts of)　2-4,144-152,184-185
阶级位置之间的差异(difference between class location)　19
政党的差异(difference between party)见"韦伯",36-37
地位群体的差异(difference between status group)见"韦伯",36,"布迪厄",97-98,111-112
推演式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ion)见"布迪厄",120-126,136-137
影响(influence of)　57,83,160-161 弱化的影响,205-208,208-211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Marxist concept of)　24-26
流动(mobility)　223 见"布迪厄",104
客观性和主观性(objective vs. subjective)　202,220-222
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 of)　39-41
关系型和等级序列性的观点(relational vs. gradational concepts of)　223
分类框架(schema)　39-41
分解的层次(level of disaggregation)　88-91
轨迹(trajectories)见"布迪厄",104

阶级行动者(class agency)
参见布迪厄的阶级分析　108-112
参见涂尔干主义的阶级分析　78-82
参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21-22
参见基于租的阶级分析　172-177
工会(unions)　147

阶级分析(class analysis)
与历史比较分析(historical/comparative analysis)　32-33
路径(approches to)　3-4,216-229
布迪厄的路径:参见布迪厄的阶级分析
批评(critique of)　181-183
定义的路径(definitional approach to)　34-35
分配性位置(disributional location)　220
涂尔干主义的路径:参见涂尔干主义的阶级分析
解放(emancipation)　229-230
解释性目标(explanatory goals)　22-24,184-185,216-230
关键问题(key questions of)　216-230
宏观和微观(macro-and micro-)　20-21,62-66,70,75-84,88-94
马克思主义:参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阶级分析
唯名论路径(nominal approach to)　34-35,58-59,144
后-(post-):参见后阶级分析
唯实论路径(realist approach to)　59,76-78
基于租的(rent-based)　141-179
单位(unit of)　54-55
韦伯主义:参见韦伯主义的传统阶级分析

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
不同的路径(different approaches to)　226-227
参见马克思,22,30-31
参见布迪厄,138

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
参见涂尔干主义传统,66-69,79-80
参见马克思主义传统,21
参见韦伯主义传统,37

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s) 22
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s) 21

阶级位置(class locations)
把个人分配到阶级位置上(allocation of people to) 17
经济活动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23
与收入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ncome) 23
与职业(occupations) 48－54
与主观经验(subjective experiences) 14
复杂性(complexities) 14－15,18－20 来源(sources of) 15－20
矛盾(contradictory) 15－20
阶级的不同(differences between classes) 19－20,
家庭(families) 18
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分析 13
数量(numbers of) 19
阶层(strata) 17－18
短暂性(temporality of) 17
两分模型(two-class model of) 14－15

阶级关系(class relations)
与权力(power) 31
与产权(property rights) 11－12
连接(articulation) 12
胁迫和应许(coercion and consent) 31－32
不同阶级关系的共存(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10－11
复杂性(complexities) 10－13
历史性变化(historical variation of) 227－229
意识形态(ideologies) 32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in capitalism) 9
在封建制下(in feudalism) 9
在奴隶制下(in slavery) 9
相互渗透性(interpenetration of) 12
间接性位置(mediating locations within) 18
权力(利)(rights and powers in) 15－16
阶级关系的多样性(variations in) 9－10
阶级处境(class situation)见“韦伯”,39

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 19－20
其中的跨国的差异(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74－75
其中的雇员(employees in) 43
其中的农民(farmers in) 43
德国(German) 74－75
参见布迪厄 101－105
其中的中间层次的群体类型(intermediary groups in) 63
日本(Japanese) 74－75
大业主阶级(large employers in) 46
小资产阶级(pretty bourgeoisie in) 43
自雇者(self-employed in) 43
雇佣人数较少的阶级(小业主)(small employers in) 43
小业主(small proprietors in) 43
瑞典(Swedish) 74－75
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见“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
罗纳德·科斯(Coase, Ronald) 167
阶级关系中的胁迫(coercion, in class relations) 31－32
G·A·柯亨(Cohen, G. A.) 1,4
罗伯特·科尔(Cole, Robert) 74
詹姆斯·科尔曼(Coleman, James) 154

集体行动，阶级（collective action, and class）见阶级“行动者”（class agency）
兰德尔·柯林斯（Collins, Randall） 80
奥古斯特·孔德（Comte, Auguste） 69
共同体和社会分层（communitie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200－202
冲突（conflict）见“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
阶级关系中的应许（consent, in class relations） 31－32
消费和阶级式微（consumption, and decline of class） 212
刘易斯·科塞（Coser, Lewis） 68
艾林·考特里尔（Cotreel, Allin） 2
文化和阶级，布迪厄（culture, and class, in Bourdieu） 114
拉尔夫·达伦多夫（Dahrendorf, Ralf） 61,63,72,141,149,153,198,210
去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 205－208
阿维什纳·迪西特（Dixit, Avishnah） 167
支配和剥削（dom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27
杰夫·多米尼兹（Dominitz, Jeff） 161
迈克尔·唐纳利（Donnelly, Michael） 99,124
罗纳德·多尔（Dore, Ronald） 74
O·邓肯（Duncan, O.） 61
爱弥儿·涂尔干（Durkheim, Emile） 120, 190, 201, 213 阶级分析（class ananlysis）见“涂尔干阶级分析”（Durkheimian class anaysis）

涂尔干阶级分析（Durkheimian class anaysis） 58－88
异化（alienation in） 69
和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 80
作为后阶级分析的前身（as precursor of post-class analysis） 188－191
态度和生活方式（attitudes and styles in） 68
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 66－69, 79－80
阶级概念（concept of class in） 62－71
剥削（exploitation in） 84－88
中间层次的群体类型（intermediary groups in） 63
宏观和微观的分析路径（macro vs. micro approach in） 58－66, 70, 75－84, 88－94
道德多态化（moral polymorphism in） 68
职业团体（occupational association in） 65－66,72－73
职业（occupation in） 71－72, 75, 189－196
职业内部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 within occupation in） 69－71
K·埃德（Eder, K.） 202
教育（education）
和阶级（and class） 195－196 布迪厄，122－123
基于学历文凭的寻租（rents on credentials and） 171
计件工资（efficiency wage） 44
思拉恩·埃格特森（Eggertsson, Thrainn） 153
巴巴拉·埃伦赖希（Ehrenreich, Barbara） 76
约翰·埃伦赖希（Ehrenreich, John） 76
精英理论（elite theory） 193
穆斯塔法·爱默贝尔（Emirbayer, Mustafa） 99

迈克尔·艾米森(Emmison, Michael) 79
阶级结构中的雇员(employees, in class structure) 43

雇主(employers)
大业主,阶级结构(large, in class structure) 46
小业主,阶级结构(small, in class structure) 43

剥削(exploitation)
和占用原则(and appropriation principle) 25
和支配(and domination) 27
和排他性原则(and exclusion principle) 25
和逆向相互依赖的福利原则(and inverse interdependent welfare principle) 25
和压制(and oppression) 25
涂尔干的概念(Durkheim's concept of) 84-88
马克思的概念(Marxist concept of) 24-27 评论(critique of) 142,148-152
租的理论(rent theory of) 162-172
罗伯特·埃里克森(Erikson, Robert) 19,41,43,46,50-51,53,55,57,76,89,93,141,145,162,172,178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 Gosta) 74-75
杰弗里·伊万斯(Evans, Geoffrey) 51,52,53,57,77,93
罗恩·艾尔曼(Eyerman, Ron) 145
家庭和阶级结构(families, and class structure) 18,54
里克·方塔西亚(Fantasia, Rick) 135
阶级结构中的农民(farmers, in class structure) 44
戴维·费瑟曼(Featherman, David) 61,76,89
史蒂夫·芬顿(Fenton, Steve) 61
封建主义和阶级关系(feudalism, class relations in) 11,228
场域,布迪厄的概念(field, concept of, in Bourdieu) 111
J·C·费尔沃(Filloux, J. C.) 61
灵活的专业化和变动的阶级边界(flexible specialization, and shifting class boundaries) 212
尼科尔·福廷(Fortin, Nicole) 175
理查德·弗里曼(Freeman, Richard) 166,174
埃利奥特·弗雷德逊(Freidson, Eliot) 72,80
西奥多·盖格(Geiger, Theodor) 146
性别和阶级(gender, and class) 197-198 布迪厄(in Bourdieu) 129-133
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 Anthony) 35,61,66,82,141,147,163,194
赫伯特·金帝斯(Gintis, Herbert) 31,166,170
约翰·戈德索普[戈登索普].3,16,19,29,35,41-54,57,141,143,145-146,150,160-163,178,218,225,230 阶级框架,41-48,145-147
艾尔文·古德纳(Gouldner, Alvin) 2,164
马克·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ark) 77
戴维·格伦斯基(Grusky, David) 4,58,60,63,74,78,83,84,87,89,92,93,94,105,124,137,145,219

约瑟夫·古斯菲尔德（Gusfield, Joseph） 81
布迪厄章节，惯习，阶级（habitus, and class, in Bourdieu） 105-108
査尔斯·哈拉比（Halaby,Charles） 77
莫里斯·阿尔布瓦克斯（Halbwachs, Maurice） 68
斯图亚特·霍尔（Hall, Stuart） 59, 67,79
罗伯特·豪瑟（Hauser,Robert） 61,76, 78,89,90,160
霍金斯（Hawkins, M. J.） 61,62,65, 67,73
哈耶克（Hayek,F.） 147
希思（Heath,A.） 54
彼得·亨勒（Henle,Peter） 176
弗雷德·赫希（Hirsh,Fred） 166
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 1,2,33,37,227
历史/比较分析，阶级分析（historical/comparative analysis,and class analysis） 32
奥古斯特·霍林斯黑德（Hollingshead, August） 89
罗伯特·霍尔顿（Holton,Robert） 63, 82,94,200
亨利·霍尔泽（Holzer,Harry） 176
基斯·霍普（Hope,Keith） 160
米歇尔·豪特（Michael,Hout） 77,160
意识形态，阶级关系（ideology,and class relations） 32
意识形态，阶级（identity,and class）见阶级(Class)
个人主义，阶级衰落（individualism, and decline of class） 186
不平等，阶级 见阶级(Class)生活机会(life chances)
阶级与非阶级（class and classless） 185-193
复杂社会（complex social） 194
阶级结构中的中间层次群体（intermediary groups, in class structure） 63
浩史·石田(Ishida,Hiroshi) 74
克里斯多夫·詹克斯（Jencks, Christopher） 89
米歇尔·詹森（Jensen,Michael） 177
兰开斯特·琼斯（Jones, F. Lancaster） 61,205
巴克利·约翰逊（Johnson, Barclay） 61,67
汉克·约翰斯顿（Johnston,Hank） 81
简·乔森（Jönsson,Jan） 145,172
帕特里克·乔伊斯（Joyce,Patrick） 59
迟迟·尤恩(Juhn,Chichi) 176
罗格·科恩（Kern,Roger） 115
保罗·金斯顿（Kingston, Paul） 59, 78,83
梅尔文·科恩（Kohn,Melvin） 83,89
卢卡奇·康拉德（Konrad,György） 164
沃尔特·科尔皮（Korpi,Walter） 81
伊里亚德·克劳斯（Krause, Elliot） 72
劳动协议，阶级（labor conract,and class） 41,42
劳动力市场中的租（labor market, rent in） 170-172，近期变化与阶级（rent changes in,and class） 174-177,194
米歇尔·拉蒙（Lamont,Michele） 58,83
杰里米·雷恩（Lane, Jeremy） 111, 115,118
恩里克·拉让娜(Larana,Enrique) 81
安尼特·拉里奥（Lareau, Annette） 102

爱德华·劳曼(Laumann, E. O.) 194
爱德华·拉齐尔(Lazear, Edward) 169
赫乌·勒鲁(Le Roux,H.) 102
戴维·李(Lee, David) 59,61
詹妮弗·莱曼(Lehmann, Jennifer) 61,86
托马斯·勒米厄(Lemieux, Thomas) 175
安德鲁·莱文(Levine, Andrew) 2
弗兰克·列维(Levy, Frank) 176
生活机会,阶级(life chances, and class) 35-36,144,155,159-162,222-226
西摩尔·李普塞特(Lipset, Seymour M.) 59,182,204,210,214
爱德华·李普玛(LiPuma, Edward) 95
戴维·洛克伍德(Lockwood, David) 61,62
乔恩·洛伦斯(Lockwood, Jon) 80
杰夫·拉伍(Love, Geoff) 175
史蒂文·卢克斯(Luckes, Steven) 61,64
斯韦尔·里斯伽德(Lvsgaard, Sverre),160
查尔斯·曼斯基(Manski, Charles) 161
杰夫·蒙扎(Manza, Jeff) 77
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阶级(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and class) 151
市场,阶级见“韦伯”(market, and class, in Weber) 37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Marshall, Alfred) 35,158,168
戈登·马歇尔(Marshall, Gordon) 35,48,72,77,82,145
马歇尔(Marshall, T. S.) 197
卡尔·马克思(Marx, Karl) 3,64,71,135,142,179,226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传统(Marxist tradition of class analysis) 1-33
的优点(advantages of) 30-33
与资本主义(and capitalism) 6
与阶级位置(and class locations) 13
与阶级关系(and class relations) 8
与生产的社会关系(and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7-8
与韦伯主义阶级分析(and Weberian class analysis) 27-29,143
的反资本主义命题(anti-capitalism thesis of) 5
中的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 in) 30-31,226-227
中的阶级概念(concept of class in) 24-27
所受的批评(critique of) 162-173
中的解放(emancipation in) 229
中交换与生产的联系(exchange and production linkage in) 30
的解释性的主张(explanatory claims of) 22-24,147-152
的历史可能性命题(historical possibility thesis of) 5
中阶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historical variation of class relations in) 224
的道德承诺(moral commitments of) 3-6
的激进的平均主义命题(radical egalitarian thesis of) 4
与托克维尔传统的比较(vs. Tocquevillian tradition) 185
詹姆斯·梅多夫(Medoff, James) 174,176
赖特·米尔斯(Mills, C. Wright) 198
科林·米尔斯(Mills, Colin) 51,52,53
监管困难(monitoring difficulty of work)

42,43,44
道德的多态化(moral polymorphism),在涂尔干阶级分析中(in Durkheimian class analysis) 67
雷蒙德·墨菲(Murphy, Raymond) 38, 141,147
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 182,196
职业协会(occupational associations),在涂尔干阶级分析中(in Durkheim) 70-73,79,81,82,86,166
职业的阶级定位(Occupations and class location),在韦伯主义阶级传统中(in Weberian tradition) 51
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在涂尔干阶级分析中(in Durkheim) 69-70
曼瑟·奥尔森(Olson, Mancur) 167
压迫与剥削(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马克思主义传统(in Marxist tradition) 26
斯坦尼斯洛·奥索沃斯基(Ossowski, Stanislaw) 141,150,205
简·帕库尔斯基(Pakulski, Jan) 4, 181,208
弗兰克·帕金(Parkin, Frank) 29,38, 80,141,147,191,195,124. 137, 160, 163
塔尔科特·帕森斯(Parsons, Talcott) 201
政党与阶级(party and class),在韦伯主义阶级传统中(in Weber) 36-37
哈罗尔德·帕金(Perkin, Harold) 195
理查德·彼得森(Peterson, Richard) 115
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ie),在阶级结构分析中(in class structure) 36
亚历山大·普提斯(Portes, Alejandro) 137
后阶级分析(post-class analysis) 181-215
公民权(citizenship in) 182
阶级与无阶级的不平等(class and classless inequality) 187,205
阶级基础(classic foundations of) 214
共同体和群体(communities and groups) 200
消费(consumption) 211,212
民主(democracy) 185-186
多重维度形成不平等(multiplicity of generators of inequality) 208
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 188-190,201,209-213
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 192, 194-195,197,198,201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在阶级的批评中(in critique of class) 58-59,81, 83,92,93,145,196
波斯妥恩(Postone, Moishe) 95
权力(Power),在韦伯主义阶级传统中(in class relations) 36
符号(symbolic)见"符号权力"(see symbolic power) 101,120-121
财产权与阶级(property rights, and class) 143
亚当·普沃斯基(Przeworski, Adam) 117
种族与阶级(race, and class) 181-182

基于租的阶级分析(rent-based class analysis) 141-180
阶级行动(class agency) 147
租与剥削阶级(rent and exploitation

classes) 152
财富与阶级(wealth and class),在基于租的阶级分析中(in rents) 165.173-4,179

租
与阶级,在涂尔干分析中(and class in Durkheim) 84-86
与生活条件(life conditions) 143-144
概念(concept of rents) 152-172
雇佣租(on employment) 158,161
垄断租(on monopoly) 164
资产专用性租(on asset-specificity) 168
文化禀赋租(on cultural endowments) 170
自然天赋租(on natural endowments) 170
暂时性和持久性(temporary and enduring) 147
以及财富和剥削(wealth, exploitation and) 148-159
雷斯尼克·史蒂文(Resnick Stephen) 2
重新分层(restratification) 211
约翰·罗默(Roemer, John) 142,150-151
罗侃(Rokkan, S) 203
保罗·瑞斯卡维奇(Ryscavage, Paul) 176
史蒂芬·赖蒂娜(Rytina, Steven) 40,93
查尔斯·萨贝尔(Sabel, Charles) 212
乔瓦尼·萨托利(Sartori, Giovanni) 204
彼得·桑德斯(Saunders, Peter) 79
路易斯·施奈德(Schneider, Louis) 160
约翰·斯科特(Scott, John) 194
自我雇佣,在阶级结构中(self-employed, in class structure) 43
服务关系和阶级(service relation, and class) 43
约西·沙维特(Shavit, Yossi) 57
爱德华·希尔斯(Shils, Edward) 196
乔治·齐美尔(Simmel, Georg) 142,213
奴隶制,阶级关系中的(slavery, class relations in) 11
卡西米尔兹·斯洛姆琴斯基(Slomczynski,Kazimierz) 83,89
小业主,在阶级结构中(small proprietors, in class structure) 43
菲利普·史密斯(Smith, Philip) 61,69
埃利奥特·索伯(Sober, Elliott) 2
社会闭合(social closure) 198
社会集聚(social clusters) 198
社会分化与阶级消亡(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decline of class) 211
社会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Marxist tradition) 8-9
罗伯特·索洛(Solow, Robert) 170
肯尼思·斯潘纳(Spenner, Kenneth) 73
奥格·索伦森(Sørensen, Aage),杰斯珀·索伦森(Sørensen, Jesper) 58,60,93,89,26,78,87, 141,34,145,94,39,166,177,84,74,151,170.61
M·斯坦沃斯(Stanworth, M.) 54
身份与阶级,参见"布迪厄"(state, and class, in Bourdieu) 111
地位群体,与阶级的区别(status group, difference between class and) 36-7
A·斯图尔德(Steward, A.) 194
阶级和阶级位置(strata, and class locations) 19

分层(stratification)
的复杂成因(complex causes of) 205-208,在布迪厄中的(in Bourdieu)
中的当代变化(contemporary changes in) 203-205
混合的(hybrid) 206
在后阶级分析(in post-class analysis) 中的 205-208
劳伦斯·萨默斯(Summers, Lawrence) 170
戴维·斯沃兹(Swartz, David) 95
亚当·斯威夫特(Swift, Adam) 4
符号权力和阶级,参见"布迪厄"(symbolic power, and class, in Bourdieu) 120-126,138-139
符号暴力和阶级,参见"布迪厄"(symbplic violence, and class, in Bourdieu) 112-120
伊万·撒列尼(Szélenyi) 164
罗伯特·托马斯(Thomas, Robert) 158
E·P·汤普森(Thompson, E. P.) 61,135,136
查尔斯·梯利(Tilly, Charles) 77
爱德华·梯瑞亚基安(Tiryakian, Edward) 61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Tocqueville, A. de) 73,196,在阶级和不平等中(class and inequality in) 181,与马克思传统相对(vs. Marxist tradition) 185
戈登·塔洛克(Tullock, Gordon) 165,167
布赖恩·特纳(Turner, Bryan) 59,63,82,94,197,200
约翰·范梅能(Van Maanen, John) 72
菲利普·范帕利斯(Van Parijs, Philippe) 16
杰尔·维瑟(Visser, Jelle) 72
洛伊克·华康德(Wacquant, Loïc) 97,102,104,106,112,120,125,126,130,131,133,137,138,140
特德·沃奈尔(Wannell, Tedd) 176
洛伊德·沃纳(Warner, Lloyd) 80,144
约翰·沃伦(Warren, John) 78,89
M·沃特斯(Waters, M.) 59,79,83,183
W·沃茨米勒(Watts Miller, W.) 61
阶级和财产(wealth, and class) 152-159
戴维·威克廉(Weakliem, David) 77
马克思·韦伯(Weber, Max) 36,37,38,69,80,194,202,其著述中的阶级:参见"阶级分析的韦伯传统"(class in the work of: see Weberian tradition of class analysis)

阶级分析中的韦伯传统(Weberian tradition of class analysis) 3,35-38,55-56,146-147
和精英理论(and elite theory) 201-202
和马克思阶级分析(and Marxist class analysis) 27-29,143-144
作为后阶级分析的先驱(as precursor of post-class analysis) 193-194
中的阶级行动者(class agency in) 37
中的阶级和地位(class and status in) 37,97-98
中的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 in) 226
对其之批判(criticisms against) 48-52
的解释性目标(explanatory goals of) 38-39
中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异(historical variation of class relations in) 228

中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s in) 36 - 37,225
金·威登(Weeden, Kim) 58,60,74,84, 92,93,94
艾略特·魏宁格(Weininger, Elliot) 4, 102,117,128,221
W·威索洛斯基(Wesolowski,W.) 200
马可·韦斯顿(Western, Mark) 79
哈洛德·韦伦斯基(Wilenski, Harold) 71
爱德华·沃尔夫(Wolff,Edward) 2,180
埃里克·赖特(Wright, Erik) 1,2,3, 16,18,19,20,24,35,58,62,76,81,84, 89,136,141,149,150,163,164,169, 170,181,182,185,216,219,227,228
丹尼斯·让(Wrong, Dennis) 205
斯苔沙·扎布斯基(Zabusky, Stacia) 80
欧文·蔡特林(Zeitlin, Irving) 62,88

译后记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教授埃里克·欧林·赖特(E. O. Wright),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于阶级和不平等的相关理论议题研究。这本有关阶级分析方法的论文集,是他整合阶级研究学术共同体智识资源的一次努力。

这本文集200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每一章都由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完成,其最大的特色就是精炼而"切中要害"地介绍了当代最主要的六种阶级分析视角,既包括延续传统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阶级分析思路,也包括布迪厄基于资本、索伦森基于租金以及后阶级分析等理论框架。可以说,无论对已经深谙阶级分析思路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人员,还是对那些有志于从事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研究的青年学子,这本论文集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案头学术参考资料。

我们决定翻译并出版此书,始于几件事情的机缘巧合。其一,2007年7月,赖特教授应刘欣教授的邀请到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访学,他敏锐的学术洞见和充满童趣的幽默性格,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当时担任刘欣教授研究助理、本书的译者之一吴菲负责他的接待工作,与他有过短暂而愉快的接触,并对他的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二,《阶级分析方法》的英文版当时虽刚出版不久,但已被刘欣教授在他为研究生开设的《社会分层研究》课程上使用,本

书的大部分译者都修读了此课，对该书的内容并不陌生。其三，在本书编辑马晓俊博士的努力下，当时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正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有关社会分层方面的丛书，并与刘欣教授商讨了此事。在刘老师的建议下，我们共同担当起了组织翻译该书的任务。

本书的翻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拣选译者、翻译书稿到校对润色，整个过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三年。由于这是一部合译作品，每章的译者在遣词造句和翻译风格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为了确保术语翻译的前后一致性，我们增加了不同译者间的交叉审校环节。

本书翻译的具体分工情况如下：吴菲(序言)，马磊(第一章、结论)，王甫勤(第二章)，马磊、倪笑妍(第三章)，项军(第四章)，赵勇(第五、第六章)。以上诸位，都对本书做出了同等的贡献。遗憾的是，由于书籍编排的原因，在本书封面译者的名单中，并没有把所有朋友的名字都放进来，但这并不表示其他译者的工作量更少。实际上，这些译者均为优秀的年轻学者，也都是我们两位的好朋友，此书翻译的完成，仰赖于所有朋友之间毫无保留的相互支持，两位译者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两位译者相信，这本小册子已成为我们在复旦社会学系结下深厚友谊的美好见证。

我们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马晓俊博士，他专业而耐心的帮助使得本书的出版过程更加顺畅。当然，我们最想感谢的还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刘欣教授，他多年来谆谆不辍的教导以及鼎力的栽培，是推动我们这个译者团队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这本论文集从选材到出版，都凝聚着刘老师的心血。最后，我们还要向授予我们翻译版权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以及负责本书出版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马磊于复旦大学，吴菲于香港中文大学

2011 年 4 月